

序 言

“我们要自由的勇气”；让自由成为信念和行动 我们就会坚强起来。”这话是 1929 年美国俄裔无政府主义者亚历山大·伯克曼写的。无政府主义者对权威的挑战，无政府主义者对自由与和平所抱的希望，并未与伯克曼一起死去。而且它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早期，又重新在美国和欧洲抬头了。

这本无政府主义者著作的文集，是当代参加这一运动的人们自己写的。它和另一本无政府主义者的文献选集——《无政府主义者》——是一致的。《无政府主义者》是由欧文·路易斯·霍罗威茨根据已故的 C. 赖特·米尔斯提出的方案编辑的。在这本早先的著作中，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激进分子已提出了对国家的控诉，对如何走向美好社会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的确，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并未发生，但是，百年来，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在高压和专横统治下产生的种种罪恶的抨击，已产生了相当重要的著作，而反政府的骚动也并不少见。

这本集子的作者代表了极不相同的观点。也许，有多少无政府主义者就有多少无政府主义吧。但是，我相信，在情绪和气质上，有一个核心的东西，把绝大多数的反集权者联合了起来，这就是对权威的不信任，对人民苦难生活的真诚关怀。然而，或许由于无政府主义者对个性的偏爱吧，这个文集里作者之间存在的差异是意味深长的：他们之中有巴黎公社社员和极端个人主义者，有好斗分子和和平主义者，有异教徒和无神论者，有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有克鲁泡特金、戈德曼的年长信徒和年轻一代的活动分子。

编者在选稿时遵循了几个原则：力求提供不是随处可从报刊上得到的材料，提供一般读者通常见不到的资料；希望从无政府主义者的各种见解中——从信奉自由意志论的个人主义者到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者——提取合适的样品；编者还试图使读者从这些稿件中重新感受到过去十年中无政府主义复兴的那种激情和紧迫感。这本文集告诉人们，无政府主义并不只是批判，它还是对新的生活方式的一种肯定。很多文章表明，无政府主义者不仅是真诚的、有时是不知疲倦的活动家，而且还是深思熟虑的思想家。

由编者执笔的绪论，说明了当代无政府主义复兴的历史的和社会的背景。接下来两篇文章论述了当代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性质。乔治·伍德科克这位多产的、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学家，在《无政府主义卷土重来》这篇文章中，对无政府主义的复兴既怀有感情也进行了批判。萨姆·多尔戈夫的《无政府主义与现代社会的关联》一文，在重新考察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与实践这一引人注目的问题上，倾注了高度的才智。再下来是无政府主义左派分子和右派分子的文章。这两派的评论文章都要求改革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虽然方式完全不同。在题为“行动中的无政府主义”这部分包括有出自英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刊物《自由》和《无政府状态》上的各种短篇文章。我以为它们乃是最近时期无政府主义者所写的最漂亮的应时之作。最后一部分提供了三篇著名的论文，它们都宣称无政府主义的批判适用于我们的时代，就象它适用于过去几十年或几百年一样。

显然，这不仅是一本有趣的文献汇集。它里面谈的是年代久远的斗争——为反抗社会压迫和暴政，争取自由和幸福的斗争——在当代的再现。当代无政府主义者的这种向社会挑战的、有时是勇敢的声明，是一个未完成的、也许是永远也完成不了的

史剧的生动篇章。

不仅仅是致谢，而且是同志式的感谢才能和这本书的精神一致。首先应感谢欧文·路易斯·霍罗威茨，是他提出编这本书并且一直予以赞助。感谢保罗·阿弗里奇，这位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学者，他用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来观察生活。感谢纽约市自由意志论者读书俱乐部的成员们，他们对无政府主义的忠诚鼓舞了我。在本书的准备过程中，迈阿密大学的学术研究所通过斯皮罗·皮特逊教务长给了我们所需要的财政援助。我永远是保罗·马辛的学生。最后，向我的亲属致谢。

第一部分 无政府主义的归来

1. 反抗精神的再现

特里·M. 珀林

无政府主义——照字义讲，就是没有政府的社会——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哲学，不如说是一种气质。无政府主义者一直是一些具有反抗精神的男男女女，他们企图组织起来去破坏社会结构。无政府主义对其信徒来说，意味着一场反对邪恶的伟大斗争、一个反对贬低自己的非宗教改革运动，一场反对社会堕落的战斗，而国家似乎就代表了这种社会堕落的思想与现实。无政府主义反对政治，反对权力主义：是一种不断造反的精神状态。

谁是无政府主义者？难道在无政府主义的标签下，把社会上所有的造反者都包括进去吗？十九世纪中叶，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第一个自豪地宣称：“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①但是靠自我声明是不够的，因为无政府主义不是一种传统的政治运动。它既没有党的路线，也没有党员守则。它可以在你想象不到的地方出现。埃玛·戈德曼，这个过去一百年间美国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所下的定义对人们是很有启发的。她说：“无政府主义是指从宗教的统治下解放人类的思想；从财产的统治下解放人类的身体；从政府的枷锁和束缚下解放出来。”^②

无政府主义的造反者从不满足于国家形式的改变；他们要求完全废除国家。无政府主义者多半是些空想家，他们的计划极少

成功，他们既是革命的批评者，又是革命的良心。已故英国无政府主义者赫伯特·里德爵士说过：“社会为了超越它本身而存在”如果这是对的，那么，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艰苦卓绝地、始终如一地奋力争取社会的根本改变。他们是社会上永不满足的少数人，想通过推翻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以求达到人的至善。

历史上，无政府主义者受了两种互相对立的成见的损害。他们曾被看作是扔炸弹的狂人和头脑糊涂的空想家。其实，这都没有事实根据。虽然，个别无政府主义者，特别在十九世纪末，曾企图采取暴力和报复行动，但无政府主义通常是充满理想的少数人的社会运动。在言论和行动上，无政府主义者谴责战争、暴力、工业中的剥削、政治压迫、教育管制、宗教迷信以及经济和政治上的帝国主义。他们体现了一种批判精神。这种精神，一百多年以前，托马斯·卡莱尔在谈论现代世界的特点时，就声称过了，那就是：“对无信义的统治者和骗人的导师们的反抗将无往而不胜”。^③

无政府主义复活了

无政府主义在六十年代和七年代初又回到了欧洲和美国。普鲁东、巴枯宁、斯特勒、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戈德曼 这些十九世纪古典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和实践家的充满战斗思想的著作重新出版了。不过 无政府主义复活的最明显的表现 还不在于重印了他们的著作 如《互助论》或《上帝与国家》而表现在反对国家的具体行动和对政府不信任情绪的增长上，表现在对无节制地发展工业技术的痛恨以及对社会和个人自由的渴望上。

并非所有反政府的活动都是受无政府主义原则的鼓舞的。激进运动的成员中，很少有人具有象那个名叫埃玛·戈德曼旅的吵吵闹闹的男女平权主义者团体所具有的历史感。他们跑到纽约第

五街一个劲地嚷：“埃玛在 1910 年说的，我们今天还要再说一遍。”^④但是在激进圈子内外，却很少有人怀疑无政府主义的异端已经再次兴起。

当炸弹在某一家公司的总部爆炸，当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从苏联逃往西方，当年轻的激进分子和无辜的旁观者在美国政治集会上被警察殴打，当一群擅自抢占房屋者占据伦敦东区的建筑物时，官方的典型反应都是把这些事件贴上无政府主义的标签。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当公共秩序受到威胁，就说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干的。这两个名词通常是被划上等号的。

在美国，当代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件，促使官方去搜寻够格的替罪羊，并且照例要从内部去寻找敌人。由于美国传统的“历史遗忘症”，分析者们把有关劳工争斗，社会和地区的冲突，街头的暴行，不公正的死刑判决等长篇报告都压了下来，而只使用更新的老生常谈。^⑤政治科学家本杰明·巴伯生动地描绘了这幅图画。他说：无政府主义“存在于法国学生运动的口号和旗帜中；存在于纽约市政厅实验室里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制造恐怖武器的业余化学爱好者之中；存在于反权力主义的青年左派不同信仰结合的梦幻之中；存在于街头剧场和青年国际党员可笑的大吹大擂之中。”^⑥无政府主义者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自十九世纪以来几乎没有发生变化。米哈依尔·巴枯宁变成了阿比·霍夫曼，两个人都被描绘成身披斗篷的狂人，手中高举炸弹，满不在乎地随时准备去腐蚀天真的信徒。

历史地看，官方的老一套看法是根本错误的。无政府主义者很少是刺客或炸弹投掷者。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宣传鼓动者，是有思想、有理想的人。^⑦但是，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渴望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六十年代，好多激进分子身上带着夸大其词的标签当作

挑战的标记，以表示他们对现实的非难。就象一个著名的摇摆舞团体形容的：

我们是混乱和无秩序的军队，
人们说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我们并且为此
感到非常骄傲。^⑧

造反者和他们的敌人就这样彼此具体化了。无政府主义者以自己的非法而自豪；政府当局则利用逮捕、折磨、公审以及宣传等手段来履行他们对现状承担的义务。通过臆造的斗争产生的小争论往往是显得离奇的——芝加哥七人的审讯就是明证。而对抗的偏见并以此自豪则不过是无政府主义复活的一小部分。鼓舞这个激进运动的是它的一整套理想和要求变革的意识。

自普鲁东和巴枯宁以来，无政府主义设计了一些新的生活方式的模式：一种建立在废除权威、在社会团结的自愿约束下，个人自由得到发展的愉快、纯朴、和平、人人平等、和谐的公社生活。怎样达到这一目标至今还是一个问题。十九世纪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在专制社会的环境里成长的。他们认为，革命、而且可能是暴力的革命，是社会变革不可逃避的方式。他们不愿象马克思主义者所要求的“等待‘条件成熟’”极力主张现在就革命。他们通过言与行的宣传，希望把群众动员起来，形成一股革命力量。把言辞激烈的小册子偷运过国界，在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中间搞鼓动，甚至搞暗杀活动，这些为的都是同一个目的：向人们指出不自由并不是注定的。那些为自由而斗争的人们是能够得到它的。正如亚历山大·伯克曼所说：“我们的社会制度是建立在某种观念上，只要这种观念普遍被人们相信，建立在这种观念上的制度就是安全的。政府之所以仍然巩固就是因为人民认为政治权威和法律强制都是必需的。”^⑨

破坏政府的必要性这种观念，至今是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目标。近代的新左派、新右派和反主流文化的鼓吹者都被这样一种假定所激励，即人们的意志产生的理想能够实现革命的转变，因此，无政府主义具有不妥协的特性，一种道德上的绝对主义，它的强调个人行动也使它成为对青年人具有吸引力的哲学。就象克雷孟梭有次幽默地说出的：“我为每一个到二十岁时还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人感到惋惜。”^⑩

新左派的口号——学生权 黑人权 工人管理 社区管理 妇女自由——远不止是对近代社会和经济变化的反应：它们体现出对思想力量的肯定。无政府主义者（在十九世纪）强调面对面作出决定而保持其活力的“分享民主制”，也是制定托马斯·杰斐逊原则的一种力量。新左派希望提出问题以唤醒公众舆论和动员被压制的少数派。正象《左派研究》杂志的两位前编辑所说：激进分子希望“提出人类自由概念的基础，以表明社会关系需要重新安排”。^⑪

象十九世纪许多理想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那样，新左派发现他们难以在工人阶级中获得同情和关注。他们更多的是从摆脱了幻想的知识分子阶层中，从一旦识破资产阶级伪善的学生们当中，从先锋派的艺术家中，有时，还从觉醒了的少数派成员中吸收新成员。象他们的先行者一样，新左派被诽谤、追捕和辱骂，被赶入地下，有时 还被监禁起来。

从历史和意识形态上来说，新左派这个词实际上是一个隐晦的用语。它所指的活动分子包括从本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民权抗议者到七十年代的各地下激进党派。它范围广泛，从黑人分离主义者、工人管理的鼓吹者到大学改革者以及免费学校的组织者。它们千差万别，是自发性把新左派联合在一起的。它和老左派的区别就在于它没有一种强制的正统思想，没有已指明的革命道路。

的确，新左派中有一批清教徒似的狂热和恪守教条的马克思

主义者，包括从进步劳工党到黑豹党里的某些成员。就思想的统一以及为净化思想而进行的内部斗争而论，新左派和老左派是一样的。新左派令人感到惊奇和新鲜的是它缺乏确定性和计划。与此相反，人们发现他们对社会改革采取一种实验态度，愿意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去看待它们（“事物是怎样就说它是怎样”）而不受教条的约束。就象旧金山一个名叫“挖掘者”的鼓吹公社制的团体所警告的：“谨防那些领袖、英雄和组织家，留神这伙废物。警惕那些结构迷。他们不理解、而我们知道体制之不起作用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废墟上。”^⑫当霍华德·吉恩，这个新左派最有学问的活动家之一，把他的目标说成是尽力“参加一点点我们时代的社会斗争”^⑬时，就表明行动的谨慎。这种志向——稍事参加并尝试革命活动——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工作。在信奉灵活多变的策略和避免思想上的划一方面，它保持了无政府主义者自发性的特殊风味。

无政府主义者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从完全的共产主义到同样狂热的个人主义，其间又有各种各样的处方，从无政府工团主义到无政府资本主义。各种无政府主义者范围之广泛，可从新右派产生的现象中看到其最近的标记。一些自命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取名“激进的自由意志论者”，是从美国保守的青年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他们以拥护自由的年青美国人（YAF）著称。他们提出一种反政治的纲领，要求把终止公众教育、征兵、赋税、“抢劫”以及对个人自由的压制作作为全国的主要任务。但是在私有财产的问题上，新右派不准备向他们的对手新左派让步。

奇异的反击姿态显现了。一个早先的保守主义者，成了自由意志论者默里·罗思巴德和卡尔·海斯的追随者，成了完全自由经营企业的信奉者。他把自己看作是无政府主义者并且宣称：“部队征兵必须被看作是今天存在的最野蛮和不公正的政府制度……自由意志论者应该在全国各地和抵制服役的人们结成同盟。”^⑭

我自己就遇见一个右派律师，他献身于自由意志论者的事业：组织纳税人抗税，办理有关公民自由权的案件。还撰写修正主义的文章，谴责美国发动冷战。他欢喜一种反文化的生活格调。跑到一些大专学校去进行宣传，编了一份无政府主义的月刊，对无政府共产主义表示深切同情。当我问他这种工作如何与他作为一名律师的工作相一致时，他回答说：“我们要用法律去摧毁法律。”

无政府主义的动力可以从所谓反文化运动中看到。无政府主义者在穿着打扮、家庭生活、性道德和公众形象方面往往是放荡不羁的。当代的“颓废派”看上去与其说象穿着整洁的、资产阶级化了的马克思，不如说更象那个完全不修边幅的巴枯宁。然而把新文化与无政府主义连结起来的不只是外貌。

许多青年人在向现代工业社会的主要趋向——都市化、划一化、工业技术进步引起的效率、计划化和合理的社会改革——挑战时，抛弃他们家里的那些理想。这不仅是一代人的造反。这场战斗更接近十九世纪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小说中对价值的全盘否定。强调人的感觉经验、面对面的冲突、公社生活，这些都与前辈无政府主义同志们的追求有相似之处。

象其他异端运动一样，反文化运动注定是短命的。既存势力轻而易举地收买了反文化的人们或使他们改变了信仰。但这一运动产生的影响是无可争辩的，尤其在价值领域。每个拒绝入伍的青年人，每个拒绝在郊区过与世隔绝的小家庭生活而寻求社会和谐的家庭，每个欣赏自主政治行动的可靠性、而反对政党政治的权威的年轻造反派，都表现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特色。

年轻的造反派往往受到挫折。趋势对他们不利。政府变得更强有力，它管理老百姓的权力更大了。西德的鼓动家们，荷兰的卡包特斯，法国的丹尼尔·科恩-本迪特的追随者在危难中懂得了：革命的机会少得可怜。但是，象十九世纪俄国的一代无政府主

义者一样 他们经常问 怎么办？

在什么地方行动？行动的适当舞台在哪里？是应当留在城市还是应该在荒野上创造一个新社会的缩影？这种辩论并不新鲜。哈里·凯利 这个埃玛·戈德曼在二十世纪早期的门徒，就曾劝说过那些想离开城市战斗舞台的无政府主义者。但几年以后，他自己就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农村草地上建立了一个最成功的和永久性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聚居地。他发现，在警察经常的干扰下，要使工人阶级改变其信仰是没有指望的。他把无政府主义引向一个方向：在自由意志论者学派的基础上，创立一个小型的、互助合作的社会^⑮。

无论老无政府主义者还是新无政府主义者，都一直被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指责为反动派，指责他们向后看，以求延缓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如果进步是指无限的都市化、自动化、异化和通过经济与权力的集中来协调人类生活的话，那么，无政府主义者确实寻求、并且一直期望制止现代化的趋向。不过，罗伯特·尼斯比特 这位保守的社会理论家发现：无政府主义者早就认识，并且一直在探索两百年来最关紧要的社会问题之一，即对公社的探索。尼斯比特说：克鲁泡特金和他的继承人为一个“真正的和持久的公社”坚持不懈地工作。他们想建立一种无结构的结构，“就象乡村、自治团体和自治区那样，人与人之间有一种非常天然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且，在人的智力和手工技能方面，也有一种天然的分工。”^⑯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并且一直到今天，许多青年人，也有一些老年人在“回到田园”的新浪潮中，离弃了城市。这不仅仅是由于厌恶可怕的城市生活，多数人是想从接近土地的生活中求得纯朴和内在的美德。另外一些人则想建立一套经济管理办法以实现人们的彻底平等。他们厌恶竞争的资本主义，对正统的社会主义保持等级制度的做法同样感到失望。新的巴黎公社社员们追求一

种“天然的”经济秩序。其中很多人甚至今天还继续过着克鲁泡特金在《互助论》、《田野、工厂和作坊》中所描绘的那种生活 没有人占有财产，食物是公共的，工作是为了集体而不是谋私利，虽然和外界经常有商业上的来往，但目标是自给自足。这种公社绝大多数在经济上都失败了。

但归根结蒂，公社运动是要给劳动重新下定义。一些年轻的“先驱者”常常不知不觉地把马克思早年对劳动异化的否定付诸实践。其中很多人经常穿着想象中农民穿的衣服，甚至说话也模仿农民 过着马克思所描绘的朴素共产主义的生活：“早晨打猎，下午捕鱼 晚上喂牛 晚饭后有兴致时 搞搞评论 而不是永远作猎人、捕鱼人、牧羊人或者评论家。”^⑩这几年，无政府主义者被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所吸引。他们声称，马克思对异化的厌恶，对工业发展中人的问题的富有同情的处理，都不同于他后来的教条主义和党的刻板态度。很多无政府主义者走向工团主义——正象十九世纪末他们在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先行者那样——并且极力主张工人自己管理经济。

没有一个组织，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进行过如此彻底和激烈的攻击。当代的评论家默里·布克勤，赞同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并且和埃玛·戈德曼、亚历山大·伯克曼说同样的话，而这两个人是向世界报道 1917 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后苏维埃政权暴行的首批激进分子。今天的无政府主义者——从他们对东方和西方国家制度的谴责看，他们实际上是超党派的——指出国家工业计划一点也不比无控制的竞争好：二者都浪费资源，都剥夺个人自由，都产生不平等和特权。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民族国家保存和分配权力，而他们则要消除权力。

无政府主义的核心是要从道德的立场，而不是从“法律”的立场来看待经济制度。因此，意见纷纭就成为这一运动的特征。有

些自由市场无政府主义者，经常又被叫做无政府资本主义者的，主张完全自由的放任主义。在他们看来，只有允许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才能保证个人自由。允许国家在经济生活中起任何作用会取消人们得到自己劳动果实的天然权利。另一方面，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们则提倡彻底废除私有财产。在他们看来，财富的垄断是权力集中的先决条件，因而也是一种罪恶。他们期望出现一个公社的实体，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它将保证所有人获得生活手段。在这两种看法之间，还提出了许多其他方案：工团主义、互助主义、集体主义以及各种混合配方。

由于无政府主义者的经济方案含义不清，前后矛盾，因而他们在对待社会变革的态度上也产生了混乱。例如，他们把法国和俄国的革命看作人类解放的大事，承认工业社会的发展使工人阶级的力量得以显示出来。很多人讴歌机器，认为它是被异化了的工人阶级的潜在的解放者。但是，所谓进步也并非不被腐蚀。俄国革命就演变成令人厌恶的专制制度，机器现在则象征着奴役而不是自由。发展带来了生态上的梦魇。

这样，无政府主义者就继续在一会儿赞扬，一会儿又厌恶现代性之间摆来摆去。他们认为现在的工厂是会存在下去的，但又留恋农村公社。在他们期望形成一个现实主义的观念的过程中，令人恐惧的现在和被理想化了的过去，彼此消长。所以，无政府主义者可以是一个深刻的社会评论家，但是对经济行动，难得有切合实际的、具体的引导。

虽然无政府主义的幻想变化了，但无政府主义对社会问题的抨击则引人注目地始终保持一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拒绝投票，拒绝把自己和任何政党或改良主义运动联在一起——直接地抨击非正义行为，而不乞求有更多的法令、委员会或政府的行动。1940年去世的埃玛·戈德曼是妇女解放运动、节育运动、免费学校

运动和结束资产阶级婚姻的斗争的奠基人。^⑮ 她的批判和推进立法或改革司法无关：她抓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许多现代的激进分子是她的信徒。

可以用妇女解放的问题来说明我的论点。真正激进的妇女并不要求有更多的法令或者在企业、政治的或教育的机构中有更多的女性代表。这些事是无关宏旨的。真正激进的男女平权主义者寻求的是根据新的原则评价男女之间的关系。他们要求消灭权力不平衡的婚姻制度，消灭女方在婚姻中扮演某种角色的要求。他们同样要求男性的解放。有如两个激进的妇女所宣称的：

性与爱情对女人来说，早已被经济上的从属地位所玷污，以至于——
锤子买卖的恋爱与婚姻看上去象是上当和受骗。我们分不清楚我们需要从男人那里得到什么和要给予他们什么，除非我们知道我们的身、心（在家里和在工作中）是不依赖于男人的。象所有被压迫的人民一样，首先，我们需要的是自主。^⑯

人们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这是无政府主义的前提。国家通过堕胎的法律，干预到私人的领域中来。国家由于在人的关系中的特许地位而得以侵犯人的基本权利。自由恋爱的提倡者——提倡废除结婚，因而也废除离婚——并不是古怪或反常的人。他们是自由本身的拥护者。

有些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革命尚未迫近，于是试图用别的方法进行社会的基本改革。他们的主要前提是：改造人们的心灵应从儿童开始。他们这样假定：在无政府主义原则下快乐地成长起来的新的一代孩子们可以作为新生活必不可少的价值标准改变的第一步。百年来，无政府主义者——从巴枯宁到保罗·古德曼——极力主张教育自由。学校——由政府开办和管理的——都是灌输国家权力论的工具。即使它们不是那么“爱国”，宣扬的也都是既定的价值标准，诸如经得起竞争、有社会地位、性的抑制和商业伦

理学。在美国，最老的免费学校——新泽西州斯代尔敦的“现代学校”（Escuela Moderna）从 1915 年起至 1950 年止，整整一代儿童产生出来了；他们令人惊奇地摆脱了竞争和好胜，而这正是绝大多数公立小学毕业生的特点。今天数百个免费学校中的许多学校，在类似的前提下工作。这个前提就是：改变世界必须从头开始而天然的工具则是孩子^⑲。

这类计划试图用新的原则来衡量价值。无政府主义的敌人宣称，这完全是虚无主义。一些评论家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在他们热衷于摧毁权力的过程中，想要摧毁男人中间的传统约束，这种约束是社会的安定和团结所必需的。然而，很多无政府主义者是信教的（就这个词的广义而言）他们愉快而自觉地奉行宗教仪式。他们许多人是托尔斯泰的信徒，托尔斯泰是最早把信仰上帝与坚定地反对国家权威结合在一起的那些人们中间的一个。有一个信教的无政府主义者要求制定符合圣经的原始道德：

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对待别人就象我们希望他们如何对待我们一样。彼此相爱，互相宽恕，不要搞审判，不要去寻求赔偿损失费，应时时关心他人更大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欲求。^⑳

这种宗教的理想主义常常引向和平主义。很多无政府主义者的非暴力行动主义揭穿了关于无政府主义本身就是暴力的成见。从梭禄到托尔斯泰到甘地，无政府主义者和权力分散论者显示了不抵抗的方法，即用非暴力反对暴力的方法，能在广泛的社会范围引起人们良心上的反应。当然，这种非暴力活动，不能造成一个无政府主义的革命：由甘地的斗争而产生印度国家，^㉑但是埋藏在理想之中的反抗传统是存在的。

从六十年代早期，以美国民权运动为起点，接着是越南战争直到现在，无政府主义的团体，特别是天主教的工人运动，都是采取和平主义的方法。过去十年，反对征兵的人们，出于对非正义战争

道义上的厌恶，他们去坐牢或者逃亡国外，以此表明他们拒绝合作，忠于和平主义的信条。所有那些在国家的强大权威面前变得软弱而不予以回击的抗议者们，未必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是他们的行动有助于加强无政府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的目标之一：困扰国家，把它作为一种不道德的力量暴露在公众面前。1968年在芝加哥举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时，达里市长的警察殴打示威群众，逼得群众不得不自发地大声呼喊：“全世界在注视着……全世界在注视着。”

无政府主义的伦理主义，引向既空想，又教条的立场。比如，无政府主义者对待政治的态度是明确的：政治牵涉权力和权势的分配，无政府主义者既然蔑视权力和权势的代表，他们就不会有政治舞台，不会有利用国家的任何计划。无政府主义者无视参政权，不象马克思主义者，妄想以增加选票作为夺取政权的手段。无政府主义者贬损任何使政府权威合法化的方案，以及任何象征个人自由系由政治实体授与的方案。

这种教条主义有相当大的价值：它既产生一种政治批评，又产生一系列消除权力集中的具体方案。六十年代末七年代初，无政府主义有了反政治的情绪。留意一下这十年和政府联系在一起的一些惯用语吧：撒谎者、可靠性之间断、帝国主义者、半斤八两、水门、空白磁带、弹劾。真实生活中的事件是和一些口号相适应的：越南战争，官僚政治的全面和大量的增长，公开发表五角大楼的文件，审讯抗议者，把对法律作狭义解释的人，充塞到最高法院的打算，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无所不在的窥探，公务人员受贿事件的不断泄露，自然，还有总统犯有重罪或轻罪的证明。同往常一样，所有这些造成了对政府的极为不满的情绪。很多非无政府主义者不喜欢华盛顿，这点是清楚的，但是在国家权力的用途问题上表现的普遍的悲观主义却增强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地位。

历史上，无政府主义者曾经不得不对政府持怀疑态度。自由的和保守的政权——从陷害乾草市场“骚乱者”的美国边疆到迅速消灭敌对分子的沙皇俄国——对待无政府主义都是用同样单一的方法。其结果，无政府主义者没有理由要求去尝试那些被认可的政治方法：他们责难选举权，他们不愿参加联合政府（虽然也有极少数引人注意的例外），他们喜欢“直接行动”甚于马基维利的权谋。无疑，无政府主义者的陈腔滥调经常是夸张的，这可能是他们处境孤立的结果。例如，最近说什么“无政府主义者 [必须] 认识第三次世界革命确实正在进行中，因为他们是在这个巨兽的肚子里。”^②

然而实践较之浮言锦语更能揭露问题。正如已故的保罗·古德曼特别提及的“(无政府主义者)相信地方权力、社区的发展、乡村的重建，分散的组织。”^②古德曼作为务实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出类拔萃的。他制定了美化纽约市、使教育制度富于人性、使社会生活分散化的规划。他的著作激励许多人去思考并采取具体行动。有些人离开了城市，有些人试图通过社区组织来向官僚政治挑战。大多数人则对“合法程序”对行政官员和从事专门职业的人对被授权解决地方问题的遥远的机构一概表示蔑视。古德曼指出：“所有这些显示了克鲁泡特金的公社无政府主义，马拉特斯塔的抵制的无政府主义，巴枯宁的骚动的无政府主义。”^②

无政府主义的极端主义和强烈的理想主义似乎是和乌托邦的传统连结在一起的。从这个观点看，无政府主义是一些怀有希望的空想家的混血儿。他们的王国既不在、也不是这个世界。这一评论是有根据的。在无政府主义者中间，不乏关于天启预兆以及和谐美景这二者的天真说教者，而六十年代末期和七十年代早期的社会冲突又似乎证实了无政府主义的分析，并给无政府主义观点的大门打开了一条缝隙。青少年纷纷离开学校，一个缺乏阶级

意识的无产者的新阶层充斥了街头。近代技术并不能提供那种大事宣扬的灵丹妙药。这十年的教训带有无政府主义的味道：对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国家的信任感已几乎被摧毁，分散权力变成了一种普遍的观念，自由恋爱、节制生育、堕胎已成为事实而非口号。一种新的田园风味吸引年轻人回到田地上去。公社到处出现了。

所有这些现象——有的是暂时的，有的则是相当基本的——在以前都是见过的。无政府主义复兴时期独特的地方，就在于这些现象都汇合起来发生在短短的十年之内。没有发生革命，可是充满了造反的气氛。

新奇的传统

无政府主义醉心于混乱，差不多可以下个定义说它是一种无体系的社会哲学。生活在目前这个时代，无政府主义者对以往和未来都感到迷惘。埃玛·戈德曼反对向前看得太远，“因为我相信无政府主义不能始终一贯地把一种严格的计划或方法强加于未来。问题是每一代都必须战斗，而最不易克服的是因袭的负担，它把我们所有人都装在一个网里。”²⁸憎恶过去使人联想起无政府主义者对待历史的态度。历史（不幸的）是必须去研究和理解的事情，而这又并非是合乎人们志趣的事。往事被蒙上了许多面具——宗教的传统、世袭的权力、经济上的继承、习俗的因袭——这一切都模糊不清并给人类自由增加了负担。马克思的信徒们想通过掌握历史的知识来求得自由，无政府主义者不同，他们试图超越历史的锁链。他们主张自发性、冒险主义、与旧事物决裂、不守纪律、不服从历史‘规律’。

现代无政府主义对旧事物、旧传统和过时的东西也表现出一种蔑视。现代公社主义者试图与工业化、官僚化和均匀化的发展

趋势断绝关系，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和二十世纪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天主教的激进分子要把他们教会里的毫无意义的蒙昧主义抛在一边，去发现表达宗教感情的新形式。年轻人的文化运动否定了父母一代的价值观念、露骨的实利主义的生活方式以及资产阶级积累起来的一套规章制度。无政府主义总是肯定新的，反对旧的。

严格地说，这种或许是不自觉的先锋主义，并不是反对历史，而只是漠视历史。老一辈无政府主义者，象戈德曼和伯克曼这一代，很少有人是学者，但是他们之中最著名的则是知识分子，他们不论男女，都忠于自己的理想和表达方式。他们是作家、新闻工作者、小说家、演说家、咖啡馆里的辩论家、宣言的撰稿人，自然还有政治活动家。国家是他们的敌人，国家的历史也是他们的敌人。今天，还有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蔑视过去已被对它的无知所代替。目前，无政府主义者最好的作品都是与历史无关的。默里·布克勤写的《匮乏时期后的无政府主义》描绘了对无政府主义者进行鼓动的极有利的现在时机，并系统地勾画出工业技术发展给无政府主义者带来的丰饶的未来，却不考虑过去。他的书几乎不提克鲁泡特金或巴枯宁。而这两个人有很多想法和布克勤的类似，^②提出得也早。一种与历史无关的觉悟是不怕无视其前辈的。“抓紧时间”；“现在就要获得自由”这都无求于先辈。

哲学上的理想主义和纯粹的伦理都为与历史无关的觉悟提供了支柱。良好的社会、自由的生活、个人和集体的结合与合作——这些获得幸福的条件，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是一样的。跟重视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无政府主义者对真正的社区有一种顽强的、非能动的想象力。如同乔治·伍德科克所形容的无政府主义者描绘“一种社会美景，在那里，每种关系具有道德特征而非政治特征。”无政府主义者的绝对忠实和固执，使他们重复这种意

为什么要等待？为什么要参加过时的机构？不要理睬过去！

但是这个决裂——从沉溺于无政府主义的传统到不顾历史传统的现代主义——在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核心有其根源。无政府主义是对自由的寻求，是对结束那种压制一切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暴政的一种探求。甚至古德曼也承认：情况在变化，一切在不断地变化。无政府主义者不怕这个。不断肯定新事物并不违背无政府主义的基本原则。

因此，我们对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无政府主义的复兴没有引起一种特别的怀旧之情，并不感到奇怪。关于更早时期的活动，象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劳工搏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反征兵运动、萨柯和范齐蒂的抗议，在人们的记忆中是很模糊的。倘若往事已明显地结束，无政府主义者又如何理解这一复兴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前辈，还有他们在欧洲的许多战友，不是衰老就是离开了人世。他们的后代成长起来了，残存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分子要么偃旗息鼓，要么在大恐慌的年代，加入了托派反斯大林的活动。目前这个新时期无政府主义的鼓动，和无政府主义的老传统并无实质上的联系。很多年轻的激进分子仅仅知道巴枯宁或克鲁泡特金的名字，而对先前时期欧洲的一些好斗分子则不加注意。他们把无政府主义看作是“新东西”，看作是美国和欧洲的人们对生活在那里的改变了的社会结构条件的一种回答，看作是过去十年由于社会结构、文化和心理的紧张状态而产生骚动和造反活动的一种反映。

当代无政府主义是备受社会争斗之苦而崩溃了的建筑物上的一个断片。特别在 1963 年约翰·肯尼迪被暗杀之后，建立在彼此协调基础上的美国社会看来已经破裂，一些通常是平静的机构，象大学、黑人或其他少数民族的聚居区，甚至教堂，看来都很难团结在一起。林顿·约翰逊总统在任满一届后实际上被迫离职，另一

个则在任期内就被赶下了台。一场无益的对外战争熬到最后毫无结果地结束。种族冲突、世代冤仇、迅速都市化带来的压力、环境的破坏、艺术上的虚无主义、两性之间的不正常关系——所有这些可怕的事情都象征着文化处在危险之中。

有些老一代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四十和五十年代一直在等待着。人们新的不满情绪似乎证实了他们长期持有的怀疑观点。举例说，1970年春，一些上了年纪的戈德曼和伯克曼的信徒跟我讲，他们看到学生在造反，反战活动蓬勃发展，人们对政府强加的解决社会问题方案普遍采取藐视态度，感到很高兴。新的重点转到了学习直接经验，实验农村公社，发展性解放和自由意志学派上，这似乎向这些七、八十岁的无政府主义者证明，一旦社会结构的腐朽成为明显的事实，有着高度觉悟的年轻人就会沿着无政府主义的路线行动。

否定资产阶级的道德规范，对他们来说，似乎是一个新的梦想的开始，而且是现实的。美国工业文明的真正的成就将引起权力分散趋势的反应。冷战（它被公认是由政府系统指挥的）的结束将带来一个真正的和平时代。国家权力已达到了它的真正的限度，一个无依靠的巨人是易于被肢解的。

很多不太自信的公民，在不小程度上受到报纸、无线电和电视警告的天天轰击后，也同样相信，内部争斗是不可避免的。1968年夏季的巴黎暴动是一次青年人的叛乱，它使很多人，包括戴高乐总统在内，都感到震惊。尽管有叛乱，但法兰西共和国依然存在。在理查德·尼克松离职时，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早期的激进主义似乎已再次夭折。校园平静了下来，越南战争在呜咽声中结束，少数民族和穷人撤回了他们的纠察员。妇女解放运动，由于它的中产阶级基础，走向了改良主义。

但是事情并不全是这样简单。回过头来稍微想想，并不能

出结论说，十年造反的行动主义既不真实也无关重要。当然，各个大国并没有被推翻，权力没有被分配，价值观念也没有象闪电似的改变，乌托邦没有实现。但它已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时代的渴望是真实的而无政府主义者的贡献是极其重要的。在社会文化方面具备了某种更易的可能性。十年喧嚣生活的压力打开了一个缺口：人们可以听到先前沉默不语的各种小集团的声音了。黑人、奇卡诺人、波多黎各人、美国人、穷人、妇女、同性恋者、和平主义者、脱去法衣的僧侣和尼姑、学生、逃避兵役者——这些在前一时代很少见到的人，不仅大出风头，而且取得了某种反正统的地位。这些以前被人瞧不起的社会人物能从最不受重视的地位走向最引人注目的地位，起作用的主要是无政府主义的反政治倾向。

明白地说，正是这一缺乏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这种在圈子外的非阶级群众，马克思曾嘲讽地称之为工业社会的游民，现在已具有政治上的意义并引起了人们的实际兴趣。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就是对着这群人讲话的。默里·布克勤就专门为他们写作。也许是天真吧。他相信这些无依无靠的人会跟着无政府主义的海盗旗帜走，而那些生活较好的工人则不会如此。这些人厌恶正常的、合法的政治制度或经济计划，他们已获得了一种新的动力。重新露头的无政府主义把那些往往不为人们注意的、可供选择的方案清楚明白地显示了出来。革命虽然没有形成，但采取革命的生活方式已是可能的了。虽然民权运动或者反战运动已经消失，但是他们造成的最低限度的成果并未消失。正如马克思也许会承认的那样，一部分上层建筑已表现出自己的生命。

而且，在谈论一些日益为人们关心的问题时——不论是节制生育、自由恋爱、免费学校还是世俗宗教——其主要发言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是他们的同情者。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把这一时期看作是无政府主义复活年代的原因。最没有前途的一群人再次受

到许多人的注意，奇异再次变成正常。旧的一些解决办法都被戳穿、被暴露了。这也许还不是革命，然而它是一种特殊性质的造反。“水渗进了满是孔洞的土地。”乔治·伍德科克关于无政府主义者的理想的这个生动描述，可以用来说明无政府主义的复兴。他说无政府主义是“一股强大的地下水，它注入池塘的旋涡之中，慢慢地流经岩石的罅隙，从视野中消失，然后又从社会结构中的那些裂缝里冒了出来，作为一种学说它经常变换，作为一种运动它发展、分裂、不断地上下波动，然而它永不消失。”^{⑤⑥}

在《无政府主义者》这本早期无政府主义者著作的文集的附录中，欧文·路易斯·霍诺威茨把这种激进的对国家的批判说成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他说：每个时代都有其自己的危机，所有时代都处在危机之中。“然而，现代世界有一种特殊的、独一无二的危机感。这种意识部分来自无政府主义者和各种激进思想家的批判。……霍诺威茨认为，这种新奇意识的中心是‘权力与原则之间的矛盾’”。无政府主义把这个分歧之点鲜明而大胆地提了出来。

不断抨击弊端、向往正义的无政府主义，会继续出现复兴，直至权力消失而原则得到谐调之时。

注 释

普鲁东，乔治·伍德科克在《无政府主义：自由意志论者的思想和运动》中所引（克利夫兰：子午线书店，1962年），第12页。

埃玛·戈德曼：“无政府主义”见《无政府主义及其他论文》（纽约：大地书店，1911年），第68页。

卡莱尔，卡尔·洛维斯在《从黑格尔到尼采：十九世纪的思想革命》中所引（花园城：锚书店，1967年），第181页。詹姆斯·乔尔赞同说无政府主义基本上是人们的一种精神状态。“如果有一种活的无政府主义的传统的話，它应从人们对待社会的心理和气质的态度上去寻找，就象对无政府主义在其中得到繁荣的社会进行社会学的分析那样。”无政府主义——一种活生生的传统”，见戴维·阿普特和詹姆斯·乔尔编《今日无政府主义》（花园城：锚书店，1972年），第269页。

亚历克斯·凯特斯·舒尔曼编《红埃玛言论：埃玛·戈德曼演说及著作选集》

的绪论 纽约 葡萄酒书店,1972 年》第 5 页。

⑤ 参阅特德·罗伯特·寇尔:《美国暴乱史》一书绪论 纽约 矮脚鸡书店,1969 年)第 14 页。

⑥ 本杰明·巴伯:《超人和普通人 自由、无政府状态和革命》(纽约 布拉吉尔公司,1971 年)第 15 页。

⑦ 我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基本上是一些理想家。详见“崇高的事业:无政府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波克夏评论》(1972 年冬季号)第 21—31 页。

⑧ 杰斐逊·埃尔普兰,引自阿瑟·罗斯泰因《我们宣称……新左派的哲学》(纽约:摩羯宫书店,1971 年)第 11 页。

⑨ 亚历山大·伯克曼:《什么是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纽约:前卫出版社,1929 年)第 5 页。

⑩ 参阅詹姆斯·乔尔:《无政府主义者》(纽约 宇宙丛书 1966 年)第 279 页。

⑪ 罗纳德·阿让逊和约翰·C.克劳里:“美国的新左派”,见阿瑟·罗斯泰因:《我们宣称》第 43 页。

⑫ “自由城”见彼得·斯坦西尔和戴维·Z.梅罗威兹编《用任何必要手段:亡命之徒的宣言和朝生暮死者 1965—1970 年》(哈门斯沃思 企鹅书店,1971 年)第 49 页。

⑬ 霍华德·吉恩:《历史的政治学》(波士顿 烽火出版社,1970 年),第 3 页。着重点是我加的。

⑭ 杰罗姆·图西里:《激进的自由意志论 新的政治抉择》(纽约 哈珀和罗公司,1970 年)第 100—101 页。

⑮ 哈里·凯利:《弗里现代学校》(新泽西州 斯代尔顿 现代学校,1920 年)。

⑯ 罗伯特·尼斯比特:《社会哲学家 社区及西方思想中的冲突》(纽约 克劳威尔公司,1973 年)第 382 页。

⑰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刘易斯·弗雷尔编《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和哲学基本著作》(纽约 锚书店,1959 年)第 254 页。

⑱ 这不是本选集的主题,因为它已远远超出了无政府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范围。然而它有助于人们想起近来在这一主题方面的绝大部分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的著作。

⑲ 康妮·布朗和简·赛兹:“伙计,你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历史的透视”见罗宾·摩根编《妇女联合就是力量》(纽约 葡萄酒书店,1970 年)第 28 页

⑳ 参阅特里·M.珀林:“新泽西州的无政府主义:在斯代尔顿的弗里侨民”,见《新泽西州的历史》(1971 年秋季号)

㉑ 内维尔·福勒:“无政府主义的宗教观”见《自由》第 32 卷 17 期,1971 年 5 月 29 日。

㉒ 参阅欧文·路易斯·霍洛威兹:《无政府主义者》的绪论(纽约:幽谷书店,1964 年)第 55 页。

㉓ 史蒂夫·霍尔布鲁克:“北美的无政府主义 问题与任务”见《无政府状态》第 8 期 第二套,1972 年)第 6 页。

②④ 保罗·古德曼引自阿普里尔·卡特：《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学说》（纽约哈珀和罗公司，1971年），第9—10页。

②⑤ 出处同上。十九世纪的无政府主义的著名思想家没有任何人给新社会哪怕画过一个轮廓。

②⑥ 理查德·德林隆摘引埃玛·戈德曼为《无政府主义及其他论文》作的新绪论（纽约多佛公司，1969年），第13页。

②⑦ 默里·布克勤：《匮乏时期以后的无政府主义》（伯克利壁垒出版社，1971年）。此书或已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新著中最有影响的一本。

②⑧ 乔治·伍德科克：《无政府主义 自由意志论者的理想和运动》（克利夫兰子午线书店，1961年），第17—18页。

第二部分 复活

“不管怎样，人类总是满怀希望，生活也总是充满了希望。”这话是无政府主义诗人和鼓动家伏尔泰兰·德·克莱尔在本世纪初写的。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特殊的理想主义。它在批判上的挑衅态度，是和它对一个互助、和平和幸福的未来世界的幻想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那些了解自己运动历史的无政府主义者很容易走向幻灭，但绝大多数人却没有。六十年代后期，和我交谈过的一些七、八十岁的无政府主义者仍充满着激情和热忱。他们的希望并未破灭。

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对抗的政治力量之所以能够持续下来（而且作为一种运动活跃达一百五十多年）在于它的“动力”基本上是符合道义的。个别激进分子的暴行，他们对社会不平的深切感受，并不是来自某种深思熟虑的政治或经济的理论，而是来自对中央集权下经济统制的不义行为的忿怒和怨恨。几乎在每个时代，都有一些敏感的、对现实不满的人。

而且，无政府主义从来是极少数人的运动。尽管无政府主义者经常以整个社会或至少是工人阶级的名义发言，他们却遭到了人们的抵制、轻蔑、有时甚至是完全的漠视。但是他们仍然坚持着，就象在过去十年那样，每当时代产生裂缝，人们就会听见他们的主张，他们的主张就会传播开来，甚至成为人们行动的根据。

乔治·伍德科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活跃于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中。他写过许多有关无政府主义“大师们”，比如蒲鲁东和克鲁泡特金这样一些人的著作和传记。

他是《无政府主义》(1961年)这本最著名的书的作者。1968年他在《无政府主义卷土重来》这篇锐敏而又带点怀疑态度的论文中描述了无政府主义的复活。伍德科克试图从早先无政府主义者的实验和他们反对权力的斗争中总结出某些教训,用来教导年轻一代。

萨姆·多尔戈夫满怀激情的论战性著作《无政府主义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一文写于1971年。多年来,他是美国极小的、往往只有二、三个人的无政府主义小组的成员。多尔戈夫把无政府主义作为一个重建社会的纲领提了出来。在他的著作中,突出了道德方面的准则,然而也要求在一个日趋复杂和难以管理的社会上,对无政府主义的分权说具体化,强调其效用。多尔戈夫的灵活性与乐于尝试新思想、新技术,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对待实验主义的典型态度产生的。

2. 无政府主义卷土重来

乔治·伍德科克

目前还有数以千计的无政府主义者零星地散布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中。无政府主义者小组、无政府主义的刊物、无政府主义的学派和无政府主义的团体依然存在。但他们不过是历史上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幽灵而已。这个幽灵既不使各国政府感到害怕,也不激起人民的希望,甚至也引不起新闻记者的兴趣。显然,作为一个运动,无政府主义已经失败了。在将近一百年的努力中,它从未接近过实现其摧毁国家,在废墟上重建耶路撒冷这一伟大目标。在过去四十年中,由于不断遭到挫败,希望逐渐泯灭,无政府主义一度建立起来的影响几乎已消失殆尽,而且也没有迹象表明无政府主义有复兴的可能,这种复兴,我们知道,在1864年第一国际建立以来是出现过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运动如果错过历史提供的机会,它便永远完结了。

这是七年前我在一本题为《无政府主义》的书中所写的一段

话，该书基本上是记述我青年时代的一本流水账。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到五十年代初期的十多年间，我同英国、法国、美国的一些无政府主义团体一起工作，度过了我的激进时期。我曾经一度当过英国无政府主义报纸《战争评论》和《自由》的编辑。我主办的杂志《现在》曾经是无政府主义文人的主要喉舌。在四十年代期间，他们聚集在赫勃脱·里德和亚历克斯·康福特周围。当德怀特·麦克唐纳认为他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之后，我就定期向他的刊物《政治》投稿。我曾汇编了一本枯燥无味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信条手册《无政府或混乱》，这本手册同托派分子的小册子一样有着狭隘的宗派思想。四十年代后期，这个手册的条文曾被肯尼斯·雷克斯鲁思在后来成为“垮了的一代”的旧金山诗人的一些集会上引用过。美国国务院对我感到相当头痛，以致在 1955 年拒绝发给我移民签证。其实那时我同有组织的无政府主义完全断绝联系已有整整四个年头了。我不知道，当六十年代情况有所变化后，这项禁令是否依然有效。我的自尊心不容许我再去作这种尝试。无论如何，我觉得如果他们的规定确是如此的话，那么，这首先是美国人的事情。一个自由意志论者发现，在世界各国的边境线中，只有美国和中国的边境线对他关闭的。

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无政府主义运动进入衰落的十年内，我不断地研究并接受了从十七世纪起的一系列自由意志论者思想家们的思想。从温斯坦利、戈德温、蒲鲁东，直到索雷尔和克鲁泡特金。从这些思想中我得益非浅。我也从不同于一般老左派的劳工运动史中接受了教育。因为这段历史对马克思持严厉批判态度。这一点我认为对评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中反革命的发展是非常宝贵的。而它似乎引起了别人的惊讶远甚于我所感到的惊讶。我曾碰到一些有才智的人士，其中少数几个颇有魅力，一个很美，有些至今还是我的朋友。

但我也曾生活在那个时代，生活在那种弥漫着浓厚和狭隘的狂热的气氛中。这正是那些濒临消亡的运动的残余分子所具有的特性。我看到了为着某些次要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信条所进行的激烈派系斗争造成的长期不和。而历史早已证实这些信条是无要紧要的。我甚至也参与了这些活动。我带着恐惧和激动的心情目睹一个英国无政府主义小组变成一伙匪徒，为了钱财进行武装抢劫。他们的牺牲者并不是邪恶的资本家，而是另一伙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之间为了争夺一家印刷厂而闹翻了。他们知道对方的自尊心不允许他们去报警。我发现我自己越来越同意（这是违反我的意志的 乔治·奥韦尔的这一观点 他——尽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论者的倾向——指出了一种危险，即无政府主义者不容异说的性格，可能会导致产生一种道义上的独裁，这种独裁危害无政府主义者所声称为之奋斗的那种自由。我早已知道在无政府主义者小组内，存在着信仰正统观念的压力。越是把自己献身于事业的战士，他就越会变得自命不凡，唯我独尊。我觉察到我已经传染上了这种毛病，并意识到它可能会毁掉我作为作家的前途，因此，我就撤到一边，按自己的想法成为一名我行我素的激进分子。我从未因此而得到过宽恕，尤其没有得到当我还是一个年轻有为的作家，看起来又是一个虔诚的信徒时，曾经极力奉承过我的那些人的宽恕。这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例外，而是所有不管从哪一方面与老左派各派别有牵连的知识分子都经历过的经验。

我强调了下述两个方面的区分：1. 我在研究无政府主义繁荣时期的历史及作家时所获得的正面教益；2. 由于我与一个运动的维护者过从甚密而浪费了时间和精力（虽然最终也许还是获得了经验），因为这个运动已经在拉丁民族和斯拉夫民族各国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群众中失去了支持者，从而也失去了同他们的联系。我所强调的区分同我在《无政府主义》一书中的一个论点有密切的

联系。在该书中我为老牌无政府主义组织敲起丧钟后，就接着写道：“这里，当然我们必须把经过巴枯宁及其追随者的努力而出现的历史性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同建立这个运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区分开来。这种思想，有各种形式和各种名称，早在这场历史运动开始前二百多年就已经存在。既然思想比组织和事业更能持久，那么，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核心依然可能有能力在历史环境改变的情况下给一种新的形式带来生命。”以后，在我写该书最后一页时，我发现无政府主义在当今的世界上可能具有的“一个目的和一个作用”。

假如人类的价值要生存下去，那么，必须给极权主义者清一色世界的目标提出一个相反的理想。而这种相反的理想确实存在于纯自由的幻想中。这种幻想曾经激发过从十七世纪的温斯坦利算起的无政府主义和接近无政府主义作家们的热情。很明显，既然它是一种理想，就不能够马上实现。也许将来也永远不能实现。但是正由于存在着这样一个纯自由的概念，它能够帮助我们判断我们的现状和看到我们的目标；它能够帮助我们保卫仅存的一点自由，不受权力日益集中的国家的进一步侵害；它能够帮助我们保持甚至扩大那些个人价值依然起着作用的领域；它对仅仅为了苟延残喘，为了生存下来渡过面前严峻的几十年这一紧急任务给人以帮助，直等到世界集权运动象其他所有历史运动的发展那样失去了活力，直等到依赖于个人选择和判断的道德力量能够重新在集权运动进入腐朽没落时期脱颖而出。

1962年出版的《无政府主义》一书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颇受欢迎。有各种不同的版本在意大利、瑞典以及现在的日本出现。我认为这是书中所阐述的主义的命运以及该书本身的价值所造成的，因为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主义，而不是一个运动，在这过去的几年中，出现了我认为可能出现的复兴。那种老牌的无政府主义并未复活，代之而起的是那个时代典型的道德政治运动。这个运动是在我的那本书出版一年后开始出现的，但这种特殊的联系只是偶

然发生的。

让我从事实谈起。最近加拿大大学的一位政治学老师写信告诉我，他对班上一百六十个学生进行了一次对现今各思想意识所抱的政治态度的测验，其结果很奇怪。百分之九十的学生挑选无政府主义，而不挑选民主社会主义（它得到二十三票，名列第二）、自由意志论、共产主义和保守主义。大部分投票者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学生一样保守；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曾是“嬉皮士”或“新左派”。

这是1967年12月的真实情况。它的部分背景当然是过去十年内对无政府主义前所未有的学术方面的兴趣。1960年以来对无政府主义的研究比本世纪前六十年更为严肃和不带偏见。除我的那本著作以外，还有詹姆斯·乔尔的优秀著作《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一些相当好的平装本选集，它们收集了一些主要自由意志论者写的文章。其中最佳的选集也许要算是欧文·霍罗威茨编辑的书名也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那一本。（法国人在这方面看来比我们先进。琼·密特朗在1955年出版了一本权威性的著作《法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历史》，1949年出版过由阿兰·萨金特和克劳德·哈默尔合写的《无政府主义的历史》第一册，这部优秀的作品一直没有写完。）

有时，历史学家们的兴趣却相当于一纸死亡证书，证明一切俱已平安地过去了。结束了，可以把它埋入书中，盖棺论定，不必害怕有人来敲棺材板。但另一方面，新闻界的兴趣却常常是某件事物产生活力的信号。在过去的几年内，无政府主义常常在大西洋两岸的报刊上出现，因为它作为当时青年运动的一部分，正发挥着新的作用。

我最初发现这种趋势是在1963年。当时，有关伦敦复活节游行示威活动的新闻报道开始传到我手中。继而就是每年在埃尔特

麦斯顿举行的反对核武器的游行。报纸上说，在伦敦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后面，有五百名男女青年，他们二十人排成一行，并肩行进。一个记者热心地写道：“伦敦无政府主义者留着长发，长胡子，带着一种前拉斐尔派的风格向前迈进。这些不信奉国教的人就象一块粗绒毯子一样铺天盖地地走来。他们年轻、欢快、自由自在，令人羡慕。”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伦敦的无政府主义者由于害怕暴露他们人数稀少，没有参加过街头的游行示威。如果我们能够在那面从西班牙内战日子里留下的破烂不堪的红黑旗帜下聚集起五十个人来，我们就会认为这是很幸运的了。其中的一半参加者会是当时的老兵，现在都已去世了。他们会带着对克鲁泡特金和爱德华·卡本脱的回忆，而使人感到烦恼。没有人会说我们快活得令人羡慕。老左派是一本正经的。在晚会上，我们可能会把未卷的长发放下，但在公开的场合，我们会象武装到牙齿的托派分子那样表现得很热诚。每星期天，我们为了要多卖掉几十张报纸而在大理石拱门外同他们竞争。也许，当我写到有关这几百个欢快的同志们时，我就开始思考起来了；也许，我曾经鲁莽地甚至过于积极地把这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埋葬起来。但事实上，这不是在敲棺材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无政府主义者并非历史上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复活。他们与前者大不相同，这是一种新思想的表现形式。

四十年代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是些好斗的巷战分子，不触犯人地梦想采用暴力去推翻政府，把自己比作拉伐乔尔和埃米尔·亨利那样伟大的刺客，就象一只家猫自比为一头猛狮那样。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追随和平主义的革命路线。只要容许我们偶尔在《自由》杂志上发表言论，我们决不超越我们的主张。巴枯宁的传统和工团主义者对浪漫主义死亡的迷恋，依然严严实实地笼罩着整个运动。我们的昨天是西班牙。

到 1963 年，情况明显地改变了。那些留长发、打扮得象拉斐尔前时期的人物那样游行的新无政府主义者，早已把西班牙抛到脑后去了，他们厌恶以往的那些富有浪漫色彩的爆破手和扔汽油弹的人。他们是一伙好斗的和平主义者，代表着出现在老无政府主义者以外的一股新的潮流。他们产生于反对核战争的核武器裁军运动和百人委员会等激进组织。特别是在百人委员会的某些领导人中，有较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非正统的无政府主义者，诸如赫勃特·里德、亚历克斯·康福特，以及和平主义活动家劳里·希斯赖姆等人，在委员会中及其赞助者的一些团体中，产生了对国家采取直接行动和挑衅的哲学。因而产生了一些不讲传统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伦敦以外的一些地方，形成了几十个小型团体，各自独立进行活动。他们的无政府主义是和平主义性质的，不关心以往的那些教条主义的争论。稍为看一看 1967 年《自由》杂志的一些布告栏，就能发现这些团体数量众多，分布甚广，代表着好几倍于二十年前无政府主义者可能召集起来的单个赞助者。

对英国年轻的新无政府主义者影响最深的是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无政府主义状态》杂志。这是过去七年来由科林·沃德主编的季刊。它是我所知道的一直保持着水平高于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法国时代起到目前为止的其他任何无政府主义刊物的一种刊物。它摆脱了古老的思想意识争论，讨论解决各种现实问题的激进而可行的办法。撰稿人包括科林·麦金尼斯、艾伦·西利托、亚历克斯·康福特、保罗·古德曼等各式各样富于活力的人物。该杂志对一些大学影响很大。在当时的许多大学里，学生们创办的无政府主义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多出版了二、三期后就停刊了，但这却体现了运动的地方色彩。

假如英国再生的无政府主义并没有失去以往神圣的孤立主义，并同所有现今伦敦的激进青年那股受自由意志论者行动影响

的潮流汇合在一起的话，所有这一切（诸如几百起新无政府主义者
在伦敦的游行，一个好的持久的杂志，或许多短命的刊物等等）就
会变得渺小得很，微不足道。三十年前的英国，当社会上的头面人
物听到自己的儿女加入了共产党时，会大吃一惊。（当今的桂冠诗
人也在他们中间歌唱道：“为什么我们所有的人见到一个共产主义
者就感到自己渺小得很呢？”冷天 当年轻的大卫或西比尔回到家
里宣称他或她已经变成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人们会听到一种无可
奈何的叹息声。这里，请注意用词的变化。“变成”而不是“加入”。
一种内心的变化，而不是一张党票。这就是年轻人对自己的革命的
看法。他们着重于感受和信仰，这也许会遭到以往的空想家们
的嘲笑。

不仅在英国，那些新无政府主义者同老无政府主义左派的残
余分子保持着松弛的联系。而且在荷兰，那些煽动者，即福利国家
的叛逆者，起来游行示威，不时寻衅闹事，把一座整洁的阿姆斯特
丹城市闹了个底朝天。坦率地说，从倾向性上来讲，他们属于无政
府主义者，歌颂以往的荷兰和平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多梅拉·纽
文休斯和巴特·德莱特等人），使革命的宗旨发生一个新的转折，
使长期实现不了自由主义天堂而感到的那种失望情绪变成了武
器，致使政府暴露出他们残暴的真面目。弱者起来反抗，强者被迫
扩张自己。

一个抗议者的宣言写道：“通过抗议 我们迫使 政府 当局撕下他们
的假面具。那些制服 皮靴 钢盔 军刀 警棍 高压水龙 警犬 催泪弹 以
及其他为我们准备的各种压迫工具，都不得被迫一一亮了出来。要
把当局激怒起来，使得他们到处威胁我们，命令我们，禁止我们，谴责我们，
宣判我们。他们越来越变得不得人心。而革命将获得人心。一种革命
的情感将再次兴起，这就是危机的兴起。

这是遭到挑战的当局的危机。

这就是我们要求国际挑战者进行的巨大挑成。

在北美洲，在那些千变万化的新激进派组织中，它们的名称全是些难记的缩写字母，在这里，并不存在象英国和荷兰的那种明显的无政府主义复兴的迹象。但只是在寻找态度鲜明的声明，或对无政府主义的赤胆忠诚时，情况才是如此。实际上，许多观察家把无政府主义看作是一系列多元论新激进思想的重要的核心组成部分。从其运动内部进行研究，做得最好的可能要算杰克·纽菲尔德的《一个预言家的少数派》这本书了。纽菲尔德毫不犹豫地把无政府主义同和平主义、社会主义相提并论，作为对新左派产生影响的三个基本要素之一。有时，这种影响可以延续几个世纪之久，象一束又长又亮的光带：例如十七世纪的温斯坦利就对现代的掘土派成员^①产生了影响。但是，一般说来，在北美洲的新激进分子当中难得有人读过象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或《一个革命家的回忆》那类无政府主义的经典著作，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读过幸存的而不是典型的老无政府主义者保罗·古德曼的著作。通常，无政府主义的基本思想，和传统的社会主义和和平主义的基本思想一样，不是通过直接阅读，而是通过老空想家残余分子在纽约、海湾地区、洛杉矶、温哥华、蒙特利尔等地形成某种气氛和精神营养品传给新激进分子（随心所欲的半文盲的一代人）的。但是，几个世纪来，挂在无政府主义者口头上的重要原则仍然是：对国家进行抵制 放弃舒适的生活 采取直接行动 权力下放 崇尚职能机构和实行分享民主制。

在公开的或非公开的新无政府主义者活跃的地方，人们至少能够发现他们与全盛时期的老无政府主义者之间有两个重要的差异。消失于巴塞罗那的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发源于最穷苦的阶层。他们是安达卢西亚和乌克兰等地的目不识丁的穷苦农

^① 英国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无地少地农民利益的一个激进派别。——译者

民、本世纪末法国和伦巴德^①等地不景气的工厂里的工人们、卡腊腊的大理石工匠们、安科纳的码头工人们以及汝拉的制表工人们；领导人中有贵族政治家（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免去圣职的牧师（戈德温和纽文休斯）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蒲鲁东和魏特林）等；为这一运动叫好的有新浪漫派画家和诗人（库贝特、皮萨罗、西格纳克、奥克塔夫·米尔博和奥斯卡·王尔德）现在那些良心受到谴责的贵族们和僧侣们被那些良心受到谴责的中产阶级替代了。而这些人，同大量增加的生活豪放不羁的艺术家们一起，几乎完全取代了以往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农民和贫民。

六年前，英国的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杂志曾经对它的读者们的背景进行了一次调查。回答调查问题的四百五十七人中，有四十人在工业部门工作，其中六人是经理。二十三人种地，其中八人自己拥有农场和土地，有一人是地产经理。十九人在交通运输部门工作。如果除去经理和有产者，那么在被调查的总人数中，只有百分之十五属于传统分类的工人和农民。尚有五十二名教师，三十名学生，二十名建筑师，十六名新闻记者和作家，二十三名文娱工作者，十二名从事图书业，二十五名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二十五名从事保健福利工作，四十名从事各种经营管理和秘书工作。白领工人所占的优势是相当惊人的。青年所占的地位也非常突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无政府主义者中，老年人占很大的比例。但在 1962 年，这些人中百分之六十五在四十岁以下。如果现在再进行统计的话，所示的比例数将会更大。更为有意义的是，在年轻人中，阶级成分的变化尤为显著。在年逾六十的人中，有百分之四十五属于工人阶级；而在三十多岁的人中有百分之二十三，二十多岁的人中只有百分之二十。英国的新无政府主义者是一种持不同

① 美国芝加哥市郊区。——译者

政见的中产阶级青年的运动。这也适用于荷兰的煽动者和美国的新激进分子。

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在那些（除法国外）技术和社会落后的国家中，以及当局采取反动的和半封建制度的国家中最强大。另一方面，新无政府主义则在那些挂着福利招牌的国家中，以及在青年人面对的对日常生活具有压倒优势的影响、而不是采用暴力行动的国家中最强大。

也许，在这种情况下，无政府主义的各种失败都为自己进行了辩解，尽管这些失败都各有各的辉煌的富于喜剧性的过去。在现代思想意识领域中，唯独无政府主义可以吹嘘它那种从来没有真正进行过试验的不是优点的优点。由于它从未掌过权，因而也不会有由掌权带来的不名誉。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代表着一种从未被玷污的形象。用现实的词句来说，它是一种除了未来别无其他的思想形象。胜利也没有玷污过它。对处于目前状况的青年说来，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和充满力量的有利条件。老的无政府主义者经常唱道：“为那些失败了的叛逆者们献上鲜花”。那些鲜花正在传给他们的继承人。

虽然无政府主义思想最初是在完全不同于现今青年们所处的环境中形成的，但是，无政府主义具有使人自发地崇拜它的魅力，在使其态度和方法适应于各种特定环境方面，经常显示出一种惊人的象普罗蒂厄斯海神那样变化无常的特性。温斯坦利在英国内战时期^①集中力量于开发荒地的直接行动。戈德温在十八世纪欧洲处于启蒙运动高潮时，热衷于发展讨论小组。蒲鲁东通过先驱信贷联合会（他的人民银行）进行工作。巴枯宁的浪漫的暴动主义可以用克鲁泡特金的科学社会学的方法来加以平衡，从这里产生

① 查理一世与议会的战争。——译者

了对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之间某些创新的远见。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恐怖分子的悲惨的华而不实的姿态让位于工团主义者更新的大罢工的神话在西班牙内战的最初几个月，安达卢西亚的农民们建立了一些既纯朴又富于诗意的利他主义的公社。他们使用的手段相当灵活，随时适应变化着的社会环境。但一直是脚踏实地，按照根深蒂固的社会意识行动，从不接触一般的政治和权力。

无政府主义在历史上的这些特定的发展阶段，在新无政府主义者看来似乎没有一个是重要的。他们同前辈们不一样，缺乏对历史的强烈要求。这种要求就是再想体验一下过去的斗争，就象小鸟总想栖息在齐诺和赫勃脱·里德爵士之间的自由主义大家庭的大树上一样。他们所最关心的只是对自身情况的适用性。看来，无政府主义的确能给他们提供很多东西。

请考虑以下情况。他们全力以赴地起来反对一个一切为了物质利益、一切受现有权力支配的社会。他们比自己的长辈更现实地面对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自动化将在近几年内摧毁我们关于尊严和劳动是必需的观念。他们同时也看到这个世界为亿万人民提供物质保证和安逸的生活，而给另外千百万人民（包括北美洲在内）带来了目前尚无灵丹妙药可以医治的贫穷和精神错乱。他们看到自己国家历史上以他们的名义进行的罪恶的战争，其中有许多人还为此献出过自己的鲜血。但是他们甚至不能毫无保留地称颂对立的一方，因为只有那些最天真的、容易受骗上当的人才相信“越共”比它的敌人还要好。他们看到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历史悠久的大政党只关心权力和物质报酬等卑鄙目的。他们起来反对老左派实行的带有革命色彩的等级制度。不管 J.埃德加·胡佛在胡想些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者从来没有在他们中间取得任何可喜的进展的原因所在。他们发现工会最关心的就是金钱。劳工激进主义已经死亡了。美国以往的劳工激进主义，只是在一年

一度的妖魔鬼怪聚会的节日上，即在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工业工人年会上，才再次复活，几个仅存的老战士集合在一起呼喊过去的口号，向掩耳不听的世界高唱古老的挑衅性歌曲。

无政府主义的传统给予激进的年轻人的首先是对一个社会的憧憬。在这个社会里，每一种关系只具有道德特性，而不具有政治特性。无政府主义者相信，人们内心道德的要求，强烈到足以在当局的摧残下存活下来。还可以把社会团结在自由和博爱的天然纽带中。最近发生的那些事件，如民权运动，黑人居住区的暴动，贫穷国家对待他们富裕的恩人的态度，都表明，即使在一个实利主义者的文明社会中，非实利主义的价值也将发出狂妄的但具有感召力的叫喊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性质上讲，是属于道德方面的。而政治从来不能够完全笼络他们。这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始终坚持的。

在采取这样一种非实利主义的态度时，无政府主义者反对英国的职工大会和美国的劳联——产联等组织。这些组织致力于使工人们在物质方面可以同有钱人并驾齐驱，即实现所谓体面的贫困这一理想。保罗·古德曼在这方面写了大量的文章，但是，切勿忘记《战争与和平》中那些华丽的诗句。蒲鲁东用这些诗句阐明了贫穷和贫困这两个词的区别。他认为贫穷即赤贫之意。贫困是指一个人的劳动收入刚能满足自己的需要。蒲鲁东用抒情的词句颂扬这种状况是理想的人类的景况。在这种景况中，我们是最自由的，能够掌握自己的感情和食欲，最能够把自己的需要精神化。从物质方面来说，无政府主义者从未提出过超出足以使人们获得自由以外的要求。人们只要读一下杰拉尔德·布雷南和弗朗兹·博克奴等人的动人的描述，就可以理解西班牙南部农民无政府主义者对他们的自由的感受是如何深刻。他们不仅愿意放弃烈酒和烟草，甚至也愿意放弃茶叶和咖啡，以使刚公社化了的村庄能

够更完全地从金钱制度的黄金锁链中挣脱出来。

这些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者（这里我不考虑那些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运动史上苦守最后阵地的抵抗者的代表）经常强调自然、自发和无系统。对他们来说，个人的判断应奉为至上；教条阻碍人们对生活质量的理解。他们认为生活应该尽可能地简单和接近于自然。这种趋向简单和自然生活的渴望使得人们象克鲁泡特金那样迫切地关心在现代化都市中生活着的人们精神错乱和农村结构的瓦解。这些主题对新激进分子来说也是很亲切的。无政府主义者向来很懂得专家统治的危险性。巴枯宁毫不掩饰地对专业科学家怀有敌意。即使是受过科学教育的克鲁泡特金，也强调业余爱好者在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当接触到组织某一行业，组织一个村镇，或一个城市居民区，以满足其物质需要时，他认为责任应该由那些与问题最有关的人来负。人们必须学会自己来作出决断。这种认为应由自己决定自己的事务的思想意识，成了蒲鲁东的联邦主义的基础。他认为社会应由一些功能性的工业和社会团体构成，在这些团体中，人们将作出在自己的工作地点或生活区域里该做些什么的决定。万事都从这个基层组织出发，在这些基层上面的是几个以最松散的联邦形式按照需要组织起来的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协会。在每一级机构中，人们将尽量广泛地参与各方面的活动，但在最低一级的工厂和生活区里，人们应全面参与各方面的活动。

不难看出，这种观点对今天的新激进分子有很大的吸引力，新激进分子不自觉地从无政府主义过去的思想中吸收了很多东西。但是，无政府主义者之所以能饶有兴趣地预见到今天青年所关心的事情，是因为他们相信同时担心人与工作之间的关系将消亡，而后来情况果然是这样。远在 1793 年 戈德温在撰写《关于政治上的公正的调查》（第一本主要的无政府主义教材）时就非常准确地预

见到今天似乎已经临到我们头上的自动化和强迫闲暇的到来。

目前，砍树，开运河，驾驶一条船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是否会永远需要那么多的劳动力呢？当我们看到人类发明了复杂的机器、各式各样的纺织厂、织布机、蒸汽机等时，我们难道不对人类劳动的成果感到惊奇么？谁能说得出这种改进将在什么地方停止呢？已经显示出来的进步的结果是，最终将不再需要人类的劳动。

戈德温在一百七十五年前所做的大胆设想，远比今天所做的更为使人惊讶。他大胆地预言，总有一天每人每天平均最多工作半个小时，可以利用余下的时间陶冶自己的性格。克鲁泡特金在差不多二十五年之后，在《面包的掠取》一书中表现得比他的前辈谨慎。他仅仅提出了一个建议，而这个建议今天在西方世界里差不多已经实现了。他大胆地提出，“假如从二十岁或二十五岁起到四十五岁或五十岁之间的所有男人一天工作五个小时”，社会上物质方面的舒适也许就能得到保证。但是，克鲁泡特金也意识到，我们今天才逐渐更加清楚的事情是：在最近的将来，人们更关心的是离开工厂和办公室以后漫长的时间，而不是少量必须干的工作。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借用另一个老自由意志论者威廉·莫里斯的话来说，是当“无益劳动”被消除后，我们如何创造“有用的工作”。克鲁泡特金乐观地相信，当“过多的劳动”这一问题解决以后，人们会创造性地进行自我调整。克鲁泡特金在 1892 年写道：“人类生活的全部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吃吃喝喝和为自己提供一个栖身之所。一旦物质的需要满足以后，就会提出其他需要。一般地说，可以说成是一种艺术性质的需要。这些需要是多样化的。每个人的需要各有差别。社会越文明，个性越有所发展，各人的欲望也越来越多样化。”我认为今天的新激进分子会用完全相同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然而我却怀疑是否会有许多人也同样地乐观。

我在很大的程度上仍然抱有同我所描绘的许多自由意志论者

一样的态度，虽然我并不受任何人的控制，也不接受任何标签。我也不想使人们皈依他们。我当宣传员的那些日子已经结束了。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对一组思想意识方面的现象感到特别有兴趣。仅仅十年前，这组思想意识似乎还缚在十九世纪工人阶级运动奄奄一息的躯体上。但是今天，它们却同一些年轻人和中产阶级结合在一起，至少就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问题似乎给年轻人提供了答案。

我也对现在所缺少而原先属于古典无政府主义的某些因素感到兴趣。现在不再谈论街垒和革命英雄主义了，虽然直接行动经常挂在新激进分子的嘴上，但它的意思非常接近于甘地的“不合作运动”而这是老无政府主义者不屑一顾的。我认为所有这些变化都是有益的，因为它们使自由意志论者的一些有益的思想脱离了历史上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有害思想，当年批评者对这些思想的责难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尽管过去的无政府主义者竭力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却过于趋向接受十九世纪左翼的那些僵硬的思想：把阶级斗争看作是唯一的和建设性的社会力量，浪漫地迷信暴动主义和恐怖行动，甚至幻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虽然他们很少承认这一点），特别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已预见到将会出现一个由坚如磐石的工人联合会管理的社会。那些在今天公开地或不自觉地鼓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人，已把绝大部分过时的思想连同其它老牌左派的思想包袱一起抛弃了。巴枯宁的革命策略已经死亡，尤如同他一起埋葬在伯尔尼自治市有钱的自由民之间一样。不管这些自由意志论的思想意识和冲劲在年轻人中能传播多远，对他们的社会和道德观念的影响有多深，我们大概不会再看到一个追随老无政府主义者的运动复兴起来了。

至于无政府主义者的努力将导致产生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无政府主义者们从来不是伟大的空想家。他们喜欢把未来保持在灵

活的基础上，并感到那些煞费苦心的计划对没有完成这种计划的后代来说是一个负担。我深信，大多数的新激进分子会同意这一点；但是，不管怎样，老无政府主义者对未来的看法有一点是僵硬不变的。这是一个强硬的、不能妥协的观点：要么是完全没有政府的社会，要么根本没有社会。老无政府主义者从未踏上漫长的达到目的地的旅途；这个不成功的光荣记录目前对无政府主义倒大为有利。

我怀疑，今天在西方是否还有人真的相信有可能创造一种划一的社会。同时，我猜想，苏联人也正在迅速地抛弃这种希望。由于核破坏所造成的威胁，我们不再按有极限的方式去思考问题了。未来是无边无际的。只要我们能向前看，我们就很可能被卷入多元论的排列之中，这将包括许多哲学和许多有细微差别的探讨方式。

换言之，无政府主义者将永远不会建立他们自己的世界。他们所梦想的自由社会，就象威廉·莫里斯在他的《无头新闻》一书中所描绘的自由意志论者田园般的社会一样，是一种使人感到愉快和远不可及的神话。现代世界上物质和社会的复杂性明显地排除了这种过于简单化的解决办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产生于自由意志论本身的思想不包括在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范畴内，与现实世界毫不相干。如前面已经指出的，从单个思想来看，它们常常同当前的问题有着惊人的联系。同时，据我看来，只有那些尊重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积极的一面的人们愿意承认一些基本的事实，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才能对人们有用。

比如，古典无政府主义者相信，独裁社会的毁灭一定会带来一个自由的社会。但是过去五十年的历史表明，一个独裁社会被革命手段摧毁后，取而代之的往往是一个更为有效的强制性社会。其实，社会自由化是一个演化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启示的过程，只能

通过集中一点一滴的改变才能获得。这些改变不能用抵制所有的法律来取得，因为有些约束在任何可预见到的将来的社会中，很明显是必需的；而只能通过找出独裁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方法已明显地失败或滥用的领域，以及实施权力分散、自觉自愿和直接参与作出决定等自由意志论者的概念来加以实现。承认上述事实意味着：对那些依然能从基本的自由意志论的学说中找到某些美德的人来说，不管以往的无政府主义者在道德方面的借口是什么，现在应该是认识到无政府主义从来不是真正非政治性的时候了。它一直代表着以其他方法实施的政治。这种认识会使信奉自由意志论的人获得解放，使他们到现存的政治结构中去寻求他们认为必要的社会变化。不用说，这种结构也是可以改变的。

最后，人们必须比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更现实，接受一种有关人性的更为符合实际情况的看法。以往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人即使不是天生就是善良的，也是天生就有社会性的。这种假设不可避免地要求实现极为不切实际的目标；他们认为，只要给予自由、足够的收入和时间以医治他们的精神创伤，人类就会开始表现出完美的社会性。但这只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未必可能实现。我们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这里，大多数人都比悲观主义者们所想象的更乐于担负责任，只有少数几个人比乐观的人们所愿意承认的更为顽固地反对社会。这就是凭我们的经验所知道的唯一的人性，尽管很难给这种人性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它的存在，限制侵犯他人生活的反对社会的行为。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按照实际可能为人类保留尽可能多的自由，而不是幻想实现虚无缥缈的绝对的自由。

我已经能够听到老朋友们的抱怨声了，埋怨我所剩下的已经不再是无政府主义了。也许是这样。但我是想使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们的真知灼见能够对改造社会产生确有效益的影响。这些无政

府主义思想家们的真知灼见，由于过去采用的策略不当，经常为人们所忽略。我们现在正在比过去更为公开地多方面地考虑政治和社会问题。这一事实，有可能使自由意志论传统中的思想意识对形成一个世界的过程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个世界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空想的世界，而是作为我们时代中广泛的技术变革的产品而确实存在的世界。但是，这需要具备以下条件，即自由意志论者象保罗·古德曼出色地做的那样，愿意对我们具体的、迅速变化着的现在，而不是对某种理想化的未来，提出切实的批评意见和改进方法。

3. 无政府主义与现代社会的关联

萨姆·多尔戈夫

资产阶级的新无政府主义

如果想就无政府主义思想与现代工业化社会之间的关联这一问题进行有意义的、明确的讨论，那么首先必须概要地阐明今天的新无政府主义和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马拉特斯塔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的古典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差别。除个别作家外，人们得到的普遍印象是，现代作家提出的无政府主义思想都是平庸和肤浅的。他们并没有提出新的见解，而只是重复无政府主义运动早就抛弃了的、同我们日益变得复杂的社会问题丝毫无关的空想主义的思想。

半个世纪前，被著名的无政府主义作家卢吉·法布里贴上“无政府主义中的资产阶级影响”标签的许多思想，现在又再次流行起来了。^①例如金斯利·威德默写了题为《无政府主义到处复苏》的文章。威德默正确地指出，和过去类似的资产阶级运动一样，“现

今无政府主义的复兴……依靠的也主要是持异议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生和其他与现存文化格格不入的人。这些人信奉的是乌托邦式的个人主义和另外一些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非工人阶级思想。’^②象老一代的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那样，威德默实际上也否认无政府主义与自由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联系，并指责诺姆·乔姆斯基把“无政府主义看作是纯粹的社会主义的一部分”。

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另外一些特征是：逃避现实——希望有足够数量的人从现存体制中‘逃避’出去；象无政府主义者那样生活在公社里……和采取其他生活方式的团体中（威德默语）从而逐步削弱这个体制。崇尚暴力——效法涅车叶夫，采用并赞美一些不道德的手段，如搞密谋，进行残酷斗争和使用暴力。生活放荡不羁——毫无半点责任感 沉溺于梦幻的‘生活方式’中 热衷于表现自己，反对任何组织形式或自我约束。采取反社会的个人主义态度——“一味美化极端反社会的、各种形式的个人造反（‘法布里语’）

〔马拉特斯塔写道〕：“不能容忍压迫 希望得到自由和充分发展个性等都不足以使一个人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如果不是经过一种对人类的爱和被一种希望全人类都应享受同等的自由的思想所锤炼，那种对无限自由的向往就会产生叛逆分子，而这些人……不久就会变成剥削者和暴君。’^③另一些新无政府主义者则着迷于“为行动而行动”。最重要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之一——皮尔·卡洛·马西尼指出 对他们来说，“自发性”就是可以自动解决各种问题的万应灵药。无需理论上的或实践上的准备。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 自由意志论者和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如“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样的极权分子之间的根本区别，将会奇迹般地消失。马西尼认为“这简直是自相矛盾，真正的现代无政府主义者却是那些头发已经花白、受巴枯宁和马拉特斯塔的教导

所指引的人 他们在意大利、西班牙 以及在俄罗斯 已经从个人惨痛的亲身经历中了解到革命是怎样一种严肃的事件。”^④

我们的意图并不是要缩小一些学者们说过的许多好事，也不是要贬低我们年轻的叛逆者反对战争，反对种族主义和反对罪恶深重的“既成权力机构”虚伪的价值等意义重大的斗争——这些斗争使长期休眠的激进运动闪烁出复苏的火花。但是年轻的叛逆者突出了一些消极因素，忽略或曲解了无政府主义的建设性的原则。巴枯宁和一些古典无政府主义者经常强调建设性的思想和行动的必要性。它“〔1848 年的革命运动〕富有直觉和消极的理论思想，使它具有充分理由对特权进行斗争。但它完全缺乏任何积极的和实际的思想，而这正是使它能够在旧的资产阶级体制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新制度所必需的。”^⑤

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歪曲

最近出版的一些论述无政府主义的著作，如乔治·伍德科克的《无政府主义》以及霍罗威和乔尔所写的两本均题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书籍，宣扬了这种荒诞的说法，即无政府主义者都是活着的老古董 幻想回到田园般的过去。伍德科克认为，“巴枯宁和他的伙伴们发起的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已经死亡了。”古典无政府主义的基本原理，如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权力下放、个人和地方自治、工业自行管理 工人控制 以及联邦主义 都是“过时的组织形式，是与政治和经济权力的集中这一世界范围的趋势背道而驰的……现时代真正的社会革命，实际上是科学技术的每一进步都为中央集权的进程作出贡献。〔趋势是在相反的方向〕……无政府主义运动没有能提出一种足以替代国家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东西。”^⑥

很难理解，对自由意志论者重建社会的大量文献稍有接触的

学者，会得出这样荒谬的结论！！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是法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丹尼尔·奎尔灵。他的杰出的小册子《无政府主义》刚被译成英文，并附有诺姆·乔姆斯基的一篇前言（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奎尔灵集中论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中的一些建设性因素。这本书尽管不无缺点（他低估了克鲁泡特金思想的重要性，而夸大了斯德纳尔的重要性），但它仍旧是一篇有关这一主题的最好的简短介绍。奎尔灵有力地驳斥了近代历史学家，特别是琼·密特朗、伍德科克和乔尔的论点。他得出结论说，他们所描绘的“无政府主义的形象是不真实的。建设性的无政府主义在巴枯宁的著作中已经得到了最完善的表达，它依靠组织，依靠自我约束，依靠一体化，依靠一种并非强制性的而是联邦制的中央集权。它与大规模的工业，与现代技术，与现代无产阶级，与真正的国际主义有关联……在现代世界中，物质的、智力的和道德的利益已经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有时甚至在不同国家之间创造出一种真正的、牢固的团结，这种团结将比所有国家的存在延续更长的时间。”^①要评价古典无政府主义能在哪些方面应用于现代社会，首先必须简要地概括其首要的建设性原则。

社会越复杂，越需要无政府主义

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忽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是极为荒谬的。相反，古典无政府主义者总是抵制那种把有利于天然复杂性的严密组织掩盖起来的所谓“简单性”。这种天然复杂性正反映了社会和个人生活的丰富多采和多样化。控制论数学家约翰·B·麦克尤恩在谈到无政府主义与控制论之间的关系时说：“信奉自由意志论的社会主义者〔非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同义词〕，特别是克鲁泡特金和兰多尔，早就领会到复杂的社会结构就象相互之间关系不断起着变化的一种复杂的网络。这种网络涉及许多独立于权力主

义高压统治的互相关联的活动和相互帮助的结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发展了自己有关社会组织的理论。’^⑧

象他的先驱者蒲鲁东和巴枯宁一样，克鲁泡特金详尽地阐述了这样的思想，即社会生活的极端复杂性，要求权力下放，并由工人们自行管理工业。从对英国和苏格兰经济生活的研究中，他得出结论说：“生产和交换是极为复杂的事情，以致工人们如果通过他们的工会不愿在每个工业部门中干活的话，就没有哪个政府（在缺乏一个庞大的、效率低的官僚独裁机构的情况下）能够把生产组织起来。因为在各种生产领域中，每天都会发生许许多多的困难……而对这些困难，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奢望能够有所预见……只有成千上万个知识分子通力合作，进行研究，才能发现新的社会体系，并为地方上的许多问题找到解决办法。’^⑨

权力下放和自治并不意味着将社会分隔成孤立的、经济上自给的小团体。这种做法既不可能也不可取。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西班牙内战初期（1936年12月）卡塔尔尼亚的经济部长迪亚哥·阿巴德·德圣提兰，提醒他的一些同志们，“我们必须彻底地认识到，我们已不再……生活在一个小小的空想主义的世界中……我们不能用一种地方观念来实现我们的经济革命；因为一个以地方主义为基础的经济只能使大家都陷入贫困……经济在今天是一个巨大的有机体，所有的隔绝必定是有害无益的……我们必须以一种考虑到整个国家，如果可能的话，甚至考虑到全世界的利益的社会准则来工作。’^⑩

我们必须达到某种平衡，即妨碍发展、恣意妄为的当局的暴政同那种导致小地方爱国主义，由小集团组成的分离主义和小片社会的“自治”之间的平衡。自由意志论者的组织必须反映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并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促进团结。这可以解释为联邦制：通过地方性的、区域性的、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自由协议取得

的协调。一个自愿结盟的、囊括全部社会生活的巨大协调网，在这个协调网中，各个团体和协会都能从中得到团结的好处。而同时，在他们自己的领域内行使自治权和扩大自由的范围。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原则不是许多分离的实体。没有权力下放就不可能有自治；而没有联邦制就不可能有权力下放。

社会越来越复杂使得无政府主义更多而不是更少地与现代社会生活相关联。正是这种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别是对自由和人类价值的极端的关心，导致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们将他们的思想立足在分散权力、自我管理和联邦制的原则上。这种自由社会的最明显的特征是，它能进行自我调整和“在它自身内部孕育自身繁殖的种子”（布伯语）。自我管理的各个协会将能够灵活地调整它们之间的差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和改正，对新的、富于创造性的社会生活形式进行试验，因而达到更高的人道主义的真正和谐。把错误和冲突限制在为特殊目的而设置的权力有限的团体中，可以限制其破坏性。但是由国家或者其他独断独行的中央集权组织作出的错误估计和罪恶的决定，则会影响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按无政府主义原则更好地组织现代工业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行政管理专家，如彼德·德鲁克、冈纳·米多尔、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和丹尼尔·贝尔等，现在都赞成大规模权力下放。这不是因为他们突然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而主要是因为技术已经使得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形式成为“业务上的必要因素”。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应该懂得，只要这些组织形式与国家或与意味着政治经济的权力垄断的资本主义仍然有联系，权力下放和联邦主义就将仍然是一种骗局——一个效率更高的工具，它把群众罗致在他们自己的束缚中进行合作。

为了说明在他们的思想内如何无意中表露出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形式的现实性以及他们如何自相矛盾，我们引用“自由企业家”德鲁克和“福利统计学家”米多尔的一些话。德鲁克在题为《政府的疾病》的这一章中写道：

对政府不抱幻想的思想意识超越了各国国境和思想意识的界限。……政府本身已成为既得利益者之一。……一旦政府承担了任何义务，它就会永久地盘踞在那里。……这个非生产性的机构却变成了政治进程本身的内在因素。……要使有关社会的理论有意义，我们必须从建立多元机构开始，这尤如由许多太阳组成的天体，而不是由许多仅能反射光线的月亮围绕一个中心组成的天体……一个机构多样化和权力扩散的社会。……在一个具有各种组织的多元社会中，〔每一个单位都将〕被限制在它应该为社会成员提供的具体服务行动中……但是由于每个机构在其自身的领域中具有权力，它将会受到公众利益的影响。……这样一种各组织有其自治性和有限性的观点，在使一个组织采取行动和保护个人的自由方面都是必需的。^⑪

德鲁克先是揭露了“政府的畸形发展、无所作为和软弱无能”，而后却直截了当地反驳了自己，得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在这种由各种组织构成的多元社会中，更需要一个强大、有效的政府……”

米多尔令人信服地证明，苏联和“自由世界国家”为了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而需要权力下放，以期使（政治和经济生活）不屈服于中央机构的僵硬的作风。但是，他又希望家长式的福利国家能够放松“它对日常生活的控制”并逐步将其大部分权力转移给“由人民自己控制的各种组织和村社……”没有任何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能象米多尔本人那样更好地反驳他自己：“放弃独断独行的模式，放弃行政控制和……在不需要的时候，自愿地从干预中退出来，这些步骤同一种正在行使职能的官僚主义政治的内部活动是不相适应的。”^⑫如果这些鼓吹权力下放和自治的人不是自相矛盾

的话，他们就会意识到权力的扩散将导致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者一贯反对雅各宾派、布朗基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和其他有可能成为独裁者的人。这些人，用蒲鲁东的话来说：“要在一个想象的计划上重建社会，就象天文学家那样，他们由于重视自己的计算而要改造宇宙。”^⑬

到目前为止，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们只是提出要利用旧社会中各种有用的有机体，以便重建一个新的社会。他们预见，一些已经被人采用的做法和一些已经表现出来的倾向将趋于普遍化。自治、权力下放和联邦制是替代中央集权制和国家社会主义的较为可行的办法，这一事实意味着，现在正在行使社会职能的巨大的组织网，将取代那古老而腐朽的过于集中的管理机构。“新社会的各种因素已在崩溃中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发展起来（马克思语）这一点是社会主义运动中各派都同意的基本思想。克鲁泡特金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非常明确：“无政府主义者们……根据观察当代生活所得到的资料作出对未来的展望。……^⑭采用独立的公社作为区域性的组织，采用各种工会联盟作为行使不同职能的人们的组织形式，正是这种想法使人看到了通过社会革命而产生的社会的具体形象。现在只须给这两种组织模式加上第三种，这是我们近五十年来所见到的正在迅速地发展着的组织形式。……到处都出现了成千上万个自由联合团体和协会，以满足所有可能的和想象中的经济、环境卫生、教育等方面的各种需要 从互相保护出发，一切为了宣传各种思想，为了艺术，为了娱乐等等。它们相互交叉，全都准备通过新的组织和调整去满足新的需要。”^⑮

鉴于一些新出现的情况，人们不必同意克鲁泡特金所有的具体建议 而只需认识到 他所提出的概念，一般地说 构成了重新建设社会的现实基础。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相互交织着的合作劳动网。克鲁泡特金所列出的现在正在行使职能的根深蒂固的各种机

构，将以某种形式，由于一个简单的原因继续行使职能。这个简单的原因就是人类的生存依赖于这种内部的结合。对这一点，从未有人提出过疑问。目前所需要的是把社会从权力主义者的机构中解放出来，把各个组织本身从权力主义中解放出来：其中最主要的是，它们必须在人民的创造力中注入革命的精神和信心。克鲁泡特金在研究无政府主义社会学的过程中，已经为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而这一点却被社会科学家大大忽略了，他们正在为规划出应受国家控制的新领域而忙碌着。

无政府主义者坚持工人的控制，由工人协会“按照他们不同的职能”自己管理工业的想法是建立在非常坚实的基础上的。这种趋势可以追溯到罗伯特·欧文、第一个国际工人协会、英国的行会社会主义运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工团主义运动。随着俄国革命的发生，出现了工人以自由苏维埃（工会代表会议）的形式来控制趋势。而这些，最后被 1921 年喀琅施塔得大屠杀所扑灭。匈牙利、波兰和东德的工人代表会议也在 1956 年前后的暴动中遭到了同样悲惨的命运。在许多已经作过的尝试中，当然还有西班牙 1936 年的革命这个经典事例。它在自由意志论者的乡村合作社和工人控制城市工业方面成为富于建设性成就的里程碑。改良主义的国际食品联盟和有关工人协会联合会的刊物《新公报》（1964 年 7 月号）^⑩曾预言“实行工人控制很可能成为‘东方’和‘西方’劳工运动中先进分子的共同要求”，现在这已经成了事实。

被清洗的布尔什维克“左倾机会主义者”维克多·谢尔盖的下面一段话，谈的虽然是革命初期俄国的经济危机，但总的说来，现在仍有现实意义，而且附带阐明了克鲁泡特金的理论：“如果依靠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积极性，使受国家压制的合作社获得自由，并邀请各个协会去接管各经济部门的管理工作，某些工业本来是可以复活并在很大程度上获得恢复的……我在为协会共产主义——

对于国家共产主义而言——辩护。它的总计划不是按照来自上面的国家命令制订的，而是来自下面各种代表大会和特别会议的相互协调。’^⑮

“革命以后”

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们并不那么天真，盼望着出现一个由完美的个人组成的社会，而这些完美的个人会在革命成功后的那天就奇迹般地抛弃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旧风俗习惯。他们首先关心的是工业化国家或非工业化国家马上就要面临的重新建设社会的迫切问题。

这些问题对每个严肃的革命者来说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为此，无政府主义者们试图要找出解决在马拉特斯塔所谓的“……重新组织和过渡的时期”中很可能出现的迫切问题的方法。^⑯下面我们概要地介绍一下马拉特斯塔对某些较为重要的问题的讨论。^⑰

关键性的问题不可能因为拖延到遥远的将来——也许一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而逃避解决，希望那时候会完全实现无政府主义，群众最后也将成为忠实而具有献身精神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当那些较为实际的、肆无忌惮的权力主义者攫取了政权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愿被嘲笑为无用的、软弱无能的、爱发牢骚的人的话，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就必须有我们自己的解决办法。不论是无政府状态或是非无政府状态，人民都必须吃饭，并且必须为他们提供生活必需品。必须给各个城市提供给养，必不可少的服务不能中断。即使提供的服务很糟糕，人民从他们自身的利益考虑，也不会允许我们或任何人去中断这些服务，除非等到他们能用一种更好的方式重新组织起来，而这并不是一天之内就可以办到的。

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大规模城市化，只能在物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当群众确信他们可以得到利益，以及当他们逐渐在心理上习惯了他们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的时候，才能逐步实现。因为自由和自愿的共产主义（马拉特斯塔使用的无政府主义的同义词）是不能强加于人的，所以马拉特斯塔强调了在不存在对他人剥削的条件下，不同的经济形式，如集体主义的、互助的和个人主义的经济形式，共存的必要性；他深信，自由意志论者的合作社所取得的令人信服的成就，将“吸引人们进入集体主义的轨道……我个人不相信社会问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而认为应该有千百种不断变化的解决办法，因为社会的存在随时间和空间的不同是有差异的。”²⁰

“纯”无政府主义是一种虚构的假说

除了“个人主义者”（这是一个含义不明确的词）之外没有任何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是“纯”无政府主义者。乔治·伍德科克解释说：“典型的‘纯’无政府主义者集团”……是那种灵活而松散、富于吸引力的团体”它并不需要正式的组织形式，而是通过“个人接触和知识分子的影响这样一个无形的网来宣传无政府主义。伍德科克争辩说：“纯”无政府主义同无政府—工团主义那样的群众运动是不相容的。因为它需要一个“稳定的组织，其原因恰恰是因为它在一个仅仅部分地为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所控制的世界中活动……同天天变化着的情况妥协。……〔它〕必须得到那些只是遥远地意识到无政府主义最终目的的工人群众的忠诚。”²¹

假如这些描述是真实的，那么“纯”无政府主义只是一种梦幻。第一，因为决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那时人们都变成了“纯”无政府主义者，而人类将不得不永远地“同天天变化着的情况妥协”。第二，由于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中，那些错综复杂的经济和社会

的活动不能在“稳定的组织”的情况下继续保持下去。即使每一个居民都是虔诚的无政府主义者，“纯”无政府主义也仍然不能仅仅为了技术和职能的原因而成为可能。这并不是说，无政府主义不包括那种富于吸引力的团体。无政府主义预见到一个灵活的、多元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类的各种需要将由种类繁多的自愿组织起来的协会来满足。这个世界充满了从棋奕俱乐部到无政府主义宣传小组等富有吸引力的团体。它们的成立、解散和重建，依靠于人们的兴趣和爱好的变化。正因为这些团体反映了个人的爱好，所以它们是自由社会的生命线。

但是，无政府主义者们也坚持，由于生活必需品和必要的服务必须始终保持供应，不能听凭个人的兴趣去供应，因而供应生活必需品和必要的服务是每一个能够劳动的人所应该履行的神圣的社会义务，假如他希望享受集体劳动的利益的话。因此，供应这些必需品的各种庞大的组织、联盟和邦联必然会加强自由社会的基础。这种按无政府主义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稳定的协会并不偏离原来的宗旨。它们是无政府主义作为一个可行的社会秩序的精华所在。

“纯”无政府主义是不存在的。人们只能将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应用到社会生活的现实中。无政府主义的目的是激起一种推动社会向自由方向前进的力量。只有从这个观点出发，才能够正确地评价无政府主义与现代生活的关系。

自动化能促进无政府主义

我们认为，电子计算机革命的出现（虽然尚处在早期阶段）使无政府主义的建设性思想显得更加合乎时宜了。随着这种革命的展开，这种思想将与现代社会发生越来越多的关系。即使是现在，对于实行无政府主义来说，也没有不可克服的科学技术障碍。实现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无政府主义者同所有社会主义派别的理想

是一样的：“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的最大障碍是商品和服务的不足。“……（用电子计算机）控制，一种几乎具有无限生产力的系统，将需要越来越少的人力……将有可能消除国内和国外的贫困状态……”^② 在一个购买力同生产不发生联系的消费经济中，工资制度将成为过时的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先决条件将得到极大的加强。

1899年 当克鲁泡特金写他的《田地、工厂和车间》一书以说明工业分散经营的可行性以使城乡生活水平达到更大的平衡时，他的这种想法曾被斥为不成熟的思想。污染正威胁着这个地球上生命的生存，这就更尖锐地提出了把工业分散成人类可以控制的单位这样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已基本可以解决了，这一点现在已不再有人提出异议。关于这个题目已有大量的文献资料（默里·布克勤对这个问题已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参阅他的《萧条时期后的无政府主义》，兰伯特斯出版社，1971年）

建立自由社会的主要障碍之一，是无孔不入的、庞大的公司和国家管理机构。这些机构由一个地位牢固的官僚特权阶层把持，其中有管理人员、经理和政府官员，他们实际上控制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到目前为止仍然被看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恶疾，但由于电脑技术的发展，现在已可以取消这种庞大而臃肿的机构。

艾伦·托夫勒《未来的震惊》 兰丹姆出版社，1970年 第141页 总结他所列举的一些例证 得出结论说：“自动化非但不会加强官僚主义对文明的控制，反而会导致它走向灭亡……”（着重号是我们加的）另一个人引用《商业周刊》上的话强调指出：“自动化不仅使经济计划成为必要——也使它成为可能。制定全国性计划所需要进行的计算工作是相当复杂和困难的。但是，新的电子计算机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这种计算。”^③

自由意志论者关于工人控制的原则，不会因劳动力组成的变化或工作性质本身的变化而失效。有了自动化，新社会的经济结构必须建立在人民直接行使经济职能的自我管理之上。实现自动化以后，数以百计的已经加入了地方性、区域性、全国性和国际性联盟的、受过高等训练的技术人员、工程师、科学家、教育家等将自由地传阅各种资料，不断改进和提高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数量，并为新的需要研制新的产品。

通过大力发展现有的消费合作社并使它们与各种生产协会紧密配合，消费者将可以使人知道他们的要求，并由生产者来满足这种要求。数不清的各种超级市场的联号商店和各种服务中心现在遍布全国。这些商店和服务中心虽然是由股份公司或私人所有，但就其结构来说，很容易对其实行社会化，使它们转变为合作网。一般说来，生产、交换和经济中的其他部门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些经济有机体的相互结合，无疑将得到极大的发展，因为同样这些人，他们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

新社会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个自己管理自己的单位是否能增加相互间直接联系的速度——相互了解对方的问题，以更好地协调各种活动。由于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现在人们已拥有各种必不可少的设备：录音带图书馆、电子计算机控制的自动洗衣机、闭路电视和电话线路、通讯卫星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设备。它们使世界上所有人都能够立即进行直接通讯联系（地球和月亮之间的视听联系也不过仅仅需要几秒钟！）。“面对面的民主”这个自由社会的基石，已经被流动性越来越大的人们预示出来了。

这里存在一种被夸大的恐惧。有人担心，在一个自由社会中，少数科学和技术人员会对社会的其他成员建立独裁统治。他们现在当然还没有行使一般认为属于他们的权利。尽管他们的地位“较高”但是他们受经济波动的影响并不比“一般”工人少。目前

有将近十万科技人员失业)。象低工资的工人们一样，他们为了免受被辞退的痛楚也必须服从雇主的命令。

成千上万个有工作的灰心丧气的第一流科技人员，不能创造性地运用他们的知识，而只能去干枯燥无味、毫无用处的反社会的工作。当那些连科学的语言都不懂的毫无知识的人指挥着科研事务及其发展方向的时候，没有比束手无策地站在一旁更令人烦恼的了。在俄国或其他任何地方，科技人员同样不能自由行使自己的权利。

除了上述一般情况外，还可以采取另外两个措施来防止科技阶层实行独裁统治。首先，更广泛地开展科技培训工作，从而提供成百万个新专家，这样，就可以打破可能出现的少数人的垄断，消除独裁统治的威胁。“... ..在短短十多年内，在这个国家中，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数目已经增加了一倍，现在已占劳动力的百分之二十 这一增长比人口的增长快得多.....”(《纽约时报》，1970年12月29日)。

第二种防止独裁统治的办法是，不给予专家或其他任何人以统治别人的政治权力。虽然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防止滥用权力，但我们决不要忘记，在共同努力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时候，我们还必须学会相互信任。如果我们相互不信任，那么这个更为美好的世界将永远是一个空想的王国。

无政府主义所真正关切的

我曾试图阐明，无政府主义并不是一种可以奇迹般地医治社会机体各种疾病的灵丹妙药，而是根据现实的重新建设社会的概念所制定的二十世纪的行动指南。商品和服务的不足和工业管理的过分集中，曾是实施无政府主义的几乎难以克服的物质障碍。电脑—技术革命的出现，已使人们克服了或有能力克服这些障碍。

然而，解放运动却受到来自更为令人生畏的“既成权力机构”在政治方面、社会方面和洗脑技术方面的威胁。

在同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争论时，无政府主义者坚持认为，国家政权往往使经济服从于自己的目的。一个高度复杂的经济体系，曾一度被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而现在却被利用来加强统治阶级的统治，因为这种经济体系带来了摧残人的精神和肉体以及消灭人类价值的方法。物质的丰富能够把人们从贫困和乏味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但正是这种物质的丰富现在实际上使国家得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贫民院。在这个贫民院中，几百万因工业技术发展而丧失了职业的人——被社会遗忘和排斥、很少露面的人——只能得到足以使他们保持沉默的公共“福利”。那种打开了通向自由的新道路的技术，也同时用极其可怕的消灭人类的武器，武装了各个国家。

无政府主义者从未低估过在社会变革中经济因素的重要性。然而，他们不盲目迷信经济决定论。无政府主义对社会的理论最有说服力的贡献，是适当地强调了政治制度和机构怎样反过来对经济生活产生影响。同样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无政府主义强调了人的意志、抱负、道德和超于一切的造反精神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在这方面，无政府主义与新社会的建立有特别密切的关系。为了说明这一看法的重要性，我们引用巴枯宁写给他的朋友埃利西·雷克勒斯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革命的时刻已经过去，其原因不是由于（普法战争和 1871 年 5 月巴黎公社的惨遭镇压）那可怕的灾难，而是因为极其痛苦地发现，而且我每天都再次发现，群众已完全丧失了革命的希望和热情。如果缺乏这些东西，一切努力都将是徒劳的。”

越来越多的消费品，加上大量灌输尖端技术，已腐蚀了公众的思想。资产阶级化已减少了群众的革命朝气。正是这种对社会主

义的鼓舞人心的价值的背离，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现代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被收买和被腐蚀。

一场在无政府主义思想鼓舞下的革命运动能够扭转这种反革命的趋势。开展这样一场革命运动是压倒一切的任务。而无政府主义所真正关切的就在于此。

注 释

卢吉·法布里：《无政府主义中的资产阶级影响》（巴黎：《工人团结报》，1959年）

金斯利·威德默：《无政府主义到处复苏》载《民族报》，1970年11月16日。

③ 《埃利戈·马拉特斯塔——生平及思想》（伦敦自由出版社，1965年）第24页。

摘自一封朋友的来信，无日期。

⑤ 《联邦主义——社会主义——反神学主义》。

⑥ 乔治·伍德科克：《无政府主义》（克利夫兰：世界出版社，1962年）第469—473页。

⑦ 丹尼尔·奎尔灵：《无政府主义》（巴黎加利玛特公司1965年）第180—181页。

⑧ 约翰·B·麦克尤恩：《无政府状态》，1963年3月第25期伦敦。

⑨ 彼得·克鲁泡特金：《革命的小册子》（纽约前卫出版社，1927年）第76—77页。蒲鲁东的看法也很相似，“思想的进步和兴趣的复杂化，使社会被迫同国家断绝关系。”

⑩ 迪亚哥·阿巴德·德圣提兰：《革命以后》（纽约格林堡，1937年）第85、100页。

⑪ 彼得·德鲁克：《断断续续的时代》（纽约哈珀和罗公司，1968年），第212、217、222、225—226、251—252页。

⑫ 冈纳·米多尔：《超出于福利国家》（纽黑文耶鲁大学，1960年）第97、102、108页。

⑬ 皮埃尔·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一般思想》（伦敦自由出版社，1923年），第90页。

⑭ 彼得·克鲁泡特金：《革命的小册子》第168页。

⑮ 同上书第166、167页。

⑯ 从属于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的一个分支机构）下的一个全国工会联盟。

⑰ 克鲁泡特金：《一个革命家的回忆》（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147—148页。

- ⑮ 《马拉特斯塔》第 100 页。
- ⑯ 同上书 第 36、103、159 页。
- ⑰ 同上书 第 99、151 页。
- ⑱ 伍德科克：《无政府主义》第 273—274 页。
- ⑳ 《宣言……三重革命委员会》引自《解放》月刊，1964 年 4 月号。
- ㉑ 《机器人革命》美国社会党，1965 年出版 第 43—44 页。

第三部分 左翼无政府主义

十九世纪中叶，人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他们那些名称不为人熟悉的同志统统称为“社会主义者”。但是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卡尔·马克思和米哈伊尔·巴枯宁由于思想上的冲突和个人气质迥异而分道扬镳。从那以后，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分歧就十分鲜明地表现出来。马克思主义者醉心于历史发展、高速工业化、夺取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特别是建立正统的思想体系。无政府主义者对这一套则恨之入骨。他们喜欢自发性而不喜欢计划性，喜欢权力分散的公社而不喜欢工人国家。许多无政府主义者都是好斗的个人主义者。

从 1917 年起，以埃玛·戈德曼和彼得·克鲁泡特金为开端，无政府主义者的表现说明他们不仅反对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反对苏维埃中央集权制度。无政府主义者要求建立一种既非常激进、但又不受马克思那些主张统制经济的继承人的错误影响的思想体系。许多新左派接受了这个任务。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一个远非正统的激进分子 C. 赖特·米尔斯就表现了一种自发意识、一种运动意识、一种乌托邦式地追求社会主义的意识。他写的《给新左派的信》得到广泛阅读、讨论和评论，其精神实质是无政府主义的。这封信充满对官僚作风的蔑视，认为希望和心愿同过去的正统派学说一样，都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一种力量。

斯托顿·林德写的《运动：一个新的开端》具体表现了对教条主义的反感，肯定了革命来自“下层”的思想。这篇文章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历史学家和积极的活动分子围绕越南战争时期反对征兵问

题进行的历史概括。作者以知情人的身份描绘了反对征兵的激进派的日常活动，并指出了他们的问题。但是在强调不合作运动中的个人因素时，文章也反映了新左派的伦理观。林德的朋友既是反对派也是建设者。他的文章反映了这些人的无政府主义精神。

默里·布克勤参加激进活动已三十余年。他写的有关无政府主义的著作特别是《匮乏时期以后的无政府主义》这篇文章显然继承了无政府主义经典著作的传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当中，他的意见是最明确、最有条理的。在一篇访问记《无政府主义革命》中布克勤说明了无政府主义者对眼前事物的关心（他是最早讨论环境灾难问题的激进分子之一），并且要求建立一个由实行分权的公社组成的、没有国家的社会。这种观点显然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埃米尔·卡布亚写的《红旗与黑旗》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抗议和他们追求的积极目标都作了评论。卡布亚既批评无政府主义者爱走极端，又赞同他们相信人类潜力的观点。作为编辑和作家，卡布亚赞扬左派无政府主义者的理想：“每个人都必须亲自工作，亲自体现一个已经获得解放的人的生活。”

4. 给新左派的信

C. 赖特·米尔斯

坐下来给你们写信，我感觉比平常要“更自由”一点。这可能是由于我大部分时间总是为这样一些人写作：在我的心目中，这些人含糊其辞的言论以及他们的价值观念都和我颇为不同。而对于你们，我则感觉有许多共同点，足以使我们能用比较积极的方式“谈下去”。读到你们那本名为《出于冷漠》的书，使我想给你们写信，谈谈我认为我们当前面临的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我都说不

清楚；我只想提出问题。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英国和美国自命不凡的保守派、萎靡不振的自由派和幻想破灭的激进派一直在进行有气无力的讨论。这种讨论模糊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压制了可能出现的辩论。病态的自满占了上风，作为双方共同特点的陈词滥调风行一时。在你们的书问世以后，已无必要再来阐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的“普通老百姓”当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文化界有一种作风——实际上是知识分子对冷漠的讴歌——可能是值得探讨的。

当然，知识分子讴歌冷漠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妨碍人们解放思想，去考虑冷战问题、苏联集团问题、与和平有关的政治问题以及在国内外寻找新起点的问题。但是萦回于我脑际的是北约国家许多知识分子当中流行的一种风气。这些知识分子对他们所谓的“意识形态”感到厌倦并宣告“意识形态已经完结”。就我所知，这种说法开始于五十年代中期，主要在一些同争取文化自由大会以及《文汇》杂志多少有点联系的知识分子当中流行。在有关1955年米兰会议的报告中，这种说法已初露端倪；从那时起，文化界许多人就把它当作一种态度、一种尚待探讨的口号加以传播。这种风气是否有任何意义呢？

它的共同特点并不是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而是已经程式化的、经过精雕细凿的、被人们不加批判地用来作为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武器的自由主义词藻。这种词藻的标准组成部分看来不过是一些自以为是的假设，其精致细腻之处在于语调，而不在于思想。使用这种词藻是《纽约人》周刊报道风格政治上的胜利。它照例要揭露事实，或者是喜气洋洋地揭露，或者是毫无表情地揭露。这些事实经过适当的斟酌、细心的平衡，结果总是模棱两可。它们那种使人激怒、使人真正从政治上得到教益、帮助人们做出决

定、甚至澄清某些情况的力量，统统遭到削弱或摧毁。

这样一来，推理就变成了合理。那些天真幼稚、自以为是、洋洋自得的神父们，对于令人不快的论点和事实根本不予理会；比较有知识的人虽然对这些论点和事实给予适当注意，但并不把它们相互联系起来或与任何总的观点联系起来考虑。零零碎碎地予以承认，但决不联系起来考虑。十分有趣的是，如果不这样做倒有被人叫做“片面”的危险。

拒绝把孤立的事实和零散的意见同正在发生变化的社会体制联系起来观察，就不可能理解这些事实可能揭示的有关体制的真实情况和它们可能代表的长远趋势。简而言之，由于事实和观点都遭到割裂，因此真正的问题根本尚未提出，对事物含义的分析甚至尚未开始。

当然，通过聪明的闲扯，通过对他们所处理的概念的选择，那些认为意识形态已经完结的人确实在报道事实的幌子下偷偷塞进了一些总的概念。说到底，他们所谓意识形态已经完结的基础是：他们对于以任何公认的形式对社会主义承担任何真正义务的思想感到幻灭。对于这些作者来说，唯一真正完结了的“意识形态”就是这种意识形态。但是他们认为，随着这种意识形态的完结，一切意识形态都完结了。至于他们谈论的那种意识形态，即他们自己有关思想意识的假设，他们并不认为已经完结了。

他们这样观察问题和讨论问题，是因为他们认为西方已经不存在真正非常严重的问题，甚至不存在真正难以对付的事。混合型经济加福利国家加繁荣——这就是他们的公式。美国资本主义将继续起作用，福利国家将沿着越来越公正的道路继续前进。同时，一切事物都是非常复杂的，存在巨大的危险，我们不能粗心大意……。

如果世界上曾经存在一种“虚假的觉悟”，这就是一个例子。

我认为这种态度使人们根本无法有效地考虑世界上可能正在发生的事情。

首先，这种态度是以一种简单而偏狭的观念作为基础的。如果“意识形态已经完结”这句话有任何意义，那也只是对那些比较富裕的国家里各自抱成一团的知识分子有意义，事实上只不过是他们的自我写照。这些国家的人口加起来也只有世界总人口的一个零头；这种姿态存在的时间肯定是非常短促的。以这种方式谈论拉丁美洲、非洲、亚洲、苏联集团的大部分地区只能说是滑稽可笑。在这些地区的任何地方，如果任何人以这种方式对知识分子或群众谈话，那些讲究礼貌的听众就只好耸耸肩，不予置理，而比较坦率和了解情况的听众则会捧腹大笑。意识形态完结论是目前西方富裕社会那些早熟的中年人当中流行的一个自鸣得意的口号，其基础归根结底是不相信人类能够塑造自己的未来——自己未来的历史和传记。它代表了少数眼光狭窄的人对自己鼻尖底下那块小天地的共同看法。

其次，意识形态完结论本身当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虽然是一种支离破碎的意识形态。说它是一种精神状态或许更为合适。它实际上是一种完结的意识形态，反映政治思考本身作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已经完结。它是一种厌世的、似乎什么都看透了了的饰词，通过语气而不是通过明确的论证为北约国家的知识分子在文化和政治方面放弃职守的行为辩解。

这一切都不过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类的玩艺。对此，我——至少是我——从来都是反对的，而且现在仍然反对。

在苏联，对周围事物的批评当然也是允许的——但不得和对体制本身的批评联系起来。对“制度”是不得提出疑问的。“对抗性矛盾”是不存在的。

苏联也容许小说和剧本批评人物，甚至批评党员——但必须

把这些人物当作“令人震惊的例外”来描写，把他们看成旧制度的残余，而不是新制度必然的产物。

苏联也容许悲观思想存在——但只能作为一种插曲，只能在对全局表示乐观的前提下表示悲观，从而把任何对制度或体制的批评同悲观思想混淆起来。因此，可以进行零零星星的批评，但是一切批评都将淹没在对整个制度、对领导人宣布的目标所抱的乐观情绪之中。

我不想也不需要过分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思想意识终结论之间的类似之处。但是，当我最近在苏联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进行一系列访问时，这种类似使我得到极为深刻的印象。在乌兹别克、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在每次录音访问结束以后，我都作些笔记：“这个人谈起话来就象小阿瑟·施莱辛格。”这个家伙确实同丹尼尔·贝尔一模一样，但不象他那么——怎么说呢？——那么爱说别人的闲话；当然也不象那些妒忌心较强的喜欢往上钻营的人那样卑劣和粗鄙。这或许是因为这里的人们并没有由于地位的竞争而羡慕英国古代那些令人心往神移的名门贵族。”关于那些自命为给意识形态敲丧钟的人，我不断在想，“他们难道不正是能够自行调整、更确切地说是能够随风倒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在北约地区的翻版吗？我还写了这样一句话：“要仔细同《文汇》杂志和《报道者》杂志上的文章对照一下。”

差别当然是很多的——首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官方路线的一部分，而意识形态完结论是独立经营的买卖。但是，差别已为人所共知。强调其相似之处——以及两种姿态都反对激烈批评自己的社会这个总的事实——是较有裨益的。

在苏联，只有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或确有把握走向政治顶峰的人才能认真干预体制问题和思想路线问题。当然，同美国政客比较起来（英国的情况你们比我更了解），这些掌权的人更有可能是

一些知识分子（从某种意义上说——譬如说 他们自己动手起草讲话稿）。不但如此，这些苏联权贵从斯大林逝世以来已经开始对体制和基本意识形态进行相当严重的篡改了——虽然由于苏联的体制正式把文化和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不得不力图掩盖这个事实。

意识形态完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引起的一种机械的而不是创造性的反应。作为这样一种反应，它也从它所反对的意识形态中吸收了某些内在的素质。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人已经了解庸俗马克思主义是毫无价值的，但尚不了解自由主义的词藻也同样毫无价值。

但是当前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完结论只不过是一种时尚，而时尚是要变化的。这种时尚现在已经开始趋于消失。甚至少数反斯大林主义的死硬派也出现了重新估价自己过去的观点的苗头；有些人甚至开始公开承认苏联的党和国家现在已经不是由斯大林亲自统治了。他们开始正视赫鲁晓夫的俄国，开始看到自己心爱的观点其内容是多么贫乏。

由于感到风气又在变化，形形色色的作者现在已开始号召知识分子再次以政治上十分明确的方式进行工作。这种情况常常使我们这些在整个战后时期——按照我们工作的道德标准来看——始终一贯保持激进态度的人感到有趣。然而我们不应当仅仅感到有趣。我们应当努力使他们的转变不局限于风气的变化。

意识形态完结论之所以开始消失，是因为它拒绝建立一种观点鲜明的政治哲学。可是各地嗅觉灵敏的人今天都感到需要这样一种哲学。我们应当继续正视这种需要。起作用的政治哲学就是使你能够展开工作的哲学。当我们正视人们对政治哲学的需要时，记住这一点是有益的。为此目的，至少需要做四种既属于知识范畴也属于政治范畴的工作。

据此，要稍微多考虑一下意识形态完结论的问题：

1. 甚至幼儿园的孩子也知道，任何可能对公众产生影响的政治见解都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对政策、制度和掌权人物是批评还是拥护，都涉及意识形态。关于这个问题，意识形态完结论从消极意义上说是主张人们使自己和自己的工作脱离政治。从积极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安于政治现状的思想。它似乎是许多作者默认现状或为现状辩解所能使用的唯一手段。

2. 关于指导社会和历史的理论：意识形态完结论主张经验主义，而且可以说是信奉经验主义。用比较学院式的语言说，它信奉矫揉造作的方法，借以表述无足轻重的社会领域中发生的琐事。用比较符合散文笔法的语言说，它信奉的是一种天真的、带有新闻工作特点的经验主义（其特征已如上述），信奉文化界的流言蜚语——而流言蜚语对重大关键问题的“回答”完全是想当然的。这样一来，政治偏见就可以冒充真知灼见，而指导性理论就不存在了。

3. 关于变革的历史媒介：意识形态完结论立足于以现有机构、或以零零星星的改良措施作为媒介，而不主张寻找可能用于或直接有助于社会体制改革的媒介。它从来没有把媒介问题作为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我们的问题提出来，相反却说什么需要讲究实际，需要灵活和不抱成见。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已谈得很多了。只有当人间事物的盲目发展总的来说是朝有利的方向前进时，这种观点才有任何政治意义。

4. 关于政治理想和人类理想：意识形态完结论否认理想有任何意义——除了作为空洞的偶像以外。按照这种看法，只要认真看待理想就是“空想主义”。

够了，不必谈下去了。在政治哲学这四个方面，我们持什么立

场呢？当然，每个方面我们都有不同的人在进行研究；我们大家一般都了解我们的有关需要。至于对理想的阐述，我认为到现在为止你们的杂志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因此你们才把重点放在文化工作方面，对吗？至于思想分析以及进行思想分析使用的语言，我认为我们都做得远非完善。但只要我们在两条最薄弱的战线上继续前进，就可以做好。这两条战线是：关于社会、历史和人性的理论；关于体制变革的历史媒介的概念——这是主要的问题。

形形色色走投无路的人经常对我们说：历史和理性已经使左和右都失去意义。我想应当这样回答他们：

右的含义之一就是象你们那样讴歌社会现状，认为社会仍处于兴旺发达的状态。左则刚好相反，包含对体制的批评和揭露，包含从体制方面分析社会的理论，其中某些方面集中表现为政治要求和政治纲领。这些批评、要求、理论和纲领受到了西方文明中世俗的人道主义思想——首先是理性、自由和正义——的影响。“做左派”就要把文化方面的批评同政治方面的批评挂上钩，把这两种批评同各种要求和纲领挂上钩。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左”的含义都是这些。

只有一点还需要说明：公开的争论点很可能是不存在的，但并不是由于没有问题或没有矛盾（对抗性或非对抗性矛盾）。非个人的、体制的变化并没有消灭问题或争论点。很多讨论没有争执点——这实际上是一种思想状态，首先取决于知识分子是否发现问题，并把问题作为可能的争论点向可能感兴趣的公众提出，或作为困难向各种类型的个人提出，围绕这些中心任务进行工作。要有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这种手段只能称为思想分析。积极的左派的任务之一就是进行这种分析。

要严肃对待需要政治方向的问题。这当然不是说要去寻找什么狂热的、能启示心灵的幻影，寻找永远可靠的、象磐石般牢固的

推动变革的杠杆，寻找教条式的思想体系、一鸣惊人的新词藻、捉摸不定的抽象概念——或者是那些走投无路的人想象出来的其他各种怪物。我们政治上的敌人正是把这些“极端思想”、稻草人和不伦不类的怪物当作他们想象中的对立面。

例如，他们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普通人都能成为政治上的“英雄”。谁说过存在这种可能？但是，经常看看你周围的情况吧！为什么不去研究一下人们显示和可能显示这种英雄气概的条件呢？他们说我们过分“缺乏耐心”，说我们“自命不凡”理论缺乏足够的根据。情况确是如此，但也不能说这些理论就毫无价值。为什么他们不踏踏实实地工作来驳斥或支持这些理论呢？他们说我们“并不真正了解”今天的俄国和中国。这是真的；我们是不了解；他们也不了解；而我们正在研究。他们说我们的提法“叫人感到不安”。确实，我们具有足够的想象力叫人感到可怕——这一点我们并不想加以掩饰；我们并不担心自己会惊慌失措。他们说我们“在追求自己的目的”。当然是这样。除其他观点以外，我们确有一些道义上站得住脚的目的；我们了解这些目的。他们无比聪明地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懂得斗争是无止境的。不错，我们要改变斗争的形式、焦点和目标。

我们常常受到指摘，说我们的批评和建议是“空想主义”同时还说我们把对新左派政治的希望“仅仅寄托在理性上”更具体地说是寄托在最广义的知识分子身上。

这些指摘都有道理。但是，我们难道没有必要问一声：所谓空想现在究竟是什么含义？我们的空想主义难道不正是我们的力量的一个主要源泉吗？照我看来，“空想”这个词现在指的是超越个人直接接触的环境——即男人和女人能够直接了解并有理由希望直接加以改变的环境——的任何批评或建议。严格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理论工作确是空想——至少我是故意如此的。需要

了解并加以改变的不是某个机构或政策的某一细节。如果要实行新左派的政治，就必须分析机构的体制和政策的基础。就这个意义来说，我们的批评和建议必然针对体制问题，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它们目前还属于空想。

因此，我们必须正视我们这个时代考虑政治问题和采取政治行动时涉及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实行变革的历史媒介问题，也就是改变体制所需要的社会手段和组织手段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向你们提出几点看法。

首先，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实行变革的历史媒介是一系列自愿组合的协会，政治上以议会制度或国会制度作为最高理想。另一方面，几乎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实行变革的历史媒介是工人阶级——后来又加上农民，还有由工人阶级成员以不同方式组成的政党和工会，或者是以工人阶级名义采取行动——“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政党（这是当前把一个重大问题弄得模模糊糊的说法）。

我不能不认为，以上两种意见谈到的历史媒介（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不是已经垮台就是变得极为含糊不清了；就体制变革而言，它们似乎已经不是我们可以找得到并卓有成效地加以利用的媒介了。我知道 在我们之间 在其他许多人之间 这是需要辩论的问题；我对这个看法也毫无把握。但即使是这种情况，我们也不应把它当成痛苦呻吟和置身事外的借口（就象某些意识形态完结论者所做的那样），也不应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苏联许多学者和宣传家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在考虑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时干脆拒不承认工人阶级的政治状况和政治态度）。

到1970年，肯定到明年这个时候，我们的情况将同现在大不一样，很有可能会发生决定性的变化。这难道不是十分肯定的吗？当然，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应当把推动变革的历史媒介似乎已

经垮台这件事当作一个问题，当作一个需要辩论、值得苦恼的问题——事实上是我们必须展开争论并感到苦恼的唯一的政治问题。

其次，十分明显的是，当我们谈论变革媒介垮台时，决不是说根本不存在这种媒介。相反地，创造历史、做出决定和执行决定的手段在世界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么规模庞大，或为铁幕两边这么少的人所掌握。至于我个人对权力形式和有关上层实权人物的理论的看法，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里讨论。在政治观点千差万别的批评家笔下，这个理论得到的待遇是不错的；我从其中一些批评家那里已经受到教益。但是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见到任何分析能使我感到需要对这个理论的基本内容做任何修改。

同我们的讨论直接有关的一个论点看来是很明显的：对我们来说是空想的东西，对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对华盛顿那些以总统为核心的高级人士以及（从最近事态可以明显看出）战略空军司令部和中央情报局的人来说却根本不是什么空想。已经垮台的历史媒介是指西方先进国家内部至少在想象中应可供左派利用的那些媒介，即希望改变社会体制的那些人。这个明显的事实产生了大量后果，其中许多后果我们肯定还没有充分意识到。

第三，我不太理解某些新左派作者为什么死死抱住先进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工人阶级”不放，把他们当作唯一的历史媒介或最重要的媒介，虽然历史已令人信服地证明情况发生了变化。

我认为对工人采取的这种形而上学的态度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残余，现在是完全脱离实际的。

这是一个具体的历史概念，现在却变成了一种既不具体又脱离历史事实的愿望。

使产业工人有可能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一股决定性的政治力量的社会历史条件需要充分而准确地加以阐述。这种条件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会存在，当然要随各国社会结构及其经济

政治发展的具体阶段不同而有所不同。我们当然不能“把工人阶级一笔勾销”。但我们必须重新研究这一切问题。在工人确实作为一种媒介存在的地方，我们当然必须加以使用，但我们决不能把他们当作必不可少的杠杆——象贵国和其他地方那些可爱的老牌工党绅士倾向于做的那样。

虽然我对工人阶级的对比研究尚未完成，但一般看来雇佣劳动者只有在工业化的某些（较早的）阶段、在存在政治专制等等条件下才趋向于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等等。“等等”的意思是“我这里只能提出问题而不准备加以阐述。”

几年来，我一直在研究文化机构和知识分子的情况，脑子里考虑的就是这个媒介问题——考虑他们是否可能成为推动变革的直接的、激进的媒介。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并不比你们当中的许多人更喜欢这种看法。但是现在，即 1960 年春天，我却发现这种看法可能是很有分量的。

首先，如果我们想使我们的空想切合实际——这并不是一个解决不了的矛盾——今天我们这些国家的左派作者就必须以上述看法作为起点。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因为我们就是知识分子。

其次，知识分子问题涉及一系列极为复杂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做多少实事求是的工作。在做这种工作时，最重要的是决不能把西欧和北美的知识分子问题同苏联集团或不发达世界的知识分子问题混为一谈。在当前世界社会结构的这三大组成部分中，每个部分的知识分子都具有独特的、从历史上说是具体的特点和作用。只有对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都进行详细的对比研究，才有希望了解其中任何一种知识分子。

第三，究竟是什么人现在日益感到厌倦呢？究竟是谁在对马克思称之为“一切陈腐的废话”^①的东西感到憎恶呢？现在思想和

① 原文出处不明，自译。——译者

行动都很激进的究竟是谁呢？走遍整个世界，无论是集团之内、集团之外还是集团之间，答案都是一样：是青年知识分子。

我刚为我写的一本讨论战争问题的书（1960年平装本）准备了一些材料 情不自禁想抄几段给你们看（有少量改动）：

“1960年春天和初夏，由于美国的决定或放弃责任造成的后果进一步表现出来。土耳其在发生学生骚乱之后，原来由共产主义的遏制者门德列斯管理的国家已为军人政府接管。南朝鲜的学生和其他人等也推翻了美国傀儡李承晚的腐败统治。在古巴，在不受美国公司统治的情况下，一场货真价实的左派革命开始了全面的经济改组，其领导人的平均年龄仅三十岁左右——这场革命肯定没有以工人作为媒介。在台湾，处于美国人强加的蒋介石（他有二百万中国人）独裁统治下的八百万台湾人越来越难以驾驭。美国军事基地冲绳的人民获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机会，举行示威反对美国占领该岛；有些学生乘机举行蛇形游行^①对访问该岛的美国总统愤怒地高呼：“滚回去 滚回去 连你们的导弹一起滚回去！”用不着担心 由一万二千名美国军队来对付那些总的说来怀有感激心情的人群是轻而易举的事；总统也“从美国大院的后门溜走”用直升飞机运到了机场。在英国 从奥尔德马斯顿到伦敦 青年人……（不过你们在场 不用说了）在日本，几个星期的学生骚动制止了美国总统的访问，使日本同美国签订新约一事岌岌可危，使代表大企业利益的亲美派首相岸信介滚下了台。甚至在我国风光明媚的南方，黑人和白人学生……（还是缄口不谈吧 这种事确实不光彩）

“以上列举的远非全部事实，而且是过去的事了。读读今天的报纸吧。到明天，在不同程度上，后果会更清楚。会足够清楚吗？”

^① 日本群众游行示威时常采取“之”字形队形 故称“蛇形游行”。——译者

必须十分清楚才能真正引起美国人的注意。甜蜜的埋怨和理性的声音是不够的。在今天世界上那些穷国里，人们在说些什么呢？富有的美国人只关心暴力，还有钞票。美国人，你们不在乎他们说什，对吗？这很好。但是他们将坚持下去。事物已经摆脱了旧的控制。这不是你们一下子可以弄清楚的。看来你们的国家——美国——很可能成为全世界憎恨的靶子，其激烈程度是逍遥自在的美国人做梦也想不到的。世界各国的中立派、和平主义者、单干派以及名目繁多的左派，加起来有几千万人。当然啰，这些人都会被引入了歧途，都处在阴谋小集团的绝对控制之下。这些小集团的成员都是些捣乱分子，直接听命于莫斯科和北京。这些人作恶多端，神通广大。整个乱糟糟的动荡局面都是他们一手造成的。正是他们使千百万人产生了荒谬绝伦的念头，不愿成为或继续充当美国的核基地——美国文明的那些小小的、欢乐的前哨。因此他们现在不愿意让 U-2 型飞机驻扎在他们的领土上，拒绝接受美国军事机器的约束，要求在疯狂对立的大国之间保持中立。他们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社会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但是，美国人，你们也无需垂头丧气。你们想对国外的朋友真正产生厌烦也来不及了；他们和你们做朋友的时间不会太久了。你们并不需要他们。一切都会烟消云散；不要让他们搅乱了你们的思想。”

此外，在苏联集团内部，那些从冷漠状态中摆脱出来的是些什么人呢？是学生，还有年轻的教授和作家；是波兰、匈牙利还有俄国的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尚未取得胜利，这无关紧要；他们当中还有属于其他社会和道德类型的人，这也无关紧要。首先是有这样一些摆脱了冷漠的人。我的意思说清楚了吗？

因此，我们必须把全世界这些属于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当作真正的、活生生的推动历史变革的媒介来加以研究。除了需要的时

候以外，还是忘掉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吧！重新读一读列宁的书（要仔细）——还有罗莎·卢森堡的书。

“但这不过是某种道义感的高涨 不是吗？”不错。但是在道义高涨的情况下，冷漠已经消失。这种高涨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直接的非暴力的行动，看来在许多地方还是起作用的。我们现在必须从他们的实践中寻求教益，并同他们一起制定出新的行动方式。

“但这一切还是非常模糊不清的。例如土耳其。还有古巴。”确实是这样；创造历史的过程总是模糊不清的；要稍候片刻，与此同时要帮助他们把道义感的高涨的焦点集中到不那么模糊不清的政治手段上来；同他们一起制定出有助于巩固自己的力量的思想体系、战略和理论，制定出我们这个时代对人类社会、并由人类社会进行体制变革的新理论。

“可是归根结底还是空想 对吗？”不对，不是你们所说的那种空想。它可能是任何其他东西，但不是空想。去问问日本学生，看他们怎么说吧！

难道这一切不正是我们力图赋予“新左派”一词的含义吗？让那些老头们去乖戾地询问：“摆脱了冷漠——又将进入一种什么状态呢？”安于现状的时代正在结束。让那些老太婆们自作聪明地去抱怨“意识形态已经完结”吧！我们正在重新开始行动。

你们的忠实朋友

C. 赖特·米尔斯

5. 运动：一个新的开端

斯托顿·林德

对于你们当中的某些人来说，我打算讲的话可能显得抽象或带理论色彩。我通常也讨厌理论；我认为人们应当使他们今天的言论同他们明天准备亲自采取的行动结合起来。然而在这次会议

上，我感觉有所不同。如果我们的讨论局限于日常抵抗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就等于默认我们现在对这种工作的解释。而如果我们想要重新探讨工作的意义，这样做是无济于事的。我本人深信现在是一个历史时刻，抵抗运动必须在认识上来一个飞跃，必须在考虑多种问题和多种阶级的基础上重新确定有关的工作。照我看来，如果对抵抗运动最终希望建立的那种社会、对促进和阻挠我们实现这个希望的历史力量、对走向目标需要采取的确切战略（即使是最初步的战略）毫无概念，就无法完成以上任务。

在反对越南战争的抵制征兵运动史上，有一个可称为典型的时期。这个时期开始于 1967 年 4 月，当时大约有一百五十名青年在牧羊草场烧毁征兵卡；海湾地区的戴维·哈里斯、丹尼斯·斯威尼、伦尼·赫勒和史蒂夫·汉密尔顿自称抵抗运动，并且以此名义号召群众在 10 月 16 日退还征兵卡。典型时期结束于 1968 年 4 月。当时，在短短一周之内，林登·约翰逊退出了总统竞选并宣布局部停止轰炸；第三次退卡日使拒绝合作者增加到二千五百人左右；马丁·路德·金也遭到暗杀。

抵抗运动的成员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在 1967 年 4 月至 1968 年 4 月期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清楚的。典型时期的抵抗运动成员就是公开地、集体地拒绝同征兵局合作的人以及鼓吹、协助和煽动这种行动的人。

拒绝同征兵局合作的典型行动后来却莫名其妙地——借用卡尔·马克思从宗教人类学搬过来的词汇——变成了一种迷信，具体化或物化了。这种行动本来仅仅是抵抗一种压迫形式的一种方式，现在却变成了我们整个运动的定义。

抵抗运动必须突破这个典型定义，不要再迷信抵制征兵局的行动，而要设法恢复最初导致这种行动的精神。要摆脱僵化的形式继续前进是困难的，但精神是可以发扬并获得新的表现形式的。

我们需要做一切必须做的事，使我们能够以忠于我们原有精神的方式，成为抵抗一切形式的压迫的群众运动。

我们如何响应这一挑战呢？抵抗运动前途何在呢？下个世纪的历史著作很有可能会这样说：

1968年4月以后，抵抗运动开始转入低潮。这年夏天并未出现大量征召大学生入伍的情况。战争继续拖延，在某些方面甚至升级了。但由于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升级行动，抵抗运动未能重新获得它最初具有的势头。派别活动明朗化了，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分裂性的小组。有些抵抗小组受到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反对帝国主义的分析的影响，开始要求制定使社会来一个根本变革的、包括多方面问题的纲领和首尾一贯的长远战略。具有这种倾向的人努力想使和他们共同参加抵抗活动的伙伴也这样看问题，但没有成功。于是他们逐渐脱离抵抗运动，常常是参加到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行列中去，虽然有时还会怀念抵抗运动那种胸怀坦荡的、通过协商一致做出决定的方式及其保持权力分散的组织结构。留在抵抗运动中的那些人的注意力越来越从战争问题转向吸毒、食物、公社、消除暴力等次要问题方面；这种变化本身就起了分裂作用，因为有些人开始把主要精力投入咖啡店、免费学校以及其他同抵抗征兵没有关系的工作中去了。当战争终于结束时，抵抗运动同其他仅仅围绕战争这个问题组织起来的团体一样宣告瓦解。越南和平条约签订不到半年，抵抗运动就寿终正寝了。

我再说一遍：这是将来的历史著作大有可能记载的。现在让我设想另一种历史，虽非大有可能，但我深信还是有可能性的。这种可能的历史将指出：

1968年4月以后，抵抗运动同规模更大的运动一样经历了总统选举年特有的方向不明的阶段。大约一年以后，开始出现了新的方向。虽然存在普遍的混乱，许多抵抗组织一直在耐心地探索反对征兵以外的抵抗形式，并且同中学生、士兵、妇女解放组织以及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某些地方分会采取试验性的联合行动。这种探索和试验所必然产生的内部紧张关系在伊利诺斯州的布卢明顿举行的全国会议上得到了富有成效的解决。当然，反对征兵的工作仍在继续。征兵工作本身也在继

续，因为美国帝国主义需要征兵为它提供灵活的人力来源，以便同时进行一场以上的反对第三世界起义的战斗；当 1969 年春天可以明显看出越南战争远未结束的时候，抵抗运动获得了新的活力。但是它现在仅仅把征兵局看成非法权力结构的一个侧面。因此，原来一直把抵抗运动贬为中产阶级受虐狂的道德说教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许多成员，转而倾向于抵抗征兵运动，认为它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可以把精辟的分析同六十年代早期这个运动具有的人道精神结合起来，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则经常陷入无休止的内部争论。结果，抵抗运动在建立广泛的解放运动方面起了关键性作用。后来十年出现的革命总罢工就是解放运动组织的。

至于如何实现这第二种仅仅属于可能性的历史，我提不出一个方案。谁也提不出这样的方案。我希望研究我们两条共同经验，以便帮助我们大家朝这个方向进行更有创造性的思考。首先是 1967 年 4 月以前的一年 在这一年 我们正朝着公开地、集体地退还征兵卡方向摸索前进；其次是 1968 年 4 月以后的一年，在这一年，许多抵抗团体修改了它们最初的设想，并努力去关心新的问题和新的社会阶级。

I

几个不同的组织和几种不同的思想汇合起来导致了 1967 年 4 月的抵抗行动：纽约市焚毁征兵卡，海湾地区发出在 10 月 16 日采取行动的号召，还有——不要忘记——穆罕默德·阿里拒绝入伍的行动。

首先是一群和平主义者。他们反对征兵是出于一种超越政治的世界观，其哲学可以追溯到 A. J. 马斯特论述“神圣的不服从”的文章。他们包括非暴力行动委员会和天主教工人组织的许多成员 例如托姆·罗德·戴维·米勒和托姆·康内尔。1966 年 10 月，赞成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在纽约市开会，发表了下列“对征兵采取不

合作态度的声明”：

我们这些属于服役年龄（十八岁至三十五岁）的签名者认为一切战争都是不道德的，归根结底是自取失败。我们认为征兵是罪恶的、不正当的。因此，我们不同征兵局进行任何合作。

我们将不登记应征。

如果已经登记，我们将同征兵局脱离一切关系。

我们将不携带征兵卡或征兵局颁发的其他证明。

我们不接受征兵法案第 2-S 条和其他类似条款规定的任何缓期服役。

我们不接受征兵法案第 1-O 条或第 4-D 条等条款规定的任何免除兵役的权利。

我们拒绝武装部队的征召。

我们呼吁并主张其他青年和我们一起拒绝同征兵局合作。

我们充分了解这些行动是违反兵役法的，最高可以判处五年徒刑或罚款一万美元，或同时受到两种惩罚。

靠近政治光谱另一端的是戴维·米切尔以及——1966年年中宣布黑人权力以后的——学生全国统一行动委员会所代表的一种倾向。这些抵抗者既非和平主义者，也非不合作主义者，但他们公开拒绝应征入伍。他们还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从 1961 年以来戴维·米切尔就是这样做的。在今天的抵抗工作中，代表这种倾向的是威斯康星抵抗征兵联盟和波士顿抵抗征兵小组。

和平主义的不合作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拒绝入伍是两种思想极端。大多数反战学生则位于两者之间。1966 年春天，他们在校园内举行静坐示威，反对把学生成绩表送交征兵委员会；同年秋天又在拒绝应征的声明上签名，从而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抵抗运动内部流行的看法是不赞成这种活动，因为参加活动的学生很少真正拒绝入伍。但是对于许多抵抗者来说，反对送交学生成绩表和声明不应征只是他们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当他们进一步参加抵抗工作时就抛弃了这种做法。密尔沃基十四人中的迈克尔·费伯、戴

维·哈里斯和迈克尔·卡伦就曾在拒绝应征的声明上签字；克里·伯兰在芝加哥参加反对送交学生成绩表的静坐示威后，惊讶地发现许多示威者后来却参加了考试。

我看到抵抗运动如何从某些学生组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当这些学生从拒绝应征的立场更进一步时，他们设法把和平主义的不合作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拒绝入伍这两种见解结合起来。这些学生组织当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斯坦福的组织，其中包括戴维·哈里斯、丹尼斯·斯威尼、保罗·鲁珀特、艾拉·阿尔路克和乔尔·库格马斯。现在我想谈谈东海岸的两个组织，一个在耶鲁，一个在康奈尔。

1966年7月，一群青年在纽黑文开会，起草了下列声明：

在我国政府停止对争取决定自己命运的人民进行战争以前，我们这些役龄人员拒绝对政府承担任何军事义务。11月16日（请记住，是1966年11月16日），我们将把征兵卡退还当地的征兵委员会，并通知它们：在美国停止侵略以前我们拒绝合作。我们很清楚这一行动将被认为是非法的，我们可能被判处五年徒刑。

我们打算在8月25日和26日，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于衣阿华州克利尔莱克召开大会以前，进一步阐述我们的纲领。在这份声明上签名的八个人当中，一名曾长期为非暴力行动委员会工作。另一名属于全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自称为无政府主义的一翼（我记得他在会上曾经说过“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成员从来没干过什么事”）。还有一名曾在前一年春天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全国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出进行反征兵活动的详细建议。他的建议是四个建议之一，被淹没在空谈之中。他准备另觅出路。另外三名签名者，还有我自己，曾于1964年夏天在密西西比州一起工作过。还有一名曾在麦库姆同丹尼斯·斯威尼一起工作。^①

这些人在纽黑文开会以后，就分散到全国各地去进行活动，远

^① 此段除第一句外看来并不是声明的一部分，而是作者的说明。现照原文译出。——译者

至西海岸。我收到一封 1966 年 7 月 22 日写于麦迪逊的来信。信的开头是这样的：“我们到了芝加哥，然后又到了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我们在底特律和安阿伯调查的结果令人鼓舞。我在底特律有七、八名亲密的爱国朋友倾向性十分强烈。安阿伯也有五、六个人在活动。他们把人数限制得很少，但讨论是热烈的。”丹尼斯·斯威尼和戴维·哈里斯第二年夏天在西海岸也正是这样做的。早在 1966 年年中，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和抵抗运动即将分裂的苗头已经显而易见。那封来信接着说：“在安阿伯进行的讨论澄清了另一种类型的看法，即认为这种思想和行动都是非政治性的。说此话的人认为这种行动仅仅是机械性的。对于史蒂夫·韦斯曼和迈克·戈德菲尔德这样一些人，他们不能不把这种思想看成一个具有使其影响扩大到各级学生运动中去的组织‘保证’的全面政治纲领。在出现这种情况之前，他们无法把它看成一个可以成长壮大的政治运动。我是从不同的观点看待这个问题的。”

1966 年 7 月 30 日，这些漫游者回到纽黑文再次开会。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包括下列看法：

既然个人决心坐牢是使运动具有集体力量的基础，所以我们略微讨论了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各种理由。两个基本动机：一是个人的，一是政治的。具有个人动机的人把征兵问题看成他个人同制度发生对抗的顶点——他本来在任何情况下都很可能采取类似的行动，但决定和大家一起行动，因为这样做可以增加他本人和团体的力量。然而我们大多数人不会这样做，至少在收到征调令以前不会这样做。我们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我们感觉自己拥有一个可以使之起作用的政治纲领。

拒绝在征兵问题上合作的典型行动却变成了一种迷信——被物化了。报告提出了有关组织工作的看法。“我们十分强烈地感到除派遣外勤人员到那些通常的活动中心去以外，还要把他们派往一般尚未受运动影响的地方去搞组织工作。”报告接着说，组织工作者“必须真正走出大门，努力建立以某种纲领作为共同纽带

的、强大的、民主的地方组织（或反对征兵斗争委员会）至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地方分会等现有机构，我们的想法是加强运动的力量，使有关团体更深入地承担实行变革的义务……。”此外，“我们决定不搞发号召、在杂志上写文章、在报纸上登广告、然后期望人们行动起来……这样的组织工作。只有在今后几个月内把基础打好（即通过外勤人员建立强大的、决心承担义务的地方组织），我们才会解除不准宣扬的禁令……。我们当中去过西部的人对我国疆域之广大惊叹不置。他们认为，如果能够建立地区性的力量和团结 将有助于即将到来的斗争。”

关于 1966 年 7 月 30 日会议的报告指出：“我们认为 11 月的发动日只是一个开端，而不是最终目的。从这一天开始，必须在其他选区按新的纲领进行重要的建设工作。大家普遍同意：通过抗拒征兵的集体行动产生的主要纲领应当是组织多种形式的对征兵的抵抗。”根据设想，11 月 16 日交出征兵卡的人将成为今后的组织者。会议还讨论了争取成年人支持的问题（这将属于我的工作范围）和不同种类的法律辩护的优劣：“我们可以用法律规定的自由权利来辩护（说我们可以鼓吹任何主张，也可以说政府征调我们去为它打仗是侵犯我们的自由）。我们可以用纽伦堡审判的案例来辩护（指出战争是不道德的、非正义的，我们有责任拒不打仗）。我们也可以保持沉默（指出法庭是现有制度的政治工具，不可能使我们得到公正的对待）”会议最后讨论了妇女解放问题：“会议指出，由于组织上和纲领上存在真空状态，把年轻妇女组织起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妇女社会政治联盟的成员大部分是中年人，其纲领是含糊不清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仍然是男性统治的团体，虽然它偶尔大谈另外一套。我们同意向我们认识的妇女提出制定纲领的可能性问题。至于妇女将如何对待我们抗拒征兵的工作，我们认为应由妇女自己自然而然地制定纲领。”在后来召开的

得梅因会议和 1966 年 12 月在芝加哥召开的拒绝应征会议期间，举行了妇女专题讨论会。由希瑟·托比斯·布思、内奥米·温斯坦、修·门纳克等人组织的我国第一批妇女解放团体就是这些讨论会的直接产物。

1966 年 8 月底召开的得梅因会议确认原来计划的 11 月 16 日这个日期是不成熟的。会议要求大家各回原处，去组织巩固的地方小组。康奈尔小组大概是其中最重要的。1967 年 4 月正是这个小组发出了在纽约大规模焚毁征兵卡的号召。康奈尔小组的组织者托姆·贝尔曾参加 7 月 30 日在纽黑文会议和后来的得梅因会议。他在《新左派札记》上发表文章（我的妻子把它转载于《我们拒绝应征》中）谈到他是如何工作的——按抵抗运动特有的方式，不是召开会议，而是一次找一个人。同样具有特点的是有关大规模焚毁征兵卡的号召。这个号召是因为一个人（即布鲁斯·丹席斯）决定焚烧自己的征兵卡引起的。

我曾经强调指出，早期抵抗小组的一种有代表性的做法是努力把伦理观点和政治观点融合在一起。布鲁斯和托姆的情况都可作为例证。布鲁斯·丹席斯在康奈尔大学上一年级时就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积极分子。当他焚毁征兵卡时，他已是该组织的康奈尔分会主席。他这样做还有另一背景：他的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以信仰为理由拒服兵役，布鲁斯本人是在他所谓“具有伦理文化修养的家庭”中长大的，而他在上大学以前的那个夏天曾经见过战争抵抗者联盟的戴维·麦克雷诺兹并深受其影响。

就在布鲁斯·丹席斯 1966 年 5 月到征兵局去登记的那一天，他还参加了在该大学校长办公室举行的静坐示威。这次示威的目的就是反对把学生成绩单交给征兵当局。这时，他对征兵委员会说他不希望按照征兵法案第 2-S 条规定缓期服役，而希望取得第 1-O 条规定的地位，但如果得到批准，他也可能不去做这条规

定要求的其他工作。到了秋天（仍然是 1966 年）：

我开始认识到以信仰为理由拒服兵役和第 2-S 条规定存在同样的毛病。我了解：一个来自哈莱姆区街道的小伙子因为未在大学就读就不可能按第 2-S 条规定缓期服役，而他也不可能取得以信仰为理由拒服兵役的地位，因为这需要填一种非常难于填写的表格。想到我不得不去对一群老头子解释为什么应当给我免除杀人的义务，就使我感到难以忍受。… 1966 年 12 月，我终于拿定主意：必须同征兵局一刀两断。12 月 14 日，当康奈尔大学教职员开会讨论该校对待征兵局的方针时，我在会外当着三百人宣读了我给当地征兵委员会的声明，然后撕毁了自己的征兵卡。

康奈尔的反征兵联盟折腾了许多星期，不知道如何对布鲁斯的行动作出反应。最后，在 3 月 2 日终于有五个人——简·弗洛拉、伯顿·韦斯、罗伯特·纳尔逊、迈克尔·罗特金和蒂莫西·拉金——号召大家保证在 4 月 15 日焚毁自己的征兵卡，如果至少有五百人同时行动的话。号召包括了伦理和政治两种论点：

美国军队通过征兵已经摧残或摧毁了几百万美国人和越南人的生命和良知。我们曾经进行争论，举行示威，要求制止这种摧残，但并没有成功。杀人犯对理性是无动于衷的。现在需要强有力的抵抗：激烈的、非法的、令人不愉快的、持久的抵抗。

在越南，战争机器对青年和老年、士兵和平民是不加区别的。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它具体是针对青年的，对黑人更甚于白人，然而归根结底还是针对所有的人。

我们从肉体到灵魂共同经受压迫。我们必须从肉体到灵魂共同进行反抗。下列签名者认为：作为群众性抵抗的开端，我们应当在春季动员时公开毁掉我们的征兵卡。

声明接着说：

反战舆论正在发生变化。最近几个月来，学生自治会、教会组织和其他团体已经对拒绝去越南打仗和抗拒征兵的人的立场公开表示谅解和同情。我们准备挺身而出，为这个立场进行斗争，并期望这些人会予以支持。

我们充分意识到这种行动使我们可能被判处高达五年的徒刑和一万美元罚款。但我们认为参加这种行动的人越多，政府就越难以起诉。

甚至在发出号召之后，托姆·贝尔还在苦苦思索这个决定是否正确。他在 1967 年 3 月 18 日写信给我说：

我对于我们的行动——特别是根据我的观察——还有某些颇为严重的保留。……使我不安的是几乎有五十名康奈尔学生保证烧毁征兵卡，而我担心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决定是出于一时冲动。（学生）会开得很象福音布道会（有时甚至某些词藻也相似）。我们发表演说，为反战办公室募集款项，并当场皈依——在保证书上签字，还加上一大串人证。我打算设法把所有签过字的人召集起来，集体考虑我们现在的行动，我希望我们能够使某些问题得到澄清。我看到这是一次进行政治组织和采取政治行动的巨大机会；我也看到正在采取的行动很可能将使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受到伤害。这种情况造成的矛盾确实使我感到痛苦。当我想到这些号召不是针对某些具体的人发出的，这时我更为担心。真不知道我现在为什么要倾诉这些，我只是感到束手无策——我不喜欢全国性行动，但我确实希望改革美国。我喜欢在个人之间深入交换意见的那种政治，而这可能并不是真正的政治。我不想操纵任何人。但是，我认为，使人们发生变化对我自己的斗争、对我们大家作为人类的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

4月2日，离4月15日还不到两个星期的时候，托姆又写了封信。他说：“关于焚烧征兵卡的事，至少作为一项政治行动来说，我开始感觉好了一点。但是这件事看来难以实现。我们至今只有大约九十人签名保证，而且不管怎么说，春季动员（万能的执行委员会）显然已经下决心不让我们把焚烧征兵卡作为4月15日行动的一部分来进行。”其他情况已是众所周知的了。4月14日晚上，已在有条件的保证书上签名的人开会决定：只要有五十人愿意集体烧掉他们的征兵卡就干。会上表示赞成的人刚好超过五十人。第二天参加行动的人却三倍于此数。

我们回顾早期阶段的这些往事，除了怀旧以外还应当有什么

感受呢？在重新阅读材料时，使我感触最深的是不合作同根据第 2-S 条规定缓期服役之间的关系。那些出于信仰而选择不合作道路的人——例如非暴力行动委员会的抵抗者——属于少数。对于大多数抵抗者来说，不合作是受到第 2-S 条缓期服役规定保护的学生借以使自己处于可以征调入伍的地位、从而迫使政府——正如史蒂夫·汉密尔顿所说——“来对付我们”的一种手段。抵抗运动早期散发的传单就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动机。

我们不想继续依附以别人的生命为代价的激进主义，充当它的配角。有一份传单说：“准备联合起来放弃一切缓期服役的权利，并拒服兵役的人已经组织起来。”另一份传单说：“参加抵抗运动的人都不愿继续消极接受缓期服役的权利而使别人代其前往。”如果没有第 2-S 条规定的缓期服役，对征兵的抵抗看来还是会出现的，但它将采取群众性拒绝接受征召的形式，而不是群众性不合作的形式。反过来这又说明：抵抗征兵运动之所以割裂为两个运动——一个是拒绝接受征召或在武装部队内部进行抵抗的运动，另一个是以不合作行动为典型表现形式的运动——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征兵局的阶级性、制造鸿沟以及美国统治阶级成功地分裂反对派造成的后果。

如果这个结论准确的话，它对当前有关是否应当放弃交还征兵卡行动的辩论是有意义的。它使我认为：不合作过去一直是、现在也仍然是缓服兵役的大学生和由于信仰而拒服兵役的人进行抵抗的一种适当行动；但它现在并不是而且根本不应当被看成是没有缓服兵役权利的役龄青年可能采取的抵抗形式；因此，以五一劳动节为例，能够最准确地反映不合作和其他抵抗形式之间的战斗关系的仪式，应当是不合作者以独立行动的各种抵抗者之一的地位出现的仪式。

II

但是，还有一种反对不合作行动的论点也是我们必须正视的。这种论点（根据我的记忆）首先是卡尔·戴维森 1967 年春天在《新左派札记》上提出来的。后来，到了秋天，史蒂夫·汉密尔顿在同抵抗运动决裂时又在同一刊物上提出了这种看法。他们认为通过不合作招致监禁表现了一种典型的中产阶级情绪，一种负疚心理、一种受虐狂和自命为烈士的心理。戴维森坚决认为，使自己啣当入狱不仅使运动丧失它所需要的组织者，而且从心理上说会削弱和阉割而不是加强其他役龄青年的力量。对抵抗运动的这种批评等于说任何人都不应交还征兵卡，因为这种行动从本质上说是非政治性的，也是不健康的。

在开始回答这种批评时，让我回顾一下形成抵抗运动的另一种动机。我已经说过，在我认识的第一批抵抗者当中，许多人曾在密西西比州一起工作。对他们（包括我自己）来说，抵抗征兵是对付那一段经历带来的心理后果的手段。这件事说起来是很复杂的。1966 年春天，在明确提出黑人权力问题以后，我们就被断然排斥在民权运动之外。对征兵的抵抗之所以在同年夏天开始形成，我想不仅是越南战争升级的结果。当时我们正在考虑激进派白人采取什么行动可以和我们在密西西比州的工作具有同样精神，同样需要我们努力奋斗并且同样从根本上对制度提出挑战。

据丹尼斯·斯威尼回忆，他当时感觉虽然把运动建立在冒险基础上是错误的，北方的运动却引人注目地缺乏冒险精神。丹尼斯从来不认为征兵是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也不认为抵抗运动能够制止征兵。他把征兵看成是一个能够特别清楚地说明整个社会制度的弊病所在的例子。同时，他也需要一种能够把认真致力于自

己的事业的白人激进派团结起来进行长期工作的手段。照丹尼斯看来，抵抗征兵就象一张网（他就是这样说的）。把这张网撒在全国大学校园内，就可以把我们真正愿意同他们一起搞运动的人集中起来。

根据过去搞民权运动的人的经验，南方——特别是密西西比州——有什么意义呢？有些东西是我们希望摆脱的，还有一些我们则希望保留。我们不想继续充当白人帮助黑人的角色，使别人感到压抑的传教士角色，也不想继续充当以别人的生命为代价的激进主义的配角。在南方，我们有很多人身不由己地在学生全国统一行动委员会亚特兰大办事处或联合组织委员会在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城的办事处担任了行政职务。这并不是我们想当领袖，而是因为我们显然比较善于写新闻稿和接电话，而不那么善于到偏僻的农村去接近心怀恐惧的黑人。但是，这样做的客观效果是：我们做了一些本来不应由我们来做的决定，而学生全国统一行动委员会搞外勤的黑人秘书在各地挨打和坐牢以后，回到总部却发现那里的白人比黑人还多。当黑人组织应由黑人控制的宗旨宣布以后，我们自己的经验使我们认识到（无论对我们个人是如何痛苦）主张黑人权力是对的。

整个这段时间，是别人在承担危险而我们并没有分担他们的危险；我们不想由我们去摆弄他们的生命。用 1966 年 7 月 30 日纽黑文会议报告的话来说：“作为抵抗征兵的组织者，我们必须站在同政府对抗、向政府的权威挑战的前列。我们必须首先站出来面对长期监禁的威胁。”为了在牧羊草场烧毁征兵卡而发出的号召是这样说的：“我们准备挺身而出。”保罗·鲁珀特也表示了同样的心情。他说：这种政治是危险的。我们必须首先承担危险。

这是不是一种殉道的愿望？可能是危险的政治，但同时也可以说是负疚的政治吧？这样说只是部分正确。不合作的意思不

过是放弃第 2-S 条规定的缓服兵役的权利。就这一点来说，它确实类似曾经促使北方白人学生南下的那种感情冲动。然而不合作的意义不仅如此。在 1967 年 1 月发表制造鸿沟的备忘录以后，白人激进派学生开始认识到，“征召入伍的大棒”不仅迫使别人参加军队，而且迫使他们自己采取考虑名利和俯首听命的态度，而这是他们十分厌恶的。因此，否定征兵等于否定自己想象中的似锦前程。同南方参加民权运动的白人学生所起的作用成为对比的是：抗拒征兵和战争是在抗拒最严重地影响到学生以外的人、但同时也影响到学生自己的一种压迫。

这时，对南方特别是对密西西比州那段经历的积极方面的回忆起了作用。我们当中曾经同鲍勃·摩西一起工作的人认为他是具有民主作风的组织者的典范。这不仅是因为他早在 1961 年秋天就全力以赴，独自到阿米特县去开始选民登记，而且他拒绝扮演传统的领导人角色：开会时坐在后排，拒绝发表演说，发言时不是走到前面去而是站在原处，如果到前面去，也是为了提问题，而不是演讲。1967 年 8 月，在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举行的那次讨论征兵问题的倒霉的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戴维·哈里斯。他辞去斯坦福大学学生团体主席职务的理由同鲍勃强烈否认自己具有与众不同的魅力的理由是类似的。这一点立刻使我得到很深的印象。他们两人的行动都不是出于负疚心理，而是出于这样一种愿望，就是使其他人能够并不得不发扬自己的战斗精神而不是俯首听命于一个领袖，办法是取消居支配地位的人物，以免成为障碍。

从感情上推动抵抗运动前进的不是受虐狂式的自我否定，而是自力更生精神；不是软弱，而是勇气。在我们这种崇拜权力的文化中，内疚是一种影响很大的气质，因此我们经常不相信以至嘲弄自己最良好的动机。1967 年夏天 伦尼·赫勒曾经嘲弄过抵抗征兵的行动。他对各种各色的人都讲，不准备采取不合作行动并且

坐牢的人根本不是男子汉。戴维·哈里斯由于充当了永久发言人，因而可能部分地违背了他自己最初的认识。但是最近我同他长谈了两个晚上，讨论西海岸抵抗运动产生的根源。这次谈话使我深信，他们号召在 10 月 16 日采取行动是出于一种肯定的而不是自我否定的感情。1964 年秋天曾经亲自在密西西比州基特曼县呆过一段时间的戴维·哈里斯认为，抵抗运动所搞的政治是在南方地区发展起来的工作作风同他所谓的自我探索的综合体。这种探索有一点尼采哲学的色彩，也有一点存在主义的色彩，有点象骑摩托车在丛中迎风疾驶时的感觉。它在感情上引起的联想不是禁欲、纪律和苦难而是坚忍、拼命、完美和大胆。戴维·哈里斯在竞选斯坦福学生团体主席时，他的竞选徽章上写着“自治”和“要共同体而不要殖民主义”等字样。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 1967 年春天参加抵抗征兵行动时使用的口号“甭想我替你卖命”也体现了这种精神。当戴维·哈里斯和丹尼斯·斯威尼 1967 年夏天在西海岸为寻找拒绝同征兵局合作的人而到处奔走时，他们象托姆·贝尔曾经做过的那样，每次只找一个人，同他盘桓一段时间，设法了解他的各个方面，除了谈政治外还一起弹吉他和吸麻醉剂。海湾地区抵抗征兵委员会的第一张传单上只有六个人表示不合作的声明。照我看来，这种“开放式”的组织方式——即由一个人告诉另一个人自己为什么要做某件事的理由——本身就是对生命的肯定。和它相反的另一方式则是要求别人把自己淹没在毫无个人感情的集体命运中去。

这使我想起一件非常巧合的事。1967 年 2 月，大约就在康奈尔大学那五个人号召大家到牧羊草场去烧毁征兵卡的时候，也就是史蒂夫·汉密尔顿、伦尼·赫勒同戴维·哈里斯、丹尼斯·斯威尼开始熟悉起来的时候，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全国书记在普林斯顿讲了一次话。他讲的那种组织方式和为自我解放而斗争的

必要性正是处于发展壮大状态中的抵抗运动所强调的。格雷格·卡尔弗特说，自由主义的基础是一种内疚心理，其纲领则是帮助别人获得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另一方面，激进主义则来自“对自己缺乏自由和受压迫的状况的认识”，其表现是“为所有不自由和受压迫的人的集体解放而斗争”。格里格在开始演讲时说的一些话概括了抵抗运动组织工作中我认为是最精采的部分。他说：

据说危地马拉的游击队进入一个新的村庄时 他们既不谈“反帝斗争”也不宣讲辩证唯物论——也不散发《共产党宣言》或毛主席的《矛盾论》。他们只是把人们召集到村庄中心 然后游击队员就一个一个站起来对村民们讲自己的生活经历 讲他们如何认识自己 如何变成了游击队员 讲他们最深切的愿望以及他们为之奋斗并希望得到的东西 讲他们所处的社会如何使他们最深切的愿望化为泡影。

然后 游击队员又鼓励村民们谈他们自己的生活。接着就开始出现了奇妙的情况。人们原来以为他们最根深蒂固的问题和他们受到的挫折是个人问题 现在发现他们的问题和愿望是共同的——谁都一样，毫无区别。用萨特的话来说就是：“在每个人身上都可以看到所有人的影子。”最后 由于他们发现了自己作为人的共性 他们决定 人们必须团结起来 为摧毁使他们共同遭受压迫的条件而斗争。

照我看来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

这篇演讲使人想到当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和抵抗运动进行辩论时，双方的主要人物都应注意不要去贩卖那种脱离时间和地点条件的、抽象的陈词滥调。曾经有一个时期，大约是 1966 年至 1967 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和后来演变为抵抗运动的各种倾向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刚才摘引的讲话中，而且表现在其他事实中：格雷格·卡尔弗特曾经协助筹备 1966 年 8 月的得梅因会议，布鲁斯·丹席斯（前面已经提到过）曾经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外勤人员；该组织的成员、后来也是制止征兵周委员会成员的杰夫·西格尔曾经在 1966 年 12 月芝加哥举行的拒绝应征大会上发言；同月，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全国委员

会不仅对抵抗征兵表示赞成，而且谴责了一切军事征调；最后，该组织 1967 年举行代表大会时还通过一项决议，支持军队里的人开小差。

对征兵的抵抗当时是整个运动的刀刃和生长点。它主要是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之外发展起来的。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该组织规模庞大、成员复杂所致；这个组织的许多成员对抵抗征兵是欢迎的。

这种令人愉快的状态为什么会恶化呢？照我看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同抵抗运动最亲密的时期也正是白人激进派遭到学生全国统一行动委员会排斥以后对需要如何改变自己的生活、对是否可能在美国白人中建建立激进派多数提出疑问的时期。对于白人激进派来说，这个时期搞的政治是一种自我肯定，而不是出于内疚。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或许应当把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对抵抗运动的批评颠倒一下，指出它在过去一年当中正在重犯它指控抵抗运动的那种中产阶级自我鞭挞的政治毛病；这就是说，自从它的全国委员会在 1968 年春天举行会议以来，它就要求白人再次扮演别国激进主义的配角。

按照这种看法，从心理状况来说，运动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大体上是从 1960 年到 1965 年，是转向南方民权运动的时期。中间是一个主张不要代理人的政治的时期，表现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 1966 年 8 月举行克利尔莱克大会时通过的“学生工团主义”决议，这个组织的全国委员会 1966 年 12 月通过的关于抵抗征兵的决议草案，以及卡尔·戴维森、格雷格·卡尔弗特、戴维·吉尔伯特等在 1967 年春天阐述的所谓“新工人阶级”观点。第三个时期开始于 1968 年 4 月。当时，越南战争的明显降级和马丁·路德·金博士被暗杀后出现的骚乱使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放弃了征兵问题，转而以种族主义作为它注意的主要问题。

这样说并不是否认美国历史上的白人激进主义曾经受到种族主义影响，也不是否认在为改造美国而必须建立的解放阵线中黑人领袖可能多于白人领袖。但是，如果白人激进派要对终将出现的联合做出贡献，最好的办法是建立强有力的白人激进运动。这个运动必须不受种族主义影响。但进行反对种族主义的鼓动并不是建立这种运动的最好办法。对于白人激进派来说，以释放休伊·牛顿或支持黑人学生的要求作为主要的政治活动，就会在更高的斗争水平上重新造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出现过的那种“学生全国统一行动委员会之友”的心理，使新的一代积极分子起一种和过去‘到南方去’相同的作用。

关于内疚问题，照我看来，并不是指抵抗运动过去曾以这种感情作为它制定政策的基础，而是指这样一种情况：由于在更大范围的运动中许多人并不因为自己是白人和中产阶级而感到内疚，我们现在可能难于以自然而轻松的方式得到发展。从 1968 年 4 月以来，抵抗运动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一样都在摸索前进，想越出中产阶级选民的范围，并逐渐认识到他们不但要反对军国主义，而且必须反对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如果这种发展是在一种感到内疚、否定过去、拼命想为自己辩解、由于害怕失败而急于取得效果的气氛中出现的，它就必然会失败，结果就不是成长壮大，而是瓦解。具体地说，我知道有些曾经参加大学静坐示威的抵抗组织后来就土崩瓦解了；由于我在芝加哥大学有过这样一种经历，因此我猜想那些与此有关的抵抗者对他们能否应付这种新问题缺乏信心，在行动过程中没有经常碰头，结果被那种企图超越征兵问题范围的努力搞得不知所措，于是就烟消云散了。此外，我知道有些人因为新英格兰抵抗组织决定不在 11 月 14 日交出征兵卡，因此认为很难继续把它看成抵抗运动所属的组织。相反地，我认为他们在中学生和美国士兵当中进行的试验性工作（这是他们那个决定

的另一内容)对所有的抵抗组织都应该是有帮助的。许多组织想开展有关帝国主义的教育。这也是一种值得欢迎而不应当害怕的、说明出现了新的活力的迹象。

我这里力图阐述的是一种容许自己发展也容许别人发展的态度。拒绝同法庭合作是否正确?试图要求陪审员按照法律和事实作出判决并从而改造法庭是否正确?现在不存在正确的路线。让我们两种办法都试一试,并对结果共同进行评价吧。在大学里由学生掌权是否好?学生是否应当离开大学并从外部对它进行反抗?同样的,我认为双方都有道理,可能的答案则远远超过两种。教师应当去公立学校工作,还是应当自行创办免费学校呢?两种学校我们都需要。在实际生活中,这个问题可能通过从被公立学校开除的教师中招收免费学校教职员的办法加以解决。参加抵抗运动的人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地方分会、同妇女解放组织、同中学生、同虽已超过服役年龄但却希望起一种比支持者更多的作用的人的关系怎么才算合适呢?我要一劳永逸地指出:让正确路线见鬼去吧!不要把情况设想为只有两种办法可供选择,也不要搞那种使参加者生活在唯恐犯错误的心理状态中的政治。

为了避免使人认为我赞成大家永远各行其是,让我最后提几条对我们的试验和成长可能有帮助的方针吧:

III

首先谈点具体的。我认为某些道德观念必须成为运动公认的准则,因为正是这些观念使我们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要热爱和尊重所有的人。一个怀有这种爱和尊敬的同志仍然可能要杀人,这我可以想象。根据我的体会,越南革命者的态度就非常接近这种情况。但我不能想象一个同志会无缘无故去污蔑和诋毁别人。因此,如果我的意思表达清楚了的话,我对一个在危险

时刻毒打警察的人倒不象对我的朋友托姆·海登那样感到隔膜，因为海登在民主党代表大会前夕写的一篇文章骂警察是“猪猡”。如果一个运动把警察叫做猪猡，我会为它感到羞愧。我不愿从属于这样一个运动。同样地，那种认为既然我们是正确的、我们就可以剥夺别人的自由权利——虽然我们坚持我们自己应享受这种权利——的态度使我万分苦恼。新英格兰抵抗运动曾经为 1968 年春天举行的一次示威发过一份指示，上面说：“一切人都有权举行示威，他们有权对我们大喊大叫。”但是在 1968 年秋天出版的《抵抗杂志》上，它却试图为那种以不断的诘问和起哄使休伯特·汉弗莱无法讲话的做法辩解。我喜欢前一种态度而不喜欢后一种态度。即使撇开道德问题不谈，我认为在右翼镇压日益增加的时期对政治采取这种态度无异自取灭亡。

然而，尽管这些问题是带根本性的道德观念问题，我们仍然不应让它们蒙住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见我们必须向新英格兰抵抗运动所代表的那种思想学习许多东西，否则我们会犯最恶劣的死啃教条、鼠目寸光的错误。这种错误是过去中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特征，肯定是我们大家都希望摆脱的。应当吸取的教训包括以下内容：

抵抗运动应当明确谴责资本主义，指出它是美国侵略性外交政策的根源。我认为这并不需要象《新左派札记》近来所做的那样进行过多的理论上的抨击。我认为我们无需在武器储备的相对重要性、搞不必要的导弹系统作为避免经济萧条的办法和保护海外私人投资的额外手段这一类问题上表明立场；至于海外投资是否出于获得外国廉价劳动力、输出剩余资本和开辟新市场的需要，是否同时出于几种需要，如果是的话这些需要又是怎么结合的，我认为对这类问题我们也无需取得一致意见；我也不认为我们在帝国主义对美国工人阶级各个部分的工资有何影响这一问题上需要有共同的想法。最后，要承认现在美国在越南的投资为数很少，对将米投资的估计是难以证明的，而且统治这个国家的人考

虑的可能根本不是具体投资问题，而是希望把共产主义关在某一地区门外，或是希望显示他们摧毁第三世界革命的力量。我认为抵抗运动不应承担详细说明越南战争问题的任务。在一段时间内，这可能是做不到的。总之，为了谴责资本主义经济以及毫无疑问是由这种经济——不管是通过什么途径——产生出来的帝国主义，我们并不需要一头栽进有关帝国主义的理论中去。我们必须十分清楚：大国之间的竞争、征兵的做法以及人性的罪恶本身都不足以说明美国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的疯狂性正说明国内经济在和平时期无法保持充分就业和令人满意的利润；反对越南战争而不反对资本主义就等于默许将来再出现这一类战争。考虑到会议议程的措词，我想再加上一句话：反对帝国主义而不反对资本主义——照我看来——也是治标而不治本，等于让疾病蔓延。

如果只谈反对资本主义而不肯定一种可以代替资本主义的制度，我看不出这种谈论有什么意义。我们应当是旗帜鲜明的社会主义者或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用词不象精神那么重要。我的直觉看法是：运动最后将落脚于介乎中产阶级伦理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的政治观点上，而作为传统的和平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一股潮流的抵抗运动正处于能够肯定这一观点的独一无二的地位。

让我举三个例子来说明这种观点。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书中谈到了“意志自由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革命的和平主义”。为了说明他的想法，他长篇大论地描绘了西班牙内战期间农民和工人发动的、而后来记述这场战争的高贵的历史学家却一致予以无视的自下而上的革命。

其次 丹尼尔·科恩 - 本迪特在他的新书中以几乎相同的措词批评了列宁主义并提供了另一例证，即俄国革命中以“工人反对派”著称的思潮。这股思潮坚持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工人控制，后来在喀琅施塔得等地为布尔什维克政府摧毁。即使是从译文中看，科恩 - 本迪特也雄辩地展现了一幅从分散的抵抗发展起来的革命的画卷。他说：我们需要的“不是作为专门机构的组织，而是一大批造反小组”，“对一切统治形式的自发的抵抗”，“对抗核心的大量繁殖”。科恩 - 本迪特明确指出，最后这种设想的意思是：在革命过程中，革命队伍内部的少数派不仅必须享有现已受到布尔什维克压制的言论自由，而且必须有权实践少数派的信念。科恩 - 本迪特把它叫做“独立行动权”。照我看来，它就是抵抗运动一直

在实行、而且在寻求更明确的政治观点的过程中也不应予以抛弃的那种权利。

最后还有动摇派。他们根本没有什么著作。我们直觉地感到，在一连串问题上抵抗运动和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精神很相近。他们认为必须通过所谓“生产点”上的直接行动来实行变革。这个观点很接近抵抗运动的信条，即人们必须变革自己日常生活的环境。他们肯定的“伤害一人即伤害大家”这句格言，同抵抗运动在克服征兵局造成的分裂时表现的团结具有完全相同的含意。他们“在旧社会的外壳里”建设“新社会”的想法，同抵抗运动以比较带有中产阶级味道的方式试图通过替代机构达到的目标也有共同之处。

丹·蒂尔顿在1968年10月的《抵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与人类自由》的文章，对以上观点做了精辟的阐述。他断言“现在已经到了抵抗运动应当严肃考虑具体用什么来取代资本主义的时候。……是时候了……抵抗运动不仅要明确声明资本主义是一种疯狂的制度，更重要的是它应明确声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取代资本主义。”但是蒂尔顿说的社会主义是指意志自由的社会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他认为抵抗运动在致力于社会主义这个新目标时应保持它过去对军国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弊病的认识。他说：

我们通过抵抗运动进行的斗争到现在为止不过是反对政府官僚制度和不正当的权力的斗争。在这方面，同那些主张工业国有化或无产阶级专政的老左派对手比较，我们显得要聪明一些。我们从来都了解：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里，政治权力都是令人怀疑的；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任何方案，如果牵涉到社会主义，都必须回答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关于权力的性质及其合法性的问题。它必须回答为什么“社会主义”并没有带来人类自由。

同参加运动的其他许多人不同，蒂尔顿肯定而不是否定分享民主制。他写道：“现在需要做的是把分享民主制这个概念彻底付诸实施。”

蒂尔顿对待分享民主制的态度正是参加抵抗运动的人应当用来对待他们原有意图的态度。如果有人要我们放弃非暴力原则以便参加工人阶级的斗争，我们可以回答说：从历史上看，工人阶级的斗争就曾经采用罢工、抵制和静坐示威等非暴力手段作为表现形式。如果有人劝我们抛弃幼稚的行动而采取“严肃的”政治态度，我们应当记住：抵抗运动特有的关于存在主义的信念以及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概念，并不是空想的理论家创造的，而是艾伯特·卡麦斯、狄特里希·邦霍弗、马丁·布伯和伊格内齐欧·西隆等在反法西斯斗争的熔炉中锤炼出来的。我认为要在政治上变得严肃起来并不一定要放弃最初促使我们投身政治的那些道德观念。

6. 无政府主义革命

默里·布克勤

第五等级^①问：无政府主义的含义是什么？为什么今天要来谈无政府主义？

默里·布克勤答：多数人一谈到无政府主义就联想起传统的乱扔炸弹的人以及这一类的胡说八道。无政府主义不是指某一特定人群或特定学派，而是一个大得多的概念。

几千年前，人类同自然界处于某种混然一体的状态。他们受自然界统治，但同自然界保持着融洽的关系。

后来出现了巨大的裂痕。人类企图摆脱自然界的统治，使自己得到某种安全，结果造成了人对人的统治。它造成人与自然界的分裂、人与人的分裂，带来了阶级社会。它不仅造成人与人的分

^① 欧洲封建时代，把人分为三个等级，即僧侣、贵族、平民。后来人们又把新闻界戏称为“第四等级”现在又有人把除以上几种人以外的阶级、群众团体称为“第五等级”。——译者

裂，而且造成人自身内部的分裂。它造成灵与肉、主观与客观的分裂，产生了一整套统治逻辑。

在人统治人的整个时期，技术力量得到逐步的发展。在阶级社会、有产社会的演变过程中，人类开始缓慢地、一点一滴地使技术得到了发展。

几千年来第一次有了重新恢复人与自然界的统一、人与人之间的统一的可能性。在这种统一中，人对自然界并非完全处于支配地位，但他的处境是安全的，并且能够对自然界进行有意识的塑造。

无政府主义从来就是人类希望重新走向统一的一种本能的渴求。

在一切伟大的转变时期，广大人民群众都对当时存在的统治制度施加压力。他们看到这种制度正在分崩离析。他们不断冲击它，并试图恢复不存在权威的自由世界。但他们缺乏加强这种努力的物质条件和技术。一直存在贫困和匮乏。现在，技术已为人类的解放展现了全新的前景。

我们在一定意义上正在回到旧的共产主义时代，但水平完全不同了。我们具有全新的可能性、全新的潜力来争取人类的自由。这种潜力不仅可以消灭财产，而且有可能消灭一切使人类陷入贫困、使人和自然界陷入分裂状态的东西。这就是无政府主义的真实含义。

第五等级问：美国出现无政府状态的前景如何？它怎么可能出现呢？

布克勤答：美国首先是一个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当前的状态是：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阶级和阶级统治制度在对人类进行统治的同时，还是起了一定的社会作用的。城市起了一定

的社会作用。据说国家也起了一定的社会作用。

特别是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阶级统治曾经使人类有可能发展文化，发展使人类可以免受自然界支配的科学。这种理论认为：统治阶级虽然对人类犯了那么多罪，但他们有闲暇去发展文学，发展数学，发展技术。

城市也被说成是发展人类文化的园地。它使人们集中起来，脱离了土地，紧密地聚集在一起交流思想。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尽管国家从来都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但它仍然起了保持一定程度的社会安定的作用。

这些机构曾经起过进步作用。但无论它们是否起过进步作用，最突出的事实是，所有这些机构现在都在起一种完全是倒退的作用。

在本来可以消灭统治制度的时候，国家却把生产工具的力量动员起来加强统治制度。经济成了实行统治和维护统治的工具；事实上，它今天已经成了人为地保持匮乏状态的工具。军火工业就是最突出的例子。

我们拥有巨大的生产能力，但是这种生产能力尚未回到人民手里，尚未用于维持人民生活或争取人民解放的目的，而是用来人为地保持匮乏状态，使人们不得不去工作，甚至做一些没有必要的工作。

今天的城市也起一种完全是倒退的作用。它不再使人亲近团结。相反地，在今天的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存在空前的隔阂。从历史上说，这是一种从未出现过的情况。城市在人们心目中已不再是文化的园地，而是毁灭文化的地方。

城乡矛盾给今天造成了巨大的生态危机。城市以具有极大破坏性的方式向周围的土地扩张，成为空气污染的中心。人类环境

中大部分毒素都来自城市。城市也是背离一切传统的非常令人触目的例子。

应当使人类摆脱艰苦劳动的技术实际上变成了禁锢人类的手段。我们有些技术成就完全是破坏性的，对人起一种完全是强制性的作用。

结果，所有的机构以及历史悠久的有产社会都精疲力竭了，甚至连马克思说的那种进步作用也不再有了。

美国正在出现什么情况呢？我们在美国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更能感觉到这一点。一方面，我们虽然还没有意识到，但却感觉到了巨大的技术潜力。另一方面，我们也感觉到存在一种状况，一种普遍的、使人受到束缚的状况。在今天的美国，可能和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变得令人难以忍受。

整整一代人几乎是直觉地感到这种紧张状态的存在；有些人则已经意识到它的存在。结果在新的一代人当中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他们想不通人们过去接受的各种力量为什么会在性关系、心理、政治和制度方面起压倒一切的作用。

在这代人的身上，你可以看到真正的、超越一切阶级界限的两代人的冲突。十分耐人寻味的是：造反的青年人来自中产阶级和最富裕的阶级。从本质上说，这种造反表现了对整个生活的质量、对庸庸碌碌的生活的憎恶。已经无法使青年相信任何旧制度的存在是有道理的。在当前存在的各种新的可能性面前，在所谓旧制度仍起作用这种说法的虚伪性已经暴露无遗的时候，在旧制度造成的压迫这个现实面前，这些制度已经毫无意义了。

第五等级问：从什么意义上说青年造反是革命的呢？

布克勤答：从可以想象到的最深刻的意义上说。你看到的不仅是一场阶级战争；更有意义的是除资产阶级以外的所有阶级（有

时甚至包括资产阶级)的青年都在进行斗争。他们感觉现在的社会的存在已经毫无道理。这些青年不会满足于对社会仅仅进行一些改良——例如提高工资、改变工作时间、提高生活水平等等。他们对美国的梦想本身已予否定。

这是当前正在发生的最大的事件。一百年来你们一直在美国构思一个美国的梦想。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个梦想表现为胡佛一类人所说的“每个盆里两只鸡,每个车库里两部汽车”。梦想背后的思想是:商品将提高生活水平并使美国生活具有新的意义;通过美国的生产能力将能实现新的梦想。

现在我们发现,对于怀有这种梦想的千百万人来说,生活已经变得庸俗不堪、毫无意义。现在的生活不仅毫无意义、单调无味,而且是邪恶的。

人们的要求今天逐渐演变为一种革命的梦想。他们希望用新的一致代替对自然界的剥削,用新的性自由代替家长制的、甚至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对生活本身的美有了新的认识,认为日常生活也必须得到解放,使每时每刻都尽可能地美好。

这些都是崭新的概念。过去只有极少数诗人才有的这些想法,现在越来越普遍了。这代表了历史的一个崭新的起点。

青年造反并不是任何人制造出来的,也不是吸毒文化的产物。它是随着对技术的可能性以及对过去整个有产阶级文化的荒谬性的认识的发展应运而生的。

第五等级问:你认为这种觉悟对工人阶级有影响吗?

布克勤答 我自己过去就是工人 甚至参加过美国汽车、飞机、农业机械工人联合会,虽然不是底特律。我还记得当时工人阶级的传统。工人们普遍认为他们被拴在了工厂里。无论他们多

么不喜欢工厂，他们仍然认为工厂是自己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青年工人对职业采取宿命论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说，职业就是他们的事业，所以他们是认真对待的。那个时期的关键性要求是解决生计问题，虽然组织工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要求。

· 现在的情况是：已经开始出现一种青年工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命中注定就要在工厂做工。这就是今天的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当中最先进的一部分人的思想状态。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感觉就是：“我到底在这儿干什么？我感觉中了圈套。”人们倾向于把自己同青年文化联系起来，越来越求助于麻醉品、大麻叶和摇摆乐。虽然青年工人和嬉皮士相互之间仍然存在很深刻的猜疑，但是在危机时刻他们对嬉皮士却比对老工人自然而然地感觉更为亲近，因为老工人主张温和、冷静、遵守规定和官僚制度等等。

还有一种更加强烈的倾向是凭冲动采取行动，表现为自发性罢工和对工会官僚的彻底不信任。它也表现为这样一种感觉：他们作为工人无论干什么，无论是在工厂以内或以外，都要取得控制权而不要别人代他们进行控制。

根据我作为一个工人的回忆，马克思主义者过去完全有理由说工人是尊敬他们的领袖的。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确实存在极大的个人崇拜和对工会领导的高度尊敬。

今天这种情况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最先进的工人认为他们不需要任何官僚；他们对领袖与其说是尊敬，倒不如说是怀疑。

我认为这一切都是伟大的起点。它们反映了今天正在出现的全新的可能性。它们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人们已经可以开始

想象一个没有领导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生活的条件将完全由他们自己控制。

第五等级问：你曾经就生态问题、即人类与其环境的关系问题在《无政府》杂志上发表过几篇文章。你能否再略加阐述？

布克勤答：人同自然的关系现在出现了重大的危机。如果说我们能够设法度过其他一切危机的话，现在这个危机——按照它目前发展的速度——很有可能成为几乎是无法克服的。

按照我们现在掠夺自然界的速度，我们可能无法安然度过二十世纪。这不是我的意见，而是许多生态学家的意见。它不仅是一次社会危机，而且是所谓左派应当密切注意的危机。因为这个危机只能通过一种可以称为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办法加以解决。

这个危机的产生不仅是因为人们为追逐利润而对自然界进行了掠夺。城乡分裂也是一个原因。我们不仅发展了城市文明，而且发展的是一种特别具有破坏性的城市文明。美国将近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口开始拥向大城市和城市地带，给大气带来了毁灭性影响。

我们的生活同我们所在的地区缺乏平衡。例如纽约市或底特律，它们已不是地区性社会了。它们实际上是庞大的全国性分工的一部分。为了养活它们为数巨大的人口，象梅萨比山脉和某些农业区这样一些辽阔的地区按照分工必然要遭到掠夺和剥削。

今天的社会和今天的城市的集中性把整个大陆变成了工厂。这对美国所有地区、事实上是对北美洲所有地区的自然生态产生了破坏性影响。经济现在是在集中的基础上、在全国分工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为了养活这些人口集中的庞大城市，它必然要抹杀一切生态特点、水文特点、大气特点、气候特点、土壤特点以及动

植物生态的特点。

后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如果不发生在我这一代，很可能就在你们一代或不久以后的一代。无论如何，我们是要自食恶果的。

我们今天的运输系统也完全是破坏性的。来自汽油中铅的沉积造成的污染已经发展到骇人听闻的程度。受到污染的不仅是大气 而且还有土壤。甚至格陵兰的冰帽地区也被污染了。我认为这是我们在不太久的将来就不得不对付的一种威胁健康的主要公害。

放射性的增加和农药使用范围的扩大——不仅是滴滴涕，还有大量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得到应有注意的形形色色的农药——正在给地球造成大规模污染。

我们今天正在改变大气中整个二氧化碳的比重。这可能导致地球温度上升，在遥远的将来某个时候产生《启示录》所预言的各种各样的后果。我们正在大规模地污染所有的海洋和江河。

这正在成为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正在破坏复杂的生物界——生命的复杂世界，而人这样的有机体的身心健康所依赖的正是复杂的生物界。我们正在使整个地球一体化，正在把它变成一座工厂。虽然人类可能被迫接受这种状况，但自然界却是要造反的。

我们现在必须分散城市。这是无政府主义者早就提出来的传统的要求，过去一直被认为是梦想。它有史以来第一次变成了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而不仅是梦想了。

我们必须消灭今天不仅在压制人民方面、而且在动员经济力量对资源进行掠夺方面都起着极大破坏作用的国家。消灭国家现在已不只是一种梦想，而是一种非干不可的事了。

我们必须消灭财产；我们必须开始把地球当作园地，用来满足人类的物质需要，而不是满足阶级利益的要求。这在今天已不仅

是梦想。它也成了一种非干不可的事。

为了生存下去，我们必须开始生活。这是现已出现的新形势的实质。过去总是说：梦想是有的，但我们首先必须注意生存问题。梦想代表生活，而生存则代表经济必要性。

现在整个问题颠倒过来了。如果我们不开始生活，我们就不可能有任何实际的存在。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设想的能够使人们不仅相互之间和睦共处而且同自然界也和睦共处的、权力分散、没有财产也没有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实际上已经不再是梦想了。它已成为人类在地球上存在下去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7. 红旗与黑旗

埃米尔·卡布亚

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象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

——《列王纪上》第 8 章^①

“我是鲜血淋漓的人，
有着鲜血淋漓的手，
我要报仇。”
疯狂的反抗者，
无政府主义者和犯上作乱者，
一边喊叫，一边把国家砍倒在地。

——旧歌曲

无政府主义已经死而复生。尽管有人带着无知的狂热诋毁它或赞扬它，它再次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出现了。有些可能很有理由见到自己的影子都感到害怕的人，把一切生命迹象，把一切试图使

^① 原文写错了。此段实际引自《旧约全书》、《撒母耳纪上》第 8 章。——译者

已经缺乏鼓舞力量的社会秩序重新获得生气的努力都斥为无政府主义。还有一些人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人，在他们年轻的经历中只见过人们躲在冠冕堂皇的谎言背后争权夺利，因此无法理解正当的信仰。这些人把任何微不足道的蔑视旧习惯的表现都吹捧为无政府主义。胆小如鼠的人和大胆莽撞的人都从无政府主义中找到了适合自己需要的神话。为此目的，他们同意按照尽可能低的条件来认识自己的本性，就象那些把基督教变成刽子手和受害者同样可以享受的节日的宗教狂一样。双方都在尽一切可能损害一种已经时来运转的思想取得成功的机会。

不管人们是反对还是为它宣扬，无政府主义精神到处都以无可抗拒的力量爆发出来。它固有的、追求兄弟情谊的理想已表现为实际行动。在南斯拉夫，出身于最受优待、最有特权的社会阶级的大学生要求给穷人的子女发津贴，使他们可以真正享受原来仅在理论上享受的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法国学生认为工人阶级的子女仅占大学生名额百分之六是一种耻辱。美国学生则要求大学吸收更多的黑人学生。

有一个时期 最高尚的、即承认事实的说法是：“你周围一直都有穷人。”现在世界各地都不这么说了。特别是在今天那些生活富裕的先进工业国家里，穷人的存在一定显得是不道德的，是特权造成的令人无法容忍的不公平的状况。人们认为友爱——从这个概念的抽象的和具体的意义来说——与其说是一种理想，倒不如说是一种社会需要。友爱意味着个人要享有经济和政治自由，对自己的命运要取得比社会制度到现在为止所能容许的更大的控制权。因为即使雇佣奴隶和政治奴隶享有“很高的生活水平”，即使人们鼓励他们投票赞成那些同他们的命运毫无关系、甚至对他们有害的纲领和政策，谁也没有把他们当作兄弟。当然，东方和西方的专制制度和受人操纵的民主仍然把自由、平等、博爱等要求看成

是挑衅。实际上，现在向它们挑衅的并不是绝望的农民起义军，而是统治阶级的子女，即为它们管理工业和军队的阶级的子女。这些子女拒绝承担他们的父辈所承担的社会作用，拒绝维护现有制度。这当然是不祥之兆。如果发生广泛的叛乱，政府已经无法继续使用它传统的自卫手段。统治者、经理们和报酬优厚的技术人员并不真正愿意让自己的子女遭到警察的枪杀。

无政府主义理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又同我们设想的合乎人道的政治形态产生了联系。在各种社会主义理论中，无政府主义一贯地强调意志自由原则，强调非强制性的联合，强调按照广大群众的直觉而不是按照杰出人物的命令进行政治革命和整顿。这些思想之所以重新受到注意，是因为它们符合人们胸中重新燃起的对友爱的渴望，因为它们使我们心中比较高尚的冲动有可能通过我们的行动和我们的制度得到具体的社会表现。当人口的增长使生存的最低条件受到压力时，无政府主义思想显然不大可能化为实际的社会纲领——这至少是历史记载给人的印象。但是在经济条件为生活的提高提供了很大余地的先进工业社会里，无政府主义理论提出的改革——分散政治权力、分散工业、由工人管理他们自己的工作、放弃强制性的规章制度——不仅是可供选择的、切实可行的社会组织方式而且是治疗组织严密、墨守成规、士气涣散、冷酷无情的国家特有的毛病的对症疗法。在西方（很可能在苏维埃俄国也是一样）发展趋势看来，因为前提已定，是走向某种形式的社会工程学，即试图利用计算机技术来管理人口。那时，工程师对效率的计算就会同资产损益表完全一样，根本不能反映心理、道德和政治状况。由于在使用计算机时缺乏新的指导意图，由于这些聪明能干的机器按其固有的性质只能根据我们未经审核的现行做法编制程序，我们可以料想那时必然会产生惊人的混乱。可以绝对有把握地预言，如果技术官僚的梦想得以实现，现在已经在

破坏国家内聚力的状况将会进一步恶化，已经威胁着我们继续生存前景的富国与穷国之间的斗争将会进一步加剧。按照丹尼尔·贝尔方式实行的计算机技术官僚统治，即由程序编制人员象国王一样进行的统治，肯定是短命的。但是在这些系统工程师一旦告退时，我们可能就会两手空空，没有什么值得庆幸的了。

就这个问题而言，无政府主义理论给予我们的启示肯定是恰当的，实际上不止是恰当而已，因为使人类进一步从属于机器的前景事实上每天都在激进派青年中激起无政府主义情绪，使他们接受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和策略。此外，技术官僚社会的出现还受到另一种“自然”发展的挑战。这种发展就是青年人对社会公开宣布的道德观念置之不理，而对社会在实践中体现出来的道德观念则表示积极的轻蔑。

好吧！就算是这样吧！无政府主义为我们以人道方式安排社会关系提供了药方。在和现在不同的制度下，这些药方甚至可能是行得通的。但是从无政府主义的方针或行动中推断不出任何有助于实现新制度的社会程序。零敲碎打地运用无政府主义思想，无论是作为所谓有意识的社团行动还是作为个人不满或造反的姿态，其结果都象掷骰子一样具有偶然性。至于同无政府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有关自发革命的理论，在比过去的国家更强大、更占优势而且垄断了一切强制手段的现代国家中，这些理论特别显得幼稚。

无论怎么说，这至少是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传统论点。传统的批评家以最优雅的君子风度拒不讨论任何困难的假定——例如人是可以走向完善的，合作是人的本能，共同生活是值得向往的（这些都被怀疑为感情用事的想法）。他们认为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社会革命理论有不足之处，并以此作为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论据。但是这些传统批评家现在还生活在十九世纪。

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在二十世纪后半期，政府同其他一切机构

一样，都依靠一种受感情支配的信用制度；这种信用同证券交易所的行情一样起伏不定。拿最近的例子来看：近年来美国有不少青年拒服兵役，这是美国内战结束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武装部队内部也存在有组织的活动，其目的是给那些认为战争是政治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人制造困难。在刚刚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拒绝参加投票的人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多的。公众对主要政党的信心一落千丈。只要发生一次意外的震动——例如国际收支危机，证券交易下降，或者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正式目标遭到重大挫折——就会象 1929 年一样使公众对政党的不信任变成对我们整个制度的不信任。如果认为这种情况似乎不大可能出现，不妨想一想去年 5 月发生在法国的事情。这些事可以作为先例，说明现代国家多么容易受到大众情绪突然变化的影响。

毫无疑问，这里作为一种神秘现象来讨论的群众情绪的变化都有实质性的——物质的和思想的——原因。但是人们的反应是无法完全预测的。因此，在群众心理变化实际已经发生以后确定产生变化的原因比变化发生以前要容易。例如，从一切表面现象看来，法国一直在分享当时的繁荣。如果说人们对戴高乐主义已经做的和没有做的事情——例如已经制造了原子弹，但人们由于新得到汽车而要求修筑的超级公路却只搞了象征性的一部分——发了大量牢骚的话，法国人承认他们是一个爱发牢骚的民族。无论怎么说，左派对当时统治法国的那位将军无法组织卓有成效的反抗，其原因归结起来就是明显地缺乏严重到足以促使人们提出政治要求的问题。尽管如此，后期资本主义经济——它使用的标准几乎同人的幸福毫无关系而其管理方式则是足以致命的——所特有的畸形状态当时实际上正在使法国遭受苦难。畸形状态之一就是法国学生的大量过剩，用经济学家的话也可以叫做教室和教授数量严重不——你怎么看都行。一部分多余的学生被送到农

泰尔这个地方匆匆建立起来的一个机构去加工，以便把他们培养成使我们的社会保持运转的思想工作干部。农泰尔拥挤不堪、条件很差、缺乏吸引力，但没有达到无法忍受的程度。尽管如此，有些攻读社会学的学生还是起来造反了。

法国的社会学越来越象美国的社会学。同美国社会学一样，它有两个主要任务。一个任务是在社会分析的幌子下为社会进行辩解，说明在这个普天之下最美好的社会里一切都是出于最善良的愿望——对这种努力最合适的理解是：人们企图使自己从道义上和心理上适应十分艰苦的条件。另一个任务是——通过劳资关系、广告、民意测验、典型调查技术、精神分析学（最佳）密度研究等等等等——对付群众，其目的是使他们适应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为生活进程提供的物质基础。在农泰尔攻读社会学的学生不但对过分拥挤、对缺乏舒适环境、对学院内部的规章制度不满，而且对法国社会学不满。他们认为法国的社会学并没有认真深入探讨真正的问题，认为它对野蛮的社会制度采取了奴颜婢膝的态度而不是批评的态度。于是这些学生就张贴标语，布置纠察线，抵制法国社会学的课，终于使这一课程上不下去了。

法国毕竟是伏尔泰的祖国。 *Pour encourager les autres*^①，该校校长叫来了警察。他的花招造成了出乎意料的结果：索邦的学生也举行罢课，对农泰尔的同学表示支持。（法国共产党把罢课的学生叫做“可怜的小少爷”。警察奉令占领了索邦的学校，于是学生就走上巴黎街头去筑起街垒。（于是法国共产党就把这些学生叫做“闹事者”。拉丁区的居民把受伤的学生藏在家里，并从窗口和屋顶扔东西打警察，以表示对学生的同情。后来学生又呼吁各种产业工人同他们携手合作，一起同政府进行斗争。（这时法国

① 法语 为了鼓励别人。——译者

共产党却对它所属的庞大工会组织法国总工会的会员说学生是“反革命分子”。)一家大型飞机制造厂的工人 其中包括法国总工会会员,首先响应学生的呼吁。一周之内,几乎整个法国的产业工人都起来效法他们的榜样。约一千万男女工人举行了罢工或占领了工作场地。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也是最成功的一次总罢工。

在那些群情激奋的日子里,法国共产党却象桃源中人一样置身事外——美国如果发生总罢工,劳联—产联也会采取这种态度。法共的做法就象美国所谓的企业性工会。这就是说,它按照合同向法国雇主提供遵守纪律的工人。如果工人跑掉了,它在法国雇主眼里就丧失了一切地位。因此,法国共产党当然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可悲的。此外,有一段时间戴高乐将军一直在偷偷摸摸地同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勾搭,用外交词令来说就是亲善。在这种情况下,法共如果鼓励推翻戴高乐政府则未免显得太缺乏教养了。劳动群众的这个革命先锋队决心保持它在法国雇主眼中的地位,避免使人指摘自己的举止有什么不检点之处。

让我们暂时把躲在桃源中的先锋队撇开不谈吧。值得谈谈的是农泰尔的社会学学生如何使戴高乐政府感到震动的过程。首先,他们发现同麦利桑德一样他们在法国过得并不愉快。他们没有求助于唾手可得的药方——心理分析、电视、电影、刺激素、镇静剂或意识扩充剂——而是公开表示不满,并提出了某些言之成理的理由。农泰尔其他学系的学生发现他们也感到不愉快,然后就是索邦的学生,然后是南方航空公司的工人,最后连国家控制的电视网的新闻工作人员和技术人员也起来造反,不愿再充当这个政权的雇佣宣传员了。他们一旦开始考虑问题和讨论问题,就发现使他们不快的是二十世纪后半期法国生活的质量。因此,学生的要求并不限于废除学校的规章制度,甚至也不限于改组大学。他们要求改变法国的生活方式,并要以更加负责的方式参预决定公

共事务，以此来促进改变。工人们的兴趣也不在于提高工资。正是在这个时候，法国共产党从它藏身的桃源中破门而出，开始以最高速度奔跑，希望赶上普通党员的步伐。通过谈判，它以停止罢工为代价使吓得胆战心惊的政府同意大幅度提高工资。但是工人表示拒绝。他们说：这根本不是我们的意图；我们要求改变的是比赛的基本规则。

这已足以证明无政府主义关于自发革命的理论是正确的了。一切真正的革命都是自发的。从幕后操纵革命是不行的；祈祷对它们也不起作用。但是，同自燃引起的火焰一样，革命也不是无缘无故爆发的。这些事实驳斥了那些富于想象力的死抠字眼的人（他们认为无政府主义的理论等于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爆发革命），而那些正是按照这种精神采取行动的天真的激进派也不能因此得到安慰。

法国去年 5 月那场革命险些成功。由于它实际上并未成功，有些评论家就根本否认发生了革命。这很象去年格瓦拉在玻利维亚阵亡以后普遍出现的一种想法，即从此南美洲的任何山区都不会出现革命或游击战了。然而这不过是痴心妄想。在去年 5 月的法国，“成功”意味着什么呢？戴高乐政府垮台就是很了不起的成功。做到这一点，对法国社会基本结构进行有益的改革就有了政治条件；从消极方面说，反对这种改革的障碍物就会垮掉——戴高乐政权的政治结构所体现的社会制度就不能继续起作用了。每个政府都要以或好或坏的方式对社会生活起极为重要的协调作用。如果戴高乐政府由于人民起义而垮台，就会出现在比较民主的基础上改组法国社会的相当好的机会，因为管理人总是需要的，而这一次人民可能决定由他们自己来管理自己。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的革命险些成功——如果不是共产党在决定性时刻进行干预，戴高乐很可能已经垮台。这场革命肯定是其他起义的前兆

世界上一切先进国家的文化都容易遭受法国文化所遭受的那种批评。这些国家组织严密的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容易受到抵制、群众示威、总罢工等不流血武器的伤害。

学生和工人要求废除戴高乐主义并在国家生活和工业管理方面建立伙伴关系。他们要求这种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同他们的生活有关系。面临这种情况，戴高乐离开了政府所在地。人们以为他是退隐到科龙贝双教堂他的老家去了。但他却溜到了德国，在那里拜望了法国驻军，并赦免了几名曾被他的政府以叛国罪判刑的高级军官。然后，坦克车就开上了巴黎街头，第二天戴高乐分子就举行了大规模示威。革命夭折了。

现在停下来对这次交锋做点非正式的分析——象我们对学生和工人的造反曾经做过的那样——是大有裨益的。如果我们当时的事态作一些合乎情理的设想，情况可能是这样的：戴高乐飞往德国去了。为什么？难道巴黎同法国驻外部队之间没有电话线路吗？电话线路是有的，并且戴高乐已经打过电话。这位将军在飞往德国以前显然征求过驻在法国和其他地方的他的心腹部队的意见。反应是否定的；军官们并不急于战斗，对士兵的态度也无法保证。士兵可能拒绝向法国人开枪。由于警察对要求他们执行攻击学生和工人、并从而引起混乱的任务已经提出抗议，因此必须认为部队的答复是不可更改的。这时，戴高乐准备退居科龙贝，因为比赛已经结束了。但是，尽管一千万罢工者已经拒绝提高工资并以大声的叫嚷压倒了他们的领导人要求妥协的主张，某些人却忙于告诉他们说如果再不让步就会造成大屠杀——即由现代化军队大规模杀戮手无寸铁的工人。所谓某些人无疑就是法国共产党。他们在法国社会里起的作用本身的逻辑以及他们在其他国家的最热心的辩护人为他们提出的辩解，都使人得出这种结论。这些辩护人至今还在不厌其烦地大弹大屠杀的调子。当这个时期的历史经

过详细核实时，它几乎肯定会证明这个异乎寻常地置身事外的党曾经以幻想的暴力威胁当作决定性的牌来打。它宁愿在戴高乐已经宣布要举行的选举中碰碰运气，而不愿学生和工人结成联盟对权力直接提出要求。当工人开始犹豫和动摇时，就有人把他们的思想状况报告了戴高乐，于是他就改变了自己的出走计划。他去德国的原因之一是对军队亲自施加压力，同时也许是为了使人们更加认为他要采取强硬措施。他一到德国就撤销了对右翼将军们的判决——甚至这个姿态主要也是针对法国本土的右派，而不是针对军队的。最后，他对军官们说：“谁说要开枪？你们只要显示一下力量就行了。”

这就是问题之所在。按照通常的分析，戴高乐是成功地诉诸武力把革命镇压下去了。但是布置在巴黎的坦克并不是可供使用的武器。坦克能把工人赶回工厂去吗？它们能从拥挤在拉丁区狭窄的街道上的男女青年的身体上轧过去吗？能够用大炮和机枪瞄准同情这些青年的中产阶级人士的商店和住宅开火吗？这都是坦克做不到的事情——除非戴高乐政府一天也不想活了。坦克只能鼓励戴高乐分子上街游行——在盘根错节的现代工业社会里，这是唯一有任何意义的显示力量的方式。一百万人走上大街；他们高举的旗帜和呼喊的口号明显地说明他们是现状的支持者；反对派丧失了勇气，就打道回府了。

另一方面，如果反对派有必要的韧性和足够敏锐的眼光，他们就会举行反示威，重申自己的要求，提出新的要求，并在自己的标语牌上涂上能够反映瞬息万变的形势的巧妙口号。这样一来，坦克就会开走了——因为坦克兵同法国警察一样，也属于工人阶级，其中可能还有学生，肯定有市民。因为戴高乐将军的全部行动过是按照他聪明的本能诉诸民族情绪罢了，正如学生和工人诉诸友爱和自尊感一样。对于许多人来说，或许对于世界各地的大多

数人来说，所谓爱国心就是要关心我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家园的实际状况，关心同胞的命运，关心他们交往的水平。这种爱国心会使我们的河流和城市上空的空气保持清洁，使社会对所有的儿童一视同仁地表示温柔和体贴，并对所有的人进行教育，使他们成为对自己有用、对我们大家有益的人。这种爱国心的增长是比较慢的，但它是整个人类发展的方向。将来某个时候，我们可能成功地求助于这样一种情绪，即对地球、对自己和对他人都要保持适当的尊重。法国学生和工人的造反说明，消费社会带来的浪费、不公平和空虚感已经增加了这种情绪。

法国学生和工人提出的要求也在其他地方提出来了，其中包括德国、英国和美国，而在意大利和墨西哥是以戏剧性的方式提出的。这个事实说明我们特别有必要了解这些要求体现的无政府主义情绪。首先要了解它不是什么。它并不是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左派那里生吞活剥地照搬过来的一种对社会生活的看法。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几乎一切官方版本（只有卡斯特罗主义和毛主义是明显的例外），都是西欧和西半球大学里的青年激进分子深恶痛绝的。一切自称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政权实际当权的地方不是实行软弱无力的社会向善论（相当于某种开明的福利资本主义），就是实行理论上的极端平均主义和实际上的镇压。如果学生要求的只是美国、英国、荷兰或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官方实行的那种自由主义，他们就不会牢骚满腹了。如果他们要的是以杀人为手段的统治，他们就会为俄国、东欧或希腊提供的范例鼓掌欢呼了。卡斯特罗对许多学生是有吸引力的。这种吸引力来自马埃斯特腊山脉的英雄传说，来自卡斯特罗政权的即兴式的特点以及他本人的民粹主义倾向。毛泽东本人的英雄气概和他对自下而上的革命的清教徒式的献身精神，也使他成为理所当然的传奇人物；他的国家距离遥远也是一个有利条件。即使代表传统的左派的现存

政党曾经有机会获得青年激进分子的忠诚，看来这种机会也被法国共产党在 5 月那些日子里的表现永远断送了。但甚至在这次惨败以前，使半个世界大学校园里的青年斗士以及许多根本谈不上激进的同学团结起来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对长辈传下来的生活方式以及这种生活方式特有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感到本能的厌恶。他们认为，一切形式的共产主义都是超级资本主义，是由于迷信积累的作用而进一步合理化了的、并由于缺少舒适的生活条件和个人自由而更缺乏人性的超级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共有的官僚主义组织形式对个人主义、自发性、相互信任和宽宏大量等理想——这些理想正是新的觉醒的主要表现——是一种侮辱。

青年激进分子对他们那个不得人心的社会普遍实行的组织安排感到厌恶。这种厌恶很容易——太容易——变成对一切组织的厌恶。无政府主义有一种不分青红皂白地谴责正规政治组织的倾向，因为它担心这些组织受到歪曲和滥用。在它的整个历史上，无政府主义都受到这种倾向的危害。现代社会即使在最安定的时候也深受官僚主义之苦。官僚主义是冷酷无情的，缺乏想象力的。它随时随地提醒人们：使人受到压抑的社会关系可能作为一种制度并非故意的副产品、作为例行公事产生出来。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无政府主义常常由于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盲目的狂热而无法发挥作用。无政府主义者以自由和自发性的名义拒绝按照自己内心深处的认识办事，已经到了无法实行政治纲领、甚至无法提出政治要求的地步。但是无政府主义理论的核心是根据常识提出的一种设想，即人们有一种自愿合作的天然倾向，他们会在文化和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自发地作出符合当时需要的社会安排。事实上，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合作起来进行革新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说明其他任何理论——例如同罗

伯特·阿德里、康拉德·洛伦茨、德斯蒙德·莫里斯等社会哲学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所谓人们天然要发生对抗的流行理论——都认为神秘莫测的人类文化的演变。但是，根据我们共同的经验来看是十分合情合理的无政府主义的设想，却同一切政府明确宣布的政策相矛盾。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得依靠它的公民在千头万绪的关系中进行非强制性的合作才能存在。这种合作决不是暴力或暴力威胁所能取得的。尽管如此，国家却习惯于以这样一种方式办事，即认为通过刑法进行制裁是它存在的唯一保证。这种态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它预示的效果，至少是一个尚待回答的问题。无政府主义者倾向于认为习惯性地诉诸强制手段的做法同反社会行为的存在有着因果关系。这种论点还可以阐述得更细致些。事实上，本世纪有关个人心理和社会心理的理论和学说——从心理分析到刑罚学——的发展都为这种论点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总的来看，这一发展已经使我们对人性的想法发生了根本变化。无政府主义关于这个问题的教导远比充满恐惧、以惩办为能事的社会秩序遗留下来的观点更接近现代思想。那种社会秩序阻碍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使我们无法自发地建立比较合适的习惯或开扩我们的眼界。

无政府主义者相信人们的社会创造力，相信他们可以不需要法典制定者、国王和政治委员而自行解决自己的问题。这种信仰使主张极权主义的左派很不喜欢他们，指摘他们幼稚、感情用事、天真无知。随着历史发展速度的变化，人们有时嘲弄他们，有时又打击他们。他们在本世纪出现的重大危机中——例如在俄国革命或西班牙内战中——所起的作用的真象，不是受到封锁就是受到彻底的歪曲，因为他们在实际政治活动中取得的胜利对右派和左派的伟大领袖、小官僚和极权主义政党都是直接的冒犯。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论点经历了三个典型阶段。这些阶段同无政府主义思

想和无政府主义者在某一特定时期参加社会活动的水平是相适应的。当无政府主义者受到历史条件限制而只能进行思考和分析时，人们就嘲笑他们的理论完全脱离实际。当社会抗议运动和革命按照无政府主义的预见兴起、从而使这些嘲笑者惶惶失措时，人们又谴责这些运动不成熟、不完备而且“客观上是反革命的”。当无政府主义者获得政治权力时，左翼和右翼的力量就会联合起来出卖他们，摧垮他们。

但无政府主义是现代历史处于转折关头时反复出现的现象。原因很简单：一些问题老是得不到解决，因此一次又一次使人想到意志自由的传统，认为这种传统可以作为解决社会危机的工具。在明确阐述当前的需要时，无政府主义者比较不受思想范畴中官僚化体系的拘束，也比较不受同当局的交往的损害。此外，他们的原则使他们时刻记住要把人类真正的需要放在首要地位，而他们的左派同事却在为下一代人考虑四平八稳的理论体系。无政府主义者直接致力于普通人日常关心的问题，因此使他们同闭门读书的大学究比较起来显得土里土气，但却有利于他们施展才能，进行卓有成效的社会创新——特别是在发生危机、教条主义者陷入瘫痪状态的时候。

传统的左派政党都容易沾染官僚主义的毛病，而且喜欢改写整个历史，以便为他们仅仅出于权宜之计而改换门庭的行为辩解。另一方面，由于处于无权状态养成的习惯，无政府主义者表现了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马克思主义政党认为自己是资本主义创造的机器文明的天然继承人，他们对机器文明的批评仅就谁应享受文明的成果——是财阀还是用劳动创造社会财富的工人——这个问题提出争论。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开扩的，他能想到其他的反对意见。但是他的门徒则同资本主义思想家一样，认为对机器文明进行任何更带根本性的指责都是感情用事的胡闹，是绝对不许可

的。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出现正是对机器文明固有的弊病、即人的异化的一种反应。当机器文明处于发展的颠峰状态时，无政府主义者在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方面都处于默默无闻的地位。那个时期，只有最热衷于机器文明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资本主义管理人员才大有希望起有效的历史作用。但是，未经批判的机器工业要求的社会代价——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对人的精神的摧残、更不用说技术如何助长了战争中的大规模屠杀——现在越来越明显地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了。因此，无政府主义的乡巴佬式的无神论思想倒显得是社会健康思想的集中反映。伴随这种思想产生的各种看法每天都在一些根本没有什么政治觉悟的人身上得到新的发展。当局势日益严重、开始出现实现政治变革的可能性时，纪律也在各种政治团体中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无政府主义的代言人和正在无政府主义化的学生所采取的自由散漫的态度是历史的产物，是会随着时间的变化、随着无政府主义对它主要关心的问题的重新强调而发生变化的。尽管这个运动的名称是暧昧的，尽管它由于一直处于反对派地位而养成了某些习惯，它的理论基本上是一种主张有组织的秩序的理论而不是一种破坏性理论；它主张合作而不主张竞争，主张意志自由而不主张发号施令，主张创造而不主张机械模仿。

为了推动这种发展，最重要的是要维护无政府主义，驳斥所谓无政府主义根本不是什么政治运动、而是取消政治的运动的指摘。最应当受到这种责难的那些鼓吹“意识形态完结论”的理论家却从来没有受过这种指责。就在几年以前，直到他们已经毫无市场的时候，这些理论家还断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至少从理论上说已经解决了，剩下的任务仅仅是利用控制论对人力和物力实行明智的管理。对人类潜力估计得如此之低的设想，却被我国头脑僵化的知识分子认为是符合常识的。这个设想有一个适合当地情

况的变种也在苏联得到赞扬。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政治是共同行动的生命，而且认为每个人都能参预政治。他们从来都不同意西方社团资本主义的祭司长和俄国的社会主义官僚发表的完全是异想天开的美妙声明。实际上，正象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特别关心积累和管理问题一样，无政府主义特别关心的是政治。因此无政府主义者的权力论是从政治角度而不是从积累和管理角度出发的。这一点需要进一步阐述，因为批评无政府主义的人否认无政府主义理论同权力问题有任何关系。甚至某些无政府主义者，例如保罗·古德曼，也认为一切有关政权的理论都不值一谈，都是某种变态心理的产物，或者是僵化的理论和制度的令人不快的遗产。

无政府主义运动内部和外部的这些批评家都存在误解。至于这种误解是根本性的或只是字面上的，现在还无法确定，但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幸的。对于个人或团体来说，所谓权力不过是在安排自己的社会生活方面保持有效的发言权。（当我们从个人谈到集团时，在概念上和实际意义上都存在含糊不清之处。但生活就是如此：人们感受自身的欢乐和痛苦。但是人不同于其他某些动物，不是离群索居的生物，因此他们的生活必然具有社会性。不能设想任何社会秩序能够消灭个人和集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对人类来说重要的是使这种关系富有创造性而不是只有消极意义。如果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对自己的命运缺乏实际影响，他或他们就有责任去获得这种影响。扩大自主权，在政治词汇中就叫做夺权。

很难期望这种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理论家有什么吸引力。这些理论家不可避免要按照积累和管理的逻辑来考虑夺权问题他们忘了一切造反的阶级、一切人的集体都有能力完全按照当时的具体要求重新组织这方面的工作。想象力的缺乏对革命运动夺权以前、夺权过程中和夺权以后的行动都具有实际影响。举例来说，马克思主义者就认为法国去年 5 月的革命之所以流产

是因为学生和工人缺乏技术上的准备，无法从资产阶级及其仆从手中把国家和工业的管理权接收过来。煤矿是谁开采的？奶是谁送的？三岁孩子也会说：是煤矿工人和送奶员。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不相信这些劳动者无需资本家或政治委员的帮助就懂得如何继续执行自己的职能。换句话说，他们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神话，认为经理和统治者具有特殊才能，认为是他们为矿工和送奶员交换自己的劳动产品提供了社会联系渠道。当然，这大部分是胡说八道，是专职管理人员为了自己的利益制造出来的，只有象克鲁泡特金或列宁这样的政治天才才能够识破这个神话并把自己的见解留诸后世。联系渠道是要的，但无需如此昂贵、如此特殊化、如此扬扬自得、如此令人难以忍受并具有如此大的破坏性，就象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一直存在的那种情况。矿工和送奶员可以用低廉得多的价钱完成这项工作，而且完成得更好。卡斯特罗主义和毛主义之所以能吸引青年造反派正是因为它们显然不赞成昂贵的联系渠道所起的作用。这种作用的自然演变会走向使人的思想和自由权利陷于瘫痪的专制制度。伊夫·梅里安说的一句俏皮话在这里很适用。她说：可怜的中国人既无水力资源也无高炉。他们只有中国水力资源和中国高炉。同样地，我们也无需为工人没有中间经纪人和公司首脑而感到伤心。

我们已经看到，从无政府主义观点派生出来的关于权力和夺权的概念与众不同，其焦点稳定地集中在扩大人的社会活动范围上。马克思主义者目光短浅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次要考虑方面；他们离开马克思越远，就越专心致志地从时间和运动角度研究国家职能。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扩大人们驾驭自己命运的机会这件事本身的性质就决定它不可能是来自上面、来自领袖人物、来自作为先锋队的政党或来自神圣的无产阶级的一种恩赐。自主权不能委托给别人，不能按照“实质代表制”一类的理论由别人代替个人行

使，也不能用任何其他代表制来代替。在电讯事业发达的时代，只有那些为了自己的目的垄断电讯事业的人和那些认为让他们垄断也无害于事的人，才会把无政府主义者要求直接参预公共事务的主张看成是痴心妄想。因为，就这个问题而言，每个人都必须亲自工作，亲自体现一个已经获得解放的人的生活。附带说一句，我们应当注意这种办法从心理学上说有其精明之处。它预先就防止了——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出现个人崇拜的可能性，因为它使委托别人履行职责和通过代理人完成丰功伟绩等做法的社会作用降低到了最小的程度。在一个自由社会里，向宇航员喝采是不好的；每个公民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这样才会有自尊心。二十世纪西方艺术以使人感到压抑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那种现代人的病态的自我中心意识和顾影自怜，产生于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即社会有效地剥夺了一个受过教育的阶级的权利。这个阶级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庞大，而它接近权力杠杆的机会却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稀少。无政府主义偏爱自愿原则；它坚持认为人们有权决定并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这都是直接针对从城市失业中产生的契诃夫式疾病的。

当社会已经演变到现阶段的时候，政治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的问题，也就是从左派和右派传统思想体系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的问题。在美国，我们在毒化我们的全部河流和湖泊；在苏联，他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污染贝加尔湖。只有当自我意识成熟到能够理解并赞成自己的生活本能和愿望的时候才能促进人类当前必须完成的计划，就是使人类从盲目的技术的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大多数人已活生生地献上了机器的祭坛，可能很快就会丧失自己的生命。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我们成为技术的牺牲品都没有任何认真的反对意见。各地的青年激进分子都发现了这个事实，因此他们才高举黑旗冲出了大学之门。

第四部分 自由意志论

某些无政府主义者可能属于陷于绝望的自由主义者。1849年亨利·大卫·索罗在赞成“管理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种论点之余，进一步推导出“最好的政府是根本不进行管理的政府”这个结论。近几十年来，自由意志论被用来阐述一种反中央集权下经济统制的哲学。这种哲学完全是个人主义的，并且迷恋于一种（也许是神话式的）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这种体系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能够有效地进行工作。尽管有些自由意志论者争夺着由选举而产生的一官半职，但大多数人拒绝接受“正常的”政治，并且象左派无政府主义者那样，主张摧毁国家机器。从自由意志论的根源来看，它与无政府主义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争取个人自由。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特别是在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美国存在着“右”的无政府主义者。例如本杰明·塔克，一位知名的撰写小册子的散文家，以要么享有自由、要么维护权威的名义，抨击国家这个概念，不论这个概念是否属于社会主义。但近期以来，自由意志论者已变得相当世故，很少动感情争论什么问题，他们在政治上站在了保守派一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思想最深刻、表达能力最强的自由意志论作家要数默里·N. 罗思巴德了。

作为一个博览群书的经济学家，罗思巴德的自由意志论已经超越了右翼反国家的论调，达到了原则上相信放任主义制度的地步。这种制度对个人的主动性给予报酬。在没有保护主义权威那种‘不自然’的干涉下容许个人幸福自由发展。在《美国右派的转

化》一文中，罗思巴德评述了新右派的出现。在《为什么要成为自由意志论者？》一书中，他主张一种实际上是废除主义的新的正义，要求彻底废除“对自由的侵犯”。罗思巴德是一位自觉的激进派，这使他彻底地批判了国家这一概念。罗思巴德在《对国家的剖析》一文中试图从自由意志论者的观点来解决国家这个“问题”。

在他所有的文章中，罗思巴德——象许多新的左派那样，试图超越前一代人的那种陈腐的差别——所关心的是如何使个人和小组重新具有作出决定的能力。在他的著作和他出版的许多单页印刷品和杂志中，他采用自由意志论者的传统，把矛头对准国家思想意识的核心，公然反对国家。

8. 美国右派的转化

默里·N. 罗思巴德

在最近出版的大量有关正在发展中的保守运动的书籍和文章中，很少提到该运动的指导思想和理性方面的领导。相反，却把注意力集中在右翼的群众现象上：比利·詹姆斯·哈吉斯们、伯切尔们，以及为上帝和国家进行战斗的各种十字军。但是，由于对右翼指导思想的忽略，它的真正性质被掩盖起来了，并且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右派的这种性质经历了巨大和意义的深远的变化，这种变化也被隐藏起来了。事实上，由于美国不同政治组织之间完全缺乏对话，右派和左派的大部分辩论是在所谓“文化时滞”非常严重的情况下进行的；双方仍然错误地认为辩论的内容与大战刚刚结束之后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尤其是在继续使用某种词语的掩盖下，右翼的理性方面的内容和目标已经在过去的十五年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事实上却未曾引起无论是右派或左派的注意。

现代美国右派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作为一种对新政和罗斯福革命的反动而出现；尤其是作为在国内反对日益加强的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和国家干预，并在国外反对战争和国家干涉的对立面而出现。所谓“美国老右派”的指导动机，是一种对个人自由深沉和热烈的责任感，他们认为，个人和经济领域内的这种自由，无论是在国内或国外，均已遭到极权主义国家的发展及其权力的严重威胁。作为个人和自由意志论者，老右派认为，国内外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的发展是必然的结果：幻想求得国内的安全而实行新政高压统治与谋求国外的“集体安全”而进行战争是相吻合的；这两种干涉加强了国家权力对社会和对个人的统制。在国内人们希望最高法院依据“严明的宪法”制止政府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同时，谴责征兵制是一种违反宪法的倒退，一种非自愿的苦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国内外新政的势力发展到其顶峰，开始出现了—个被围攻的小小的自由意志论反对派。它对美国当时的主要倾向进行了全面的批判。遗憾的是，左派正全神贯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在国内推行新政的工作，没有看到反对派为了争取自由所制定的原则和合理的立场，只认为他们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盲目的“孤立主义”而从最坏的方面来看则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戈培尔路线的鹦鹉学舌”。不应该忘记不久以前左派并没有超脱于自己那套玩弄计谋和合伙犯罪的手段。假如说右派议员中有麦卡锡和迪林之流，那么，左派议员中也有约翰·罗伊·卡尔森之流。

现在看来，在这个新生的自由意志论右派中，确实有不少人受到了盲目的沙文主义的影响，有点看不起“外国人”甚至可以说玩弄计谋的倾向也不幸变得越来越明显。但是，当时右派知识分子的主要趋势，依然是有原则地和坚定地反对战争，反对随之而来的

对生活和自由以及对所有人类价值的毁灭。试图置身于欧洲战争之外的理想，从本质上说并不是因为具有沙文主义思想，看不起外国人，而是要唤醒美国，使其不要忘记自己的古老宗旨，即作为自由和平的灯塔，为世界服务，而不是去充当改造所的头子，用刺刀去纠正世界上每一个人的行为。假如“孤立主义者”自己并不是自由意志论者，他们至少正在向这个方向前进，只需把他们的思想意识稍加改造和系统化，就可以达到那个目标。在为和平献身方面，在渴望限制国家的军事干涉和随之而来的战争方面，三十年前的右翼中立主义的原则，同现今左翼中立主义原则之间几乎没有有什么区别。我们了解了这一点之后，就看得很清楚，过去划分“右派”和“左派”的方法已完全过时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及其以后一段时期的老右派知识分子的领袖们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几乎不为当时和今天大批美国知识分子所知晓。他们是艾伯特·杰伊·诺克、罗斯·怀尔德·莱恩、伊莎贝尔·佩特森、弗兰克·乔多罗夫、加雷特·加勒特等人。人们需要花费极大的毅力去回忆与当今的右翼是那样迥然不同的老右派的原则和目标。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老右派所强调的是反对国家权力从各个方面维护个人自由如言论自由、行动自由、经济自由、反对高压统治的自愿结合关系，以及和平的对外政策等。对个人自由最大的威胁是国家权力，其表现是人身自由和个人财产遭到侵犯以及军事专制政府不断出现。从哲学观点来看，它强调“天赋人权”这一概念是人们对人类本性的认识得来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老右派的知识分子英雄们中有这样一些自由意志论者，如约翰·洛克、平均派的成员们^①、杰弗逊、佩因、索罗、科布登、斯潘塞以及巴斯蒂特。

① 英国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平均派的成员。——译者

简言之，信奉自由意志论的右派以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自由放任主义为基础，并系统地发展了那一理论。老右派的代表作中有诺克的《我们的敌人是国家》和《多余的人的回忆》、佩特森的《机器的上帝》（其中一章题为《我们日本化了的教育制度》它实际上打响了战后反对循序渐进的教育方法的第一枪）以及 H. L. 门肯的《门肯选集》。阐述老右派观点的刊物是现已被人们忘却了的大型月刊《分析》，由诺克的主要门生弗兰克·乔多罗夫主编。这个集团的政治思想由乔多罗夫确切地归结为：“国家是一个反社会的机构，源出于征服，只关心没收产品……按照诺克的说法，谋生之道有二，一是借助于经济手段，一是借助于政治手段。前者是使用人力加工原料，生产出人们所需要的物品；后者是没收他人的合法财产。”

国家是由一伙这样的人组成，他们掌握了压迫的机器，合法或非法地利用它来改善自己的境况，这就是政治手段。诺克会马上解释说，国家不单包括政治家，也包括那些利用这些政客为自己谋私利的人，其中有所谓压力集团^①、院外活动集团以及所有那些从政客们那里骗得特权的人们。所有这些祸害“高级”社会的非正义的行为，都可归因于依附于这些社会的国家机构。

在冷战紧随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时，老右派并未茫然不知所措，更没有带头发出战争叫嚣。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当时反对冷战的主要政治反对派，并不是由左派（他们当时已被“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拉进了兵营）领导的，而是由该时期的“极右翼共和党人”霍华德·巴菲特和弗雷德里克·C.史密斯等人领导的。正是这些人反对杜鲁门主义，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反对征兵，反对美国参加朝鲜战争，而无论当时或现在，左翼和平团体对此却毫

① 资本主义国家中为影响政策或舆论而组织的集团。——译者

无感激的表示。共和党众议员巴菲特（此人后来于 1952 年在中西部地区为塔夫脱搞竞选运动）在国会上发言攻击杜鲁门主义时宣称：“即使值得去干，美国也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去充当世界宪兵。如果这种企图得逞，自由的幸福将被国内的高压统治和暴政所替代。我们不能凭着美元和枪炮向其他国家输出基督敎义。劝导和以身作则是拿撒勒的木匠（指耶稣）教给我们使用的方法。如果我们信仰基督教，就应该采用这种方法传播我们的思想。我们不能在国外使用强权和暴力，而在国内保持自由。我们不能一边大讲世界合作，一边使用强权政治。”

老右派领导层中的知识分子弗兰克·乔多罗夫，强有力地阐述了自由意志论者在冷战和在国内镇压共产主义者这两个问题上的立场。对后一个问题，他说了这样一句涵意丰富而深刻的话：“把共产主义者排除在政府职位之外的办法，是废除职位本身。”或更详细地说即：

现在我们谈一谈搜捕间谍的问题——实际上，这是对异教徒的审问。是什么使得审问官感到不安呢？他们并不这样去问被怀疑的对象：你相信权力吗？你坚持个人是为了国家的荣誉而存在这种信念吗？你反对捐税吗？或者，你是否会增加税收直至把国家的全部产品吸干？……你是否反对征兵的原则？你是否赞成扩大官僚统治以增进“社会利益”？……这些问题可能使调查者感到难堪。所得到的回答可能表明，被调查者的思想和目的与调查者的思想和目的基本一致。他们也崇拜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调查者只能问这样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共产党员？这实际上是在问，你是否属于莫斯科教会的成员？目前，权力崇拜是按国家的界线来分成不同教派的……每一个国家都在维护自己的正统地位……在可以获得权力的地方，敌对派别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看来，如果美国和俄国的权力崇拜狂之间发生冲突的话，是会有人变节的……战争是权力的最高表现形式，是信仰和巩固其成就的最终表现……

……在清除共产主义者这件事中，包含着至高无上的自由原则。这

就是做错事的权利。异教的存在是自由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作出选择的权利……对我说来是重要的，因为，选择的自由对我的个性是必要的，这对社会也是重要的，因为只有存在着相互对立的思想，我们才能希望接近理想中的真理。每当我选中一种思想并认为它“正确”时，另一个人也就有权拒绝接受这种思想，并认为它是“错误的”。剥夺他人的权利，也就是剥夺自己的权利……假如人们由于拥护共产主义而遭到惩罚，我们会就此而罢手吗？一旦我们否定了做错事的权利，我们也就把人类的思想禁锢了起来，把生杀予夺的大权交给了暴君。

1940年5月，乔多罗夫在赞扬由“反对征兵全国委员会”散发的题为《美国的军国主义化》的小册子时写道：“只有建立起镇压机器，国家才有可能干预社会的经济事务，这就是军国主义。权力是政治的关联词。”

朝鲜战争时期，老右派在争取和平的运动中达到了其全盛时期。五十年代初期，朝鲜战争引起了几次激烈的辩论。就连研究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教育基金会，也研究起了朝鲜战争。例如，该基金会的伦纳德·E.里德在《战场上的良心》（1951年）一书中写道：“奇怪的是战争是人类最残暴的活动但在讨论时却要特别细心……战争是自由最大的敌人，是经济发展的死对头……以毒攻毒，只能带来更大的灾祸。”同年，经济教育基金会出版了F.A.哈珀博士的题为《寻求和平》的小册子。哈珀博士在这本小册子中写道：

在动乱时期，如果有人对战争竞赛提出的任何疑问表示赞扬，他很可能被指责为和平主义者。假若和平主义意味着信奉和平的目标，我愿意接受这种指责。假若它意味着反对所有侵略别人的行为，我也愿意接受这种指责。为了自由，现在迫切需要许多人成为“和平贩子”……

因而国家被投入了战争，当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真正的敌人（即奴役人类的想法）——早已被忘却，并被战争的进程所掩盖——在双方阵营中获得了胜利……在战争中，攻击的矛头并没有对准真正的敌人 其证据是，我们似乎对“胜利”从来不知道该怎么办。……是把“被解放了”

的人民枪毙呢，还是把他们全部关在战俘营中，还是采取其他什么措施？国界是否要变动？是否要进一步破坏战败者的财产？或者还要做些什么别的事情？……错误的思想只能用与之对立的思想、事实和逻辑来攻击……今天对〔卡尔·马克思的〕思想，我们同样不能采用屠杀这一思想的主要倡导者，或成千上万的追随者，或让他们自杀等手段来消灭它……尤其是不能通过杀害被奴役的无辜的受骗者来消灭它，不管这些受骗者是被征入伍的士兵还是战争中的俘虏。

在信仰的战场上，思想要用思想来对付。直到 1955 年 5 月，迪安·拉塞尔才在经济教育基金会的小册子《征兵的概念》中写道：

那些鼓吹为了永远保持自由而“暂时牺牲”我们的自由的人，实际上是在鼓吹取消自由……不管这些人的意图多么好，他们终归是你我自由的敌人；我害怕他们比害怕俄国对我的自由的潜在威胁更甚。这些真诚但极易感情冲动的爱国者，显然是对自由的直接威胁；而俄国人却还在千里之外……俄国人进攻我们只能是出于以下两个理由中的一个：或者是因为害怕我们的意图，或者是对我们的行动进行反击。……只要在与俄国毗邻的各国边界上陈兵，俄国人就会象我们一样采取行动；假如俄国在危地马拉或墨西哥派驻军队……我认为在朝鲜或外蒙古对俄国作战，并不见得会比在塞浦路斯同英国作战或在摩洛哥同法国作战更合逻辑……有关帝国主义的历史事实……并没有提供足够的理由证明，把美国变成一个永久性的宪兵国家就可以在國內摧毁自由。……我们正在迅速地变成我们所憎恶的那个模样。

不必再举更多的例子了。弗兰克·乔多罗夫始终如一地用分析方法反对战争而后在 1954 年他成为《自由人》杂志的编辑。自由意志论右翼的刊物《信仰和自由》在 1954 年 4 月出版了一期和平专辑，由我、加雷特·加勒特、罗勃脱·利菲弗和勤奋的欧内斯特·T. 韦尔撰稿。我们在此想对那时被忽略的两篇作品详述于后。一篇是加勒特的小品文《帝国的兴起》，1952 年发表，1953 年收在《人民的浓汤》中）它尖锐地指出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事件是

一个可悲的美帝国主义正在兴起：“我们已经跨过了共和国和帝国之间的界限。”另一篇作品是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写的不太受人注意的《疲惫不堪的世界的一个新模式》（1954年出版）该书大声疾呼反对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战争、征兵和帝国主义。布罗姆菲尔德颇有信心地写到帝国主义和不发达国家的革命：

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对外政策最大的失败之一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在世界各地总是和欧洲的一些古老的、注定要灭亡的、腐朽的殖民帝国主义小国站在一起，这些国家曾经一度对世界上许许多多国家进行剥削 进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治。……只要我们依然站在欧洲经济殖民制度一边，那些起来造反的觉醒了的人民……就决不会信赖我们，或者以任何形式同我们合作。欧洲经济殖民制度，即使在资本主义模式中，也代表着封建主义的最后残余……我们没有给这些觉醒了的人民留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他们只能到俄国人和共产主义那里寻找安慰，寄希望于乌托邦。

关于美国的冷战政策，布罗姆菲尔德指责说：

很显然，我国的战争贩子和军人认为……所有其他国家都是不重要的，只要美国或俄国想发动战争，就可以把这些国家踩在脚下……这伙人（战争贩子和军人）好象毫不关心生活在我们和俄国之间的那些国家的人民将是最大的受害者……欧洲国家日益增长的“中立主义”只不过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文明的反应；不管从哪方面来考虑，从俄国固有的软弱到我们自己的干涉和侵略等全部因素都包括在内来考虑，都是合法的……朝鲜的局势……一直要等到我们从那块我们无权逗留的土地上全部撤出，并让那个地区的人民自己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后才能得到解决。

这几段引文给人一种遥远的时代感，使人难以置信这种观点竟然会左右着美国右翼人士。现代的右翼人士实际上已经把自己过去的立场从记忆里抹掉了，对他们说来，这种观点在今天至少应被贴上“对共产主义手软”的标签。右翼人士的这种根本转变也能够从布里克修正案的命运中观察到。仅在十年前，布里克修正案

还是右翼最重要的对外政策纲领，是经常构成其群众基础的那些“穿着网球鞋的小老太太们”所钟爱的。恢复了活力的保守主义运动，以及体现了其政治主张的戈德瓦特运动之所以完全埋葬了布里克修正案，是因为，该修正案不但没有提出最重要的或最理想的对外政策，反而表露出了“孤立主义”的倾向，担心政府机构的扩大将对个人产生影响。这些同当今的新右派没有丝毫关系。

但是，许多左派在文章中依然把今天右派的主要麻烦说成是它的“孤立主义”，说右派主张取消对外援助，解除在国际上承担的义务。另一些左派则声称，右派反对共产主义只是披在其自由放任的经济观点上的外衣。如果说这就是美国右派当前的立场的本质，那再没有比这更错误的分析了。因为实际上美国右派的立场正好相反：今天的右翼正满怀激情地、甚至狂热地献身于一个压倒一切的目标，所有其他可能出现的目标都从属于这个目标：用核武器来消灭苏联。这才是新右派的本质，只有从这里才能看清新右派的彻底转变。正如新右派的一位主要理论家经常说的那样：“我有一个幻想，一个对未来的伟大幻想——即彻底摧毁苏联。”简单地说，正是这种幻想使保守主义获得了新生。

使右翼抛弃了自由意志论并促使它转变的因素，完全是歇斯底里的反共主义。右翼的推论是：对自由存在着两种“威胁”：来自国内社会主义的“内部”威胁，和来自苏联的“外部”威胁。最重要的是外部威胁。因此，现在必须全力以赴战胜和摧毁这种“威胁”。在把着眼点从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转移到共产主义作为“敌人”的过程中，右翼在一定程度上没有看到真正的“外部”威胁并不是苏联，而是干涉全球事务的、好战的对外政策，尤其是用来支持这种政策的破坏性极大的核武器。他们也没有看到，这种干涉全球事务的对外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是美国。总而言之，他们没有看到中央集权下经济统制对自由的“外部”和“内部”威胁实质

上都来自国内。

在歇斯底里的反共情绪的压力下，尽管右翼喜欢把仁义道德挂在嘴上，但他们也模仿起共产主义者，实际上抛弃了所有道德原则，而只是坚持一条，即消灭国内外的所有反对派。共产主义的不道德并不是因为它无比凶狠和残暴，而是由于：对共产主义者来说，在维持和发展共产主义制度这一压倒一切的目标面前，所有其他道德原则都是可以牺牲的。右翼也同样地把消灭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国家作为它唯一的和压倒一切的目标，所有其他考虑都必须让路。可是，看来还存在着一个极为重要的差别。共产主义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在毁灭性的核武器面前，各国必须和平共处，社会变革只能通过各国内部的变化来实现，因为在国家内部，冲突的规模相对来说要小一点，要受到一些限制。右翼不但没有接受这个教训；相反地，现代武器越是可怕，右翼就越发疯狂地决意要进行全面战争。这似乎是、而且无疑地是一种疯狂的立场，但这恰恰是今天右派的立场。

当然，战争本身从来就不是人们所需要的。举例来说，假如俄国同意无条件投降，希特勒也就不会攻打苏联了。假如赫鲁晓夫和他的政府辞职并让美国占领军比方说进驻苏联，右翼也就不会对俄国发动一场氢弹战。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只有无条件投降才会使右翼满足，使它放弃核攻击。右翼怎样为这个明显荒谬的和疯狂的立场辩解呢？难以理解的是，其基本理由却是属于神学的和基督教的，甚至是天主教的。因为，右翼的群众基础，除了东部城市外，是信奉原教旨主义的新教徒，而其有知识的领袖们却大都是天主教徒或“原始天主教徒”^①。其理由是，人们愿意为了一个崇高的原则而去毁灭世界和人类。正如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右翼的最高原则是消灭共产主义者，因为右翼有时毫不掩饰地，至少是在他们的心里，认为共产主义是魔鬼，是魔鬼在世界上的代理人。

总之，如果人们不朽的灵魂将永存不灭，毁灭世界又有什么关系呢 正如新右派的主要宣传员所说过的：“如果我不得不‘按电钮’，我会毫不犹豫地按动它，因为我坚信我是正确的。”那些不愿对毁灭世界采取这种轻率态度的人，被指责为胆小鬼，而且是信奉无神论的胆小鬼，因为在伟大原则面临紧要关头的时刻，只有无神论者才会死抱住“纯肉体的生命”不放（我不是天主教徒，所以不得不让别人从神学的角度来批驳这个立场。可是，当我听到教会对于集体自杀和集体谋杀表示赞同时，我感到惊讶。）

另一个奇怪的理由是有名的“要么赤化要么死亡”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的论调。其实，对美国来说，这种僵硬的选择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许多左派提出来的“要么作共产主义者要么作法西斯主义者”的选择一样，没有丝毫实际意义。至少还存在着另一种选择，即：和平共处和共同进行核裁军。而且，宁愿死也不赤化实际上等于自杀，而自杀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一种深重的罪孽。最后，这种非此即彼的论调无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全世界大约有十亿人民，目前正生活在共产党国家中，每天宁愿赤化，而不愿自杀。这里难道没有发人深省的东西吗？消灭这些人，其中包括无数的美国人在内，从而“解放”这些宁愿赤化而不愿死亡的人们，难道有什么意义吗？使用暴力迫使他们改变自己的选择，放弃生存去死，这合乎道德，合乎基督教教义吗？总之，让美国保守主义者去消灭成千上万的俄国人、波兰人等等，通过谋杀去“解放”这些宁愿生存的人们，这合乎道德，合乎基督教教义吗？

右翼的论点中还隐含着这样一种观点，即魔鬼是万能的；一旦共产主义“接管”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完了，其人民也就划归了阴司地府。很明显，这是对人类所抱的一种极为悲观的看法。自由意志论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不能为工业化的社会提供可行的经济制度，这更加暴露了右翼观点的荒谬可笑。右翼还无视这样

的事实，即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共产党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俄国和许多东欧国家实行了相当可观的自由化，它们越来越重视私营企业。共产党中国最近对南斯拉夫究竟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表示关注这件事，足以证明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在这块共产主义的土地上勉强而轻率地撤退感到惊恐。耐人寻味的是，右翼经济学家和策略家中没有一个人愿意自找麻烦去考虑这样一个确实十分重要的问题，即：如果俄国——在现在或任何其他时候——向美国军队投降的话，人们将怎样使俄国非共产主义化？我相信，非共产主义化是可以实现的，其方法与南斯拉夫采用的方法相类似，但要彻底和坚决得多。关键是右翼对这个问题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再一次表明，右翼关心的主要是核战争。根据右派的看法，非共产主义化将不是通过俄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民改变自己的思想意识和行动来实现，而是要把他们消灭掉才能实现。

右翼把所有其他的目标和原则全部从属于反共核战争的证据，比比皆是，唾手可得。正是这种可憎的欲望，驱使右派迫不及待地拥抱每个“反共”的独裁者，而不管他多么凶暴残忍，双手沾满人民的多少鲜血。一个恰当的例子是，威廉·F·巴克利在《国民评论》杂志上从自由意志论的角度站出来为南非法西斯政权辩护。同样地，蒋介石、佛朗哥、李承晚以及最近的吴庭儒夫人，也都受到了极为热情的对待。这不仅仅是为了“反对共产主义的战争”这一眼前目的而勉强地对他们表示欢迎。右派在战争歇斯底里方面要比这走得更远。因为这些独裁者对待共产党及共产党嫌疑分子的政策要比民主国家的政策“强硬”得多。吴庭儒夫人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和极权主义者，触动了每一个右翼宣传员的心。再没有比这种镇压大多数教徒，并把农民象牲畜那样赶进集中营，凭棍棒把他们同“共产主义”隔离开来的办法更“强硬”的了。右翼丝毫没

有感到这种政策并不比共产主义本身更好些，尽管他们时常喜欢自诩自己搞的是“保守主义—自由意志论”运动。具有悲剧性的讽刺意味，而且令人不可置信的是，一场在不太久的过去兴起的运动，开始时是那么热烈地追求人类自由，最终竟成了一位夫人的拉拉队。右翼现在究竟怎样看待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在其最得意的时候算得上是“最最强硬”、“最最粗暴”的反共分子？人们提出这个问题也许不太过分吧？！

在国内事务方面，有关自由市场的辩论已成了饭后茶余的闲谈。确实，放任主义的美好前景现在对美国的新右派所起的作用，正与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物质将无限丰富的美好前景对斯大林所起的作用相同。在奴役和剥削苏联人民的同时，斯大林端出了一个物质丰富的乌托邦的光辉未来，使得目前的牺牲显得确有价值。今日的右派则端出了在共产主义者被消灭后终将会获得自由和自由市场的美好前景。在一场浩劫之后，假如在民防掩蔽所中还有幸存者，大概将会允许他们参加自由市场的各种活动，条件当然是在这同时不能出现其他“敌人”。

这种把全部考虑都从属于反对共产主义的做法，导致了右翼所有无法让人理解的倒退。例如，现在最高法院由于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相反的原因正在受到猛烈的攻击：因为它阻碍了国家侵犯个人自由。最高法院法官弗兰克福特，曾一度被右派攻击为暴政的实际鼓吹者。而如今，右派却向他欢呼，赞扬他的稳健而又实际的保守主义，赞扬他不干涉对共产党人的迫害，能迫害共产党人当然也是保守主义的功劳。社会民主党人和推行新政者，如《新领袖》周刊、西德尼·胡克、参议员多德、乔治·米尼以及其他等人，由于“强硬反共”而受到了右派的赞扬。《新领袖》周刊同右派合作出版亲蒋的宣传文章，表明了社会气氛正在发生变化，社会气氛的这种变化改变了所有关于“右”和“左”的旧概念，而这些概念

还依然如故地在政治论述中使用着。

最后，看一下“美国青年争取自由组织”在政治方面所关心的事，是颇有教益的。该组织实际上是国民评论社从事政治活动的机构。据我所知，它从未进行过一次有利于个人自由或自由市场的政治行动；相反，它搞的政治行动是：加强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并使之永远存在，要求封锁古巴，反对禁止核试验协定，恢复公立学校中的祈祷，提倡地方法令和各个“卡片组织”强行干涉商店出售共产党国家生产的物品——所有这一切几乎没有哪一项是对维护自由市场有利的。我认为，对以上概括来说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对减少纽约州纽伯格的救济金所表现出来的无限热情，但这种热情不可能同所涉及的种族问题毫无关系。

同美国右派政治方面的转变相连的是出现了一种哲学方面的转变。我认为这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后者大力支持前者，使前者得以长存。保守派思想家们的立场差别很大。但他们共同的一点是：坚决反对人类的理智，反对个人自由，反对教会和国家分离，反对所有源于古典自由立场的事物。遗憾的是，这里的篇幅不容许对当前保守派的立场作全面讨论：其实，它基本上是十九世纪早期保守主义基本原则的回潮。我们必须认识到现代历史上的伟大事件是古典自由对旧秩序的革命，这场“革命”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放任主义的经济，个人自由，教会和国家的分离，自由贸易和国际和平，反对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和军国主义。其伟大体现是十八世纪后期的三大革命：工业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每个革命按照自己的方式都是总的古典自由反抗旧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

保守主义在法国、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地方作为一种自觉的反动力量而出现，它企图粉碎这场革命，并比过去更为系统化地恢复旧秩序。该秩序的实质可以用一句名言“宝座加圣坛”来概括。简

言之，旧秩序是由英国圣公会或法国天主教会寡头政治集团的统治组成的。就象保守主义者们所阐述的那样，这种秩序认为无比重要的是（体现在国家中的）“社会”由教会和国家联合实行的神权政治、民族主义和战争的作用、受制约的“道德规范”以及个人对国家的服从。在哲学上，理智常常因为纯洁的传统信仰而受到嘲弄。

乍一看，似乎这种老保守主义同今天美国的保守主义毫不相干，但我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的确，美国的保守主义者很难在美国找到一个合法的君主。但是，他们却在尽力地去寻找。首先，当前美国的右翼特别迷恋于欧洲的君主政体，热衷于复辟哈普斯堡王朝。原始天主教保守主义者的一位领导人依然在为“大洋那边的国王”举杯祝酒。弗雷德里克·威廉森明确地认为圣斯蒂芬的王冠代表西方文明的顶峰。拉塞尔·柯克看来则赞成英国圣公会的保守党地主政治。在各方面，梅特涅、斯图尔特皇室以及后来的伯克都已经取代自由意志论者而成了历史上的英雄。但要为美国设置一个国王确系难事。保守主义者不得不救助于历史上的人物或制度，聊以自慰。他们抬出了主张实行经济统制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渴望恢复南方的奴隶制度。威尔穆尔·肯德尔在国会中找到了神化了的保守主义，坚持认为，希腊社会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不接受苏格拉底的令人不愉快的诘问。在右派中，“开放的社会”到处都在受到谴责，而强制的道德则得到肯定。右派希望上帝回到政府中。自由言论受到怀疑而且不被信任，军人被誉为最伟大的爱国者，对征兵表示坚决拥护。西方帝国主义被宣扬为对付落后人民的最恰当的办法。朝圣者都被引向佛朗哥的西班牙去接受那里的政府体制的灵感。总之，在各方面，理智被贬低了，按传统和习惯办事却被捧为人们应遵循的准则。

的确，大部分现代的保守主义者并不象他们的前辈那样，希望

摧毁工业体制，返回到小农场和愉快的手工业时代——虽然在当代的保守主义中还有这种思想的强烈痕迹。但是，总的说来，当前的保守主义者对自由市场经济极端冷淡；他们对武器合同造成经济严重畸形，对外贸易受到严重限制毫不在意；他们不能容忍削减预算，因为这将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军事优势。其实，欧内斯特·范登哈格和威尔穆尔·肯德尔等保守主义领导人在经济方面都公开主张实行凯恩斯主义。最终，一切都必需从属于国家，正如威廉·F. 巴克利所宣称的那样：“在个人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必须优先考虑国家的利益。”一位对保守主义运动素有研究的人士评论说：“这可真是放任主义！”确实，这是怎样一种放任主义呵！现代保守主义的纲领已退化到这步田地，其首要目标是迫使美国人民接受当代美国版的“宝座加圣坛”式的统治，因循守旧，关闭自守，把一切都贡献给摧毁共产主义这个压倒一切的目标，甚至用核武器毁灭人类也在所不惜。

那末，右派中老自由意志论者的情况又怎样呢？他们大部分在右翼的转变过程中被淹没了，一般说来，这是因为没有能替他们说话的人，他们不了解所发生的事情的性质和意义。人们普遍认为，当前存在着一种声势浩大的保守主义与自由意志论相结合的运动，不管保守主义者偏离自由有多远，他们本质上仍是自由意志论的同盟者——都站在光谱的同一端，与社会主义相对立。老自由意志论者被这种看法弄得茫然不知所措，而实际上这种看法却是前面提到的“文化时滞”的产物。老右派可能曾经是信奉放任主义的自由意志论者的天然同盟者，但新右派的情况则完全不同。

自由意志论者也许最需要从历史方面吸取教训，从而意识到保守主义一直处于同古典自由主义相对立的另一极上。相反，社会主义并不是上述两者的对立面。我认为，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杂乱无章而相互矛盾地结合在一起的很合物。因为，

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屈从于工业革命的一个运动，试图利用集体主义的保守的方法来达到自由主义的目标。它试图利用集体主义、机体主义^①、等级制度等适用于工业社会的保守主义方法达到和平、自由、以及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理想。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折衷的教义来说，一旦抛弃了和平和自由的自由主义理想，很容易变成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彻底转向保守主义一边。

弗兰克·S·迈耶先生是鼓吹保守主义和自由意志论相溶合的主要人物。他要我们忘却十九世纪，忘却“法国大革命的破坏带来的后果”超越“十九世纪狭隘的纷争”而着眼于十九世纪以前的时代。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对迈耶的论点当然是很有利的，因为这样一来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运动的全部意义也就荡然无存了。关键就在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形式和教义恰好都是在十九世纪形成的，这是新旧秩序之间互相斗争的结果。恰恰由于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十九世纪的历史上，才使我们得知今天各种“主义”的真正起源，使我们看清了试图把保守主义和自由意志论溶合在一起的作法的荒谬和可笑的本质。

确实，有迹象表明，思想家们已开始从各方面意识到旧结构正在瓦解。美国政治中老“左派”和老“右派”的旧框框已经过时，不可能把自由意志论者同老保守主义的残余分子溶合在一起。自由意志论者正在开始提出抗议；著名的右翼学生杂志《新个人主义者评论》的总编辑罗纳德·哈莫威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有名的文章，尖刻地攻击巴克利的保守主义哲学和政治以及《国民评论》。瓦白什学院的院长本杰明·罗格写了一篇评论新保守主义的很有见地的文章。霍华德·巴菲特呼吁结束征兵制度。但总的说来，《新个人主义者评论》还是相信保守主义和自由意志论能够结合在一

^① 机体主义(organicism)认为社会是一有机的整体，不能把各部分分割开来考虑。——译者

起的，因而很明显地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自由意志论者的“自由学派”的头头罗勃脱·利菲弗，在一篇笔锋犀利的文章《那些提出抗议的人们》中指出并攻击了右翼的转变。著名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从另一角度对冷战和所得税提出了强烈抗议。也许条件确实已经成熟，我们国家的各种思想意识即将发生根本性的大改组。

注 释

“原始天主教徒”是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派别，过去一直未受到人们的注意。他们用天主教徒的语调写文章和讲话，几乎比天主教徒还要虔诚和容不得异教，但是他们又从未加入天主教会。

9. 对国家的剖析

默里·N. 罗思巴德

国 家 不 是 ……

人们几乎普遍地认为国家是提供社会公益服务的机构。某些理论家还把国家尊为社会的最高表现形式；也有人认为，对于达到社会目的来说，国家的效率虽然常常较为低下，但它仍不失为令人感觉亲切的机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国家是达到人类各种目标的必不可少的工具，是对付“私营部门”的工具，在斗智的竞争中往往获胜。由于民主主义的兴起，国家更加被看作是同社会相一致的东西，以致人们常常听到诸如“我们就是政府”这样一类的说法，而这实际上是不合常识和情理的。这里，“我们”这个颇有用途的集合代词，被用来作为思想意识的伪装，披在实际政治生活的外面。如果“我们就是政府”，那么政府对个人所做的每件事，不但公正，而且毫无暴虐可言，对所涉及的个人也是完全出于“自愿”的。如果政府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欠下了一大笔公债，需要向另一部分

人征税来还债 那它就可以说“我们是还自己的债”以此来掩盖这种税负的真相。如果政府征召一个人入伍，或把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送进牢房 那它就可以说这个人是“自己要这样的”因此 也就毫无不妥之处。根据这种逻辑，被纳粹政府杀害的犹太人都不能算作被谋杀 而应看作是“自杀”因为他们就是政府（政府是他们民主选举出来的）。因此，政府对他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在他们这一方都是自愿的。人们不仅认为没有必要去驳斥这一看法，而且绝大多数人还不同程度地持有这种荒谬的看法。

所以 我们必须着重指出，“我们”并不是政府 政府也不是“我们”。从确切的意义上讲 政府并不“代表”大多数人。^①就算它“代表”大多数人，甚至是百分之七十的人民作出决定要谋杀其余百分之三十的人民，这还是一种谋杀，被杀害的少数人也决不会认为自己是自愿的自杀。^②我们不能容许“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之类妄图把水搅混，毫无实在意义的陈词滥调，掩盖上述基本事实。

如果国家并不是“我们”，并不是为解决相互间的问题而聚合在一起的“人类的大家庭”并不是联谊会 也不是乡村俱乐部 那它究竟是什么呢？简言之，国家是这样一种社会组织，它试图在某一特定地区内维持其使用武力和暴力的垄断权；尤其是，它是社会中唯一能够凭借高压统治，而不是通过人们的自愿捐款或对其服务的报偿而获得收益的机构。其他个人或机构获得收入的方法是生产货物和劳务，以及和平地、自愿地向他人出售这些货物和劳务，而国家获得收入的方法却是使用强制手段，也就是使用或威胁使用监狱和刺刀。^③在使用武力和暴力获得了收入后，国家通常会进一步限制和左右国民的其他活动。人们也许以为，只要简单地观察一下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历史，就足以证明上述论断；但由于种种骗人的鬼话象瘴气那样长时期地掩盖了国家的各种活动，我们必须详尽地加以剖析

国家是 ……

人来到世界上总是赤条条，一无所有。他必须运用自己的头脑学习怎样获取大自然赋予的资源，把它们转变成（即通过“资本”投资的方式）各式各样的东西，并把这些东西搬运到人们能够利用的地方以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人们能够采用的唯一办法，就是运用自己的头脑和力气去转变资源（即“进行生产”），并用所得到的货物去换取别人生产的货物。人们发现，通过自愿的相互交换，所有参加交换的人的生产力以及他们的生活水平，都会得到巨大提高。因此，人类生存和获得财富的唯一“自然”途径，是运用他的头脑和力气于生产—交换的过程中。首先，他要找到自然资源，然后要改变它们的形状（即如洛克所说的让这些资源“同他的劳动相混合”）变成他个人的财产，最后拿来同别人交换用同样方式获取的财产。因此，由人类的天性决定的社会道路，是“财产所有权”的道路，是自由转让或交换这种权利的道路。通过这条道路，人们学会了避免采用“弱肉强食”的办法去获取稀少的资源，以致甲只能在牺牲乙的情况下获得它；而代之以在和平融洽的生产和交换中大幅度地增加这些物质资源。

德国伟大的社会学家弗朗兹·奥本海默曾经指出，在获得财富方面，有两种互相排斥的方法；其一就是上述生产和交换的方法，他称之为“经济手段”。另一方法比较简单，它并不需要生产力；它只是使用武力和暴力攫取他人的财物和劳务。这是单方面没收或盗取他人财物的方法。奥本海默把这称为“政治手段”。必须弄清，和平地运用人的智慧和力气于生产，是人类应遵循的“自然”的道路，也即人类在地球上得以生存和繁荣的方法。同样必须弄清，高压的剥削手段是违反自然法则的；是寄生性的，因为这不但不增加生产，反而减少生产。利用“政治手段”使产品为寄生的

和具有破坏性的个人或集团所吮吸，不但会减少生产品的数量，而且还会打击生产者的积极性，使他们不愿生产超过自身生存所需要的东西。从长期来看，这个强盗由于减少或消灭了自己的供应来源，也就断绝了自己的生路。不仅如此，即使从短期来看，这个掠夺者的所作所为也完全违反他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真正本性。

现在我们可以较为全面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国家是什么？根据奥本海默的说法“国家是运用‘政治手段的机构’它对某一地区进行有组织的掠夺。”^④因为“犯罪充其量只是零星、偶尔发生的寄生是暂时性的，采取高压手段借以寄生的生命线可能随时被起来反抗的受害者切断。而国家则为掠夺私有财产提供了合法的、有秩序的、有系统的渠道；它给社会上的寄生阶层提供了某种可靠的、较为‘和平’的生命线。”^⑤既然生产总是先于掠夺，所以自由市场也必先于国家。国家从来不是通过“社会契约”创造出来的；它总是在征服和剥削中产生。古典的范例是，战胜的部落总是使用那种由来已久的办法，掠夺和杀戮战败的部落，后来他们认识到，如果容许被征服的部落存在，允许他们进行生产，让征服者作为统治者定居在他们中间，强迫他们缴纳年贡，则可以延长掠夺的时间，使之更加牢靠，也使形势更加令人满意。^⑥以下描绘的是产生国家的办法之一：在“鲁历塔尼亚”南部的山区中有一伙土匪，他们占山为王，最后，土匪头子自封为“独立的南鲁历塔尼亚的君主”，如果他和他的部下有力量维持他们的统治一段时期，嗨，你瞧，一个新的国家便加入了“国家大家庭”的行列，过去的土匪头子摇身一变，成了该王国最正牌的贵族。

国家怎样保存自己

一旦建立了国家，统治集团或“特权阶级”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维持其统治。^⑦虽然可以随时采用武力，但他们所面临的基

本的和长期的问题是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因为，为了继续执政，任何一个政府（不单单是“民主的政府”）必须获得大多数国民的支持。必须指出，这不一定是积极、热情的支持，完全可以是消极的屈从，就象对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那样。但这种支持必须是某种意义上的承认；不然，处于少数地位的统治者最终将会被广大群众的积极反抗所推翻。因为掠夺必须有剩余产品作为支持，所以，构成国家的阶级（即专职的官僚和贵族）必然在国家中是极少数。虽然他们肯定会在一些重要的阶层中收买同盟军。因此，统治者的首要任务一向是获得大多数人的积极的或消极的承认。③

当然，寻求支持的办法之一是创造既得经济利益。因此，国王不能单独进行统治；他必须拥有大批享有特权的追随者，即国家机器的成员，如专职官僚或已加封的贵族。④但这仍然只能获得少数趋炎附势者的支持，即使用小恩小惠或其他特权来收买广大群众，也仍然不可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为了获得广大人民的承认，必须通过思想意识手段使大多数人相信，他们的政府是好的，明智的，至少是不可选择的，肯定优于想象中的其他选择对象。

“知识分子”的头等重要的社会任务，就是在人民群众中宣传这种思想。因为人民群众并不创造他们自己的思想意识，对这些思想也不进行独立的思考；他们只是消极地追随知识分子所信奉和传播的思想。所以，知识分子是社会的“意识塑造者”。因为国家极为需要的正是这种对意识的塑造，因而很明显，国家同知识分子之间的历史悠久的同盟关系是有其基础的。

国家需要知识分子这一点是很明显的；而知识分子为什么需要国家，则不太明显。简单地讲，知识分子在自由市场中的生活处境从来是不安定的；因为知识分子必须依靠群众对他们的估价和选择，而群众一般对理性方面的东西则毫无兴趣。相反，国家却愿意为知识分子在国家机器中安排一个牢靠而又永久的位置：有保

证的收入和显赫的地位。由于知识分子为统治者效劳，因而获得优厚的待遇，并成为统治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⑩

十九世纪，柏林大学的教授们渴望成立“霍亨索伦王室的智囊团”。这象征着国家同知识分子之间的同盟关系。今天，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谈到威特福格尔教授对古代东方专制政体所作的研究时说的一句很有启发意义的话：“威特福格尔教授所激烈攻击的文明社会，是一个能够使诗人和学者成为官吏的社会。”^⑪在无数的例子中，我们可以举最近出现的所谓战略“科学”这种科学是专门为政府的主要暴力机关即军事部门效劳的。^⑫此外还有一些令人尊敬的人物即官方或“御用”历史学家，专门向人们灌输统治者对自己或其前辈的行为的看法。^⑬

国家和知识分子用来诱导属民们支持其统治的论点是多种多样的。总的说来可以把这些论点归结如下：（甲）国家的统治者是伟大和英明的，他们“受命于天”，是“最优秀”的人，是“科学专家”与善良但头脑简单的老百姓相比要伟大和英明得多；（乙）由现存的政府来统治是不可避免的，是绝对必需的，它一旦垮台，将招致无法想象的灾难。教会和国家的联合是这些思想意识工具中最古老、最有效的工具之一。统治者的权力是上帝赐予的，或者，在东方专制政体的绝对统治下，统治者本身就是上帝；因此，反抗他的统治就是亵渎神明。在这里，受国家雇用的僧侣所起的作用基本上和知识分子一样，都是为统治者笼络人心，寻求人们的普遍支持甚或崇拜。^⑭

另一种颇为成功的办法，是向人们灌输一种对任何其他统治制度或无统治状态的恐惧心理。据认为，现在的统治者是人民不可缺少的，它保护人民不受少数犯罪分子和强盗的侵袭，对此，人民应深表感激的确，国家为了维持它对人民进行掠夺的垄断地位，总是尽力减少民间的、无组织的犯罪行为；国家唯恐失掉已经

获得的利益。特别是，最近几百年来，国家成功地向人民灌输了对其他国家的统治者的惧怕心理。地球上的土地已经一块块地划归各个国家所有。因此，国家理论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把国家同它所统治的领土等同起来。因为大多数人都热爱自己的祖国，所以把国土及其人民同国家等同起来，可以使天然的爱国主义为国家服务。如果“鲁历塔尼亚”受到“沃尔达维亚”的攻击，国家和它的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是让“鲁历塔尼亚”的人民深信，敌人攻击的矛头是针对他们的，而不单是针对统治阶级的。这样，一场统治者之间的战争便转变成了一场两国人民之间的战争。人民奔赴战场，保卫他们的统治者，却错误地认为是统治者正在保卫他们。只是在最近几百年里，这种“民族主义”的手法才在西方文明社会中取得了成效。就在不太久的过去，广大人民还把战争看作是与自己无关的、贵族之间的战争。

几百年来国家挥舞的思想意识方面的武器，是多种多样，神秘莫测的。其中一个绝妙的武器便是所谓传统。一个国家存在的年代越久，这种武器就越有威力。因为这样一来，某个王朝或某个国家便有几个世纪之久的传统作为其坚强的后盾。^⑮由此，对祖先的崇拜，也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对古代统治者的崇拜。对国家来说，最大的威胁莫过于无党派知识分子的批评。压制这种批评的最好方法是，谁提出与众不同的思想，谁对现存统治表示怀疑，就说谁亵渎祖先，大逆不道。思想意识方面的另一有效措施是贬低个人，抬高社会集体。既然任何一种统治都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承认，因而在意识形态方面对这种统治的威胁最初只能来自一个或少数几个善于独立思考的人。新的思想，更不必说批判性的新思想，开始时必然是极少数人的思想；因此，国家必须嘲弄任何与众不同的思想，把它消灭于萌芽状态中。由此，“你得听弟兄们的话”或“你得顺应社会”等劝告便成了压服个别持不同意见者的

思想武器。^⑮采用这种方法，群众将不会知道皇帝的衣服是不存在的。^⑯

国家要使其统治看上去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即使它的统治并不受欢迎，也要使人们消极地顺从，就象人们通常把“死亡和捐税”联系在一起那样。为了做到这一点，可以宣扬天命论，以对抗个人的自由意志。如果我们受某王朝的统治，那是由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或神的意志或上帝、或物质生产力决定的，任何一个渺小的个人都无法改变这种天命。国家还应使其臣民厌恶“历史上的谋叛学说”。因为对“谋叛”感兴趣，必然会使人们追根究底，探究到底谁应该对历史罪行负责。不管怎样，假如国家、或贪污腐化、或侵略战争强加于人民的任何暴政不是由国家统治者造成的，而是由神秘的“社会力量”造成的，或是由世间本身的缺陷造成的，或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对其负有责任（正如一条标语上所写的“大家都是杀人犯”）那末，人们就不必对这种罪行感到气愤，也不必起来反抗它，而且抨击“谋叛学说”将使国民变得更易于相信国家在施行任何暴行时列举的“大众福利”方面的理由。“谋叛学说”会使公众怀疑国家的思想意识宣传，从而动摇国家的统治。

另一种实践证明是可取的、能使国民顺从某人意志的办法是，使人们具有一种负疚的心理。攻击私人财富的增长为“贪得无厌”、“实利主义”或“极度的富裕”，攻击赚取利润为“剥削”和“放高利贷”，指斥互利交换为“自私”，由此人们总是得出这样的结论：应该把更多的财富从私人手中转移到“公家”那里。负疚心理使公众甘心情愿这样。尽管每个人都醉心于“私欲”，但人们却认为国家的统治者未能参加互利的交易，是因为他们把全部精力放在更高尚、更神圣的事业上——寄生性的掠夺在道德上和在美国上显然比和平的生产活动更高尚。

在当今较为世俗的时代，国家的神圣权利上又加上了一个新上帝，即科学。国家的统治，现在被称为超科学的统治，是由专家们计划安排的。但是，尽管人们现在比以往几个世纪更多地把“理智”挂在嘴上，可这并不是个人的真正理智，个人也未能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办事；国家的统治依然是集体主义的和宿命论的，顺从的国民依然要从全局着眼，听从统治者的摆布。

科学术语日益广泛的使用，使受国家雇用的知识分子得以编造出种种谎言来为国家的统治辩护，而这种辩护在较为原始的时代只能受到人们的嘲笑。一个强盗如果把他的盗窃行为说成是帮助被盗人花钱以繁荣零售业，那他是不会得到人们赞同的；但不幸的是，如果他用凯恩斯的公式装饰其理论，大谈特谈“乘数效应”，则会有较多的人相信他的理论。因此，常识仍在被人蹂躏，每个时代都以自己的独特方式玩弄这套把戏。

由此看来，思想意识方面的支持对国家是生命攸关的。在思想意识方面，必须不断地向公众灌输国家的“合法性”，把国家的所作所为同盗贼的行径区分开来。这种对常识的不懈攻击并不是偶然的，正如门肯所生动描绘的：

一个普通老百姓 不管在其他方面有些什么错误的看法 他至少清楚地知道 政府与他以及他的大多数伙伴是不着边的 ——也就是说，政府是与他无关的、独立的、敌对的力量 只有一部分在他控制之下，可以给他带来很大危害。人们普遍认为 盗窃政府的东西同盗窃个人甚或公司的东西相比 罪行要轻一些。这一事实难道没有意义吗？……我认为 这一事实的深刻含义是 政府与受它统治的人民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抗。政府并没有被看作是选举出来为全体人民办事的公民委员会，而被看作是独立的、自治的组织 主要为自己成员的利益剥削广大人民。…… 某一平民被盗，一个好人便被剥夺了勤劳和节俭的果实而政府被盗 顶多是那些不干正事、游手好闲的人少一些花销罢了。从来没有人认为这些钱是他们挣得的 对头脑清楚的人来说 这种看法是相当荒谬可笑的。……¹⁸

国家如何超越职守

正如伯特兰·戴约文内尔所正确指出的，几百年来，人们造出了各种概念来阻止和限制国家的统治；但国家利用其同盟者知识分子，把这些概念一个一个地变成了橡皮图章，用以证明国家法令和行动的合法性。在西欧，神圣君权的概念最初意味着，国王只能按照神圣的法律进行统治；但国王们后来却把这种概念变成了神圣的橡皮图章，用以批准自己采取的任何行动。议会民主的概念最初是让民众用来限制绝对的君主统治的，但结果议会却成了国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的每一个行动都是至高无上的。正如戴约文内尔所总结的：“研究国家统治的理论家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限制性措施。但最终这些理论都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反而为国家帮了大忙，成了国家获取权力的跳板，因为这些理论向国家提供了无形的权力，而国家也就马上接受了这种权力。”¹⁹

一些较为具体的理论也是如此：在约翰·洛克的著作和“人权法案”中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已变成了统制经济制度下的“工作权利”功利主义本来是用来争取自由的现在则被用来维护国家对自由的侵犯，等等。

当然，在限制国家权力方面，最为雄心勃勃的尝试是“人权法案”，以及美国宪法中限制国家权力的其他条款。根据美国宪法，限制政府权力的条款是应该由独立于政府其他部门的司法机关加以解释的根本法。所有美国人都非常清楚，宪法中的这些限制在过去一百年是如何被无情地放宽的。但是，很少有人象查尔斯·布莱克教授那样敏锐地看到，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已在很大程度上把法院复审本身从限制性手段转变成了为政府的所作所为提供思想依据的另一工具。因为，如果司法机关裁定政府的某一行动“不符合宪法”将极大地限制政府的权力的话，那么，司法机关或明或

暗地认定政府的某一行动“符合宪法”，则将有力地促使公众接受日益增大的政府权力。

布莱克教授在他的分析中首先指出，任何政府要维持其统治，都必须获得“合法地位”。所谓合法地位是指大多数人基本上接受这个政府及其所作所为。²⁰在象美国这样的国家，获得合法地位是个很特殊的问题，因为在美国，“对政府的许多严格限制是由建立政府所依据的理论规定的”。布莱克接着写道，现在所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手段，通过它政府可以使公众相信，政府的权力不断增加确实是“符合宪法的”。他总结说，这就是法院复审的主要历史作用。

让布莱克来描述这个问题吧！

（对政府）最大的威胁是不忠和在老百姓中广为散布的愤懑情绪，以及政府本身道德权威的丧失，但政府却可以利用武力或惯性，或者由于没有吸引人的、可供立刻利用的替换对象，长期维持其统治。几乎每一个生活在权力有限的政府下的人，迟早都会受政府的某一行动的影响，而这种行动在每个人看来是超越政府权限的，是法律禁止政府采取的。一个人被征召，虽然在宪法中他找不到被征召的条例。……一个农民被告知他应该生产多少麦子，而这个农民认为，并且发现某些尊敬的律师也同他一样认为，政府告诉他该生产多少麦子，并不见得比告诉他女儿该嫁给谁拥有更多的权利。一个人被送进联邦监狱，只因为他说了自己想干什么。他在牢房里踱来踱去，背诵着……“国会不该制订剥夺言论自由的法律”。……商人则被规定出售酸奶所能收取的价格。

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威胁，即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谁不是他们中的一分子呢？）会把自己头脑中政府权力有限的概念，同（他所见到的）现实生活中政府大大超越这些限制的所作所为加以对照，从而就政府是否具有合法地位得出明显的结论。²¹

政府为了消除这种威胁，经常向人们灌输这样的理论，即总得要有某个机构来对是否符合宪法的问题作出最后的裁决，而这个机构不管怎么说应该是联邦政府的一部分。²²尽管联邦司法部门表面上的独立蒙蔽了大多数人，使人们认为它的裁决是神圣不可

侵犯的，但司法部门毕竟是政府机构的一部分，其人员是由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任命的。布莱克承认，这意味着政府在有关自己的案件中任命自己为法官，这就违反了作出公正裁决的基本司法原则。他断然否定有采取其他方法的可能性。²³

布莱克接着说：“因而，问题就在于建立这样一个能作出裁决的政府机构（它将很有把握地把人们的反对（反对政府在有关自己的案件中充当法官）呼声缩小到能够容忍的最低限度。做到了这一点之后，人们的反对，虽然在理论上依然站得住脚（重点是我加的），但实际上将丧失足够的力量，以致裁决机构替政府所作的辩护能够被人接受。²⁴

最后，布莱克认为，国家在有关自己的案件中总能胜诉，总能获得合法地位“有点奇迹的味道”。²⁵

布莱克教授在运用他的理论分析最高法院同“新政”之间的著名对抗时，严厉责备拥护“新政”的同行们在谴责最高法院阻碍新政的实行时目光短浅：

人们对新政和最高法院之间发生的事情的一般叙述 虽然很精确，但却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人们把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实行新政所遇到的困难上，而几乎忘记了事情的结局。事情的结局是（这正是我要强调的），经过大约二十四个月的阻碍……最高法院在人员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给新政盖了橡皮图章，承认了它的合法地位，由此，有关政府的概念在美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²⁶

就这样，最高法院平息了一大批美国人的反对呼声，这些人本来认为实行新政是与宪法相抵触的：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被说服了。那位主张实行宪法指导下的放任主义的快活的查理王子，依然触动着住在苏格兰高地的少数充满幻想的狂热分子的心。但现在已没有多少人怀疑国会具有管理国民经济的权力，即使有人怀疑，也构不成什么威胁了。我们只能通过最高法院来给予新政以合法地位。²⁷

正如布莱克所认识到的，大政治理论家约翰·C. 卡尔霍恩也早就认识到，在宪法对政府的限制中有一个大漏洞，即把最后的解释权交给了最高法院。卡尔霍恩并不满足于“奇迹”的说法，而是深入地分析了宪法问题。在《探究》一书中，卡尔霍恩阐述了国家想要打破宪法限制的内在倾向：

一部成文的宪法当然具有相当多的优点。但是 如果以为仅仅在宪法上写明限制政府权力的条款，而不授予这些条款所要保护的人以监督执行的权力，就足以防止大执政党滥用权力，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正是人类的宪法使政府成为保护社会所必需的工具。执政党将欣然接受宪法授予的权力，而反对对权力的限制……相反，较弱小的政党将会站在对立的一面，把这些限制看作是保护他们不受执政党侵害的必不可少的措施……但由于他们无法强制大政党遵守这些限制，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对宪法作严格的解释。……对此，大政党则主张对宪法作较自由的解释。……由此，便在对宪法的解释上展开了斗争——一方要尽力限制政府的权力，而另一个则尽量扩大政府的权力。当一方具有政府的全部权力来把它的解释付诸实施，而另一方却被剥夺了实施其解释的全部权力时，面对大政党的较自由的解释，小政党的严格解释又能有什么用处呢？在力量如此悬殊的斗争中，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主张限制政府权力的政党将会被打败。……结果，宪法将遭到践踏……对政府的限制将成为一纸空文，政府将拥有无限的权力。²⁸

J 艾伦·史密斯教授是赞赏卡尔霍恩对宪法的分析的少数几个政治科学家之一。史密斯指出，宪法本来试图通过控制和平衡来限制政府的权力，但后来却出现了最高法院，它垄断了对宪法的最后解释权。假如创建联邦政府是为了制止各州对个人自由的侵犯，那么谁来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呢？史密斯认为，宪法之所以采取‘控制和平衡’的方法 是因为有这样一种观点 即认为不会授予政府中的任何一个部门以最后的解释权：“人们不会允许新政府去限定自己的权力，因为这会使政府而不是宪法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威。”²⁹

卡尔霍恩提出的解决办法（在本世纪得到了史密斯等人的支持）即著名的“一致多数”原则。如果国内少数人，特别是某一个州的政府认为联邦政府越权侵犯了他们，则他们有权否决联邦政府的某一权力，宣布其为不符合宪法。对于州政府来说，这一原则意味着州政府有权“废除”联邦政府的某一法律或规定。

从理论上来说，由此建立起来的符合宪法的制度将保证联邦政府制止各州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同时各州也将制止联邦政府对个人滥用权力。然而，尽管各种限制将无疑地比目前更为有效，但卡尔霍恩的解决办法仍存在许多问题，实行起来仍有许多困难。如果允许某一下属利益集团对有关自己的事项拥有否决权，那为什么只停留在州这一级上呢？为什么县、市、区等各级机构不能拥有否决权呢？更进一步来看，利益不仅是地区性的，它们也可以是职业性的、社会性的等等。面包师傅、出租汽车司机或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又将怎样呢？难道他们就不该对自己的生命财产拥有否决权吗？问题的关键正是这一理论只允许政府机构本身拥有否决权。我们不能忘记这样一点，即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以及它们各自的分支机构都属于国家这个范畴，它们是受国家利益支配的，而不是受公民利益支配的。怎样才能阻止卡尔霍恩的方法走向反面呢？也就是说，怎样阻止各州对其公民实行专制统治，而不是只有当联邦政府试图出面制止各州的专制统治时，才对联邦政府运用否决权。怎样才能阻止各州默认联邦政府的专制统治呢？怎样才能阻止联邦政府同州政府相互勾结共同剥削公民呢？即使民间职业团体在政府中占有一席“职务上”的代表资格，又怎样才能阻止他们利用国家来为自己谋私利，或怎样才能阻止他们强行约束其成员呢？

简言之，卡尔霍恩并没有更深入地探索一致理论；他并没有亲自把这一理论推论到个人。假如最终应保护的是个人的权利，那

末首尾一贯的‘一致’理论就应该使每个人都拥有否决权 也就是实行某种‘一致原则’。卡尔霍恩写道“若没有所有人的一致同意 政府是不可能行使其职能的。”他无意中说的这句话 也许恰巧证实了上述结论。^⑳但是，这样的推理却会使我们偏离所要讨论的问题，因为如此推论下去必然涉及政治体制问题，而政治体制并不等于“国家”。^㉑其理由之一是，如果州拥有否决权意味着它同时有权脱离联邦，那么个人拥有否决权则意味着他同时有权“脱离”他所居住的国家。^㉒

因此，国家总是很巧妙地避开一切限制，扩大其权力。由于国家的生存有赖于对私人资本的强行没收，由于它的扩张有赖于不断扩大对个人和私人企业的侵犯，所以我们不得不说，国家生来就是反资本主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立场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正相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执行委员会”——在今天，即资本家的执行委员会。而我们认为国家——政治工具的组织形式——构成并产生了“统治阶级（或更确切地说，统治阶层），它永远反对真正的私人资本。我们可以引用戴约文内尔的话来说明这一点：

只有那些除了对自己生活的时代以外对别的时代一无所知的人，那些对几千年来权力的行为方式毫无所知的人，才会认为这些活动（实行国有化，征收所得税等等）是实行某种理论的结果。这些活动实际上是权力的正常表现形式，在性质上同亨利八世没收寺院没有丝毫不同。同样的原则在起着作用：对权力的追求和对财富的垂涎。在所有这些活动中，存在着同样的特征，其中包括分赃者的飞黄腾达。不管权力是社会主义的还是非社会主义的，它总是要同资本主义的权威发生冲突，使资本家丧失其积累起来的财富 在这样做的时候 它只服从自身的规律。^㉓

国家害怕什么

国家最害怕的当然是对它的权力和存在的根本威胁。主要有

两种方法可以导致一个国家的灭亡：一是被另一个国家所征服，一是被本国人民的革命所推翻——简言之，或者是被战争消灭或者是被革命消灭。国家的统治者必然会作出最大的努力，对人民开展最强大的宣传攻势，来对付战争和革命这两种主要的威胁。如上所述，必须想方设法动员人民保卫国家，让他们相信，他们是在保卫自己。当在那些不愿“保卫”自己的人们面前挥动征兵的法宝，并强迫他们入伍时，保卫自己的说法便暴露了它的荒谬性：不用说是不允许他们“保卫”自己来反对“自己”国家的征兵的。

在战争中，国家的权力被推向最高峰，而且在“保卫国家”和“紧急动员”的口号下，国家可以对公众实行暴政，而在和平时期，这将遭到人们的公开反抗。因此，战争给国家带来许多好处，而实际上，每次现代战争都给参加战争的人民留下永久性的遗产，增加了社会对国家的负担。另外，战争还向国家提供了征服别国领土的诱人机会。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国家可以独断专行。伦道夫·伯恩的下面的一句话当然是正确的。他认为“战争可以使国家强盛”但是对某一个国家来说，战争既可以使它强盛，也可以使它遭受沉重的创伤。^④

我们可以用下面所提出的问题来检验“国家关心的主要是保卫它自己，而不是它的属民”这一假设。试问：国家对哪一类罪行查办得最严厉——是对公民的侵犯，还是对国家本身的侵犯？在国家法典中最严重的罪行大多不是对个人人身或其财产的侵犯，而是对国家本身欲望的危害，即叛国罪、逃亡投敌、拒绝应征入伍、颠覆和颠覆性的阴谋，行刺统治者，以及危害国家的经济罪，如制造假钞票，或避交所得税等。或者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国家在追查袭击警察的罪犯时下了多少功夫，在追查袭击普通公民的罪犯时又下了多少功夫。但奇怪的是，国家公开地首先保卫它本身来对付人民群众，而人们却几乎感觉不到这是同建立国家的目的不

一致的。^④

国家之间如何相互关联

因为地球上的土地被划分成了不同的国家，所以国家之间的关系必然要占用国家的许多时间和精力。国家的本性就是扩大其权力，而对外则表现为征服领土。除非有尚无国籍，或尚无人迹的土地，否则，这类扩张必然包含着某一伙国家统治者同另一伙统治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某一时期内，只能有一伙统治者垄断对某一地区的高压统治：甲国只有把乙国从该地区排挤出去才能获得对该地区的完全统治。尽管发动战争有危险，但战争却是国家之间永远存在的现象，虽然中间也有和平时期，也有国家之间变幻不定的联合。

我们看到，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人们一直试图从内部也即国内对国家进行限制，最后总算确立了立宪政体这种最著名的形式。在“外部”或“外交事务”方面为了对国家进行限制则建立了“国际法”特别是确立了“战争法”和“中立权”。^⑤某些国际法本来与政府毫不相干，只是为了满足各地商人的需要，以保护他们的财产和仲裁各种纠纷等。例如，海事法和商业习惯法。即使是有关政府的法规也是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而不是哪个超级大国强加的。“战争法”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国家间对国家机器本身的摧毁，从而保护无辜的“平民”百姓不致惨遭屠杀和掠夺。确立中立权的目的是保护民间贸易甚至同“敌对”国家的贸易使这种贸易中的货物不致被某一交战国没收。因而，其超于一切的目的在于限制战争的范围，尤其是限制战争对中立国以至交战国的平民的危害。

F.J.P.维尔法官出色地描绘了这种在十五世纪的意大利盛极一时的“文明战争”：

意大利中世纪的富商和自由民们忙于赚钱享乐，不想冒生命危险去当兵吃苦。因此，他们出钱雇军队去为他们打仗。一旦战事结束，这些节俭的生意人就会马上把雇佣军队解散。因此，每打一仗便招募一次军队。……当兵第一次成了一种合乎理想的、损伤比较小的职业。这段时期的将军们互耍手腕，巧施诡计，一旦某方占得优势，另一方一般都会撤退或投降。公认的惯例是，如果一个城镇不进行抵抗的话，是不会遭到洗劫的：只要交纳赎金，就可以免遭洗劫。……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不会出现负隅顽抗的城镇。很明显，一个软弱无能、不能保护其人民的政府也就丧失了人们对它的忠诚。人们并不那么害怕战争，因为战争只是职业兵的事。^{⑤7}

内夫生动地描述了在十八世纪的欧洲老百姓同国家战争毫不相干的情况：

战争期间，甚至没有对邮政通信进行过长期有效的限制，没有对往来的信件进行过检查，这种自由通信会使二十世纪的人们感到惊奇。……交战双方的人们碰面时，会相互交谈起来。见不到面，则靠通信来联系。他们并不是敌人，而是朋友。当时几乎没有人认为……敌国的属民对他们统治者的敌对行动也负有一部分责任。交战双方的统治者也并不坚持要禁止同敌国属民的通信往来。古老的同宗教崇拜和信仰有关的调查和刺探工作也不见了，甚至没有人想到要禁止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往来。护照最初是用来在战争期间保证安全通行的。在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人似乎很少终止他们在交战国的旅行。^{⑤8}

当时贸易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事，而且十八世纪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同敌国的贸易”。^{⑤9}

在本世纪，国家到底超越文明战争的限度有多远，在此不必一一赘述。现代进行的是全面战争，运用的是全面摧毁的技术，在这种情况下，把战争限于国家机器的想法，甚至比美国最初的宪法更为离奇古怪和陈旧过时。

当国家不打仗的时候，总要签订协议来把摩擦保持在最低限度。一种得到广泛承认的理论是所谓“条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一概念被看作与“契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相类似。但条约和真

正的契约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契约以精确的方式转让私人财产所有权。因为政府实际上并不“拥有”它境内的土地，所以它所签订的任何协议并不授与财产所有权。举例来说，如果琼斯先生把他的土地卖给或赠给了史密斯先生，那么琼斯的继承人便不能向史密斯的继承人声称这块土地是属于他的。财产所有权已经转让了。老琼斯的契约自动地约束着小琼斯，因为前者早已把财产转让出去了，小琼斯不能索要这笔财产了。小琼斯只能得到老琼斯遗留下来的财产，而老琼斯也只能把他依然拥有的财产遗留给子孙。但如果某一天比如“沃尔达维亚”的政府强迫或甚至贿赂“鲁历塔尼亚”的政府宣称，根据条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两国政府或人民永远不得重新统一“鲁历塔尼亚”，那却是荒谬的。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并不拥有鲁历塔尼亚西北部的人民和土地。一个政府当然不能通过已往死者的手所签订的条约来约束以后的政府。同样，一个推翻了鲁历塔尼亚国王的革命政府是不会对国王的行动负责的，是不会承担国王所欠下的债务的，因为政府不能象孩子那样作为真正的“继承人”去继承前任的财产。

历史是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之间的竞争

正如和平合作或强制剥削，生产或掠夺，是人与人之间的两个基本的和互相排斥的关系那样，人类的历史，尤其是经济史，可以被认为这是两个原则之间的争夺。一方面是创造性的生产力，和平的交换和合作；另一方面则是对这些社会关系的强制的命令和掠夺。艾伯特·杰伊·诺克恰当地把这两种敌对的力量称之为“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④ 社会权力是人类对大自然拥有的权力，即人类为了全体成员的利益而互相合作改造自然资源并洞察自然规律。社会权力是对大自然的权力，人类可以通过互相交换达到某种生活水平。而我们所见到的国家权力则通过强制性的、

寄生性的手段占有这种生产——榨取社会所生产出来的东西去养活不从事生产的（实际上是反对生产的）统治者们。社会权力是针对大自然的，而国家权力则是针对人类的。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人类的生产力和创造力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改造大自然的办法，为人类谋取福利。这种时候可以说是社会权力走在国家权力的前头，这时国家对社会的侵占程度大大减少。但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期后，国家总是会进入这些新的领域，再次削弱和征用社会权力。^④如果说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许多西方国家的社会权力大为增加，从而增加了自由、和平以及物质财富，那么二十世纪则是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国家权力迎头赶上了社会权力——结果重新带来了奴役、战争和毁灭。^⑤

在本世纪，人类又一次面临着国家的残暴统治。现在国家用人类的创造力结出的果实武装了起来，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征用和恣意挥霍人类生产出来的东西。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人们试图利用宪法和其他手段来限制国家，但所有这一切均以失败而告终。在过去几个世纪内出现的所有统治方式中，在所尝试过的所有理论和制度中，没有一个能限制住国家。很显然，国家这个问题还远未获得解决。如果要使国家的问题得到最后的解决，可能还需要探索新的途径。^⑥

注 释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不能详尽地阐述有关“民主”的各种问题和谬论。这里仅就以下问题说一说就够了：某人真正的代理人或“代表”总是服从这个人的意志的，代理人可以随时被辞退，其所做所为不能违反委托人的利益和意愿。很显然，民主政体这个所谓“代表”，根本不能行使这种代理职能，只有自由意志论者社会才能行使这种职能。

社会民主主义者经常反驳说，民主——即由多数人选择统治者——合乎逻辑地意味着，多数必然会使少数享有某种程度的自由，因为少数也许有一天会变成多数。

除了其他缺点之外，在少数不可能变成多数的地方，例如当少数是不同于多数的种族时，这个论点就明显地站不住脚了。

③ “公与私之间的摩擦或对抗从一开始就由于下述事实而不断激化……国家一直依靠税收生存，而税收本来是私人对个人目的而生产的，是政治力量强使它偏离了原来的目的。有人认为赋税相当于俱乐部的会费或付给诸如医生的报酬，这种理论只是证明，社会科学的一部分离开人们正常的科学头脑有多么遥远！”约瑟夫·A.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纽约哈珀兄弟公司，1942年）第198页。也可参阅默里·N.罗思巴德：《有关“公营部门”的谬论》载《新个人主义评论》（1961年夏）第3页以下。

“为了生存，人类不得不运用两种根本对立的方法，来获取必要的生活资料以满足自己的欲望。或者是去干活，或者是去抢劫。也就是说，或者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生活资料，或者是攫取别人的劳动……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将把人们自己的劳动和以自己的劳动换取别人同等价值的劳动称为‘经济手段’；而把无报酬地获取别人的劳动称为‘政治手段’，……国家是运用政治手段的机构。所以，国家只有等到经济手段创造出了一定数量的满足人们需要的物品以后才会出现，因为只有在生产出物品以后，盗贼才有可能大肆盗窃。”弗朗兹·奥本海默：《国家》（纽约前卫出版社，1926年），第24—27页。

⑤ 艾伯特·杰伊·诺克维妙维肖地写道，“国家要求垄断犯罪行为……它禁止私人的谋杀行为，但是它自己却组织大规模的屠杀。它惩罚私人的盗窃行为，但它自己却贪得无厌地攫取它所需要的财物，不管是本国公民的，还是外国人的。”诺克：《论干正事及其他论文》（纽约哈珀公司，1928年）第143页转引自杰克·施瓦茨曼：《艾伯特·杰伊·诺克——一个多余的人》载《信仰与自由》（1953年12月）第11页。

⑥ “那末，国家作为一个社会学的概念究竟是什么呢？从根本上来说，国家……是一个社会性的机构，由战胜者集团强加于战败者集团，其唯一的目的是维持战胜者集团对战败者集团的统治，以确保它自身的安全，对内则镇压反叛，对外则抗击侵略。从目的论的角度来说，这种统治除了战胜者对战败者的经济剥削之外，没有其他的目的。”奥本海默出处同前第15页。戴约文内尔也写道：“从实质上说国家是一伙匪徒取得成功的产物，他们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社会……。”伯特兰·戴约文内尔：《论权力》（纽约海盜出版社，1949年）第100—101页。

⑦ 关于“特权阶级”（即拥有国家特许的或强加的权利或义务的集团）和马克思所说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根本区别，可参阅路德维希·冯·米泽斯：《理论与历史》（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57年）第122页以下。

⑧ 当然，获得了这种承认并不意味着人们“自愿”接受了国家的统治；因为即使大多数人的支持是积极而热诚的，这种支持也并非是一万人的。不管对个人如何“专制”，各国政府都必须取得这种支持，这一点已由一些敏锐的政治理论家如艾蒂安·博埃蒂、大卫·休谟和路德维希·冯·米泽斯等人所证明。因此，可参阅大卫·休谟：《论政府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见《文学、道德和政治论文集》（伦敦：瓦德、洛克和泰勒公司，无日期）第23页艾蒂安·博埃蒂：《反对独裁者》（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42

年)第8—9页 路德维希·冯·米泽斯:《人类的行动》(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49年)第188页以下。关于博埃蒂对国家的更详细的分析,可参阅奥斯卡·贾西和约翰·D.刘易斯:《反抗暴君》(伊利诺斯州 格兰考埃自由出版社,1957年),第55—57页。

⑨ “……每当一个统治者成为独裁者时……那些利欲熏心、贪得无厌的人便都趋炎附势,群集于他的周围,以期分享他的战利品,并把他们自己变成暴君属下的小领主。”博埃蒂 出处同前 第43—44页。

⑩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同国家结合在一起。关于知识分子同国家的联合 可参阅伯特兰·戴约文内尔:《知识分子对市场社会的态度》载《猫头鹰》(1951年1月),第19—27页 戴约文内尔:《欧洲大陆上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看法》见F.A.海克编:《资本主义和历史学家们》(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4年)第93—123页,重印于乔治·B.戴赫萨尔:《知识分子》(伊利诺斯州 格兰戈自由出版社,1960年)第385—399页 并参阅熊彼特的文章 出处同前 第143—155页。

⑪ 李约瑟:《评卡尔·A.威特福格尔的〈东方专制政体〉》载《科学和社会》(1958年)第65页。李约瑟还写道:“历代中国皇帝都有一大批效忠于他的通达人情、公正无私的学者。”出处同上 第61页。威特福格尔在给孔子学说的注释中写道,统治阶级的荣耀,依靠的是由绅士、学者和官僚构成的官吏,这三种人命定是向广大人民群众发号施令的专职统治者。卡尔·A.威特福格尔:《东方专制政体》(纽黑文 耶鲁大学出版社,1957年),第320—321页 及书中其他地方。关于同李约瑟相反的看法,可参阅约翰·卢卡斯:《知识分子阶级还是知识分子职业?》见戴赫萨尔的著作:出处同前 第521—522页。

⑫ “战略家们坚持认为,他们应该和‘科班出身的军事战略家,一样,受到人们的尊敬。”珍尼·里哈:《战争策划者》载《解放》(1961年8月),第13页。同时可参阅马库斯·拉斯金:《该死的知识分子》载《纽约书评》(1963年11月14日)第6—7页。

⑬ 例如,历史学家科尼尔斯·里德在其就任主席的演说中就鼓吹,为了“民主”和民族的价值,要隐瞒一些历史事实。里德声称,“历史学的全部意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激励每一个人贡献出他的力量。历史学家并不比物理学家担负更为轻松愉快的义务……。”里德:《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载《美国历史评论》(1951年)第283页以下。对里德的评论以及对宫廷历史的评论,可参阅霍华德·K.比尔:《职业历史学家:其理论和实践》载《太平洋历史评论》(1953年8月)第227—255页。还可参阅赫勃脱·巴特菲尔德:《官方历史 其陷阱和尺度》见《历史和人类的关系》(纽约 麦克米伦公司,1952年)第182—224页 并参阅哈里·埃尔默·巴恩斯:《御用历史学家与修正主义》(无日期)第2页以下。

⑭ 参阅威特福格尔的文章,出处同前,第87—100页。关于宗教和国家在古代中国和日本的不同作用,可参阅诺曼·雅各布斯:《现代资本主义和东亚的起源》(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1958年),第161—194页。

⑮ “人们之所以顺从统治者,其根本原因是顺从已变成了人类的一种习惯……权力对我们来说已成了不可改变的事实。自从有历史记载以来,权力一直左右着人类

的命运……以往的统治当局总是要把权力遗交给他们的继承人，并在人们的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后，才会退出历史舞台。多少世纪以来，虽然统治社会的政府更替频繁，但却从未间断过。戴约文内尔：《论权力》 出处同前 第 22 页。

⑮ 关于中国宗教在这方面的用处，雅各布斯的著作中到处都有论述。

⑯ “所有的〔政府〕都认为，有创见的思想有可能带来变革，从而有可能侵犯政府的权利。对任何政府来说，最危险的人要算是那种蔑视一切陈规旧俗、善于思考的人了。这种人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统治他的政府是不诚实的，疯狂的，偏狭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是一个浪漫的人，他就会试图改变它。即使他本人并不浪漫，他也一定会在那些浪漫的人中间散布不满情绪。”H. L. 门肯：《门肯文集》（纽约诺夫公司，1949年）第 145 页。

⑰ 同上书 第 146—147 页。

⑱ 戴约文内尔：《论权力》 第 27 页以下。

⑲ 查尔斯·L. 小布莱克：《人民和法院》（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60年）第 35 页以下。

⑳ 同上书 第 42—43 页。

㉑ “（最高）法院最重要、最不可推卸的职责是使政府的行动合法化，而不是非法化。权力受到限制的政府从一开始直到永远，需要的是这样一个工具，它能使人民相信，政府为了不超越权限已采取了一切人力所及的步骤。这就是政府获得合法地位的条件，而取得合法地位，最终是它借以生存的条件。从历史上来看，法院的作用一直是使政府的行动合法化。（出处同上）第 52 页。

㉒ 对布莱克来说，这种“解决办法”虽然荒谬可笑，但却只能如此，他的原话是，“国家的权力……最终必须由法律来限制。那末，谁来为最高权力规定界限呢？谁来实行这种限制呢？当然是国家本身通过自己的法官和法律来实行限制。谁来掌握火候呢？谁来教导智者呢？”（出处同上）第 32—33 页。他还说：“当问题涉及主权国家的政府权力时，是不可能在政府之外找到公断人的。每一个国家的政府，只要它是一个政府，就必然对自己的权力具有最终的决断权。（出处同上）第 48—49 页。

㉓ 出处同上 第 49 页。

㉔ 这种认为政府具有神奇色彩的看法，使人联想起詹姆斯·伯纳姆采用神秘主义和非理性的理由来为政府所作的辩护：“在古代，在科学幻想腐蚀了传统智慧之前，城市的建设者们都被称为上帝或半神的人。……政府的起源，或为政府所作的辩护是不能用合乎理性的语言来描述的……为什么我会接受祖上传下来的制度，或民主制度，或任何其他合法制度呢？为什么某一理论能证明别人统治我是合理的呢？……是的，我接受了这一理论……因为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而且向来就是这样。”詹姆斯·伯纳姆：《国会和美国的传说》（芝加哥雷尼利公司，1959年）第 3—8 页。但假如人们不愿接受这个理论，会怎样呢？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㉕ 布莱克 出处同上 第 64 页。

㉖ 出处同上 第 65 页。

㉗ 约翰·C. 卡尔霍恩：《有关政府的探索》（纽约自由艺术出版社，1953年），第

25—27 页。并参阅罗思巴德：《保守主义和自由：一个自由意志论的评介》载《现代》季刊（1961 年春）第 219 页。

⑳ J. 艾伦·史密斯：《立宪政体的成长和衰亡》（纽约 霍尔特公司，1930 年），第 88 页。史密斯还说：“很明显，如果拟订宪法中的某一条款是为了限制某一政府机构的权力，但却让这个机构来解释和执行该条款，那么这一条款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很显然 常识告诉我们 不应让任何一个政府机构来限定自己的权力。（出处同上）第 87 页。很显然，凭常识和“奇迹”来看待政府问题，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看法。

㉑ 卡尔霍恩 出处同前 第 20—21 页。

㉒ 近年来，这种一致原则在各种各样的著作中得到了新生，尤其是在詹姆斯·布坎南教授的著作中。然而，如果把这种一致性注入现今的形势，把它只应用于现状的变化，而不应用于现存的法律，那只会把限制政府的概念再次转变成为国家服务的橡皮图章。如果把一致原则只应用于法律和法令的变化方面，则起始“原点”的性质便会有很大不同。参看詹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塔洛克：《有关赞同的演算》（安阿伯 密执安大学出版社，1962 年），书中处处可见。

㉓ 参阅赫勃脱·斯潘塞：《忽视国家的权利》见《社会静力学》（纽约 阿普尔顿公司，1890 年），第 229—239 页。

㉔ 戴约文内尔：《论权力》第 171 页。

㉕ 我们看到，对国家来说，知识分子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其中包括支持国家对付那两种最主要的威胁。因此，关于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可参阅伦道夫·伯恩：《战争与知识分子》见《文学界激进分子的历史及其他论文》（纽约 拉塞尔公司，1956 年），第 205—222 页。正如伯恩所指出的，知识分子为国家的所作所为赢得支持的一般办法，是把各种议论都纳入国家基本政策的轨道，不容许对国家的基本政策提出任何根本性的或全面的批评。

㉖ 门肯绝妙地写道：“这伙人〔组成政府的剥削者，〕几乎都免受惩罚。对于最恶劣的敲诈勒索行为，甚至明目张胆谋私利的勒索行为，我们的法律也没有规定明确的惩罚条例。从共和政体存在的第一天起，顶多只有十来个统治者受到弹劾，只有少数几个失宠的属下被投入牢狱。因反对政府敲诈勒索而被关在亚特兰大和利沃思联邦监狱的罪犯，要比因为敲诈纳税人而被判刑的政府官员多出十倍。”门肯：出处同前，第 147—148 页。关于个人自由缺乏保护，不能免受其“保护者”的侵犯的生动而引人入胜的描述 可参阅 H. L. 门肯：《自由的性质》见《偏见：一种选择》（纽约 古典图书公司，1958 年），第 138—143 页。

㉗ 这要同现代的国际法区别开来，它着重于通过所谓“集体安全”概念尽量扩大战争范围。

㉘ F. J. P. 维尔：《进入野蛮状态》（威斯康星州 阿普耳顿 纳尔逊公司，1953 年），第 63 页。同样，内夫教授也描述了十八世纪法国、西班牙和撒丁岛为反对奥地利而在意大利展开的唐洛卡斯之战：“联军包围了米兰，几个星期之后……两军在巴马城外相遇，大战一场。两地的居民对双方军队都抱旁观态度。他们唯一害怕的是乱军入城抢劫。这种恐惧心理是毫无根据的。在巴马，城内的居民们都跑到城头上观看远处的战

况……约翰·内夫：《战争和人类的进步》（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0年），第158页。还可参阅霍夫曼·尼克森：《我们能限制战争吗？》（纽约斯托克公司，1934年）。

⑳ 内夫 出处同前 第162页。

㉑ 出处同上 第161页。关于美国革命的领袖们为同敌方做生意所作的辩护，可参阅约瑟夫·多尔夫曼：《美国文明中的经济头脑》（纽约海盗出版社，1946年）第一册 第210—211页。

㉒ 有关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的概念，可参阅诺克：《我们的敌人是国家》（爱达荷州科耳德韦耳·卡克斯顿公司，1946年）并参阅诺克：《一个多余的人的回忆录》（纽约哈珀公司，1943年）和弗兰克·乔多洛夫：《社会的兴衰》（纽约德温-阿戴尔公司，1959年）。

㉓ 在扩张和收缩的交替中，国家总想夺取和保持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某些重要的“指挥所”。其中包括对暴力的垄断、对司法决断权的垄断、对交通运输渠道（驿路、水路和航线）的垄断，在东方专制政体下对灌溉渠道的垄断，以及对教育的垄断——以便塑造未来居民的思想。在现代经济中，货币是最关键的指挥所。

㉔ 卡尔·马克思已公开宣称要使国家权力“赶上”社会权力，他认为必须通过夺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起来的资本来建立社会主义。

㉕ 毫无疑问，一种不可或缺的方法是通过建立独立于国家权力的知识分子的研究与教育中心，来把知识分子和国家分开。克里斯托弗·道森指出，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的大规模知识分子运动是在旧势力盘踞的大学外面开展起来的。有时运动的矛头就针对着这些大学。传播新思想的学院都是由无党派人士集资建立的。参看克里斯托弗·道森《西方教育的危机》（纽约：希德和沃德公司，1961年）。

10. 为什么要做自由意志论者？

默里·N.罗思巴德

为什么要做自由意志论者？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意思是：做自由意志论者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为了个人自由的原则与目标而终身承担一种深刻的义务？在我们这个自由很少的世界上，这样一种义务意味着与现状的格格不入，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在金钱和名誉上付出许多牺牲。在人生短促而胜利遥远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难以置信的是，我们发现在我们这个国家日益增多的自由意

志论者中，有许多人是从两种极端狭隘的个人观点出发而信奉自由意志论的。许多人之所以向往自由，是因为他们把自由看作是一种智力上的需要或是一种美学目标，于是对他们来说，自由就成为客厅里的纯粹智力上的游戏，完全脱离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活动。另一部分人之信奉自由意志论，则完全出于个人经济利益的动机。他们认为自由市场会给有见识、有能力的人提供较多的机会去获取企业家的利益，因此，他们纯粹是为了寻求发财的大好机会而信奉自由意志论的。虽然在一个自由的市场上和一个自由的社会里，获取利润的机会确实非常多，但一个人把这作为信奉自由意志论的首要目的，却很可笑。因为在达到自由之前所必须走过的道路，往往是曲折艰难的，是充满了挫折的。自由意志论者获取个人利益的机会不但不多，而且常常是根本没有。

无论是游戏者或是一心想发财的人，他们狭隘而近视的眼光带来的结果是，他们对开展一场自由意志论运动毫无兴趣。然而，只有通过开展这样一个运动，才有可能达到自由。思想，特别是激进思想，不会象在真空中那样自己跑到世界上来。它只能由人去传播因此，促进人的进步与发展——从而也就是“运动”的进步与发展——就成为自由意志论者的首要任务，如果他们对于达到自己的目标真正抱严肃态度的话。

除了这些眼光狭隘的人，我们还必须看到，功利主义（这是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共同坚持的一种学说）对于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自由意志论运动是不够的。自由市场会给每个人，不论贫富，带来远为充足与健康的经济，虽然懂得这一点确有价值，但重要的问题是，仅凭这点知识，是否足以促使许多人把毕生精力献给争取自由的事业。简言之，究竟有多少人愿意坚守街垒，忍受牺牲（这种牺牲是对自由坚持不渝的献身所必须承担的），而仅仅为了使更多的人用上更好的澡盆？难道他们不会安于舒适的生活而忘掉澡盆

吗？说到底，功利主义经济学虽然对于已经形成的自由意志论思想和已经采取的自由意志论行动是必不可少的，但同那些单纯追求眼前利益的机会主义者一样，它并不是开展自由意志论运动的坚实的基础。

我们永远认为，一场轰轰烈烈的自由意志论运动以及对自由的献身，只能依靠对正义的热烈追求。这才是推动我们运动发展的主要动力，支持我们抵挡未来风暴的甲冑，而力求在智力游戏中轻易地赚钱，或对一般经济目标的冷静计算则与此无关。一个人要具有对正义的热情，他就必须懂得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简言之，就是必须掌握功利主义经济学所不能提供的一套关于正义与非正义的伦理原则。正因为我们看到世界上到处是不义，我们才不得不尽我们之所能去追求一个可以根除一切不义的世界。其他传统的激进目标——如“消灭贫困”——与此相比，不过是空想而已；因为人仅靠意志是不能消灭贫困的。只有通过某些经济因素的作用，特别是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投资，才能消灭贫困，但这需要长时期地改造自然才能奏效。简言之，用一句依然正确的老话来说，人的意志在这里要受自然法则的严格限制。但是，不义却是一部分人强加给另一部分人的，它们完全是人为的，因此，不义和不义的消除都从属于人的瞬间意志。

让我们举个例子：数世纪以来，英国占领了爱尔兰并残酷地压迫爱尔兰人民。如果我们在 1900 年注意到了爱尔兰的状况 看到了爱尔兰人民的贫困，那么我们必定会说，爱尔兰人民的贫困可以通过赶走英国人和取消土地垄断而得到改善，但要在爱尔兰消灭贫困，无论如何也要花费很长时间，要受到经济法则的制约。而结束英国压迫的目标，则可以通过人的意志用瞬间的行动来实现——譬如英国人干脆决定撤出这个国家。当然，这样的决定实际上并非瞬间作出的，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非正义失败了，

对别人施加非正义行为的人失败了：在我们的例子中，即英国政府失败了。在正义问题上，人的意志就是一切：人能够移山倒海，只要有足够多的人下决心就行。这样说来，想立即伸张正义的热情，亦即激进的热情，并非空想，这和想立即消灭贫困的愿望或想把每个人立即变成音乐会上的钢琴家的愿望不同。因为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决心这样做，正义就能立即得到伸张。

因此，对正义的真正热烈的追求必须是激进的，简言之，至少要希望立即达到自己的全部目的。经济教育基金会主席伦纳德·E.里德在他二十年前写的一本题为《我要按电钮》的小册子中，曾表达过这种激进精神。当时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对待物价管理局实行的工资与物价管制。大多数经济自由主义者都采取了谨小慎微的或“现实主义的”态度。他们虽然主张解除管制，但却坚持要慢慢来，有时甚至发生动摇；而里德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却采取了一种毫不含糊的、激进的原则立场。他在小册子的开头便写道：“如果在这个讲台上有一个电钮，按一下这个电钮就可以立刻解除所有的工资与物价管制，那么我会伸出指头去按它！”^①所以，对激进精神的真正检验，是看他是否愿意按电钮：如果我们按一下电钮就可以立即消除对自由的无理侵犯，我们会按它吗？如果我们不愿意按它，我们就很难称自己为自由意志论者，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只有真正热烈地追求正义时，才会按它。

所以，真正的自由意志论者，在这个词的一切意义上，是一个“废除主义者”。如果他办得到的话，他会立即废除一切对自由的侵犯；不论是在这个词原来的废除奴隶制度的意义上，还是在废除其他各种国家压迫的事例上。他会象另一个自由意志论者在类似的情况下所说的那样：“就是拇指起泡，也要按那个电钮！”自由意志论者必须同时是“按电钮者”和“废除主义者”。在正义精神的支持下，他将不被功利主义者的超道德的要求所打动。功利主义者说，

只有在罪犯们得到‘补偿’之后，正义才会到来。例如，当伟大的废奴主义运动在十九世纪初期兴起时，立即就出现了温和的呼声，提出劝告说，只有在奴隶主的损失在经济上得到补偿之后，废除奴隶制度才算公道。简言之，在奴隶主进行了几百年的压迫与剥削之后，还要付给他们一笔可观的钱，而这些钱是从广大无辜的纳税人身上强取来的！英国激进哲学家本杰明·皮尔逊对这一建议给予了最恰当的评价，他说：“应该得到补偿的是奴隶。”显然，这种补偿只能来自奴隶所有者。^②

反自由意志论者和反激进主义者的一句口头禅是，“废除主义”是“不现实”的。我们可以指责他们把愿望中的目标与对可能产生的结果的战略估计，无可救药地混淆在一起。在制订原则时，最重要的，是不要把战略估计与制订目标相混淆。首先，人们必须提出目标，在目前的例子中，就是立即废除奴隶制度或任何其他中央集权经济统治的压迫。我们必须首先提出这些目标而不去考虑达到目标的可能性。自由意志论者的目标在下述的意义上是“现实的”，即如果有足够多的人认为它们是可取的，就有可能实现它们，如果实现了这些目标，将带来一个好得多的世界。目标的“现实性”只能从目标本身来考虑，而不能从如何实现它来考虑。因此，只有在我们已经确定了目标之后，我们才能考虑另一个与此完全不同的战略问题，即如何尽快地实现已确定的目标，如何开展一个运动来实现已确定的目标等。例如，当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举起立即解放奴隶的光荣旗帜时，他并不是“不现实的”。他的目标是正确的，而他在战略上的现实主义则使他没有料到他的目标能很快实现。正如加里森自己所说的：“我们应尽最大努力，争取立即废除奴隶制度，但可悲的是，废除奴隶制终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们从未说过可以一下子推翻奴隶制度，那只是理应如此，我们要永远进行斗争。”^③

其实在战略问题上，高举纯洁和激进原则的旗帜，往往可以最迅速地达到激进目标。其原因是，如果不提出纯洁的目标，就永远不会有现成的动力推动人们去达到它。如果废奴主义者不在三十年之前就发出叫喊，奴隶制度是永远不会被废除的；后来发生的事情是，奴隶制实际上是一下子就废除了，而不是逐渐地或通过补偿方式废除的。^④ 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在 1831 年初为《解放者》创刊号所写的著名社论中，对他早先采取渐进的废奴主义表示忏悔：“我利用这个机会，完全地和毫不含糊地正式宣布放弃我过去的观点，从而公开地请求上帝、祖国和我的弟兄——可怜的奴隶们原谅 原谅我发表过一种如此胆怯、不公正与荒谬的看法。”有人说他惯于用严厉而炽热的语言 对于这种指责 加里森回答道：“我需要的是周围燃起熊熊大火，因为我周围有许多冰山要去融化。”正是这种精神必须成为真正献身于自由事业的人的特征。^⑤

注 释

伦纳德·E.里德：《我要按电纽》（纽约 麦克盖尔公司，1946 年）第 3 页。

威廉·D.格兰普：《曼彻斯特经济学派》（加利福尼亚 斯坦福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0 年）第 59 页。

引自威廉·H.和简·H.皮斯编：《反对奴隶制的理由》（印第安纳波里斯：鲍勃一麦雷尔公司，1965 年）第 35 页。

针对某些人指责政策“不现实”，指责政策将好的与现时可行的混淆在一起，菲尔布鲁克教授在一篇杰出的哲学评论文章的结尾写道：“经济学家或任何其他人若要严肃地为一种政策辩护，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他必须坚持这种政策是好的。真正的‘现实主义’就是人们通常认为是明智的东西，要从着眼最后的结果来决定现在。”克拉伦斯·菲尔布鲁克：《选择政策时的现实主义》载《美国经济评论》（1953 年 12 月），第 859 页。

^⑤ 引加里森的话，参见路易斯·鲁切姆斯编：《废奴主义者》（纽约 卡普雷柯恩书店，1964 年）第 31 页 并参阅弗恩·M.布诺戴：《谁为废奴主义者辩护？》见马丁·杜伯曼编：《反奴隶制度的先驱》（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5 年）第 67 页。杜伯曼的这部著作中有很多有价值的材料，其中包括对维护现状者的驳斥，这些维护现状的人们联合起来对激进派、特别是对废奴主义者进行了心理上的污蔑。特别参看马丁·杜伯曼：《北方对奴隶制度的回答》见上引书 第 406—413 页。

第五部分 无政府主义研究

现代和以往的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都带有“俄罗斯”的色彩。无政府主义者的宣传中之所以往往表现出一种危急感，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者总是喜欢象十九世纪俄国的许多激进分子那样提出这样的问题，怎么办^❶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和印刷品（它们经常是草率地甚至一挥而就写成的）里的这种带有道德色彩、有时候是说教性的调子，深刻地反映了他们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即社会正处于道德的和政治的危急状态之中。正如彼得·克鲁泡特金1873年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活动分子不能……平静地忍受他们周围的不公正，他们必然要投入到反对不公正的斗争中来，而不管这种不公正以什么形式出现。”

无政府主义者的蔑视一切的“感情”，可以通过阅读急进的周刊或月刊感受到。在这些出版物中，很难找到全面分析的文章，而只是让人感受到充满强烈感情的对当局的抗议和指责。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不能与其他鼓动性著作相提并论。一次群众大会、一次罢工、一次绝食或一次街头冲突可以很激动人心，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但却不能用文字或宣言书的形式予以重演。

然而，正如最优秀的无政府主义鼓动家和无与伦比的演说家埃玛·戈德曼曾经说过的那样，“口头宣传充其量只是一种把人民从冷漠中震醒过来的手段；它留不下长久的印象。”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却始终充满热情和吸引力，有比较长远和深刻的影响。

❶ “怎么办？”一语出自俄国十九世纪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同名小说。——译者

这一部分中的文章大都来自一处。英国无政府主义的报纸《自由报》从 1886 年克鲁泡特金在英国定居以来一直不间断地出版到现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这家报纸上充满了美国、欧洲和英国无政府主义者写的最好的无政府主义的文章。自由出版社从 1961 年起发行了一种月刊，刊名《无政府》专门刊登比较长的、比较有份量的无政府主义的分析文章。要想深入了解无政府主义者在最近的复兴中所关心的事情和他们的活动，再没有比这两家报刊更好的材料来源了。

人们在阅读《自由报》和《无政府》月刊上的文章时会很清楚地看到无政府主义者彼此之间的差异。个人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各陈己见。争论最多的是策略问题，例如关于暴力和恐怖主义的使用和滥用问题。无政府主义作者不仅常常尖锐地批评国家，而且还常常尖锐地批评其他激进分子。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左派分子也未能幸免于难。总有人提出“怎么办？”这个老问题，并经常得到暂时的回答。无政府主义的灯塔还经常照耀到意想不到的地方。例如，1965 年发生了纽约市停电事件后，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在分析停电过程中人们自发地互相帮助的行为时说，这种利他主义证明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即人类本来就是友善的和热爱自由的。

虽然无政府主义者经常热衷于日常生活的问题，但他们也是美好未来的追求者。无政府主义中的乌托邦因素是不能否认的。在这部分的末尾，刊登了乔治·莱克写的一篇通过非暴力手段寻求一种公正社会的文章。无疑，这位美国贵格会的和平主义者兼作家在《非暴力革命宣言》一文中的分析，不会得到所有无政府主义者的赞同。任何分析都不会得到所有无政府主义者的赞同。但是，他的分权主义的主张、他的生态意识、他的道义上的党派偏见和他对于人类相互依存的强调，都明显地表现了无政府

义的特色。

11. 无政府主义者 —— 为它感到骄傲

乔治·卡恩克罗斯

无政府主义者！一提起这个字眼，人们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身披黑斗篷手持炸弹的危险分子、野蛮的无节制的暴力行为、流血暴动、强奸、洗劫和现行一切法律和秩序的全面崩溃等等一系列景象；它似乎是洪水猛兽，广大民众惟恐躲避不及。但是，这种普遍的印象是多么错误啊！不错，在无政府主义的名义下，确实进行了不少暴力行动，也确实发表了一些狂妄的声明，但是在无比巨大的范围内，究竟是谁对人类犯下了最严重的罪行？是政府向毫无防卫的人民扔下了成吨的炸弹，是政府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屠杀了难以统计的百万生灵，是那些据说代表着法律和秩序、代表着社会中一切与和平有关的事物的政府啊！

与一般人的看法相反，大部分无政府主义者虽然不一定是和平主义者，但也不一定倾向于搞暴力活动。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是爱好和平的，他们只不过希望生活在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里，在那里，为了人类的尊严，人们互尊互敬。那么，为什么上述景象会如此生动地留在人们的脑海里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样的事实，即无政府主义运动致力于推翻任何形式的政府，从而促使人们以为无政府主义就是一种以无法无天为基础的哲学。再没有比这种看法更荒谬了。实际上，无政府主义可能是最有组织的一种社会，其原因在于，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将和他的同伴互相协调地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个人将自愿和其他人共同合作地生活。它坚持这样一种不言而喻的真理，即只有到人们对自己的生活负责和掌握自己生活的时候，社会的弊病才能医治。无政府主义是唯一

提供了这种思想的政治运动。所有其他政治运动则认为，要组织社会就得有政府存在。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以组织另一个政府为其基本目标的任何形式的政治集团。废除国家和它的一切机构是无政府主义的基本的和最早的宗旨之一。

在我们当代的社会和共产主义世界的社会里，整个经济都是围绕着赚取利润而运转的。每一件东西的生产都必须赚取利润，而不管该物品是否为人们所需要。这样，生活质量一下子就降低到肮脏的物质第一主义的水平。无政府主义者要求一个生产不跟着利润而跟着需要运转的社会，一个由人民自己掌握自己的生产资料的社会。许多世纪以来，劳动群众被剥夺了自己劳动的报酬。生活中的残酷事实是，极少数人单纯通过经济统治就控制了大多数人的命运，而且谁创造财富，谁就要受剥削。因此，资本主义者，不管它是国家还是个人，都在憎恨无政府主义运动中与政府结成了联盟。

普遍的幻觉

扔炸弹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普遍印象，是由于国家报刊的宣传而得以长期存在的。每一件不能解释的暴行立即被贴上“无政府”的标签。每一项法律和秩序的瓦解都预示着产生无政府主义，于是幻觉持续下来。然而这些极力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报纸，正是那些享有既得利益要保持社会现状的人们所拥有的报纸。因而无怪乎他们一有机会就攻击和诽谤无政府主义。对他们来说，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成功，实际上意味着他们将失去他们拼命要保持的特权。

我们的民主社会标榜以平等为基础，但是成千上万的人却生活在这样的状况之中，这种状况如果存在于动物园中，会引起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委员会的勃然大怒。许多人没有房子住；但是由于

找不到付得起高房租的未来房客，高大的办公楼一直空着。空楼的价格日益上涨，为地产投机商提供了巨额利润。许多人实际上不只拥有一幢房子，政府的部长们（社会主义者常常占据这样的职位）在他们中间不占少数。无政府主义者要结束这种状况，他希望看到所有的地产通过‘房客协会’或者可能是‘联合地产’等形式，归公众掌握，在那里所有的房子都属于这个联合体的全体居民，而不是属于任何个人或董事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每个人都有与人类的尊严相称的良好的居住条件；在那里人们不再为了找个蔽身之所而去非法占领空房；在那里没有过高的房租，或者根本不存在任何房租；在那里每个人都可以照管他的花园和看着他的孩子在合乎所有人（而不是少数特权者）的健康和幸福的条件下成长。

教 育

建立在阶级差别和偏见基础上的教育制度，是我们这个所谓的民主社会得以长期存在下去的主要因素之一。整个教育制度是压制性的，被用来作为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齿轮，该制度通过各种恶毒的手段把孩子塑造成接受剥削性社会的人。可恶的考试制度挑选出学习成绩优秀的人来管理社会，而剩下的人则乖乖地听从他们的驱使。一种由纪律和竞争控制的制度是为了压制个体成为一个一致的集体而设计的。很显然，不能允许一种旨在使个人摆脱愚昧和迷信的教育制度存在，其原因是任何形式的政府都不敢让一个由自由思考的和开明的个人组成的社会成长，因为这样的社会会给这个政府敲响丧钟。无政府主义者坚持认为，受教育（特别是受高等教育）是所有人的权利，而不是有钱阶级或者特殊优越条件的那些人的特权。教育应用来培养人们热爱自由和自力更生的思想，这种思想反过来将导致出现和加强一个自由的社会。但是没有现存的政府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这将意味着它的自我消

灭，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不久就会意识到政府是完全多余的。

那么，为什么政府能够毫不费劲地统治和愚弄人民呢？这是因为政府有效地控制了从前面提到的报纸直到电视、无线电等通讯和媒介手段。人民只能知道政府让他们知道的事情。我们所谓的自由报纸和通讯制度，仅仅是指在一定的不能公开的范围內俯首听命的自由。唯一可以另作选择的是无政府主义一类运动的自由报纸以及他们的宣传。但是，假如这类可供选择的新闻媒介对现存制度构成了严重威胁的话，那末在种种借口下实行的迫害便常常会马上来临。政府对广播和电视实行严格垄断不是没有道理的。

政府有一强大的同盟者——广大中产阶级的支持。中产阶级向往获得体面的社会地位，在中产阶级那里，虚伪的价值观念无限膨胀，大大超过了一切理性，企图出人头地的哲学成了至高无上的东西。在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看来，无政府主义是最可恶的东西，会造成他们所害怕的一切景象。他们唯恐失掉他们现在享有的那么一点点东西，而没有认识到，他们的一点点损失可以使每个人都得到更多的东西；结果，他们便乐于支持向他们施以小恩小惠的腐朽制度。

国家是祸害

与此同时，无政府主义的革命仍在继续。每年都有更多的信奉者加入这一运动，革命不仅仅发生在街头上，而且发生在头脑里，不过革命的胜负很可能在街头上见分晓。成为一个有觉悟的无政府主义者，这本身就是一次思想上和哲学上的革命，这种哲学一旦在头脑中生根，就使其他任何政治思想都成为无稽之谈。有各种各样的无政府主义，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都是一个独立单位，因而无政府主义者彼此之间常常发生意见分歧，但他们在重要的和

基本的问题上看法却是一致的，其中他们一致同意的主要一点是：国家是祸害，必须消灭国家。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觉悟的提高，必然会有更多的人加入无政府主义的运动。近些年来，无政府主义文献的广泛传播，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这场运动。同以前相比，最近的一些事件，例如堵塞汽车道的事件，使更多的人与当局发生了冲突。的确，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人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但他们采取的行动正是无政府主义者所提倡的直接行动，因而行动本身就是前进了一步。人民一旦抛弃领导者，领导者也就不复存在了。在最近的选举中，投票站票数的下降似乎表明，更多的人已经对政治家感到厌恶。如果这种趋势增加，可能对任何政府都会造成严重后果。

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都不知道未来的无政府主义社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只能指出我们愿意看到的这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从来未出现过一个确实存在过的无政府主义社会可以作为指针，只是在西班牙内战时，该国的一些地区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里实现过很多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在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里，所有的人都将是无政府主义者。首先是无政府主义者，然后才是木匠、建筑工人、诗人等等。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将做自己最喜欢做的和最适合于自己做的工作。工作将是一种快乐，而不再是一种仅仅为了维持贫困的生活以便可以在下一周继续做这种工作，并为某些特权集团生产利润，除此以外别无特别理由的苦活。工作是生活的要素，但这是创造性的工作，而不是象我们在受压制的社会里以受雇佣的形式存在的工作。它将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对于他自己和别人都是有用的。它是协调、自愿合作、和平以及政治和经济上的个人自由与幸福为基础的，社会科学将不再存在。

12. 为什么恐怖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手段？

M. C.

每当有人搞恐怖行为时，社会各阶层都会一致表示憎恶并给予严厉的谴责，这往往使无政府主义者作出糊涂反应。他们寻找各种借口和理由，来反驳受害者完全无辜，犯罪者完全没有理由采取暴力行动的说法。我们应该防止作这种反应：我们不能因为同情那些被警察追捕的恐怖分子，或因为搞恐怖活动的人是无政府主义者，是和我们一样反对黑暗社会的人，为了团结的需要，就背叛自己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信条。

上面这段议论自然是由就业大臣住处被炸事件引起的。我们还不知道是谁想出了这个主意或者是谁执行的，不知道他们打算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不知道他们希望在那位大臣、现政府、工会会员、普通公众和“革命左派”特别是无政府主义者（如果扔炸弹的人也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话）身上引起什么反应。

警察首先猜测这件事是无政府主义者干的；据《旗帜晚报》（1971年1月14日）说，一个二十多岁的不知姓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领导人”有在伦敦策划另一些炸弹袭击事件的重大嫌疑；还说侦探们相信他们将在一个很有意义的日子——即抗议政府《劳资关系法案》的日子——但并非就业大臣所欢迎的日子（着重号是我加的）搞这些炸弹袭击事件。该报道其余的大部分篇幅详细地描述了袭击西班牙大使馆和去年在伦敦、巴黎和其他地方的伊比利亚航空公司的飞机上安放炸弹的事件（在伦敦，炸弹爆炸前被发现了，我不记得是否还有欧洲的其他地方发生过机场爆炸）。该报道还提到，伊比利亚航空公司事件发生后，警察当局讯问了一个男人并拘留了他的女友四十八小时，这与《自由》杂志（1970年2月

26 日)上所刊载的、由“无政府主义黑色十字架协会”提供的一份报告(说警察注意到了若干同样是不知姓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恰巧吻合。

我们能够初步加以判断的(就这种判断而言,这项特殊行为究竟是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干的并没有什么关系),是这类行为在达到无政府主义者所希望的目的方面究竟有什么价值,这类行为在具体背景下的是非问题,以及该事件究竟是否符合对无政府主义哲学的任何理解。

因为我是从对罗伯特·卡尔住处的袭击这一特殊事件谈起的,所以请允许我说明,我并不认为袭击者早有打算或者考虑到有可能杀死或伤害这座房子里的居住者。但是,用炸弹袭击财产很可能造成伤害(如果屋内有人的话)和死亡(如果使用的炸药达到足够大的份量或者造成的破坏达到足够大的程度),所以它就变成了有害于人民的恐怖行为。而且,虽然无政府主义者比起其他政治信念的信奉者来,杀人和恐怖行为的纪录要少,更比任何政府的杀人和恐怖行为的纪录要少得多(除了最小的共和国和最新成立的国家以外),但暗杀和恐怖仍是无政府主义活动的一个历史组成部分。这类恐怖行动对于无政府主义来说,究竟是必不可少的呢,还是格格不入或者毫不相干的呢?

作为达到无政府主义者目的的一种手段

很明显,对无政府主义来说,恐怖行动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无政府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人类愿意而且也有可能彼此提供生活的一切物质和文化需求;没有哪一个人或集团有权剥夺他人的这些需求,并进而以恐吓和饥寒来强迫其他人为自己提供不公正的所得,或者以一种工作形式迫使其他人接受他们不愿意过的生活方式。实现这一基本原则的障碍,就受压迫的一方来说,是对不

公正缺乏足够、强烈的感受，缺乏为自由而奋斗的热情和缺乏可以改变现状的认识；而就那些拥有财产和行使权力的人来说，则是他们对特权的价值和权力的甜头感受得太强烈，认识得太清楚了。那末，将如何消除这些障碍呢？

在这两种障碍中，前一种障碍似乎最难消除，甚至猜不出这一障碍到底有多大。七个月以前，在这个国家里大约有一半的成年人投了保守党的票；最近几年只有少数人参加反抗和抗议运动；就连那些无家可归的强占住房者的困苦处境也没有引起那些处于相同困境或者有能力提供帮助的人的同情并给予帮助或互相提供帮助——所有这一切使人沉重地感觉到，这一障碍是非常巨大，很难消除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许多人精神的崩溃、持续的劳资冲突和自发的罢工、对现政府的一些主张采取的批评态度、亲官方报纸给予少数派运动及其自卫组织的同情报道——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个世界并不是完美无缺的。那些彼此观点各不相同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不懈斗争，以及他们的不予合作的态度，必然会改变现政府企图强加于人们的模式。当政府用法律形式强行实施《劳动关系法》的条款时，那唯一具有广泛群众基础、拥有巨大力量的社会成分——工会将做些什么，这一点现在还难以预料。要进行任何较彻底的改革（而不仅仅是让工党在下次选举中重新当选），要使这一改革朝着鼓吹自由思想的方向发展，就需要在那些表示不满但又没有意识到可以另谋出路的人们当中更广泛得多地宣传并使他们接受自由的思想纲领。零星发生的炸弹袭击事件似乎和达到这一目的的关系不大，效果甚微。当这类行动并非必需而又缺乏群众支持的时候，这些行动仅仅表明有某个人在某个地方对实现这一目的要比其他人怀有更热烈的感情或者从他自身的性格上讲怀有更大的仇恨，这似乎证明了这种行动与无政府主义毫不相干。

恐怖主义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恐怖主义是不是消除第二个障碍——即死命地抱住权力不放——的适当的或有效的手段呢？这是很成问题的，因为就我所知，还从来没有过暴君和秘密警察应人们的要求而自动辞职和停止刑讯的事例。在沙皇俄国，专制主义受到炸药锤炼多年，但并没有发生革命，直到绝大多数人民具有了共同的或者彼此关联的思想和愿望而且外部因素又改变了具体状况的时候才爆发革命。在塞浦路斯，英国士兵陷入恐怖状态而使英国人终于离开，但那是因为绝大多数居民要求独立。这证明：恐怖主义不是意志的必然表现。在最近几乎引起全世界同情的由于杀死警察头目而使六个巴斯克人被判决一事中，杀死警察头目显然可以看作是正当的行为，如果他真是被一个政治对手杀死的话，因为他是个特殊人物，他正在迫害和折磨人民，而人民又无法用其他手段除掉他。这类恐怖行动也许会使后来的继任者的行为受到某些约束。最近三十年来的游击战和暗杀行动所没有做到的，是推翻可恶的政权。即使是在由人数很多的一些工人派别发动的最勇敢的罢工的支持下，例如在阿斯图里安的矿工工人的罢工支持下，恐怖行动也推翻不了可恶的政权。为什么？是否仅仅因为政权当局拥有足够多的武装士兵和警察？或者是还有别的原因：例如，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在这个政权下生活得很不错，已经恢复了他们革命前的地位；甚至还有更大一部分人在革命和内战中尝够了流血和恐怖的滋味，愿意在日益接近资本主义欧洲其余地方的、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化”和“繁荣”之下安定地生活？

西班牙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和抱负（以及贵族统治和政治共产主义）的传统。尽管最近几年这里的无政府主义已“得到公认”，尽管许多青年对我们的庸俗物质社会所持的无政府主义的抵制态

度是真诚的，但要使足够多的人了解和接受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使之发挥作用，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我们知道，没有就业部长，工人照样能够管理工厂和生产食品并决定我们的真正需要是什么；我们的任务是使他们——以及股东和老板——具有信心。如果没有为无政府主义所推动的工人和工会会员施加一致的巨大压力，即使是一位部长为恐怖手段所惊吓而不敢再工作，人们也不会认为就没有人来接替他，或者是政府会取消就业部和《劳资关系法》。如果是由工会代表大会和工党提出正式抗议，也许会在 1 月 12 日（星期二）产生一点影响；如果有几千名工会会员在工作时间举行游行和集会并拒绝接受职工大会的劝告，则可能产生更大的实际效果，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这清楚地表明，我国数百万工会会员尚未具有真正不可动摇的战斗精神；但对准就业部长的炸弹却似乎只是告诉人们：有那么几个人离开了人间，他们在一部蹩脚的电视片中找到了栖身之地。

13. 纽约市大停电中的无政府主义

H. W. 莫顿

1965年 11月 6 日下午 5 时后不久，在安大略省昆士登城的亚当·贝克爵士第二配电厂里，一个四平方英寸的小小的继电器主动承担了阐明若干无政府主义原则的任务。在这样做时，它采取了一种其本身就具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方法：直接行动。无疑，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次断电事件，这次断电使美国和加拿大有八万平方公里的地方灯火熄灭，使三千万人完全处于黑暗之中。这是一次电子暴力行动，其范围之大使人们很难予以忽略。但通过黑暗，它象一座灯塔，照亮了无政府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诸如分权主义、相互帮助、直接行动等等。

就个人而言，人民行动得如此漂亮，甚至连克鲁泡特金也会深受感动。当然，也有一些人象资本家那样行事的例子——以一点五美元一支的高价出卖蜡烛（11/-）乘一次出租汽车要价高达五十美元（十八英镑）手电筒的售价高得要挖人一磅肉^①等等。然而正如《新闻周刊》（1965年11月11日）所指出：一个黑人女清洁工的行动代表了“真正的主流”，她陪一位住在曼哈顿做职员的小姑娘爬上了十层楼梯，把她引到她的公寓房间，给了她两支蜡烛，并且谢绝了五块钱的小帐，说道：“不用谢，宝贝，今天晚上每个人都应该互相帮助。”

不知因为什么，整个这座疯狂的城市似乎在这次停电的前一天都读过了《互助论》^②。请记住，纽约一向是以这个地球上最大的相互残杀、激烈竞争的场所而声名狼藉的。它不仅是受停电影响最长的城市，而且是最容易受到冲击的地区。停电正好发生在最繁忙的时间，因此，停电时大约有五十万人困在地铁车站或地铁的车厢里。另外有十万人为了等上、下班的火车而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成千上万的人被困在摩天大楼上。毫无疑问，处境最坏的是被困在电梯里的数以千百计的人。但人们并没有惊慌失措！每个人都很镇静、很有耐心。也没有发生犯罪和抢劫浪潮——当然，所以能如此，是因为警察们进行了非常繁重的救护和其他抢救工作。估计收益方面损失了一亿美元（三千六百万英镑）。当然，损失最大的是纽约警察部门。所以，他们能在困境中挺住，倒是值得钦佩的，不过，当我在黑暗中从他们身边走过、用怜悯的声调大声向我的同伴说，“这些可怜的家伙正在拚命，但所得到的仍只是薪水”时，第二十四警官区的几个警察对我的这种关怀并不表

① 借喻售价之高，出自莎士比亚戏剧《威尔斯商人》，犹太人夏洛克借高利贷给安东尼，索价是割他身上一磅肉。——译者

② 《互助论》是无政府主义鼻祖克鲁泡特金的重要著作。——译者

示欣赏。（正是在第二十四警管区，经常发生枪杀十四岁波多黎各儿童的事件。）总算起来，大约有五千个不在岗位的人民警察被召来参加已经在岗位上的七千人的队伍。消防部门也把它们不在岗位的人召来了。

然而，尽管所有这些都出色地完成了职责以外的任务，但这出戏的真正明星却是人民。综合各种有关那段时间的报道来看（参看《生活》、《时代》、《周末新闻》、《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纽约时报》和《纽约邮报》）许多人实际上享受了断电的乐趣。在街上有饮酒的 有唱歌的 有接吻的。被困在帝国大厦第八十六层了望顶楼上的一群群法国人和美国南方人，互相轮流齐声高唱《马赛曲》和《美国南方各州》这首歌，虽然没有报道他们究竟唱了多久。一位教堂司事向人们免费分发蜡烛——甚至上帝也损失了钱财——与此同时，一个女盲人领着旅客走出了一座地下铁路车站。一个十九岁的女孩说：“这种情况应该经常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 每个人都十分友好。我们又成了一个大集体——大家有时间 停下来互相交谈了。”

志愿服务人员用手电筒和手帕指挥交通。在家里听半导体的人，把频率固定在报道事态发展情况的频道上，结果每个人都分享到了有用的情报。司机请步行者坐到汽车里来。人们在收费电话间、餐馆和旅馆大厅里安静地排着长队。他们聚集在街道的角落，一起听手提收音机的广播。一个擦皮鞋的孩子借着顾客划燃的火柴光亮擦完了皮鞋。

新鲜事层出不穷：整个形势令人难以置信。《时代》杂志后来提到，“在这场危机中产生了一种同志间的友谊和忠诚，人们异常兴奋。”该杂志还说人们普遍认为：“停电事件使人们表现出了最美好的东西”。不言而喻，事实是我们的权力主义的社会制度，只能促使人民表现出他们身上最丑恶的东西，因此它一旦不起作用（请

记住 当时在人们的头脑里 国家几乎已经消失)就使人们完全得以象自由人那样行动。断电之后, 各式各样的政治家、官员和其他类似的寄生者, 对于他们的“同胞”的令人满意的行为都给予了赞美, 但他们从来不曾认识到, 这种行为本身恰恰证明了他们自己在社会中的作用是多么多余。不知是什么原因, 统治阶级幸运得很: 人民经常只看透单个的领导人, 而很少看透领导层本身。一位妇女说 在断电时 她受到“如此多的彬彬有礼的对待”致使她恢复了“对人类的信心”。但具有悲剧意义的是, 她并没有说她因此而丧失了对以武力为基础的政府的信心。然而, 这次断电几乎造成了一种权力的真空; 我们在几小时内更加接近了一种真正的无政府主义状态, 这是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将来不可能再有幸看到的。附带说一下, 自由女神像, 由于其电源来自新泽西州, 整个断电期间一直亮着。“这个老妖婆”在她的一生中似乎是第一次在讲真话。

在某种程度上, 当时有一种狂欢节的气氛, 它使一位观察家想起了德国投降和对日战争胜利的日子, 那时“人人互相亲爱”。另一位观察家谈到, “当时的狂欢气氛和一场大暴风雪后的气氛差不多”。一位在三十二层楼办公的律师说: “开始时我们只是围着桌子各喝各的酒。而断电后, 大家兴高采烈地聊了起来。我们本来可以下楼去, 但是有六百级台阶呢, 所以就呆着没动, 大家慢慢地相互认识了。”另外有个人承认: “断电确实是一件很讨厌的事 但我却有点舍不得它结束, 要知道明天又是个老一套的工作日啦。”不过, 第二天和此后几天, 人们仍兴致很高地谈论着当时如何勇敢救人, 如何亲切待人以及如何富于冒险精神。有值得谈论的东西, 人们被互相感动着。接受《纽约邮报》采访的出租汽车司机、女招待员、办事员、卡车司机、老太太、青少年、律师和旅馆服务员都说: “当时大多数人都很镇静、愉快和体贴别人。”不过 与此相对照的

是，也必然有一些例外的情形：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在想通过第五号大街时胆怯地停下来，马上得到四个人的护送，但与此同时，一个乞丐却不断地拦住行人乞，致力于自己所理解的那种“相互帮助”。

自然，地面、地下和电梯交通的停顿造成了最严重的问题。有六百辆地铁火车受阻，上面有大约八十万上下班的乘客，他们当中有数以百计的人困在车厢里达八小时之久，其中有六十人困在车里的时间超过了十四小时。另外，在纽约市有数百架电梯困在公寓和办公楼的楼层里。这就意味着另有几千名遇难者需要救援。

然而，即使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主流仍然是团结一致的精神。正如一位家庭主妇在地下火车中呆了六个小时以后所说的：“我根本没有想到纽约人会是这个样子，我的意思是说，每个人好象都没有火气了。”在一个车厢里，一位乘客带领大家唱卡利波小调并且用手打着拍子。当乘务员到来，带领他们通过一道安全井走到地面上时，他们一对对地跳起舞来。据普遍的报告，当时没有慌乱。正如一位妇女所说：“我们的乘务员每隔一会儿就进来问一下：‘大家身体感到怎么样？’大家都说：‘很好’。我们确实一点儿也不感到担心。”有些愿意做好事的人离开车厢，沿着狭窄的通道摸索着寻找太平门。但在找到太平门以后，他们并没有自顾自地回家，相反地，他们回来带领和他们在一起的乘客走出去。在另外一些列车里，有才能的受难者则为他们的同伴表演：在一个车厢里有位男高音；在另一个车厢里有一位口琴演奏者，而主要的表演者则是个吹风笛的人。许多车厢的特点是大家一起唱歌。然而最通常的是轻轻地谈话，间杂着讽刺和幽默。男人们把座位让给太太们，而太太们又常常把座位还给他们。在一个车厢里，一位妇女昏倒，消息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直到从某人那里找到鼻盐，这鼻盐立即通过一只只手传到了昏倒的妇女手里。

那些长时间受困的人们把他们口袋里的或夹在日记本里的一切可吃的东西都拿出来伙着吃。花生、野樱桃糖、什锦糖果、甚至抗酸片等等。一群人共同享受了用指甲刀切开的炸面饼圈和意大利香肠。半夜，运输当局给尚未获救的人们送来了食品。运送食品的人所看到的场面是，人们相互倚靠着在睡觉，而这些人五个小时以前谁也不认识谁呢，而且没有一个警察在场！！

与此同时，困在电梯里的那些不幸者（仅帝国大厦就有九十六人），和困在地铁里的人们一样，也泰然自若地忍受着困苦。这里，人们也用即兴之作来互相解闷，在正常情况下完全不可能凑在一起的人们在停顿的电梯里玩到一块了。在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一位烧征兵卡的工人的合作下，人们玩得很快乐。在美国无线电公司大楼的一个电梯里，一位先生给大家讲怎样练瑜伽（yoga）^① 坐功。当消防人员劈开通道进入一部不能动的电梯里时，他们问道：“这里有孕妇吗？”对他们的回答是很幽默的，“我们刚刚约会^②”

地面交通表现出了同样的合作和团结精神。虽然运输当局开出了全部四千辆公共汽车中的三千五百辆，但压力仍未减少。于是，难以计算的、数以千计的人们徒步跨过大桥或走上大道回家。其他人安静地在公共汽车站排队，没有乱推乱挤的现象。似乎没有人想乘这混乱之际揩油不买票，虽然某些乘客想买票也没有办法买——因为他们是骑坐在汽车后面的保险杆上的。公共汽车的驾驶员本身也一反常态地给人方便，每到一站都要大声报站名。在纽约这种情况平时只是在报纸的“难得遇到”栏下出现。同时，每个十字路口都有好几十辆私人汽车装上了完全陌生的人。

另一方面，在黑暗之中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甜蜜和光明的。有些人利用这时的可趁之机大捞别人一把。约有一百个橱窗被砸

① 瑜伽（yoga），印度哲学的一派，带有神秘主义色彩。——译者

② 此处指男女之间谈恋爱的初次约会，与上句孕妇相接，十分幽默。——译者

开，约有四十一个抢劫者被逮捕（没有一个是穿蓝制服的）。总结起来，大约有十二家商店被抢劫，这在一个有八百万人口的城市里完全是微不足道的。甚至连警察专员布罗代里克也承认，这天晚上犯罪和伤亡的比率比平时低得多（可见得谁需要他呢？）一个大胆的歹徒在商店仅有的烛火照耀下抢劫一个经营稀有古币的古董商——不用说，这是一个挺有趣的镜头。总共有八十五人因抢劫、偷窃或罪恶的袭击而被捕——这与平时十六小时内平均有三百八十人被捕的数字比较起来是相当小的。因犯罪而被逮捕的总人数只有平时夜间犯罪数字的百分之二十五。冒充顾客在商店行窃的扒手也很少，考虑到各百货商店实行的是开架经营方针，这简直是近于奇迹了（参看以下有关材料）。另外，造成伤害的车祸只有三十二处，造成损失的车祸有四十五起——而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在完全没有红绿灯的情况下发生的！只有一辆公共汽车在昆斯冲进了人群，压伤了三十八人，其中有些人受了重伤。司机显然吓得够呛，跳下车逃走了。不过，这件事还应该联系这样的事实来看，即这个司机的公共汽车是在当时那种困难的条件下行驶的三千五百辆公共汽车中唯一的一辆。

在地下铁道线的某个地方，一个地铁电气机车司机被控告犯有强奸罪行，因为他用手电打信号，把一位年轻的妇女引到了他自己的房间这个所谓安全的地方。后来他在法庭上声辩说：他以前曾多次带领这位妇女到这个住处去干这种勾当，所以，谁知道是怎么回事？……把可能的假警报和确凿的假警报算入内，我们发现消防部门报告的火灾发生率要比平时高得多：二百二十七起对平时的五十起，这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是根本不相容的，因而暂且不提它。

当时象资本家那样行事的人较少，而象人那样行事的资本家则较多，后者可以轻而易举地抵消前者。例如，不少百货商店在这

天夜里都允许自由进入。马锡商店在这天夜里招待了大约五千名顾客和雇员——邀请所有的人到店里来歇脚，向他们提供咖啡、三明治、甜饼和糖果。不用说，九楼的家具部是最舒适的地方。同时，大街对面的吉姆贝尔斯商店的一位推销员则以演奏吉他来招待顾客。据说，顾客随着吉他的曲调一起唱起了古老战争年代的一首流行歌曲《阳光再次普照大地》。很显然当时没有人会唱《我们将赢得胜利》，否则他们一定会唱这首歌的。洛德一泰勒商店在停电过程中向顾客开放了整个二层楼，与此同时，B.阿尔特曼商店也开放了它的第一层楼。阿尔特曼商店碰巧自备有发电机，因此那里有一点灯光，凭借着这点灯光，人们享受了食品品尝部向顾客和雇员们供应的进口精美食品——鱼子酱和特别调配的咖啡。五百人在那里过夜（显然他们舍不得离开这种鱼子酱）。布卢明达尔斯商店向停留者开放了它的家具部——一个妇女睡在一张价值八百美元（二百八十七英镑）的沙发上——而这种慷慨行为的高潮则是，在第二天早晨，商店职员还向每个人提供早餐！菲纳公司原来在这天晚上安排了一个销货会议和宴会，但他们把准备的东西让给了顾客。邦威脱·泰勒商店为了让雇员安全回家，租了二辆公共汽车，并建议他们在离开商店时要手拉手，这样可以避免有人走失。很能说明当时的普遍情绪的事实是：雇员们一起跳着舞走出了商店，因为“某些人认为这是很有趣的”。同时，这一夜有四十个人在席孟斯褥垫公司陈列室里睡觉。

这个城市的旅店也表现了高尚的风格。康默多饭店在宴会厅安置了一百个床位。罗斯福和阿尔根昆两家饭店把年纪大的和有心脏病的客人转移到底层去。斯坦霍佩饭店的经理让出了自己的住房，一位副经理把一位跛脚妇女背上了十六楼。爬上去以后，这位妇女说：“我想要一杯水，”于是副经理设法找来了水。在斯泰特勒·希尔顿饭店，两位服务员把一位跛脚客人背上了七楼，但没

有报道说到达七楼后，客人要什么东西。阿美利加纳饭店给暂时在它那豪华的门厅里栖身的二百个人发了毛毯和枕头——其他大多数旅店只是免费让人们在门厅住宿。谢拉顿—亚特兰大饭店的门厅里大约居住了二千人，该家饭店认为，这天晚上也不是全无所为，因为正如一位经理所指出的：“酒吧间的生意非常兴隆。”这个旅店的报告似乎是有典型性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当时“处境是困难的”，但是只有个别人试图用双倍的租金把他们原有的房间转租给别人。

不幸的是，乌托邦式的免费供应食品远不如免费提供住处那么普遍。不过，布鲁克林的一家肉店赠给邻近的女修道院一只整猪，从而使住在附近的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份烤猪排快餐。两家用数字命名的饭馆，“二十一”和“四季”饭馆采取了一种其危险性近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政策。“二十一”饭馆免费敞开供应炸三明治和饮料，而“四季”饭馆则免费供应菜汤。为了充分说明这种牺牲之巨大，请大家想一想以下情况：记得 1960 年，当时物价还比较便宜，我的一位熟人告诉我，他有两位朋友到“四季”饭馆进午餐，包括饮料和小帐，花费了将近六十块美元（超过二十一个英镑）当他们进餐时，乐队则演奏着《我的家产快给你了》这首歌。我和我的夫人这一夜碰巧没有上那儿去，因此错过了免费喝汤的机会，但我们在附近的熟食店里自己花钱在烛光下享用了厚馅饼，倒也很惬意。其他许多饭馆虽然没有免费供应食品，但却整夜开门，免费提供人们歇脚的地方。

市区的大多数办事机构都在下午 5 时下班，因此停电时，办公室是空的。那些还有人的办公室则尽到了他们有可能尽到的一切责任。例如，雷尔文公司就在经理办公室里给本公司的姑娘们安置了临时卧榻，并且告诉她们第二天可以不上班。一个秘书困在第二十七层楼，但却吃到了蟹肉和全麦薄脆三明治，后来她以怀念

的口吻描述她的这段经历说：“我过得痛快极了。”她心目中指的是螃蟹肉呢还是临时卧榻，就不清楚了。

各式各样的机构都敞开了它们的大门，有些船舶还放下了舷梯，作为紧急情况下一种免费的公众服务。据最后估计，停电时被临时安置在停泊于港口轮船上特等舱里的人大大超过四百人。兵工厂也对所有的来者开放，同时，火车站、航空集散站、教堂也给难以统计的成千上万的人提供了住处。

仅第三十四街兵工厂一处就接待了一千五百人，兵工厂向他们提供了木椅，并由停靠在操练场中央的几部吉普车的头灯提供照明。由于某种尚难说明的原因，没有提供床铺。洛克菲勒^①很自然地立即召集国民警卫队，这种行动经常是他掩盖州长无能的既好又安全的手法。根据《纽约邮报》的报道：警卫队员手持步枪，未上子弹但极其威风。为了完成这出滑稽戏，他们背着装有雨披和防毒面具的背包，可能是因为有的人会放屁吧。警卫队的主要贡献看来是在第三十四号街和公园大道周围进行搜索，他们一直搜索到早晨一点半——也就是停电发生以后的整整八小时——直到这时，他们才终于为被围困者弄到一点咖啡和法国面包。《生活》杂志把军队的这种慢慢腾腾、拖拖拉拉的作风与妓女寻求面包的机灵作了对比后指出：这些妇女“属于首先得到手电筒的人之列”，从而表明，对某物的渴望要比剑更有力量。

中央高等商业学校是一所分两班上学的学校，第二班上课时间是从下午 12:30 到 5:50。因此在停电时，那里有一千名学生被困。他们当中约有四百人在晚上被父母赶来带走，而其余的六百则由学校安排在教室里过了一整夜。这些留下的学生说笑话、唱歌，后来把头伏在课桌上睡觉——轻松地愉快地渡过了这场危

^① 洛克菲勒当时任纽约州州长。——译者

机。当然，他们不如邻近的靠在豪华的理发椅上过夜的那些幸运儿舒服，但他们比在圣帕特里大教堂寻找栖身处的几百人要好得多。这些人挤在教堂的凳子上，甚至没有一件粗毛衫衣来御寒，而最糟糕的是没有厕所！马克戈维尔主教后来承认，“我们八十年来一直是把人送到新西方饭店去”。这帮助证实了我们当中许多人长期以来所怀疑的一点：即上帝也处于困境之中。

医院的情况更是事关重大。这里的人们在紧急关头也表现得很出色。在贝尔维尤医院，当灯光熄灭时，正在进行一项细致的角膜移植手术，但使用乾电池的汛光灯泡照明，也成功地完成了这次手术。在圣约翰医院，在同样的条件下，完成了两个人的紧急手术。这两个人的脾在前面提到的公共汽车事故中受压而破裂。在另一所医院里借助临时灯光，完成了五小时的破头盖骨手术。最后的报告表明，至少有六十个婴儿在蜡烛和其他灯光下出生。有一个人在福卢希医院的急救室里惨死。他是在停电以前的一次车祸中受伤，而当灯火熄灭时，他已经在做手术。在纽约市，只有二名死者直接和停电有关：一个是因爬十层楼梯，心脏病发作而死；另一个是从楼梯上掉下来，撞破了脑袋。当然，受伤的要得多得多：仅在贝尔维尤医院的急救室里，就有一百四十五名病人是因停电受伤而接受治疗——跌伤胳膊、腿的，车祸的受难者是某些心脏病患者。为了保持医院储存的血液不致变质，警察、消防队员和志愿者赶着运干冰到城里的医院里来；圣文森脱医院的紧急求援，从格林威治村咖啡馆召来了三十名志愿者，用手唧筒给铁肺打进空气。

虽然纽约也许提供了最引人注目的互相帮助的事例（而从它一向以无情竞争闻名于世这一点来看，出现这种互助现象也确是最难能可贵的），但同样的情况在整个停电地区比比皆是。在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人们普遍表现得很团结，机智，

很体贴人，没有谁歇斯底里。在安大略省的多伦多，企业家走上街头指挥交通，处理了这个城市最严重的一次交通阻塞事件。除其他方面的混乱外，当时市内的全部有轨电车和无轨电车都突然停住不动了。在纽约州的阿尔巴尼，青少年们带着半导体收音机挨家挨户地劝居民关掉电气用具。在佛蒙特州的伯林顿，二百人为了响应一座无线电台的要求打着手电筒赶到当地医院去，虽然后来证明那架电台的呼吁原来是开玩笑。在佛蒙特州的伯林顿，一个理发师借助汽车司机用汽车头灯射在前窗上的亮光，给顾客理完了发。在整个停电地区，居民们在街上巡逻，指挥交通和维持秩序。在某些志愿人员中，还有从警察局舞会中赶来的穿着无尾礼服的波士顿宪兵小分队。由于他们没有佩戴袖标，没有穿制服，也没有带枪，这些人和同时投入行动的波士顿大学的学生们处于同等地位。

一个又一个事例无可辩驳地证明，没有国家的武力和暴力的威慑，社会照样能够运行。在这块八万英里的无电地区，可以说自从当初由被杀害或被欺骗的印地安人那里窃取到这块土地以来，没有任何时候享有那样多的摆脱掉法律的自由，虽然这种自由是短暂的。这种情况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正如克鲁泡特金曾经说过的：“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说：‘做你要做的事 按你的愿望行动’，因为我们相信，人类的大多数按照其不同的觉悟程度及其从现存的枷锁中解脱出来的程度，他们的所作所为总是有益于社会的。”

因此，停电事件证实了克鲁泡特金的理论。而该事件又为巴枯宁提供了什么样的支持呢？事实上是很多的，但是我只举一个例子——一句经常被歪曲引用的、巴枯宁的话，这句话曾被麦克斯·内蒂劳说成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吹起了嘹亮的革命号角”。这句话写于 1842 年，那是在巴枯宁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大约二十年

之前，实际上甚至是在他被视为自觉的革命者之前，当时，巴枯宁用朱尔斯·埃利萨尔德这一笔名，在一篇题为《德国的反动》的文章的结尾处写道：“破坏的欲望就是创造的欲望。”贬损巴枯宁的人，不管在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内部还是外部，总是象秃鹫那样向这一行文字猛扑。不过，巴枯宁分子也许可以不必那么沮丧（或坦率地说，不必那么尴尬），如果他们把这句话因停电后一天《纽约邮报》金融栏登载的一篇暖人心房的题为《没有权力，计算机宣告死亡，华尔街停止活动》的文章联系起来看的话。

另一方面，如果说这次停电事件为分权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主义者和巴枯宁主义者都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根据的话，那末，它对于和平主义者又提供了哪些安慰呢？回答是提供的安慰少得可怜。正如《纽约邮报》的詹姆斯·韦奇斯莱尔和《和平新闻》的布拉德·莱特勒所指出的，无限奥妙而万无一失的电子技术竟使我们三十亿人民永远失去光明！使我多少得到一点儿安慰的是，整座该死的五角大楼也将成为放射性尘埃而落到地面上：我的破坏的欲望并不完全是创造的欲望。一方面由于热线出了故障，一方面由于第一军区防空司令兴高采烈地作了“保证”即使停电“东海岸所有的导弹基地也会正常运行”因而很显然，灭绝种族的屠杀还会象往常那样继续下去。这只会把我们引到黑暗的中世纪！

这次停电事件给人的最根本的教益是什么呢？当面临危机时，社会中各类成员的可以预计得到的、几乎是不由自主的反应是士兵依靠武器，神职人员依靠祈祷，医生依靠抗菌素，官僚们依靠办公桌；政治家们依靠他们的蠢驴^①。但人民则相互依靠，这正是人类生存的全部希望所在，而不管这种希望多么微小。

^① 美国民主党的标志是驴，此处系指政治家们依靠其政党机构。同时“驴”又代表愚蠢；此处语含讽刺。——译者

14. 一种新意识和关于它的争论

约翰·奥康纳

一个经常被写到、被讨论到并向每一个社会革命家提出的难以回答的问题是：究竟是先设法改变社会的结构，然后等待公众的意识逐渐适应新的环境，从而达到改善生活质量的目的是呢？还是先引起争论，目的是首先引起意识上的变化，从而与旧的社会秩序发生冲突并摧毁这种秩序呢？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认为当前参与革命性宣传的人所采取的，正是后一种行动路线。反文化的秘密团体（其他的政治左派在这方面正追随他们）正通过艺术、吸毒、性生活和音乐等途径以其感官刺激产生的入迷状态和领悟力，强调自我探索，这种探索被视为一个历史时刻的前奏。到那个时刻，当“新的意识”尝到了足够多的自由之后，就会要求推翻压制性的社会秩序。

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闲暇的增多，已使社会革命家不再对住房和营养条件感兴趣，而把注意力转向了这种能够满足第一需要的社会的所谓更严重的心理上和感情上的病症。虽然这种革命者不可避免地运用了老一套的恐吓和威胁的宣传以应付新的形势（在迫使顽固的雇主提高工资方面，这种恐吓曾一度证明非常有效），但是，那些在不太有利的经济情况下本来可能会竭力唤起工人进行反抗的论战者们，现在却集中力量鼓吹感情和性生活方面的改善，并且在宣传时是那样狂热，毫不考虑在工业急剧改组过程中几乎是必然需要的冷静态度。我们知道，影响某个人对自己拥有的一家或两家工厂的敏感心理（甚至可能达到说服他们把这些工厂烧掉的程度）是一回事；而为了政治理由去劝说某人服用改变思想的毒品或者指点他应该和什么女人同床，并指点他为了和平运动

的缘故或者为了更大的社会利益，他上床后应该干些什么，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因此，宣传重点的改变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而不管当前运用这种宣传的是代表既成体制的人还是反对既成体制的人。

如果为了消除一个一向压迫广大人民的社会秩序的首脑而枪毙一个国王或沙皇及其家属或者一位总理及其内阁，对于被枪毙的人来说可能是不公平的，但在政治上则可能是必需的。

另一方面，如果政治家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到了社会主体本身的意识上，如果他碰巧发现理性的统治正在使西方的意识受到暴虐的压迫，正在压制沸腾的感情以及隐藏在这种感情深处的个人的本能 我们便不能指望人们去反抗冷酷无情的“线性逻辑”以求最终获得一个公正美好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激烈的感情将恢复正常，得以平静地生活。一旦人们不可抗拒地选择了反对彰明昭著的压迫者的方向，长期存在于西方思想中的几个世纪的不公平感便只能使暴君受到报复而最终导致他的覆灭。

这是积极的政治意识的一种特性，而且具有其重要的作用。由于人们说我本人就是狂热运动的鼓吹者，所以我在此必须提到，我自己也发现了它的缺陷。这场论战的最得意的方面是它方向的奇特和对偏见的操纵和利用。可是，它不能被用来揭示事实，因为这和侧重点本身有更大的关系。从社会和物质方面讲，事实并不太重要：有点不公正正是暴君达到他的目的所需要的。但是，如果正如已经发生的那样，论战被利用来维护具有一系列不同思想和不同感情的党派立场，这只能有助于分裂那些应该包括一切思想感情因素在内的公众意识。在我们所讨论的这种情况下，如果以吸毒来逃避现实的颓废派哲学家、好斗的艺术家、巨富的音乐家、反理性的美国学究、麻醉药物的销售者或者玄学家成功地把全体民众的意识摧残殆尽的话，那末处决少数地主和资本家便可能成为无

意义的事。

感官的放纵和深入探索

如果人民处在可怕的压抑之下，那么，在某种程度上鼓动人们去体验一下各种各样的经验，包括性生活方面的、政治方面的和宗教方面的一切经验——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会把革命视为社会有机体的亢奋，把意识到神的存在的经验视为与上帝的结合——可能倒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一个这样的时刻很可能会到来（在那些接受上述宣传最多的人们当中，这一时刻已经到来了）那时，“新意识”的偏见在一个方向上已被推到如此之远的地方，以致人民就象一度严格而坚决地处于自我压抑状态中那样，开始坚决地和不顾一切地沉溺于感官的放纵。这是不是生活状况的一种改善，这是不是更加革命或是仅仅是更加喧闹而已，可以通过观察它在意识熔炉里出来的情况来得到最好的解答。如果我们的发现和更大社会范围的情性躯体很少有关，我们就可以预料，赶时髦的风气、政治和资本主义必然会或迟或早地均匀地把它传播开。

不幸的是，我认为人民的感情无疑是可以宣传的手段来改变的。如果碰巧有这么一个国家，它拥有大量守旧而咄咄逼人的爱国主义者，难道依靠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其帝国主义野心的扩大，就能把一切都弄颠倒，以至出现大量无耻的手淫者而只有极少数鬼鬼祟祟的爱国主义者，有这种可能吗？即使我们能找到这种现象的实例，也难以证明它，因为这出戏里的所有的演员都认为，他们已经选择了他们要成为的那个样子，而不管经济的发展如何。

如果任何人想指出，自由的人民既不愿意做摇国旗者^①，也不愿意做摇鸡者^②，也不愿意联合在一起拍摄二者兼而有之的影片，

① 指爱国主义者。——译者

② 指同性恋者。——译者

那就必然会把这场论战抛到一边而不予置理。当实际问题已摆在我们面前，也就是要我们作出抉择，究竟是发生性行为还是发动战争的时候，人民总想稍微摆脱开个人的选择，而论战者则关心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

守护神、侏儒和小毛皮动物

吸毒者的群居乐园有一个使革命者深受鼓舞的特点，即它的居民对任何形式的权威都敏感得很。在他们看来，警察象恶毒的外国人，甚至连收票员也对自由构成了可怕的障碍。一次，在旅游旺季，我在一座美术馆里寻找出口处，开始十分平静，但当我意识到我在同一个冷漠的服务员身边已经绕过五次的时候，我便产生一种不寒而慄的感觉：如果我再从他那儿经过，他就必然会（这时他的声音也就会变得带有威胁性）喊出来：注意——有个人——形迹可疑！

他当然没有这样做，但这件事说明，人们所以对任何形式的权威都那么敏感，这种感觉所以会引起人们认为到处都布满了警察密探并由此而产生集体偏执狂，这是因为人们在心理上日益变得脆弱，易于为任何可列为有妨碍性的东西所干扰。我以为——而某些人正因为吸毒者的这种深刻见解而器重他们——它所造成的是一种类似被秘密串通起来的幼儿园阿姨、学校教师和家长包围着的孩子所具有的敏感心理。

这肯定会使人们反抗外部强加的权威，但是离开那种有意识地锻炼自身来对付那种权威的革命意识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吸毒者们的意识有可能变成一种神经质，一种叫人厌恶的敏感心理，而为这种神经质和敏感心理极端厌恶的任何思想体系或纲领要想有所成功，就必须好好学习一番察颜观色和伪装的本领（把声音压得低低的）；否则就只会触犯某种极端敏感的心理，使人们一溜烟

地跑开。吸毒的玄学家或者通过吸毒来逃避现实的专家们会指出：这种脆弱的敏感心理在与世无争的吸毒者中，是一种极普遍的暂时现象，由此而获得的对于残酷权威的认识可以帮助消除这种心理。这也许是可能的，但据我了解，另一些人却被他们自身的经历所摧毁，变成了歇斯底里的野蛮人，我现在只能在那吵吵嚷嚷的和难得有的疯人院周末放风中见到他们。这不是吸食麻醉品本身造成的。这是一种对于他们自身痛苦处境（乃至全人类的痛苦处境）的过分强烈的意识，而在产生这种意识之前，他们却没有获得任何精神支柱。

有些人说他们愿意完完全全地进入麻醉品造成的另一个现实之中而不再出来，因而开始服用麻醉品。在我去过的一些吸毒者群居区里和在我经常访问的一所疯人院里，这些地方住满了被叫做“头头”的人。我观察到，看来和他们对这个世界上专横的权力当局所怀有的敌视意识分不开的、最突出的心理是所谓“对障碍的反感”。不论是一座指针指在令人不愉快的时刻上的时钟，还是一个包含着不祥的直线真理的声明，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权威地位在寻求独特的个人生存价值的人看来都是人民的敌人。巴枯宁曾告诉我们，他只愿意“在自己的理性强迫自己接受时”才向人类的权威屈服，他的这句话里有一种特别自相矛盾的色彩。既然人们所写的每一本书或者人们能够想到的任何可能有的思想早已包含在人的本体之内，为什么还要考虑那些从外部闯入的现实呢？

一种寻欢作乐的新型公民

在最近的将来，人生的功利主义和功能性的内容将愈来愈少，因此，如果人们在自我探索和各种形式的活动中不能发现存在的意义，生活中就将没有他们的地盘。绝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对这种状况感到不满。我们理当问一问我们自己，什么样的性格也许是

更加适应于现实提供的这些可能性的性格吧)可能欢迎用五彩缤纷的自我表现的机会和途径来代替眼前这种苍白的功利主义的存在模式?我们是否会发现这样的人将积极地站在革命性社会宣传的前列?为了与论战重点的变化保持一致,他将强调改变意识和进行内心革命的必要性(在任何情况下,他对政治本身都不感兴趣)。他的希望是,当目前尚处于愚昧落后状态中的工人和他那受奴役的老婆成为温和的兄弟姐妹的时候,将发生一场反对政府的革命;这种希望可能掩盖了一种从本质上说是主观主义的关于理想的存在模式的观点,但就它本身来说却可能是十分真诚的。

在“游乐场”或“娱乐大厦”里,人处理实际事务的功能将无容身之地,有的只是自我表现的满足和单纯的“存在”带给人的种种新奇感。然而,目前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宣传的人在我们的社会里却确实具有一种功能,这种功能甚至使他自己都没有看到他正在帮助建立的世界的真实性质。与政府当局进行一些小冲突,一些人比广大群众更加粗鲁和原始,甚至骂少数人是“猪猡”。我估计都会有助于丰富我们的生活,很显然,如果听任这种生活沉溺于它所信仰的理想之中,它将变得十分沉闷。格瓦拉不是一个可以和我们的论战者相提并论的真正合适的人物,但他也同样热衷于为他自身的能量寻找一个功利主义的发泄场所,而且,不管他是否有助于促进新社会的产生,他在那个不能为他提供同样的机会来表现他自己的社会里其实是不能生活下去的。

那种创办微型“人间乐园”的社会宣传家(他们常常是富有者)提出了一种理论,即当这种寻求生活乐趣的理想风行于整个社会(他们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进行宣传的),当人民纷纷变成了与世无争的和爱玩耍的寻求乐趣者,从而在思想上消除了追求权力的因素的最后痕迹的时候,争权夺利的冲动的表现——国家机器便将消失。如果你怀疑在真实的生活里是否会发生这种

事，他们会说：当每个人都变成寻欢作乐的理想公民时，就不会有任何人运转国家机器。如果你仍然深深地吸气并来回踱步对此表示怀疑，你便可能听到最后的论证。无论如何，他们会补充说，政府不会允许人民成为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越是散布这种新的意识，反对压制性的社会秩序的行动就会越早爆发。

以上便是在理论上可以被用来支持意识变化的三个论据。假如如兄弟姐妹们（他们是以改变意识为目的的革命论战的主要宣传对象）真正厌恶自己生活受人控制，他们就多半不会试图控制别人。这种宣传把人的品质灌输给人们后，便可能造就出一种本身决不想控制别人的好人，但他们很容易受到那些拚命想要统治别人的人的操纵。国家有朝一日也许需要尽可能多的一味寻欢作乐的公民，这些人很容易被教育得满足于现状，满足于单纯享受生活乐趣，满足于在一个不受功利主义的急需所干扰的“永恒的现状”这一美妙的天地里痛饮（感到无聊的叫喊可能会来得太迟，以致不能再能改变任何状况）。一个政府是否能够提供一种值得呼吸于其中的空气和国家是争论的焦点，它已经迫使许多人相信，他们作为革命者所反对的是国家控制的“思想”，而不是资本主义在现阶段所使用的控制手段和所创造的环境。

它不在树上生长！

奥泰格·伊·加塞特提出，城市景观对于出生在城市里的人来说，已经具有了一种自然环境的面貌；而且，与那种使他反对真正自然的本能相一致的是，他已经转而反对枝叶茂密的丛林并且正在企图破坏它。同陀斯妥也夫斯基^①或爱伦坡^②的解释相比，这似乎更好地解释了那种为表现它的自由而要危害它自身存在的

① 陀斯妥也夫斯基，俄国十九世纪名作家。——译者

② 爱伦坡，美国十九世纪小说家。——译者

反常现象（不过陀斯妥也夫斯基确实认为，人类有朝一日也许不得不选择发疯作为唯一留给他的自由）。

有些人正在有意地破坏意识，这可能是出于一种同样没有希望的和非常不革命的迫切要求自由的推动。有一种艺术恢复了生活中武断的和任意的因素，并且说：“这种艺术的内容就是你自己的独特的自我所要求它具有的任何内容”，这是在使用进行政治奉承时的陈词滥调，所不同的是，对于个别艺术家来说，这可能是在不希望由别人来指引道路的人中间争取观众的最后一次尝试。

一旦从周围的混乱中抓出秩序必定是一种成功，那些总算做到了这一点的人是有某些使人高兴的东西的。现在，由于全民教育和自动化的环境似乎要把直线思想和直线行动强加于我们，所以用那种方法再次逃避进入混乱之中，恢复个人特色和要求取得自由就变成了一个事关荣誉的问题。

学院颓废派

一个生活在美国南方各州黑奴所经历的条件下的斗争的民族，其生活本身就充满了动荡不定和机会，从而创造出一种紧密结合的和“混合在一起”的艺术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能够变通而又非常顽固的精神状态。意识的瓦解仅仅对于那些在富裕中作茧自缚得如此之紧、以致与其理论的实际内涵毫无接触的人是可以想象的。安德烈·布雷顿是另一种作茧自缚的人，他那独裁主义的个性（在争论究竟应该用什么精确的方法来毁掉思想时表现出来的！）保证他没有和他自己的理论发生赤裸裸的联系。一些追随他的年轻人这样做了，不久以后不是发疯就是自杀。

反对理性的学院派人物没有允许自己的个人反抗充分发挥。他们没有生活在自发的非理性的人们中间（至多只是企图用一种合适的直接方法向这些人解释那无所不包的内在感觉）。如果某

些人在大学谋生，而不同他们的理论所要争取的反对文化的人们混在一起，他们便可能梦想造反，梦想把粪便倒入当局的考试档案里，或者在校园里脱光自己的衣服等等。他们不会亲自去做这些事情，而是为那些没有什么可以损失的人们提供理论上的论据和哲学上的辩护。同那少数几个真正采取行动的人相比，他们更善于给予理论上的支持。但是，如果他们正象自己所宣扬的那样，脱离社会，特别是脱离产生这种理论的令人窒息的环境，他们就会进入一个冷酷得多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中，他们会发现这些理论将化为一股轻烟，化为“自然”和“秩序”、“自发”和“压抑”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将会溶化为某种更美好的东西。

如果你不能做到别出心裁，

那末就任性胡来吧！

几乎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参与攻击杰出人物统治论和艺术的矫揉造作，企图用某种分权主义的经验来代替盲目的崇拜。但尽管如此，当布满灰尘的一百年前的古老传统被抛弃，从而带来最初一阵欢欣（现在，人们终于将考虑一下他们自身了！）以后，当五年的传统和六十年代的黄金时代恢复了它们的地位，并且在这种恢复过程中还表现出了和最后一群真正的信仰者在同样大的程度上使他们感到生气的势利眼光和排他性崇拜的时候，他们仍然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压抑。它号召从根本上来一个改变。历史已经被废除，使人松了一口气和暂时高兴了一阵子之后，现在我们正日益为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永恒现实”所苦恼。

当服用麻醉毒品以及艺术中强调随意因素而造成的意识崩溃被用来传递一种政治“信息”的时候，它的出现是和更广大的公众的怠惰的心灵相一致的。论战者可以指出，依靠直线控制和严密逻辑的国家机器会为无关紧要的小事和傻笑所破坏，以此证明他们利用非理性原理是有道理的。然而，除了在少数审判室或通过宣

传媒介进行的对抗以外，实际情况是，唯一给予这种学说以注意的人乃是许许多多聪明的青年人，他们往往会相信所推荐的思想模式。他们把它用在他们自己身上，作为他们自己的所有物、自己的行动准则，并把它变成一种活生生的“策略”……一种傻笑而不是把它作为一种带有狡诈性质的和处心积虑的良好策略（这个游戏是被操纵的，不能玩的等等）。但它至少是他们自己的创造物！某一个人的非理性原理决不会和另一个人的完全相同，对比之下，非理性原理便使得那种共同约定的客观真理显得枯燥乏味了。

与思想上回到非理性因素上的这一点并存的，是愿意承认有助于控制外部环境中自然而然地存在着的随意性和专断性的每一项理性的修正都是一个进步。避孕是一种理性措施，它给予人们更多的选择，更多的自我决定的机会（如果这是他们所需要的话）。这也可以说是从他们的生活中消除了另一种随机的和命中注定的因素，强迫他们屈从于另一类风险和命运的任意摆布。一种日益变得混乱的思想和反映这种思想的艺术和音乐，可能是我们为这样一种日益由自己掌握的存在付出的代价，这种存在只能在自我导致的疯狂中找到新奇的东西。这意味着社会内部结构的统一以及存在于构成此种统一的个人当中的理性统治的王国，不仅将受到我们社会中的政治中间势力的攻击，而且还将受到这种势力的先锋队——反主流文化的人们的攻击。这是一种新的意识，但它正在促使无政府主义者能够指出和说明的唯一的结构日趋崩溃；这是对外部强加的统一的一种替换。

一粒米中见世界

赫克斯利关于服用幻觉剂“墨斯卡灵”的第一次感受的描述，对于研究连续使用任何一种幻觉剂所造成的精神状态来说，都会把人引入歧途。麻醉剂可以使人产生强烈的感受，它强迫一个人

达到“极为兴奋的探求”状态，而这种探求，正如埃利沃脱所深知的，往往在性交中找到答案。之所以有如此众多的不同类型的笃信教义者劝其他人去服用麻醉剂，是因为他们认为（正如我们大家都会认为的那样），依附于他们自己的信仰之上的同一种亢奋的意识，一定会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以同样强烈的程度复现。当士兵们认识到自己在一个没有战斗的地方当兵的愚蠢以后，他们会笑倒在地。然而，如果在服用麻醉剂后把他们投入战斗，他们亢奋的意识就会使他们比以往更强烈地认识到战斗的重要。麻醉剂就其本身来说是完全中性的，它仅仅是使当时最重要的一切内部或外部需要的因素都表现出来，并强迫它们向一个方向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吸毒能够在我国变成一种奇怪的现象，即“促成”某些人产生发财或掌握大权的欲望——例如贪得无厌的“钱迷瘾君子”或者“吸毒的权势迷”的原因。然而，正如大量文献所记载的那样，当大部分人的“意向”处于强化状态时，他们所需要的则是通过爱情以及共同工作同别人交流思想和进行接触。我们由此而有所了解的是人民和我们自己身上的社会性因素，而不是麻醉剂的作用。

理解服用麻醉剂的感受的关键，是理解所谓“赤裸裸的需要”，那是一个听任感情浪潮摆布的状态，这种浪潮为求得对各种问题的回答而大声呐喊，为了和平，为了革命，为了珍妮·莫雷沃，为了上帝，为了结束活体解剖，为了爱情，为了普遍的裸体，或者为了在这个时候能有所帮助的任何事情和任何人。许多语无伦次的论战者就是由这些激烈的感情动荡造成的，他们要求来一次包罗万象的革命。如果你经常服用足够的麻醉剂，接近于这种“赤裸裸的需要”的十字路口并进入一种“极为兴奋的探求”状态，而不再为许多自行出现的逃避现实的幻觉中的一种所浸没，这可能成为一种非常痛苦的感受。这是在麻醉品和使用巴比土酸盐或海洛因来缓和，服用麻醉品后进入的心理现实之间的心理桥梁。由于同一原因，

好几年前开始服用麻醉品的人已经回过头来喝酒，不过在一段时期内，服用麻醉剂会产生一种新形式的清教主义，并由此而带有几分敬神味道地抛弃麻醉品。素食主义和瑜伽，不管他们表现什么样的好观念，都是清教主义的另外两种形式，而这种清教主义在我看来则是由那些往往是为了回答“极端兴奋的探求”而作出的“良好决定”引起的。

麻醉品本来和革命没有任何关系，不过“赤裸裸的需要”这一极端状态往往使人们意识到必须“有所作为”，而这就经常涉及社会的改革。它没有给予关于能做什么事的回答，在现有的物质条件和人类所处的困境下究竟能做什么事，它并没有给予答案，而多半是以猛烈抨击人类的痛苦现状而告终。先锋派团体首先依附于佛教这一点说明，人们仍然醉心于一粒米或一把椅子的催眠术所造成的心理浪潮以及它所包含的无穷变化和复杂心理。最近人们对基督教（及其救世主个人）兴趣的增加，表明对完全虚无的恐怖在增加，而这种虚无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为佛教所接受的。

“神爽”状态

在先锋派的刊物里，“神爽”这个词是十分突然地普遍流行开来的。该词的广泛使用可能意味着在仍然服用麻醉品的人们中对麻醉品的态度和主张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神爽”状态在基督教神学中是幻想和错觉的对立面，而且据说是拒绝向后者屈服而获得的报酬，因此，对这一概念发生兴趣也许表明，当麻醉品引起的幻想和错觉等等感受正在日益控制服用者的时候，他们也在竭力进行反抗。

处在麻醉品的影响下而同时又反抗麻醉品（其方法可能是试图把某些显然是直线性的因素集合在一起），这可能会造成一阵阵的痛苦，并使耳朵里充满颤抖的噪声。这种几乎象麻电似的噪声，

据我看来是引起所谓我们正在受到太空人干扰这一谣传的原因。某些爵士音乐中也经常使用这种噪音，这种噪音往往使我产生一个奇怪的想法，即正在产生的某些艺术给予自鸣得意的人们的痛苦比给予斗争中的人们的快乐要多。这似乎是要阻止意识的崩溃，而目前人们正在利用意识的崩溃从政治上打破富裕的束缚。

随着麻醉品作用的消失，痛苦的浪潮慢慢地化成了一种轻松的感觉，一种完全的解脱——一种虚假的“神爽”状态。这种状态在迪斯尼的《幻想》一剧的最后几场中也就是在当“黑山”使人苦恼的夜晚转向清凉的朦胧状态、前进的队伍走向墓地时表现得最为彻底。对大多数人来说，吸食麻醉毒品产生幻觉后，天刚刚亮的时候散一会儿步也许会引起同样的感受。

在达达派转向超现实派的过程中，同一种机制曾在较大的范围内引起过相同的作用，但没有达到最后的阶段。达达主义者使自己陷于虚无之中，拒绝希望和信仰，但他们未能持久，最后还是接受了在这时向他们提供的优厚报酬——幻觉与错觉。而超现实主义只好依附于共产主义，而又是依附于更加富有适应性的无政府主义，虽然后者似乎才是他们的理论必然导致的结果。潜在的政委和他们那严酷的刻板的控制手段，已经成为一种沉迷于幻想的世界观的自然补充，这种世界观只能依附于它的对立面才可得到平衡。同样“搬进‘穴居人——聚集地’”（嬉皮士群居村运动非常象这种景象）的反主流文化人士愈多，对外部权威的依附就愈大，这种权威体现了为寻找安宁和平静的人所回避的心灵中一种更加实际和更加令人难受的成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这里姑且把权威的表面文章抛开不谈），对于持这种态度的人来说，和政府保持一段距离反而使政府成为一种比较可以接受的控制形式，这要比那种最终可能成为真正对立的无休止的束缚要好一些。

无法表达的“启示”

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达到“极端兴奋的探索”状态——这也许倒是件好事。每一代人中那些达到这种状态的人都传递出一种信息，而这种信息则渗透到这个时代的所有阶层。如果这种信息是坏的，那么少数人会遭到毁灭或者自己毁灭自己，而其余的人则只是吸收这种信息，因而在“熔炉”里发生的事要比更大范围内潮汐涨落的现象更为重要；无论是在高潮还是低潮时期，它都是使我们得以观察到这种运动（它告诉了我们它所得到的对问题的回答）的强大吸引力的根源。

一些富于冒险和创造精神的年轻人已经成为社会的废弃物。尽管资本主义向他们提供了走中间道路的机会，这种现象还是空前扩大了。社会或许是从它的根部向上生长的，但它从头向下死亡；因此，那些要正面同命运抗争的人如果不再对社会福利作贡献，如果依附于可靠的革命选择，那末，他们在探索绝对真理时会一下子陷入极端。迪安所说的那种“无法表达的启示”，即使我们相信它们是存在的，也和实际生活没有任何联系，只能象金斯伯格所说的那样以“饥饿的歇斯底里的裸体”在大街上奔跑而告终。我想许多人已经精神崩溃。诚然，他们仍然能容忍别人并憎恶权威。但这种情况只会加深远离革命的宽厚和懈怠，而不会使人具有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脚踏实地地进行反抗的态度。麻醉品也许一下子揭开了七层面纱中太多的秘密，露出了隐蔽在内心深处的压抑——把空间和时间的无限性以及事物的复杂性展现在人们面前，一下子接触到了绝对真理，以致可能使人们对摧毁这些障碍中的第一个障碍就需要付出极大努力感到恐惧，并因此而退缩。

“发现”语言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并在心中不断重复这一事实（无论如何这是不能否认的）实际上就是接触到了绝对真理。这

会使我们拒绝与语言这种用来创造文明的无用工具相妥协（拒绝本身就已是一种巨大的妥协）。吸食麻醉品会使你相信，你不依靠其他任何事物，就可以解释存在的意义。对我来说，存在经常以一张纸的形式出现，我只要一斜眼就能瞧见它。它总是企图避开我，沿着一条螺旋路线往下飘，我紧追不放逐渐逼近它，最后把它抓住了。于是，我紧紧地抓着它从水下浮了上来，我不急于读它，因为我喜欢这种不久就能发现它上面的全部内容的感觉。不幸的是，我抓住的那张纸最终带给我的，往往就象戈德斯公园里的小狗学习骑自行车时的感受一样。这标志着人类的再生。有着同样感受的其他人发现 唯一的回答是暴力 他们就是基督 就是希特勒 世上的一切都是虚空，推动地球运转的是爱情，这成了他们的信仰。

颓废派的没落

当欧洲的思想意识开始发现它本身已经从它的社会目的的负担中释放出来时，这种状况所带来的最初一阵甜蜜的懒散和乐趣很快就变成了厌烦和麻痹的尖叫（就个人来说，也许王尔德^①和阿陶德是极好的例子）。目的，追求极度的刺激和看破红尘的真知灼见已形成了一种群众运动，这场运动中的所有人都摒弃了社会大目标，因而我们看到了在各个不同的舞台上的人，有的大谈特谈“宇宙意识”并狂热信仰它，有的对现在完全丧失了信心，离群索居，懒散无为。此外还出现了另一种新的现象。人们现在要的是麻醉毒品、放荡和社会对这些行为的认可，这也就导致一些人要求某些行为为社会所接受，而这也许会使本世纪初的放荡者和探索者吓一大跳 因为他们当时还有脸 有勇气说 是的 我们是象你们说的那样坏 甚至更可恶 该死的——但你们可以追求你们的社会

^① 王尔德，英国十九世纪颓废派作家，同性恋者。——译者

目标，不必过问我们的事。

现在，印度大麻、麻醉毒品和各种各样的性交活动，已经不再只是供自己享受，而是成了写报告和调查的主题，沉醉于其中的人试图证明它们对社会多么有益。同性恋者现在已不仅仅满足于以特殊方式对自然和社会表示蔑视，他们要求和其他正常的好人一样，被看作是对人类有贡献的正常的好人，并同其他人竞争以使社会对他们持最有利的看法；他们使用的行话，甚至王尔德听了也要羞得晕倒。每个人都想在社会的赞同下过放荡的生活，人们可能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为个性感到担忧。如果这类为自己辩解的人是为了说服自己的朋友，那末他们会发现他们的朋友早已容忍了他们的行为，不需要向一般公众呼吁了。正如布莱克的一个追随者可能告诉我们的那样，能够自我作乐的东西才是完美和纯洁的，当乱搞性行为的人为了取得社会赞同而自吹自擂的时候，另外一种也许是力求扩大影响和进行自我表现的愿望已经取代了仅仅为自己寻欢作乐而放纵自己的愿望。和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道德极权主义的时代一样，目前对于违反习俗的流行的道德观仍然有很多清教主义的议论。在许多色情文学中有一种隐蔽的杀气（参看《吮吸》杂志）威胁要把犯禁者放逐于社会之外 过去那些宣扬旧道德的小册子正是利用这种威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不管怎么说，这是一场权力之争，新道德也和旧道德一样具有压迫性和荒唐可笑的地方。

“一个妇女是否能够不知羞耻地进行她所希望的性行为，从而使自己的性欲得到满足而不受任何不合理的约束，这无疑是在衡量妇女的内在的解放的一种标准。使妇女们感到困惑的是，她们还得去努力说明对她们来说是再也明白不过的事实，即这并不排除因人而异的对性生活的正常厌恶。她们认为，一个妇女是否能摆脱心理上的压力，从而尊重自己对性生活的厌恶，这同样是衡量妇女的内在的解放的一个标准，而且是

同样能够说明问题的标准(《无政府》第 1 期 第 17 页)。

很遗憾，我没有改动它一个字（我现在已经有些吃不消了，每次我壮着胆子要得出我自己的结论时，都感到我会完蛋）。我认为他的文章中又增加了一个漏洞，同时认为，如果某个时候某个女性不想进行性活动，那她必定感到很有把握，觉得自己并不一定就犯了什么错误。但是，你会在任何道德家身上发现，他们仍有劝说和控制别人的愿望。

大多数反主流文化的叛逆者都与我们这个令人感到十分压抑的社会处于对立状态，因为该社会在它目前的发展阶段不能给予他们所寻求的安宁。当某些人议论性交“如同吃饭一样是自然和令人舒适的机能”时，他们是在谈论一种乌托邦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身体的每一种要求，包括那些现在尚被虚伪的社会视而不见的要求，都将会得到满足。同资产阶级为过上富裕的物质生活而与其他阶级斗争的历史相比较，这是资产阶级提出来的最先进、最革命的要求。有些人头撞在墙上还唠叨着爱情、革命和美女，这种人滑稽可笑就象个老酒鬼，老酒鬼遇到任何人都会令人吃惊地停下来，议论一通上帝、王后和国家。你如果停留的时间稍长一些，就会发现这个酒鬼对于责任和博爱的种种呼吁只不过是乞讨二先令的前奏。如果你对他的话感到新鲜，耐心听下去并不住地点头，你很可能会十分爽快地掏出他所要的钱。但当你听够了的时候，疯子、颓废派和酒鬼关于他们自身生活经历的叙述就开始显得千篇一律了。于是，唯一剩下的使人吃惊的东西便是这样的发现：社会学家、论战者、大学教师和新闻记者都不愿意放弃有利可图的、新奇的、给社会作诊断的工作，去从事枯燥乏味的预诊工作，因而仍然听疯子、颓废派和酒鬼唠叨个没完并不住地点头。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他们把社会改革的希望放在吸毒的幻想上，而实际需要他们去做的则是设法使人们能够较容易地接近一种特殊

的麻醉品。这里的所谓麻醉品并不是用来制造毒品的酒精，而是一场能够迅速达到自身目的的革命。

15. 一些世俗神话

杰克·罗宾逊

尽管发生了两次可怕的世界大战，在所谓“和平”时期又发生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但二十世纪的人们仍然普遍对“进步”抱有信心。人们深信，人类在科学和教育的帮助下，正在稳步地走向和平、民主和悠闲。这将由教育的普及，从而文化的普及，又从而理性的普及来完成。

二十世纪的历史，乃至人类的全部历史，是各种迥然不同的力量在起作用的历史。重大的历史运动，主要是战争，是由背离理性的力量推动的。产生战争和强权政治的三个要素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其中每一要素又包含着若干不可忽视的因素。热爱某一地区及其人民，效忠于某集团，具有英勇的献身精神，所有这一切都是美德（虽然不是没有缺陷），但它们结合在一起只能把人们引向坟墓。随着宗教势力的衰落（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模糊概念，取代了民族主义的奇迹、爱国主义的神秘和打着圣像旗帜、穿着僧侣道袍的军国主义统治。从民族主义分化出来的共产主义正在助长极权主义不断发展时，领袖人物的形象出现了，对领袖的崇拜趋于神化，由此对人类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甚至直到现在，每当一个国家处于绝境的时候，人们总盼望出现一个“超然于所有党派”的领袖。

在“进步”方面包含的第二个和唯一能够具体见到的因素，是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科学家之愿意供人利用的程度变得毫无限制了。二十世纪的所谓最高科学成就是原子的分裂及其在原子弹上

的应用。若不是科学家们愿意为一项只能带来死亡和破坏的工程工作，这项成就决不会取得。最近的空间和登月航行，则得力于军事天才阿道夫·希特勒的“复仇”号火箭，而该火箭是由希特勒的忠实奴仆沃纳·冯·布劳恩发明的。当美国人希望发射间谍卫星时，冯·布劳恩在同样大的程度上表示愿意充当美国人的奴仆。

赫尔岑曾指出科学技术正在使国家力量愈来愈大，并描述过“带着无线电发报机的成吉斯汗”。科学技术并不仅仅是某种能够被自由的社会原封不动地通盘接受下来的东西。其中的很多东西本来是决不会发明出来的，例如大规模生产就是由资本主义的贪婪要求造成的，还有军国主义制造死亡的各种武器等等。

科学家坚信自己是世界上有理性、有实际经验的人。这导致他们为生活中的愚蠢行为作辩解，使之纳入科学的轨道，并把自行建立的极权主义体系视为“可行”而予以接受。他们乐意为使人类适应一切流行的疯狂行为而效力。他们的准则是使社会跟着疯人院转。

据说英国上院十八世纪八十年代通过一项教育法案时曾提出：“我们现在必须教育我们的主人。”大量涌现的通俗报纸（由办公室勤杂工编辑供勤杂工阅读）有效地接替了这个任务，由于电视的出现而得到加强的群众性宣传媒介继续执行着这项任务，从而使公众处于宣传的包围之中，在其影响下变成了消费大众。售货员的“软性推销法”移植进了政治领域，个人崇拜就象肥皂粉和香烟那样在市场上推销。于是，“教育”取消了民主。不识字至少曾一度使人们避免通俗报纸的愚蠢。

人们被迫接受工业革命，以至到现在接受计算机的社会或者控制论系统，其宏伟的梦想之一就是增加悠闲。而结果却是一种幻想，得到的是失业的残酷现实。消费社会的激烈竞争导致人们加班加点和妇女外出工作，而这全都是为节省劳动力的设备所付

出的代价。下班之后，要在路上花费大量时间才能回到家，剩下的一点儿闲暇时间，往往是被机械化的休息所占据。电视每晚在残害数以百计的人。人变成了他人活动的代理消费者。人的生活仍然在赌博和占星术的梦幻中度过。生活如此平淡无奇，只有偶然的才能给人刺激，危害身心健康的毒品成了逃避现实的工具。在我们这个实利主义的时代，赢满贯仍然是梦寐以求的理想。

在法国革命中首先尝到味道的民主梦想，导致了热月的流血，以及在平等和博爱（更不用说自由了）的名义下实行军事征兵制度的拿破仑的出现。在虚假的议会民主之后，接踵而至的是一场场虚假的革命，结果使另一个统治阶级登上了权力的宝座。为苏联革命所利用的理想主义被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强权政治无耻地背叛了，取而代之的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实用主义的墨守陈规。

虚假的宣传已使人类麻木不仁，对政治漠不关心。即使如此，“老大哥”仍不肯罢休，仍要干涉普通人命中注定的愚昧的生存。他被统治当局征税、征兵和追逐。没有人关心他没有房子住，他的失业被当作一种经济措施，他的家和生计被国家的一些愚蠢计划夺走。国家，不管贴的是哪个政党的标签，总是变得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有理性。束手无策的人类只好去寻找替罪羊，并挑选手边最近的人充当替罪羊，不管他们是犹太人、黑人、移民还是嬉皮士。

教会的极端腐败以及科学和教育对愚蠢的神话的否定，使人们抛弃了宗教，转而信奉现世主义。这产生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崇拜狂，有人相信太平盛世会到来的许诺，有人抱有更加令人满意的各种幻想，有人信奉似是而非的假科学理论。诸如耶和华见神派、飞碟观察者、科学神学派、巫师和 J.R.R. 托尔凯恩的追随者等等，都是病态社会的症状。

有人可能认为，人类的这种疯狂和倒退为无政府主义敲响了丧钟。但情况并非如此。摆在人们面前的虚假的选择是：人类生来就罪孽深重，需要政府来加以管理。无政府主义的某些最好的朋友（以及最坏的敌人）放在无政府主义者面前的虚假的抉择是：人类并非生来就是善良的，以致不需要政府对其加以管理。如果人如某些人所说的那么可怕，那就不能信任他来实行统治；如果人如某些人所说的那么好，也就不需要政府了。事实上，他都不是，人的本性是一剂药，而不是一个配料。

现代国家是为了扩大人类最可悲的本性而设计的。人的非理性的冲动被那些想利用他的人科学地利用了。他的理性的努力则受到庞大的国家的阻碍。人类可以获得发展，但人类向前发展的每一步都是革命性的，因而是对力求保持稳定、最终走向灭亡的现存秩序的挑战。

人类的问题——战争；贫困和自由——都能得到解决。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避免发动战争——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就是例子。国家可以用福利计划来消除贫困。为了保存国家，这两件事都是非做不可的。自由则只有通过与他人的合作才能取得。国家将不允许人们享有自由，因为自由威胁着国家的生存。

16. 无政府主义的宗教观点

内维尔·福勒

我情愿自称是“信奉宗教的”无政府主义者，虽然这样做或许会引起与这个词有关的误解。我肯定不是我的某些同志最近使用“个人主义者”一词含义下的“个人主义者”相反我认为就无政府主义的实际含义来说，集体观念和自由观念同样重要。

我信仰无政府主义，经过一个复杂、缓慢而终于到达顶点的过

程，然而总的来说，它仍是逻辑演进的结果。作为一个有模糊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天性同情受迫害者的年轻的基督教和平主义者，我突然被投入了一种殖民主义的严酷现实之中。由此而显示出的资本主义最残忍、最无耻和最富于侵略性的真面目，点燃了长期郁积在我心头的愤怒，而这在我的祖国英国的环境里可能是永远也不会体验到的。因为在英国本土，这种制度的运行被文化和传统的毛毯深深地隐藏和掩盖住了，其剥削性也被许多代工人阶级的斗争所赢得的物质报酬伪装起来并加以缓和了。

这种愤怒使我的和平主义思想意识发生了动摇并消失了。我感到马克思的话是十分正确的，这就是：“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的意思当然是武力。不是么，谁能想象财富和权力的掌握者会在基督教教义的劝说下自愿地放弃它们呢？如果不使用武力，怎么能使上帝所有的孩子都重新得到公平的对待呢？这样，我就变成了一个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暴力是必需的（而不管这是怎样令人遗憾），并进而认为相信上帝的慈爱和预言者基督甘心忍受苦难而不是把这种苦难强加到他的对头身上是毫无意义的，也是完全自相矛盾的。

把建立“社会主义的正义”放在一切事情的首位，道德和伦理很快重新定向，脱离了抽象的上帝或“善”，因为据说这种上帝和“善”仅仅是社会条件制约下主观作用的结果。任何有妨碍的思想都可以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而使之消失。每一件事都必须以对事业的是否有用处来重新评价，为达到崇高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于是，我认为有必要进行暴力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有必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同时还认为有必要建立最终将会“消亡”的中央集权国家，有必要巩固工人阶级政权。

幻想破灭

现在我的所有幻想都已经破灭，重新被上帝俘虏了，而且被俘虏得更紧。“天狗”咬住我不放，我现在深信确实存在着精神价值的绝对中心，那里有一个宇宙的实体和一个可以被他人隐约瞥见、与人心相通的永恒的目的。因为我相信上帝，相信那个目的是真的、实在的、善的，所以我也相信所有的人是平等的并尊重所有生物生活和自由的权利。我对于所有的奴役和剥削的敌对情绪可以说是更加强烈了，也肯定不那么有选择性了。我不再认为，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了。目的和手段必须协调，因为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说的：“手段代表人们所抱的理想和追求的目标。如果一个自由、正义的社会是我们的目标，那么，我们争取建立这个社会的手段也必须贯彻自由和正义的精神。不应为建立这个社会而在肉体上强迫任何人。真正的革命是总体性的，也是从我们自己开始的。我们首先应该尽最大可能实践我们自己的原则。在我看来，除去使用暴力的所谓和平缔造者以外，再没有什么比富有的社会主义金融家更为可悲的了。人必须保证自己象基督教导的那样生活，按照一种真知灼见来生活，这种真知灼见人们只能称之为是神圣的，但它又能为一切真正追求它的人所共享。总而言之，应遵循这样的原则：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对待别人也象我们希望别人对待我们自己一样，互相亲爱，互相宽恕，不审判，不惩罚，因受损、遭窃或受害而要求赔偿，不谋求私利，而尽量去满足别人的需要。所有这些东西不是在未来出现不同的社会秩序时才去做，而是现在就做。”马丁·路德·金知道，正象无政府主义者知道的那样，社会不会仅仅因为空谈一通就能有所改善，而权力从一个集团转到另一个集团手里或者从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效果甚至会更小。只有当我们，人民，每个人都决心换个样子生活，而且从现在做起的

时候，社会才能有所改变。我们越坚持这一理想，我们对国家机构的依赖就越小。我们不需要法律、监狱、法官和警察，因为我们不愿意看到一个人因为触犯了我们的人身和财产而被剥夺自由或自尊，更不愿意看到他因此而被剥夺生命。

如何事有自由

当人们收回了掌握自己命运的责任时，统治当局的支柱就会瓦解。我相信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发生，因为现在已经有大批的人觉醒，希望自己能亲自参政，特别是在全世界的青年当中尤其如此。在这场斗争中，每一个微小的胜利都是对极权主义的直接打击，都是中央集权结构的削弱，都是向着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前进了一步（这种真正的自由和平等才是真正的民主和人类真正的命运）。只有当这个时代出现，才具备人类精神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人的灵魂需要自由，就象他的肺需要空气一样，虽然它们是很难等看待的两种不同的东西。物质的自由在整个历史时期已为少数特权分子所享有，但经常是在牺牲别人利益的情况下取得的。精神的自由则时常由那些物质条件窘困的人所享有。一个人如果愚昧无知，就不可能享有真正的自由；不论一个人多么富有，如果他被自己的荒谬的偏见所支配，就不能认为他享有自由。人们普遍有这样一种感觉：除非所有的人在精神和物质方面都享有自由，否则谁也不会享有真正的自由，这就是生命有内在联系的本质。我要进一步说，只要人们依靠粗暴地奴役别人来取得食品或快乐，他们就不会自由。

我要立即补充一点，自由并不自然而然地使人十全十美。自由的人不等于超人，而我不相信什么超人的，人多半总会有缺点和犯错误，但是无政府主义，也只有无政府主义能保证个人的错误始终只涉及他个人，保证它可以被社会接受和谅解，不会通过强

权政治的歪曲镜头变形为可怕的原子战争和细菌灾祸。

自由的价值

现在我必须和当前的这样一些思潮进行争辩，这些思潮贬低自由的价值，把自由理解为可以无节制地寻欢作乐和追求个人的满足，而不顾及其他人的需要，特别是社会的更广泛的需要。在我看来，这种思潮的出现只是企图利用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基础，或者几乎是一种辩护理由，以此来宣扬一种本质上是自私的和以我为中心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远不是革命的，十分流行于现存的实利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生活模式之中。实际上，应把这种人生观视为极权主义的产物，而不应看作是无政府主义的组成部分。聪明人怎么会有那种人生观呢？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部分，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个事实。我们是互相依赖的。在这个世界上有几十亿人，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生活在一起。我们中的任何人做的事都要影响我们的邻人，就象石头扔进池子里激起的波纹一样，我们的所作所为会影响到广阔的世界。因此，脱离社会责任，脱离我们对邻人的爱去谈论自由是愚蠢的。事实是，如果我们想消除外部强加的行为准则，这必然是因为我们已不再需要这些准则，因为我们已经意识到了我称为上帝而其他人称为良心的内在向导，还因为我们主张一种使所有的法律都变得无意义的彼此相亲相爱的生活方式。因此，在我看来，自由和爱是不可分开的。我以为，正是极权主义在宗教和世俗事务方面的严密控制，破坏了人们对“善”的积极响应的天性，并摧毁了人们精神觉醒的能力。

总之，无政府主义者要牢牢记住有两个谎言，在揭露一个谎言的同时，我们切不可让自己受另一个谎言的欺骗。用 W.H.奥登的话来说 就是：

我只有一个愿望，

就是要揭开层层迭迭的谎言。
从街头好色之徒
头脑里浪漫主义的谎言，
到那办公大厦高入云霄的
统治当局的谎言。
没有国家那样的东西
而人们又不能单独存在；
饥不择食
对于平民或者警察都是同样；
我们必须相亲相爱，否则就是死亡。

17. 人——创造者和破坏者

贾斯廷

现在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大字标题：人既是创造者又是破坏者，空气正在受到污染。何止是空气，地、江河和海洋也正在被污染。今年是“世界环境保护年”人们突然认识到人贪婪的掠夺者，正在多么严重地污染着自己的环境。

世界上没有哪个物种象人类这样表现出如此坚强的决心，要破坏自己的生活环境。与人比较，横冲直撞的野猪和旅鼠倒是有远见的空想家，它们宁愿把环境留下来给后代，而不愿去破坏它。但上帝即造物主当初创造出来的人并不是这样，当时人都具有灵魂，具有较高的智慧。对于人类来说，后来发生了问题，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即：人类一直是在牺牲自己灵魂的条件下发展自己的智慧。他把灵魂留给上帝照管，而把智慧集中用在自我改善的事业上。不幸的是，他不听那些告诉他上帝不存在的人的话，因而他的灵魂根本无人照料，同时，由聪明人打着与那个不存在的上帝取得联系的旗号建立起来的组织就变成了权力机构，这种机构把人的

天性中爱的成分消灭殆尽，使罪恶甚嚣尘上，并使人类社会日趋解体。

它们大获全胜，使我们今日的世界充满了仇恨、罪恶和道德说教。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不能够说有人类社会存在。这是一个由贪婪的和工于心计的人支配的被掠夺的世界。一个没有灵魂的世界。

人 太 多 了！

但并不是一个干净的没有灵魂的世界。虽然我们“发达”国家的大多数医院，其干净程度毫无疑问达到了人力所能做到的最大程度，但我们在那里出生后，一旦出了医院而来到“真正的”世界上，就不得不呼吸汽油引擎排放的有毒气体，吃被农药污染的食物听任机器摆布不得稍有违抗。

最严重的是，该死的人太多了。在威胁我们环境的污染物——汽车排放的一氧化碳、工厂排放的化学污物、爆炸原子弹产生的放射性尘埃、军队及其有毒工厂处置的污毒以及单纯的垃圾——当中，人本身是所有污染物中最大的污染物。

现代人已开始变成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特别在工业化国家里，大多数人所从事的都是收入高而又完全非生产性的职业，使 them 能购买和消费比较贫穷的人生产的产品。主要生产和销售行业的机械化使较少的工人能生产较多的产品“提高生产率运动”使裁减冗员成为可接受的措施，如果使那些留下的人提高收入的话，而这一运动也助长了上述趋势），这样，有雄心的工人便会竭力争取做“白领工作”，而这就使他们成为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

这种恶性循环开始运转，“进步”带来的矛盾愈来愈多。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生产质量”却下降了。拥有汽车的人愈多留给每一辆汽车的面积便愈少。汽车道修建得愈多，为修路而推倒

的房屋也就愈多，不再生产粮食的土地也就愈多。这样，越来越多的食品便不得不用谁都讨厌的工厂方法来生产，房屋也越来越小。于是，不得不建筑更多的高楼，在一个小地区集中更多人，使公共交通更加紧张起来，这样，更多的人就要买他们自己的汽车。住高层楼房在生活上唯一的优点是可以享受电气器具提供的方便，这样就要求有更多的电冰箱、电炉、电视机、洗衣机、电话、电唱机、空调器等等，还有洗涤剂 and 装在不会毁坏的（简直他娘的打不开的）塑料口袋里的方便食物，而这又带来了处理垃圾的问题。

这种趋势无法遏制

由于城市生活越来越使人不满意，越来越没有意思和不堪忍受，因而越来越多的人想迁出去——于是产生了另一个要求 要求有更好的交通设施，而这就要修建更多的公路，从而要推倒更多的房子并使更多的土地脱离农业生产。

如果人口不增加的话，也许可以遏制这种要求增加每一样东西的趋势。但人口却在不断增加。世界人口在下一个四十年将增加一倍。从你的窗口望出去，幻想一下每件东西都加倍的情景吧。人口的加倍意味着房屋数字的加倍，学校的加倍，医院的加倍，监狱和青少年教养所的加倍，公路的加倍，公路上汽车的加倍，发电站和高压电缆铁塔的加倍，在空中盘旋着等待着着陆的飞机的加倍，从而机场的加倍……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大大低估了的数字，因为今后四十年出生的每一个人的欲望都要比现在高得多，人口数字的加倍将意味着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增加远远不止一倍。

单是在今日的英国，每天出生的人口就超过死亡人口八百人。即使考虑到迁出英国的人比迁入英国的人要多五万多人这样的事实，每年仍要多出大约二十五万人在这个小岛上寻找生存空间。这意味着我们除了要为现有人口改善住房、交通和上学等条件外，

每年还要修建一个象布里斯托尔那样大小的新城市。

他们也会进步！

在比较贫穷的国家里，受天主教或其他愚昧的宗教影响，出生率往往更高，跟着发生的问题也就更加有威胁性——只是他们的欲望要低得多，他们的要求也不那么高而已。但是，他们也会进步，农业经济会成为工业经济，于是愈来愈多的目前提供初级产品的人们也会变成象我们这样的消费者。而且，用资本主义的话来说——为什么他们就不该如此呢？

资本主义要使人摆脱这种困境，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发动战争。用战争减少人口 用战争毒化地球 用战争破坏财产 这样 被可笑地称为“文明”的东西就必须从头开始再来建设一次——这就是权力角逐将要走的道路。统治当局甚至由此可以获得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继续存在下去的机会。对于资本主义来说，肯定没有其他道路能摆脱这种困境，因为资本主义依靠的是持续不断的增长和扩张。继续发展市场，继续刺激需求，继续增长人口，是保证消费市场和劳动力供应所必需的。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都要依靠国家，同样，与为它服务的庞大人口的支持也有利害关系。因此，集权主义的道路实质上只能引导人类走向灭亡。

无政府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什么呢？是否象无政府主义者经常说的那样要进行社会革命？喔，是的！是否要摧毁国家和废除货币和利润制度？当然，越快越好！是否要平均分配全世界的财富以消除穷国和富国的差距？是的，要用一切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

在过去，无政府主义者站在节育运动的前列，是出于个人自由和妇女解放的理由（今日的妇女解放运动——请莫提及！），许许多多的人，其中包括美国的埃玛·戈德曼、意大利和其他天主教国

家的许多同志都曾因要求允许自由地传播避孕知识而遭到迫害，因而，当时无政府主义鼓吹节制生育是从争取个人自由出发的。现在则是为了人类的生存而鼓吹节制生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类为了生存，反而必须控制自己的生育能力。

眼下发动这样一场运动似乎不可能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只要稍为想一想发动一场争取全面性自由的运动意味着什么，就会明白人们为什么不感兴趣了。这场运动如果取得胜利，国家卫生机构将免费提供避孕药物和用具（！），一经要求便可施行流产手术（当避孕知识充分普及以后这种流产手术就不会是必要的了）由此，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集权主义社会的家庭和婚姻的结束，而事实上随着妇女取得和男子平等的地位，所谓道德的家庭核心结构就会完全崩溃。这一来，当人们得到这一切以后，他们就会发现男女同样作为工资奴隶的平等地位是不够理想的，真正的经济革命就将随之而来。

在这期间，无政府主义者要做大量的工作。诚然，打倒资产阶级会帮助我们结束对地球的污染，然而，仅仅在星期天下午在空荡荡的城市街道上简单地叫喊几句：“打倒资产阶级”是不会给我们增加很多机会的。我们该如何禁止国家制造麻痹神经中枢的毒气，并把它扔入海洋呢？我们该如何去击败军事—工业综合体呢？我们该如何去进行革命呢？我们该如何去拯救世界呢？

18. 教育和民主的神话

乔治·凯恩克劳斯

民主制度是大多数人说了算数的一种制度形式。民主的方法就是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来选举一个政府，大多数人希望由这个政府来统治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然而在这个社会里，仍然存在

少数的集团和个人，他们虽然不同意大多数人的选择，但却不得不遵守大多数选票所授权的政府的决定，他们无论作出什么反对表示都完全是无效的。如果个人希望作出某种反对的表示，那他可以利用已经建立的对他们开放的渠道。然而，这不是反对而完全是遵守业已规定好的秩序。这就是所谓民主的方法，少数人生活在多数人的统治之下。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曾写道：“多数是由许多个人组合成的多数，因此，多数人压制少数人的意见是对多数人统治本身最终所依靠的基础的挑战。”这是民主结构的主要缺陷！个人的意见经常被压制。对少数派来说，唯一的补救办法是举行另一次选举，希望在多数票上有一个变化，这样，另一个政府就可以代替他们所不满意的这个政府。于是，另一次多数票便建立起另一个统治政权，但仍有少数人反对这个政权。是否可以把民主制度变成更加自由的社会形式，在这个社会里，服务的对象是个人而不是多数人或少数人呢？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又写道：“如果国家能够保证这个国家内部的每一个人是幸福的，那么这个国家也就自然是幸福的。”

在民主制度的后面有一个掌握着全部权力、无孔不入的国家的影子。我这里所说的国家指的是政府、国教、警察、武装部队和教育制度。产生选民的社会在国家的监护下生活，民主制度的最终权力仍归于国家。一次选举的变化只意味着权力从一个政治集团手里转移到另一个政治集团手里，国家机构仍在不同的程度上原样保存下来，有关社会的最后决定权仍旧属于国家。

我们已经看到，国家首脑是由多数选票决定的。国家，仅仅由于它的存在和它控制着教育制度，决定着有关教育制度的政策。一个孩子面临两个主要环境，一个是家庭，一个是学校。在家里，孩子受到他家庭的压力和价值观念的支配，而家庭就其总体来说又受到社会的压力和价值观念的支配。在学校里，孩子受国家教育

制度、他的老师和学校领导人的标准和价值观念的支配，最后，轮到孩子家长，又把同样的标准和价值观念传给他的孩子，而这种标准和价值观念整个说来同社会的标准和价值观念是近似的。从长远说来，国家要存在，就必须统治一个接受那个国家统治的社会。国家能保证这种情况发生的唯一方法，就是延续一个这样的社会，这个社会已被制约得只信任国家，而不相信有什么主权个人，不相信主权个人之间可以自由合作。马丁·巴伯说过：“自由是一种教育状况”。所以，教育制度必须受到控制，以产生一个愿意无条件地接受上述前提的社会，而这一点对保证人们服从国家是起很大作用的。因此显而易见，不能允许教育制度造就出善于独立思考的人，而必须控制教育制度，以使它造就出来的人承认现存的民主制度是社会和政府的最好形式。G.H.班托克说：“只有当我们了解到学生正在为什么社会和什么社会地位而受教育时，我们才能理解教育。教育并不是在抽象地培养人，而是在一定的社会里和为了一定的社会而培养人。”

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多数人接受了这一现实，并出于自我改善处境的愿望而在这种气氛中行动。所以，以下这种情况肯定不是无关紧要的：整个学校制度是成功者受奖而失败者受罚的制度。不仅如此，而且一个人的成功就是另一个人的失败——在全班面前的失败和丢脸。在学校的成功取决于考试成绩的好坏，这一标准已进入了大多数家庭，正如在社会上的成功要看个人在自己所选择的职业领域的等级结构中是否能达到高工资的地位一样。集权制度必然要鼓励等级制度，不仅如此，而且要鼓励一个信得过的等级制度。那些遵守自己的社会集团培育和灌输的价值标准和观念的人们，可以通过取得一定的资格，最终达到社会结构内的一个公认的地位，而这种地位可能受自由意志论者向这个社会结构进行挑战的任何迹象的威胁。因此必须引诱个人接受

现存社会标准的约束，如果这种做法失败了，就必须动用镇压的手段约束他。反社会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结果，个人如果拒绝接受他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的价值观念，他就会面对法律的全部力量（或者，有时是以社会的辱骂和放逐这种更加隐秘的方法来对付他）。法律，它是为了这个社会中国人民的利益而由社会实施的，而不管人们需要不需要它，实施法律所依据的是民主政府为大多数人而行动这一原则。

在学校里，孩子也受到了同样的对待。教育制度是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标准的反映，学校也期望孩子遵守学校内部的制度。学生的等级制度经常是通过任命级长、屋长或队长来建立的，同时还结合采用按成绩优异程度给小组评分或评选优等生这类方法。任何表现出叛逆迹象的孩子都被认为是调皮捣蛋，并且受到这种或那种方法的严厉惩罚。因此，就象成人社会一样，个人不得不表现出与社会的一致，如果你要想太太平平的话；如果你不这样表现，你就得准备受到社会不满的全面冲击。学校的孩子也是这样。除革命而外，教育是唯一能够从内部改革社会的途径。成年人，和孩子们一样，为了使旧的社会被取代，必须受到新社会思想的教育。一个社会如果认为它本身和它的价值观念是可信赖的和公正的，它就不可能自觉自愿地通过教育制度来促成对它自身结构的改革。正如穆勒所说的：“对人类的现状感到满意的大多数（因为造成这种现状的正是他们自己），不能理解为什么这种现状不是使每个人都非常满意的”。一个社会的内部通常只有少数人希望这个社会发生巨大的变革，而由于鼓励个人的这种愿望是不符合社会利益的，因此个人最终就必定会在民主制度的教育过程中饱尝痛苦，因为这个制度是相信多数统治少数的。

19. 迫使人服从的手段

安东尼·弗莱明

在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与现存的社会结构的冲突当中，充分认识国家所掌握的迫使人服从的工具是什么，并提出建设性的可供选择的方法，显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准备讨论迫使人服从的两种主要手段。第一是养育，第二是政府对不顺从的成年人采取的行动。孩子不得不应付两个环境——家庭和学校。这两方面，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是调整人的思想使之形成统一模式的十分有效的力量。毫无疑问，无政府主义者无疑是认识到这一点的，但是我认为认识到它的全部深度和广度是有决定意义的。

国家对待不顺从的成年人有两种方法——一是把犯法者送进监狱，一是对他施以精神治疗。这也是很明显的事实，但我同样感到我们必须加深认识这种情况的重要性。

童 年

父母给予慈爱，特别是母亲。同时，她也使孩子受到太多的挫折。有时她让孩子吃东西，有时又不让孩子吃东西。孩子也会理由充分地作出反应，第一种情况下的反应是爱她，第二种情况下的反应是恨她。然而，随着他日益长大，他必定也适应了这些斗争。与此同时，他要完全依靠母亲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必须听话，如果他不听话，他就会有失去他所依靠的东西的危险。

显然，作母亲的要利用孩子对她的这种依赖是不困难的。逐渐地她会把她希望孩子和要求孩子遵守社会准则的行为模式灌输给孩子。这以教孩子在哪里大便开始，以自己的言行影响孩子的

处世态度而告终。萨特^①说：“早在我们出生之前，甚至在我们到母亲肚子里之前，我们的父母已经决定我们应该是怎样的人了”（为安德烈·戈兹所著《叛徒》一书写的前言）但是父母的态度可能同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态度有矛盾。因此，让我们记住，不论我们如何竭力不把我们自己的态度强加给孩子，我们还是不免通过以我们对他们的行为表示赞同与否而使他们受到影响。

在所有这一切当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培育孩子使之顺从我们的社会的最成功的方法是爱——至少对于我们社会中“具有较多自由主义思想”的那部分人来说是如此。但在这同时，一定的挫折也可能有助于产生较为成功的实业家。实业家不怎么关心他的同胞，而更加关心得到他要得到的东西。不过，得宠的孩子都是一个模样：已经从他的父母那里得到所有的东西，但他仍打算从社会得到所有的东西。

然而，社会还提供各种各样的培养儿童的方法。这些方法是父母打算依靠的方法。在一个至少是中产阶级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供选择的会里，一般地说总是实行最流行的方法——所谓进步的父母大多是如此，其他人也一样。

研究一下比较静止的社会的儿童培养方法更能说明问题，因为它的特点在这种社会里更加明显。但是，我们不应该从这一点推论出：我们社会的方法就不会迫使人顺从。培养儿童的方法的迅速变化至少是与工艺方法和我们文化的一切其他方面的变化程度相等的，如果不说它是由竞争的基本制度引起的的话——其实即使在这方面，也已经从十九世纪的直接斗争变成了日益官僚化的经理制度内部竞争，而且这种竞争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可能变得更加剧烈，并且日益具有国家控制和私人垄断的性质（例如可参看保

① 让·保罗·萨特，法国当代作家，存在主义哲学的倡导者。——译者

罗·卡丹的《现代资本主义和革命》)

埃里克森在《童年和社会》一书中以两个突出的例子用大量材料说明了儿童培养方法和社会结构要求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对其中一部分——关于尤罗克族人的部分——作一概述是有价值的。按照尤罗克族的习惯，新生婴儿十天内不喂奶，过了十天才慷慨地和经常地喂奶，但到六个月长牙齿时就断奶。尤罗克族人的糖果是咸的食品。母亲怀孕时还要干重活，目的是防止孩子靠在母亲的脊椎骨上休息！禁忌性交，一直到孩子能生龙活虎地爬行，这样可以保证双亲能尽全力来使孩子学会爬行。甚至在喂奶期间，就以许多措施来防止孩子在吃奶时感到太舒服。

由于神的恩赐，尤罗克族扑捉大马哈鱼的渔夫经常满载而归。“尤罗克族对于神的恩赐是终身热情地‘感激’的”这种“感激”似乎由于母亲留给婴儿极少的怀念而加强，因为婴儿很早就从母亲身边被强有力地分开了。

大人要孩子放慢进食的速度，要十分吃力地完成整个吃饭过程，要边吃边想到发财——集中心思想钱和大马哈鱼。但是他又得在心里念叨着自己并不想真正伤害大马哈鱼，据说扑捉这种鱼时，它只是留下了鳞片，大马哈鱼是由这些鳞片在鱼网里变成的——这肯定是回想到幼年的情况，那时，当产生想用牙咬东西的愿望时，却被剥夺了吮奶的机会，从而对自己产生伤害人的愿望感到内疚。埃里克森说：“所有一厢情愿的想法都被利用来追求经济目标了。”他接下来写道：“稍后，情欲也被纳入同样的经济努力之中。在‘血汗家庭’里，稍大一些的孩子要学会双重本领：想金钱而不想女人”。很明显，妻子实际上是有价钱的，妻子和她孩子的地位取决于未来的丈夫为购买她而付给她的父亲多少钱。尤罗克族只认为以下情况是违反习俗的反常行为，即一个有妻室儿女的人在付钱以前，就使一个有身价的女孩子怀孕，或者是只预付了一部

分钱就和她结婚，而没有能力偿还剩下的钱。因此，金钱是结婚所必需的。

吃不着奶和想到金钱及马哈鱼之间的关系，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已经很清楚了。在婴儿长牙的时候断奶，以及后来采取的一系列抑制个人愿望的做法，这一整套使孩子感到不舒服、灰心丧气和焦急的做法，都旨在促成经济上获得利益。因而尤罗克族是一个重视金钱的部落。但是这种焦急也具有使生活长期处于恳求状态中的作用——特别是想吮奶而又吮不着时的那种焦急心情。

有人曾说：“在反常的文化（诸如尤罗克人或多布安人的社会中，遵守一般社会准则的人，从绝对的意义上来说，事实上是反常的人，即使他们在自己的文化环境里是完全为社会所接受的人”（见安德鲁·克罗克罗夫特所著《精神病患者》）

但是，正如莱恩特别清楚地阐明了的那样，我们自己的文化也并不理想。“我们是发呆和发狂的生物 对我们自己、对别人、对精神和物质世界都不了解——一句话，是疯狂的，即使是从一个我们能够瞥见而不能采用的理想的观点来看也是如此。我们出生在一个异化在等待着我们的世界中，我们从潜在的意义上讲是人，但却生活在一个异化的国家里，这个国家根本不是一种自然的制度。……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这些在开始衰老的、常需发生痉挛的资本主义中心地带里仍然半死不活地挣扎着的人——我们除了反映我们周围和我们中间的腐朽以外 还能做什么呢？”（《经验政治学》）这已是无政府主义者接受的一种观点，所以不需要再加以强调。

在把孩子变成服从社会准则的人的过程中，学校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手段。这个过程不仅仅是用诸如“公民课”和“宗教课”等方法来完成的，更加关键和有效得多的方法是以教学方法本身来进行思想灌输。

我们的社会是个竞争的社会。百分之九十的人接受这种状

并在这种气氛中表现出提高自身地位的愿望。因此，整个学校制度是一种成功受赏和失败受罚的制度这一点肯定不是无关宏旨的。不仅如此，而且一个人的成功还是另一个人的失败——在整个班级面前的失败和由于失败而丢脸。在教师受到学生欢迎的地方，后一手法特别有效。公开惩罚失败这种较为惯用的手法有助于恫吓人民顺从——结果是造成他们非常粗暴，把他们的痛苦发泄到那些妨碍他们的人的身上。

但是，我们要讨论的是现代的、更加有效的手段。在传统的方法里有一种固有的危险——使怨恨情绪从主人转到统治阶级身上。现代的方法消除了这种危险。孩子们感到他们是同教师团结在一起，共同反对失败者。于是耻辱也大得多。J·亨利举了一个具体例子，说明了这种成功者得赏和失败者受辱的方法。

一位老师要一个学生把 $\frac{12}{16}$ 化成最简形式。那个学生对这个问题答不出来。教师不理睬其他学生嚷嚷着要给予回答，而是继续追问，要他“想想”，虽然他当时可能已经慌得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最后，她转向班里的其他人，叫一个孩子回答这个问题。亨利评论说：“鲍里斯的失败为佩吉提供了可能成功的机会；前者的悲哀是后者欢乐的原因。……这种经历迫使每一个在我们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一次又一次地和日日夜夜地提心吊胆，甚至处在成功顶点时所梦想的不是成功而是失败（《有害于人类的文化》）人们可以指出：佩吉的成功可能会使人产生这样的梦想：即成功和失败可以并存。无疑，亨利描绘的是一所‘美国学校’的情况，但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有可能采用这类手法。

亨利还观察到教育中的另一现象。老师不问谁能回答下一个问题，而是问谁愿意回答下一个问题。“一个有经验的老师会采用各种方法使学生感到，回答不出问题就是叛逆”。于是，失败等于背叛集体这一感觉更增加了失败者的羞耻，而又有多少孩子愿意

感到自己是一个被集体抛弃的人呢？

不过，未来的教育可能会采用现在的某些小学和现代中学开始采用的那种方法，即允许孩子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目。这种情况看上去确实有可能出现，或许比亨利讨论的方法更加有可能被采用，亨利提到的那种方法有一个缺陷，即它显然和社会是格格不入的。

但是，需要弄清楚的是，为什么一种方法会被采用，而另一种方法则不会被采用。如果一种方法与社会格格不入，它要发展就不大可能。正如我所知道的，在大多数现代学校里，教师就在那里提供帮助。孩子自己决定感兴趣的东西并在这个基础上工作，不时从老师那里寻求指导，但也利用书本和其他情报资料。

社会只能把它作为一个总的制度来接受，如果它的目的被看作是对事业的贡献或业余活动的补充的话。所以，那些普通水平的、或者比普通水平稍好一点但其著作还没有好到能够行销市场的作家和诗人，就有了一个在业余时间实现他自己的抱负的手段。他闲暇时的视野将变得开阔起来，逐渐缩短的花在工厂的时间也就会变成可以忍受的了。有能力的科学家最后可能在自己的岗位上作出更大的成绩，如果在得到正确的指导和拥有资料的条件下允许他全凭自己的心愿去工作的话——他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如果他对职业的选择出于一种内在的“倾向”的话。

但是，这种听任自由发展的方法目前只限于在小学和现代中学里使用。在后一种学校里，无论如何可以假定孩子们具有平均水平的智力或者低于平均水平的智力。我们大可以在打下全面知识基础的阶段采用同样的方法，但对于具有较高水平的学生来说，似乎有理由要求老师给予更充实的指导——目标在于选择一种职业和继续工作下去，特别要求达到进入大学这一标准。

另一方面，人们将可能越来越多地采用心理学的方法。采用

这种方法，即使在所谓自由发展的情况下，也会取得所需要的（即社会所需要的）效果。很显然，现在大部分孩子还得依靠老师的指导，特别是在早期阶段需要老师传授知识和推荐书籍。发展的基础正是在这种早期阶段打下的。显然，推荐什么样的书籍、给予什么样的指导和传授什么样的知识都会受到教师个性的极大影响，但有人却认为教师不是值得注意的革命力量！

罗伯特·杰伊·利弗顿在他作了关于教育和思想改造以及和意识形态极权主义之间的关系的谈话以后，紧接着录下了一次全体教员的讨论。一个教授宣称：这三者之间没有不同之处，并认为在这个学院里，他们确实是在给孩子洗脑筋。另一位宣称：“我们不关心女孩子们毕业的时候相信什么，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她们在学校期间学到了什么”。但是，进一步追问她，看来她还是关心着她的学生相信什么并将成为什么样的人。

最后，另一位教授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我们或许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其方法是对自己的信仰抱有正确的态度……告诉学生这就是我的信仰，但还有与这相对立的另一些信仰。这样，我们在坚持任何信仰的同时，也可以感受到这些信仰的局限性以及其他信仰所造成的紧张和压力”。利弗顿评论说：这第三位教授“懂得承担义务和保持灵活性这两方面的必要性。”（《思想改革和极权主义的心理》）

但是，有经验的教师已成功地使孩子象尊敬父母一样尊敬他，把他看成是可以依靠的人。所以，孩子们就更可能接受他的观点。有经验的教师往往会利用孩子的心神不安的青春用来维持自己的威信，并准备说服学生抛弃与习俗相左的观点。

同时，期望师范学院在传授教学方法时培养出最可能引导学生顺从的教师，看来不是没有理由的。当一名教师这一行动本身就意味着对社会有一种责任感（而不管产生这种责任感的心理基

础是什么)，这个社会只能加强，不同的观点将被否定。教师将被鼓励向前看，但只能在现存结构的范围内这样做——因此任何理想主义的趋势到头来都会是改良主义的死胡同。

需要记住的另一点是：青春期的反抗是短暂的；我们可以肯定，那些操纵教育机器的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即使在反抗阶段，青少年们也常常坚持与从前一样的观点，而那些达到了意识形态反抗的水平的人（不幸的是他们只是极少数，特别是在我国）则往往会回到早期培育出的行为和思想模式中去。不顺从的成年人将继续是极少数。在这方面，最近《每日邮报》调查了青少年的思想，调查结果很有趣：坚持旧日偏见的人所占的比例高得惊人。显而易见，甚至在青少年中，如果举行公民投票也会恢复绞刑，并使其他肤色的居民的生活重新恶化。

即使下一代将更加开明，对我们来说也没有多大意义——只有想到社会服务可能有所改进时才会稍有一点安慰。的确，人们将很可能从生到死都得到照顾，并且经常是以立法的形式来加以实施，正如现在划定汽车行驶范围那样，为了减少生命的损失而不管留下的一点点自由会进一步遭到多大的限制。

莱恩在总结有关家庭培育孩子的方法和学校的教育方法的讨论时说了一段很有份量的话，他说：“孩子们不愿轻易放弃他们天生的想象力、好奇心和幻想。必须爱他们才能使他们放弃所有这一切。爱是通过宽容走向纪律的道路，而通过纪律（只可惜纪律执行得太多了）只能走向对自我的否定。”

以上就是我们对于孩子从青春期进入成年期以及他们原先培育成的信奉现社会准则的行为模式再次得到肯定等问题的总结。但是，如果这种外界的培育由于各种原因而失败了，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正如在许多情况下肯定会碰到的那样，可能是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了矛盾，或者家庭内部的压力使孩子不可能作出

信奉社会准则的反应，从而引起激进的和终身的反抗或者逃避现实。我们称这种家庭环境是不正常的——但至少会有一些家庭实在太正常了，反而变得与社会结构不相协调，如果说大多数家庭在一定程度上都有些古怪的话，这正如莱因在探讨精神分裂的起源时所指出的那样（参看《分裂的自我：神态正常、发疯和家庭》第一卷）。当然，我们不应忘记这一点：除了外界影响的投射和由此引起的分裂以外，精神分裂的经验似乎也包含着一定程度的真实。

思想改造

我们已经看到，在一定的情况下，文化方面的培育如何会失败。我们的社会只承认两种不正常的人——精神病患者和罪犯。直到最近为止，社会仍然认为他们是不相干的两种人。现在，至少是比较开明的人已经越来越多地提出了这样的主张：犯罪也是一种精神失常的标志。因此，不但不应惩罚，反而应该帮助犯人成为社会的生产成员。必须帮助他获得新生，改变他的看法，使之与他生活的社会相一致。所以监狱要学习精神病院的榜样，努力改造失败者，使他们成为受欢迎的和有责任心的公民。

对于这个问题，自由意志论者必须阐明自己的看法。自由意志论者与自由主义者没有共同之处。总的说来，我们的立足点与他们的立足点是完全对立的。他们说社会是健全的，尽管还需要使它更讲一些人性；我们则认为，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现在的社会从它的本性上讲就是使人丧失人性和使人堕落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以现代化的方法使人获得新生是一种进步；我们则必须看到这些方法掌握在社会手中是致人死命的。国家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能够利用这么多的人类知识来使人顺从。国家已经日益认识到：不正常的背离社会者必须得到帮助，帮助的方式不是惩罚（惩罚只能加深内部的精神异化），而是对我们作为人的自我实

行心理调节——使我们扭曲，不再与社会异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不再是人，而成了自由主义者，盲目地把福利资本主义看成是自由的缩影。他们被中产阶级的棉絮裹得紧紧的，认识不到自己已经成了完整的人的漫画像。他们虽然把这种完整的人加以理想化，但对它却一无所知。

思想改造是“洗脑筋”的一种委婉说法。但自由主义者会反驳说，可我们的社会是开放的呀。我们并没有给人民洗脑筋。我们仅仅强制他们，防止他们伤害他们自己和别人。你也太无知了。只有当你信奉社会准则的时候，当你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行动的时候，你才是自由的。如果你越雷池一步，我们就要禁闭你。你记住，我们要促使你改变思想。我们不象他们在中国那样，用暴力的办法。我们只把你关在一个小屋里，给你吸毒和施加电震动来阻碍你内在的东西发展，同时让我们精心策划的信奉社会准则的行为模式在你的头脑中恢复。

被社会抛弃的人回答说，如果我们还不顺从又将如何？那就会把所有的手段再施行一遍。不管你的反抗多么微弱，如果你再坚持，我们就要让你吃苦头——当然，我们同时也乐意对你说，我们将向你指出“光明”指出通向“真理”和“诚实”的道路。这就是自由主义者走向真理的道路——于是我们就这样死去。

或者，我们可以延长我们那被禁闭的生命，就象派克所说的那个惯犯那样。此人四十八岁，断断续续地偷了一百七十八英镑，为此而在政府监狱里度过了二十六个年头（参看托尼·派克《无名的平民》）

精神病治疗法

按照精神病学的划分，精神病有三种类型——精神神经病、精神变态和心理变态。患第一种病的人承认自己有病，并且希望得

到治疗。他承认对他的文化培育的正确性，并希望矫正那些和“正常状态”不协调的经验和行为模式。患第二种病的人陷入自己的内心世界而不能自拔，这个内心世界包含有他自己无法看到的他的自我的一部分的投影，并可能包含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某些有效的经验。与神经病患者不同，精神变态者自信他自己的经验模式是正确的，而现今的文化模式是不正确的。心理变态者同样不承认他自己的经验模式是不正常的。但社会则认为他处于持续的精神紊乱状态，这导致出不正常的侵犯他人或者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因而需要药物治疗和锻炼。

精神病学对于精神异常者有许多治疗方法。在这类人中，神经病是最容易治疗的，除去着迷的妄想狂以外。然而，这类病症，亦即妄想狂的精神病事实上经常是某种潜在的比较严重的疾病的征兆，例如抑郁症或潜伏期的精神分裂症。

首先是药物治疗。其作用是以化学物质来抵消异常的行为模式，从而恢复文化培育出的模式。这种办法特别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 经过一段长期的治疗之后 能产生明显的“正常状态”但一旦停服药品，很快就会恢复原来的精神状况。就抑郁症而言，如果不是太严重的话，药物作为治疗计划的一部分，往往能够使病人在一段时间内消除抑郁。

其次是电痉挛治疗，也即电震动治疗。我们对于这种治疗法的效果知道得很少，但据说电震动可以减轻梦幻者的痛苦，同未接受治疗的人相比，接受过治疗的人夜间做梦的次数要少些。人们可以提出假设说：既然梦是我们下意识地解决问题的方法（参看 J.A.哈德菲尔德：《梦与梦魔》），精神变态的问题就象精神病一样被解决了。

然而，我们与一位精神病患者接触的经验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直到他第一次接受震动治疗以前，他一直坚持说他必须

玩真的，他将不再行动（这一点支持了莱恩对精神分裂症所作的环境说明）。在第一次接受震动之后，他说他愚弄了我们很长一个时期，并且还要这样做下去。到那时候，他还乞求再接受电震动治疗以便使他能突破“性障碍”可是当人们告诉他就要给他再来一次电震动的时候，他却说他不愿意再接受这类电震动了。

对此也许可以作这样的解释：事实上，电痉挛治疗使人做梦的那种猛烈的力量是难以忍受的，因为在正常生活中，进入梦境的速度要缓慢得多，会使梦幻者返回到他早年那种虚假的自我真实之中的自我分裂状态，从而保护他自己不为这种不可阻挡的毁灭感所压倒。精神分裂症的基本问题是对存在有一种不安全感。诸如电痉挛这样的会压倒他的力量，往往促使他进入这样的反应。

或者通过解决梦幻中的问题，或者使被治疗者恢复虚假的清醒，借助这两种方法中的一种，在文化环境中培养出的行为模式都能得到恢复——归根到底这也是治疗的目的。

在精神病治疗中，职业和工业疗法是另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这种方法，如同使老年病人养成某种习惯一样，能使病人逐渐回到工作中去——能把集体压力和心理满足结合起来。职业治疗所提供的创造性的天地多于工业疗法，但即使这样，这种疗法在它所提供的范围内还是有限度的。一般的目的是帮助病人集中思想和确实回到正常的工作习惯上来。心理上对于友谊、安全和刺激的需要——问到病人的时候，偶而还有对于独立性的需要——将能得到满足，这样一来，反对现社会准则的分子也就落入了陷阱而就范了。如果治疗是长时期的，他也许会被转到工业疗法上去。

工业疗法其实就是把工厂搬进医院。病人当然会得到帮助来适应它和其他环境等等，但整个目的是使他能走出医院——如果不是走向劳动力市场，至少也是走进一个有顶的车间，在那里，他将对制度的永存作出贡献，并帮助资本家维持利润率。或者用这

个制度的术语来说，使他能够“对社会作出有益的贡献”。

事实上，这两种治疗方法都有使病人做好工作准备的目的。前者，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也促进思想集中——这不是工厂工作的经常需要，但可能是这个制度愿意看到的一种条件。思想集中在保持你自己精明能干这类事情上，事实是在促成你符合现代文明社会的要求上当然是重要的，如果你有意想逃避的话。

最后，还有各种类型的分析和集体心理疗法。我们将首先谈一谈集体心理疗法。

这是通过使用集体压力以及满足心理上的需要来使病人“重新社会化”的一种方法。与在职业和工业治疗中的情形一样，集体能提供或取消心理上的满足，这种能力是迫使不正常者顺从的一种强大力量。病人在和其他人的接触中，能讲出自己的问题，从而有助于解决自己的问题。无论是向心理学家请教，还是所有参加者或大多数参加者相互诉说自己的苦恼或问题，其目的都是在于使病人向文化上统一的模式迈进。集体心理疗法事实上可能最近似思想改造和洗脑筋。就感到孤独的精神病患者来说，他虽然不认为现文化是正当的，但却处于强大的集体压力之下。同时，他最害怕他将被别人压倒和吞没，害怕在被别人压倒的过程中完全失去个性。一种高压的集体心理疗法，如果经常施行，能促使精神病患者表面上顺从，而社会也只要求我们顺从，它并不关心我们内心世界究竟怎么样，只要它不影响我们对现实的关系。

无论是直接的分析还是借助于药物和催眠术的分析，其目的都是要发现引起“不正常状态”的初始原因。这类分析所依据的是任何征兆都有其病理性根源这一原则，这是对的，但它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即文化遵奉者的行为模式同样也是不正常的，其原因是这类分析把顺从现存的文化当作一种理想。这类分析还由于其本身的性质，把人看作由各个部件组装起来的集合体，而不把他当作一

个整体。情况必然是如此，因为从抑制和压迫下解放一个作为整体的人，将使他成为一个与非人道的社会不相容的人。分析者只能透露什么和社会不相容。现代精神分析学为超我找到了一个场所——虽然这种超我的唯一作用是抑制我们的自然本能。

同时，正如我们所相信的，只有当人能无限制地和无条件地去追求自己的目标时，他才算是充分符合人性的——而只有处于这种内在自由的环境中，他才不会一味的着迷于一种完全是一切为自由的想象之中。

监 狱 方 法

管理监狱的主要方法当然是传统的做法，强调惩罚。最近又增加了“拘留中心”的震动疗法。这种方法已被广泛采用 目的在于十分厉害地震动精神或行为不正常者，使他战战兢兢地进入顺从状态。这种恐惧心理将会延长到足以在人心深处恢复文化培育的本来面貌，而不只是表面恢复。

某些“特殊监狱”还特别采用了集体精神疗法。监禁的感觉激化了侵犯性精神变态罪犯的暴力行为，即逃跑的念头，这种念头受到巨大的集体压力可以转变为顺从，因为每个人都感觉到，出路在于假装顺从。他们在互相影响中把不可靠的暴力心理加在彼此身上，此外还加上这种情况是无法避免的心理。因为精神变态者准备用任何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每个人都不只是表面上影响别人。

家庭状况在把精神或行为不正常者的实在感情消灭殆尽的同时，还使他成了资本主义理想的绝妙讽刺——在他身上表现出了造就出成功的实业家、成功的政治家的一切品质，而社会对之却视而不见。社会不能看着它的理想人物走得太远。它必须使他缓和下来，使他不要过激，使他赤裸裸的自私自利不要太突出，使他对

别人的漠不关心不要太明显。而与此同时，它必然要把他当作可怕的祸害挑出来，即使他的邪恶是他疾病的一种产物。

人们常常最激烈地攻击那些集中表现自我存在的人，他们看不惯那些人。资本主义的情况亦复如此。但是就资本主义来说，它不能正视的恐怖正是它存在的最根本的背景——而不是某种被压抑的、和它相抵触的因素。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看到，不管自由意志和道德的支持者进行的维护旧制度的斗争结果如何，监狱管理将日益受到精神病学方法的侵犯。原始的惩罚制度已经失败了：这种制度虽然对少数人是有效的，但它与蓬勃发展的心理控制相比较则过时了。心理控制法只是说罪犯患了病。也许它还没有认识到它是要控制罪犯，或者是它不愿意正视这一点。这种方法正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同时它也满足了社会的需要，而不管谁发明了它。中国共产党人也把思想改造作为清除不正常行为型式的方法。

我们看到，在思想改造中正越来越多地利用心理学知识来使人顺从。控制人的心理的目的，是要否定不遵奉现社会准则的、不正常的行为型式乃至其经验模式（这肯定是一件乐事，但整个说来从长远看却没有什么可高兴的）是要恢复统一的行为型式。重要的是要记住：思想改造已经把这些行为型式逐渐灌输到精神或行为不正常者的思想中了，它只要赋予这些型式的活力就行了。这些型式还需要加强，但基础已经打好了，现在所需的只是对它们加以详细阐明。

无政府主义的解决办法

我们已经看到了文化培育的效用。因此，简单地引入一个自由的社会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它只会重演文化的统一。仅仅提供一个自由环境，并不会带来自由，还必须使我们自己得到心理上的

自由。我们必须着手消除我们受到过的培育，这样，因长期受到思想灌输而处于窒息状态的自然人才能得到解放。

同时，我们应该记住我们所受到的强制培育带来的问题，特别是在培育自己的孩子时不要忘记这一点。

但是，这里却产生了一个矛盾。我们必须同时创造一个自由的环境并解放我们自己。这个过程事实上必定是相互作用的进化过程。在我们有一个自由的社会之前先解放我们自己，就是使我们在一个压抑的结构里完成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是走向精神分裂的最快速的道路。当务之急是竭尽全力建立起一个有利于精神和行为自由的环境，然后努力使自己获得自由，并使环境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发生演变。

可是，这要求每个人都希望得到自由，然而大多数人都已经被受到的培育成功地制约住了。我们该如何打破这个僵局呢？

事实上，首先要由希望获得自由的人们在压制住的社会里建立起自由的环境，使形势随着人性的增多而演进，从而提供一个代替现存社会的另一种选择。至少我个人认为没有别的道路可走。

由此看来，最根本的基础是要具有获得自由的愿望并接受下列看法，即：由于我们被培育得已经习惯于一个压制的等级森严的社会，所以我们对完全的自由和人性的意义只有极少的了解。此外还要准备承认下列情况：我们所构成的社会可能在开始时在我们心目中是自由的，但只是通过我们那经受过长期文化培育的存在来看问题，情况才是这样。因此，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必须在彼此互相影响中来发展内部的和外部的自由。

在我们研究文化压制时，我们首先谈的是对孩子进行思想灌输的方法，其次是各种水平上的思想改造。在研究无政府主义的解决办法时，很明显地需要颠倒这种顺序，因为要建立这种潜在的自由社会，只能依靠具有自由愿望的成年人。

正如前面已指出的那样，自由的演进是不断增加的心理自由和不断增加的环境自由互相作用的结果。但由于外部的现实从概念上讲是按内在的想象塑造的，因此，必须从心理自由着手。心理自由的增加在环境方面的表现将影响内在的演进，影响的方式是告诉人们在某一阶段哪些发展路线是正确的，哪些发展路线是错误的。

这样一种自由化的过程要求广泛包含集体的本性和个性，这是潜在的痛苦和满足的泉源。然而，它也要求一个个人只能涉足于他自己所选择的范围，因为这是自由主义世界观的精髓。这是一个会自行消解的冲突，因为一个不愿意过分深刻地涉及他自身的个人，会发现思想深处的关系，例如自己可能成为哪一类被解放的即恢复了人性的人等等。正如前文已经说过的：这是因为我们对于自由的含义和后果的看法是我们那种经受过长期文化培育的个性的表现。

然而，根据人类学的观点来看，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看法。是会出现范围远比现在大得多的社会化，还是会出现斯蒂纳^①所说的那种自给自足？是会出现马克思所描绘的性共产主义，还是会出现另一种家庭形式？工厂是否会由工人来管理？无政府主义者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乌托邦画出具体的蓝图，但他在什么场合下会提出不同观点则是明显的。因为他在具体提出自己的乌托邦时，他实际上是在表现他那经过长期文化培育的自我。对我们今后将要做什么有某种想法是有趣的，甚至是有帮助的，但事实依然是：我们只能对未来进行猜测。

^① 斯蒂纳：德国十九世纪小资产阶级哲学家，他写的《人及自我》曾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著的《神圣家族》中受到批判。——译者

20. 走向工人控制

P. 特纳

无政府主义者必须认识到工人运动的用处和重要，必须支持它的发展，使它成为他们行动的手段之一，尽最大努力使工人运动同一切现存的进步力量相结合，最后发动一场社会革命，消灭一切阶级，实现全人类的完全自由、平等和团结。但是，如果象许多人所相信的那样，相信工人运动以它本身的条件并根据它本身的性质就能够而且必然会走向这样的革命，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与此相反，所有的运动都是以直接的物质利益为基础的（一个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不可能以其他东西为基础），在此情况下，如果缺乏有思想的人们为美好的未来而斗争和牺牲所作的不懈努力、激情和劲头，所有的运动都会趋向于使自身适应环境，逐渐养成一种保守精神，使那些总算改善了自身处境的人们对变革感到恐惧，其结果常常是创造出新的特权阶级，支持和巩固本来要摧毁的制度。^①

上面一段话是马拉泰斯塔在 1927 年 10 月写的，描述的是当时意大利的情况。然而，这段描述和分析也适用于我国今日的情形。

现今的工会确实创造出了一个由官僚组成的特权阶级，这个阶级是为巩固现存的经济制度服务的。要改革现存的经济制度必须得到工会领导人的支持。问题不在于改变工会的领导，使领导权转到相信革命行动的人手里，而在于改变所有工会会员的世界观。

在工会运动史上的某些时期，一些工会曾在某些问题上采取过革命的主张。1910—1922 年，英国的铁路工人、矿工和工程师曾正式通过决议，或者主张共同控制他们的企业，或者主张完全接管，把企业置于工人控制之下。这些时期较之正常的情况可能是例外，但无论如何表示了工人们在一一定的情况下要求革命变革的

愿望。

国有化，不是答案

关于工人控制的许多梦想，例如《矿工的下一个步骤》^②里提出的接管和经营矿业的主张，都已经在实行国有化的过程中破灭了。国有化不仅没有把某一工业的控制权给予在该工业部门工作的工人，反而使这些工业规模更大，更加僵化，更加远离工人。它非但没有使社会拥有所有权，反而强化了国家。国有化是一个政治概念，它给予国家以工业力量。工业力量加上社会和政治力量，使国家对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拥有巨大的统治权。事实已经证明，认为国有化是最终达到工人控制的一个步骤的思想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灾难性的。那些已经国有化的工业都已走向衰落，由此产生的方案则意味着大批工人成为多余。国有化非但没有给予工人更多的控制，反而已经使厂方更加脱离工人，更加有力量，从而更能抗拒工人对他们提出的要求。

人要控制自己生活的愿望深深地扎根于他的本能之中。没有人愿意承认他或她喜欢受人摆布。人们已经赢得了某些自由，但还有一些自由没有被给予，这种状况或多或少地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有改变我们政治主人的自由，我们可以表达和一般地宣传我们的观点，但在当今的社会里，工业力量居于最重要的地位。我们要花费将近三分之一的生命在工作上，为少数雇主和国家创造财富和力量。在工作时间里，我们对如何安排和怎样干工作，几乎没有或者根本没有发言权。对我们所做的工作，几乎从来没有征求过我们的意见或者赋予我们任何责任。没有工作的时候 我们被解雇 工作充裕的时候 却又期望我们放弃闲暇 加班加点。作为报偿，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工资袋，使我们能够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属获得食品、衣着和住房等必需品。

几乎没有或者根本没有发言权

奇怪的是，那些实际生产物品、销售物品和为社会提供必要的社会服务的人，对于如何进行这些事反而几乎没有或者根本没有发言权，而那些从生产性工作中提取财富的人却控制了工作的全过程。生产工人是社会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许多工人做了有益的工作，如公共汽车售票员，但如果没有司机和技工为车辆服务，公共汽车的服务就不会存在。现在的状况是，某些做关键性工作的最重要的工人在我国却领取最低的工资。

很显然，工人作为物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但一般工人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大部分工人满足于他们现在接受命令的地位，但是许多工人也想对影响他们工作的那些事情拥有某种控制权。工会便是体现这一集体愿望、试图控制和调整工作条件的组织，但是某些人误认为这种职业组织就是工人控制。例如有人说：“凡是有工会活动、车间工会代表制裁权以及集体力量抑制雇主的地方，就存在着工人控制。”（《参与和控制》，肯·科艾泰斯和托尼·托普哈姆著）没有人会否认这种职业水平的控制是一件好事，但它不是工人控制。不过，这种职业组织已经取得了很高程度的控制，它培养了责任心和首创精神。

黑格·赖特描述了一种在考文垂施行过的组织形式。他写道：“这种班组制度使人们的思想从许多忧虑中解放出来，使人们能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工作上。它提供了一种自然的安全结构，使人们具有信心，能够均分金钱，没有区别地使用所有不同熟练程度的工人，能够分配给男女们各种最合适的工作，这种分配经常由工人们自己进行。调换工作以避免单调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废除了‘工头’，领班成了被请来提供咨询意见或者处理事故或其他紧急事件的技术人员。”^⑤这种控制制度在使用输送带的大工厂里明显地对

工人有好处，但它仍然只是一种工作方法，这种方法只是缓和了现代汽车制造厂里非人的和单调乏味的工作。当标准汽车公司陷入经济困境，被合并到莱伊兰德卡车帝国里去的时候，这种班组制度就宣告结束了。

是工会控制吗？

工人控制这个词，当今被用来描述许多不同的情况，肯·科艾泰斯和托尼·托普哈姆毫无疑问会把它用到班组制度上。但这不是工人控制，而仅仅是使乏味的工作变得比较有意思的一种很好的方法。另一些工人控制的提倡者则强调：作为工人控制的第一步，工会控制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持这种看法的集团或更确切地说一个潜在的政党是“国际社会党人”^④。他们的目标这些年来变化了许多次 先是主张“实行完全工人控制下的公有制”后来主张建立由工人委员会构成的国家，由工人控制生产，以此由工人阶级对工业和社会实行“工人”民主力量的集体控制。^⑤ 他们的主张中突出的两点是要“实行公有制”和“建立由工人委员会构成的国家”，这表明他们要建立某种形式的国家或国家机器。这种对国家的承认是和建立政党的想法相联系的。他们的一篇社论曾宣称：“当前迫切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可靠的社会党来代替保守党和工党。国际社会党人有义务来建立这样一个可供选择的政党。”他们的最后劝告是“不让保守党上台 投工党的票 准备投入战斗。”^⑥

这种劝告基本上和另外五十几个各种各样的托派团体提出的劝告相同。它号召支持一个政党，但这个党如果掌权，事实上它就会成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为它自己创造新的特权，并使工人仍然遭受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那种异化。任何形式的国家对工业的控制必定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影响工人的决策仍将由与此没有直接关系的人作出。

俄国的例子

马拉泰斯塔在论及国家时说：“假使国家存在下去，它就要继续趋向于在一种或另一种形式下〔着重号是我加的〕重新产生一个压迫人的特权阶级。”^⑦ 已经有许多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五十年前在喀琅施塔得发生的事以及 1917 年革命中发生的事，都属于这种情况。对于这些重要事件，埃玛·戈德曼评述如下：

使俄国广大群众与革命异化的过程，几乎是从列宁和他的政党掌权以后就立即开始的。食物和住房的极不公平的分配、各项政治权利的被取消、持续不断的迫害和逮捕早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诚然，当时进行的清洗没有涉及党员，但共产党员也帮助填充了监狱和集中营。一个恰当的例子是第一次出现的“工人反对派”，它的一般成员迅速被消灭，他们的领导人施拉普尼科夫被送到高加索去“休息”，亚历山德拉·柯伦泰被软禁。但所有的其他政治对手，在他们中间有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许多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工人以及农民都被送到契卡的地牢里做临刑前的忏悔，或者被流放到俄国的边远地区或西伯利亚而慢慢地死去。换句话说，毁坏俄国革命或者给俄国人民锻造新锁链的理论和方法，并不是起源于斯大林。

我承认，在斯大林统治下的独裁已经变得很可怕。然而，这并不能减轻作为革命戏剧演员之一的里昂·托洛茨基的罪行，在这个戏剧里，喀琅施塔得是流血最多的场景之一。^⑧

一种更受奴役的处境

共产党的极权主义国家确实是个教训，证明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为革命的目的而夺取国家政权这一立场的正确。这种国家给工人带来了新的、更有权力的工厂主。共产党国家取得了与经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越来越多的社会职能。这意味着国家不仅用各种手段例如宣布罢工为非法控制了经济而且意味着因为它已经成为政治和经济的主人，它使工人沦入了一种比西方工人

更受奴役的处境，这是因为法律不容许任何改善工作条件的手段存在。在共产党掌权的国家里，政权已经成为全面的、无所不包的权力。它决定原料的分配、货物的类型和分配、投资和工厂经理人员的任免。在“工人国家”里，一切都由上面决定。

共产党不佯装允许工人控制。巴特·拉梅尔桑在《共产党的工业组织者》一书中说过这样一番话：

一方面管理部门有责任保证安全 提供福利、训练和教育设施 另一方面它们的贯彻和监督则由工人选出的代表和委员会来完成。这样，由于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和管理部门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便大大地扩展了工业民主。然而，如果认为工人和管理部门的一切分歧都已消失，或者认为存在着“工人控制”或“自我管理”或者认为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工人可以控制生产的所有方面，例如生产什么，定多高的价 如何投资等等 那就错了。

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管理部门也倾向于对产量和单位成本表现出更大的关心，而有时这就很可能侵犯工人的权益（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工会何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是不可缺少的，而且从根本上说，它们的主要作用何以同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工会是一样的——保护工人的利益，使他们不受一切人包括管理部门和国家的侵犯，原因即在于此。^⑨

无政府主义者要说明的是，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根本的利害冲突依然存在，因为正如巴特·拉梅尔桑在我加着重点的句子里所承认的那样，工人的地位实际上没有改变。他十分强调工会保护工人利益的作用，但也就是这些组织已经完全和国家机器结合成一体了。它们已不再是独立的和自由的组织，而是极权主义制度的一部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苏联工人的处境比西方工人的处境更糟。共产党国家工人的反抗进一步证明了无政府主义的一个论点，即工人和国家之间存在着—道鸿沟。官方的工会在这些冲突中没有站在工人一边，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便建立起自己的组织来反对统治和控制他们的制度。

匈牙利、波兰和法国

在革命的形势下，出现了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和愿望的工人和农民委员会这样的组织。这种现象并不只是出现在遥远的过去，最近一个时期，匈牙利、波兰和法国都出现了这种组织。在上述三个国家里，国家和政府的权力已被人民的反抗所压倒。人们组织起了工人和农民委员会，把官办工会和党的官员甩在一边。在工作地点形成的委员会与其他工厂的同样的委员会联合在一起，而这些委员会又在地区和全国的基础上与其他工业联合到一起。这种在整个国家范围内联合起来的组织，往往非常迅速地发展壮大，而同时基本物品的生产和食品的分配则能照常进行。

在 1956 年匈牙利暴动期间，《观察家》杂志 (1956 年 11 月 25 日) 评论说：

形势的一个奇怪方面是 虽然总罢工在进行 对工业没有集中的领导 但工人们为了他们自己选择和 supports 的目的 都主动维持基本的社会服务。为了使居民生活下去 工业区的工人委员会承担了分配基本物品和食品的任务。煤矿工人每天生产的煤 刚好能维持发电厂的运转和供应布达佩斯和其他大城市的医院。铁路职工为了他们赞成的目的 组织车辆驶往他们所赞成的目的地。这是在没有政府的环境中的自我帮助。

对匈牙利共产党国家和苏联入侵者的反抗不仅仅是罢工这样一种消极行动，而且采取了革命的主动性为新的自由社会创造基础。在工人和农民发现国家由上而下对社会进行的控制已经松弛的场合，有许多这方面的例子。抓住这种主动性和接管生产手段，几乎是一种自然的倾向。对于那些在土地上工作的人们来说，接管生产手段这样的事做起来比较容易，因为事实上所有必需具备的东西都在手里，在土地所有者和官僚逃走之后，工人只要继续种植和收获就行了。工业则是另外一回事，它要依靠原料和工厂才能生产出成品。当国家的权力被削弱时，它只好接受这种形势，而

当当局感到足够强大时，他们便要使这种形势合法化。在 1917 年的俄国和 1936 年的西班牙，国家就是这么做的。这种合法化并未带来工人控制，而是成功地阻止了已有的工人控制的发展和扩散。

在工厂和工作地点已被接管的地方，工人表现了主动性，他们继续生产，临时想办法克服零部件和原料的短缺。他们表明自己能够管理和控制工业，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后来所以没有能维持住这种控制和巩固社会革命，并不是一种思想的失败，而是因为那些最终掌权和接管国家的人全面反对的力量太大了。

工人控制的成熟

我国现在又在讨论实行工人控制的条件已经成熟的问题。它已被说成是一种“寻找运动”^⑩的思想和“进行行动的思想”^⑪。在目前整个工业社会的工人正面临着通货膨胀和失业增长的时候，迫切需要的正是这种思想。时机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成熟，人们可以把问题看得比社会民主党人的无效改革更远一些，不再搞政治行动，今天支持这个工会的领导人，明天支持那个工会的领导人，而结果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罢工次数的增加反映出工人已不再满足于仅仅做工资的奴隶。许多罢工是反对使人异化的工作条件，反对仅仅把工人看作是一个不断增大的机器上的齿轮。这种罢工正具有越来越多的非经济性质，因为工人们正在争取对工作条件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对工厂拥有更大的控制权。1910—1922 年间我国出现的正是这样一种争取工人控制的运动。^⑫这个运动在工程师中开展得特别广泛，在谢菲尔德、克莱德和伦敦都建立了委员会。它不仅有工业基础，而且还扩展到了影响工人阶级的其他事务上。虽然这种委员会是工程师工会的一部分，但它们是在非正式的基础上工作和组织起来的。它们不仅争取对工作条件有更大的控制权，而且还主

张推翻资本主义的工资制度。它们宣布它们信仰革命和工人对生产和分配的控制。

今天所需要的，是在车间一级开展这类运动，可以依靠存在于整个工业中的车间工人代表的组织来推动它。工人代表人数的不断增加，标志着工人希望组织起来，在某些方面控制工作条件。这是对发号施令的统治当局的一种反抗。它表现出一种决心，即工人不愿再在工作方法和工作条件上受他人支配。这一级组织是与雇主作斗争的主要武器，因为给雇主造成最大损害的是非正式罢工。工会与现存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有很大的利害关系，它们的领导人决不会有推翻这一制度的愿望。而这项任务能够并一定会通过工人阶级的积极参与来完成。

今天的发展机会

现存的车间工人代表组织是否有可能推动这种运动？很不幸，许多工人代表是政治党派的成员，他们认为工业行动是次要的，首先是要采取政治行动和夺取国家政权。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布尔什维克掌权以后，正是这种态度的转变导致车间工人代表脱离了工业行动和工人控制的方向，而沿着政治的道路走下去。

然而，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到今天，还有一些与此不同的平行发展的情况，它使工人控制的思想有可能深入人心。强调的重点正在从在议会中争取更多的政治代表席位，转向采取工业行动。工人们日益认识到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保卫自己的权利。工资增长速度能超过全国工会协议规定的速度是由非正式行动取得的，工会事务的活动中心正在迅速转向工作地点。近年来，有纪录的罢工次数已经从 1961 年的一千二百二十次增加到 1968 年的二千三百五十次，而且最近二年有更大幅度的增加。这些数字包括这样一些工业部门中的罢工，在这些工业部门中工会自从 1926 年

以来一直没有号召其会员进行过正式罢工，例如全国铁路工人工会仅仅在 1962 年 10 月 3 日举行过一天正式罢工，此后便一直没有号召工人罢工。

很明显，重点转向直接行动导致了车间工人代表人数的增加。他们是被车间工人直接授权进行工作的代表。如果他们不能完成这种任务，他们可以被撤职，事实上也有被撤职的事例。据《多诺万报告》估计，英国有十七万五千名车间工人代表，从不断增加的罢工次数看，看来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发挥积极的作用。

同时，人们对于所有那些声称支持工人阶级愿望的政党也都大失所望，不再抱有幻想。他们特别感到威尔逊政府的收入政策对他们的生活水平产生的影响。我们的处境和其他国家一样：增加的工资正在被上涨的零售价格和租金所吞没。眼下通货膨胀似乎不会停止，加上禁止非正式罢工以及削减社会服务，将进一步降低生活水平。失业人数的增加会进一步使政党和政府普遍感到失望，抱怨它们未能阻止目前的经济衰退。

目前仍有人对我们说：罢工这一武器已经过时了。一些工会领导人例如“全国漂染与纺织工人工会”的杰克·皮尔居然攻击为了政治目的而举行的罢工。据他说，反对《劳资关系法》的战斗，“只要利用我们的头脑以及争取舆论对我们的支持就能赢得，只要赢得下一次选举，就能废除那个法案”。可是不管这些领导人怎么说，工人们正在转向工业行动，而不想依靠工党的政治家和寻求其他政党的帮助。由于这一情况，工人们会更感觉到他们的力量，并能超越眼前的斗争走向工人控制。

由下而上的控制

同社会的其他部分一样，工业是由上而下组织起来的。工人控制是一项革命的原则，它将给予工人由下而上组织和控制工业

的责任。他们已经在过去证明了他们有能力采取这一步骤，同时也证明他们不需要国家、雇主和政府。当这些力量衰弱时，工人很自然地会转向工人控制。这是要对自己的生活负责和加以控制的一种愿望。

很明显，这种要求改革的革命愿望将受到统治当局的反对，政府为了雇主的利益也会采取行动来保护他们在社会上的统治地位。这将意味着用军队和国家的全部力量来对付争取工人控制的革命运动，因为这个运动将意味着结束资本家的权力、他们的利益和他们的特权。它还意味着工资制度的结束。为生活的需要而生产物品和种粮食将是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关于这些问题将由人民在他们的工作地点或他们的团体里作出决定。

资本主义社会把人民仅仅作为生产单位来对待。它造成了匮乏和浪费，污染了我们的地球并且制造了战争。无政府主义者要结束这个疯狂的社会。取而代之的是，我们要求工人在工作中具有尊严，同时，工业要由在现场工作的人为整个社会的利益和福利而经营和控制。

注 释

- ① 《马拉泰斯塔的生平和思想》，V.理查兹著 第 113—114 页。
- ② 《矿工的下一个步骤》南威尔士矿工在 1912 年写的一本小册子。
- ③ 《无政府主义》杂志第 2 期，《工人控制》第 50 页。
- ④ 《劳动工人》杂志 1967 年 6 月。
- ⑤ 《社会主义工人报》，1970 年 6 月 13 日。
- ⑥ 同上。
- ⑦ 《无政府主义》欧里科·马拉泰斯塔著 第 22 页，自由出版社。
- ⑧ 《托洛茨基反对的东西太多了》埃玛·戈德曼著 第 3 页
- ⑨ 《关于工人控制问题的争论》第 14—15 页 工人控制问题研究会。
- ⑩ 《无政府主义》杂志第 2 期，《工人控制》，1961 年 4 月
- ⑪ 《无政府主义》杂志第 80 期，《工人控制》，1967 年 10 月。
- ⑫ 参看《1910—1922 年车间工人代表运动和工人控制》，布兰科·普里比塞维克

21. 摘自：非暴力革命宣言

乔治·莱基

新 社会

当前许多问题相互关连，正在形成一个导致文明世界总崩溃的恶性循环。与此相同，我们对一个新社会的设想也有许多相互关连的特点；如果要让这些特点充分显示其美好前景，就不能把它们一个一个地分开考虑。我们不打算为新的制度描绘蓝图，但要把想到的方向提出来。我们相信，通过人民运动之间多年不断的对话，将会产生我们所需要的具有创造性的设想。

新社会要求有与地球相协调的生活方式、合理的经济制度、民主地参加政治生活的制度、公平的世界制度、文化方面的平等以及非暴力斗争的作风。

同地球相协调

工业化国家发展其经济时，利用能源和原料的方式应能维持几个世纪，而不是几十年。这不意味着我们要以欧洲中世纪做为我们的典范。时光是不能倒流的。这意味着要利用许多国家通过许多世纪获得的知识，来发展生态完好的生产方法和分配方法。

科学家和工程师应该设计经久耐用的产品。这些产品要容易修理，最后还要容易回收。虽然象人工肾那样的复杂技术是无可非议的，可是技术标准应该简单或技术范围不要太广。举例来说，自行车应代替汽车作为个人的正常的交通工具，不收费的、快速的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应成为最普通的交通运输手段。

为了保护和回收资源，把大城市分割成小乡村和小城镇，似乎

是必要的。从生态观点看，大城市的浪费很大。在小城镇，按平均人口计算，较少的能源和原料就能满足需要。包括人的粪便在内的废物，也比较容易回收。另外，噪音的减少、相对拥挤的缓和、容易接近农场和植林区等等附带的好处，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相信，这些变化会消除工业社会里根深蒂固的利己主义和用户第一主义的习俗。在生活的共同体当中，人与人之间的融洽关系和清晰可见的生态循环过程将使人们严于律己；人们将更清楚地看到他们相互之间、他们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只看到他们自己与其他人的相互斗争。

在一个生态完好的新社会里能被充分显示出来的人的价值，是“存在”价值而不是“财产”价值。艺术将繁荣兴旺，体育活动将广泛开展，教育将通过各种方式使人们分享知识、技能和智慧。

从生态方面讲，素食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同更高一级的食物链即肉类相比，地球本身能更有效地生产出蛋白质。

分散的经济能使人们较容易看到，即使人们都吃素食，人口的不增长也会给可获得的食物供应造成无法承受的压力。例如，一些专家认为，英国最适宜的人口是三千万人（而现在为五千六百万人）。也就是说，英国的环境所能提供的食物和其他必需品，只能维持三千万人过象样的生活。多出的人口，现在是从其他国家获得他们的食物，但是这些国家本身也将越来越多地需要食物。除非英国人坚持采用军事的和其他的手段从其他国家不公正地占有食物，否则就必须减少人口。

因此，新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应维持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社会标准。当然还有另外一种选择：有些夫妇想生多少孩子就生多少，而有些人则一个也不生。但是，这是违反平等原则的。自愿扩充成员的家庭或故意扩充成员的生活共同体，可能满足许多谋求多子女家庭的人们的愿望。总之，共同生活应成为准则，因

为按平均人口计算，大家庭消费的能源和空间比小家庭消费的要少。

高度工业化的社会只有通过彻底改变社会风尚才能达到生态平衡。再发展的计划要因地制宜，在这里我们只能提出建议。不过，应该清楚的一点是，工业化世界里普遍存在的物质第一主义和利己主义必须予以消除，代之以真正尊重人、尊重地球的社会风尚。

从某些方面来说，农业国家的工作要好做一些。集体生活的传统、大家庭生活的传统、同自然界和谐相处的生活传统等都是比较牢固的；都市化才刚刚开始；许多资源还没有运到欧洲、日本和美国被消费掉。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显示出，不经过危险的工业化和都市化道路来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是完全可能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在阿鲁沙宣言中宣布：要优先发展农业和乡村，暂缓发展重工业；要依靠人民的劳动，不依靠金钱。

几十年前，甘地和他的同事们就看到了在损害农村利益和工人尊严的情况下实现工业化的危险性。甘地反对“工厂文明”是因为这样的文明会导致剥削和战争，而不是由于显而易见的生态方面的原因。然而，他的这种直观认识却由于对生态学有了新的理解而被肯定。他认为，技术将越来越简单而不是越来越复杂，将是劳动密集型的而不是使人失业，将以乡村为基础而不是以城市为基础。

由于缺乏对现代生态学的理解，甘地不懂得在提供较多的食物、较好的卫生条件等等以限制人的死亡的同时，也必须限制这个面积有限的地球上人的出生。在这方面，中国由于实行了晚婚这一社会准则，已经接受了这一挑战。

在新社会，我们可以想象到：矿物资源将由所在地区控制，而不是由远方城市中的垄断集团控制；它们将被谨慎地开采，以最大

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状况应该改变，发展应集中在有利于物资回收和节约能源的分散的经济地区。

某些方面的集中，自然是必要的，如公用事业和通讯系统。某些复杂的技术，也是必不可少的。不过，证实的责任，需要从赞成技术简单化的人们那里转移到赞成技术复杂化的人们那里。工程师们的基本任务应该是发展有利于尊重人、尊重地球的技术。

合理的经济制度

一种经济制度在帮助或阻碍健全而善良的人的成长方面能起很大作用。在许多方面，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强调的是人类准则的对立面。它要求人们采取“唯我第一”的处世态度，为了自身的安全拼命地竞争，甚至牺牲旁人的利益。

我们认为，合理的经济制度应强调要合作，不要竞争；要收入的相对平等，不要相差悬殊；要民主的自我管理，不要旁人的独裁统治；要依靠自力更生和首创精神，不依赖官僚机构。

联合大企业和多国公司必须被摧毁，它们的子公司必须归人民所有，并由人民自己控制。南斯拉夫工人委员会的经验告诉我们，一种制度是可以设想出来的。在这个制度中，工业的基本所有权属于全体人民；但各个企业则由企业中担任日常工作的工人们管理。

在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体制中，各企业的全体工人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直接选出在工人委员会中任职一年的工人候选人。工人委员会是企业的最高管理机构。工人委员会还要选出一个管理委员会，它在工人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内，可以决定一切方针政策性的问题。它可以雇用和解雇企业的负责人，可以决定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可以决定工资标准，可以决定在什么地方购买原材料和设备，可以决定如何使用利润进行再投资等等。

在南斯拉夫，这种基本方法已应用于剧团、大学、医院等许多机构，在不可避免地实行大规模生产和复杂分工的情况下，这可能是最好的方法。

在新社会的经济中，合作社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通过实行每个人都有选举权的原则并让每个人都享有参加管理和发挥积极性的机会，合作社可以丰富人类的生产活动。消费合作社可以阻止生产合作社和企业谋求不合理的产品价格。合作社为非赢利组织，创办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入股人的特定需要，多出的利润应还给最先提供资金的人们。

新社会的大量住房，可由住房建筑合作社承建，并可归合作社所有。这样，就可使租房人从谋求私利的房东的势力下解放出来；也可使人们享有民主权力，以便对他们自己如何安排生活条件做出决定。

经济中应允许个体企业存在，但所占的比重不应过大，例如允许小农场主、手工业者、店主等存在，允许他们雇用几个帮手。虽然这种经济成分比较倾向单干、竞争、追求私利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它的规模很小，其消极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它存在于社会所有制和合作社所有制的总的经济之中，它将愿意接受新社会的较为积极的社会准则。我们认为需要有这种经济成分，它会给总的经济制度增添多样性和灵活性。

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很可能要受各国传统的巨大影响。当然，强制向国营农场过渡，把工厂特有的异化带到农村，并不是解决办法。在许多国家，最好是合作社与私人小农场相结合，农场主可以在销售产品、信用借款、使用大型机器等方面，服从合作社的统一安排。

我们建议，新的经济制度要有三种基本经济成分：大的、合作社的经济成分；大的、社会所有的但拥有自主权、自我管理的企业

的经济成分；小的、个人所有的经济成分，如个人所有的商店等。

我们反对把工作看成仅仅是生产效率问题，因为这样只会把工作看成是占用真正生活的时间而又不得不承受的一种负担。要么是我们使工作具有人性，要么是工作使我们的生活失去人性，就象现在一些职员和工厂工人总是日复一日地做完了日常工作，就开始几乎是日常的浪费光阴的娱乐活动那样。在这里，生态上的需要再次与消除异化的理想结合了起来，也就是生产经久耐用的产品和勤俭节约同掌握技术结合了起来；存在上的（而非财产上的）需要同自治和集体领导结合了起来；努力工作同自力更生和调动小规模生产单位的积极性结合了起来。

从生态角度来说，还对真正的人的工作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即应该是人控制技术 而不是象现在这样 技术控制人。很显然 苏联及东欧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需要在这方面和其他方面进行彻底的变革。

新社会的经济应该使儿童在不担心饥饿和贫困的环境中成长，男人和女人能够过体面和象样的生活，老年人能在不担心贫困的情况下安然度过他们的晚年。人们的工作所创造的财富，可以通过公共事业和收入进行分配。所有的人都可以享受免费的交通、医疗、教育、文化生活等公共事业方面的待遇。丧失工作能力的人的最低收入应同所允许的最高收入保持一定比率。这一收入比率应该保持低水平，举例来说，可以是一比四，以促进平等。任何人从经济中得到的收入，都不应使他或她享有高人一等的权力和特权。任何人都不应在剥削别人劳动的基础上获得收益。个人的收入应来自工资和薪水、合作社的回扣以及社会保险救济金。通过征收遗产税和其他财产税，可以避免财产相差悬殊。

民主地参加政治生活

大工业化社会中的政治，近似一个电影院。电影院里的许多观众都受影片的影响，但每个观众之间却很少互相影响。在自由主义的大国，各政党总是用一些不触及基本问题的花言巧语和口号，争取对它们的支持。候选人总是向市场上的用户“推销自己的主张”，而不是和公民进行坦率的对话。

在一个人口高度流动、新闻工具发挥巨大作用、权力集中、城市不断膨胀的社会（即所谓“大众社会”）中，政治生活只能是象上面所说的那样。民主政治的本质，即享有同等地位的公民共同讨论当前的重大问题，被报纸和电视单方面的宣传取代了。大众社会只能导致政治受人操纵。

我们也反对苏联那种权力高度集中的官僚体制。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官吏的权力依然不受民主权力的限制，尽管列宁说过，这样的国家会很快地开始消亡。《共产党宣言》中要求集中力量创建工业大军的号令，完全忽视了由此而可能产生的僵化的官僚主义统治。在苏联那种制度下，工人阶级的政府只能是高居于工人阶级之上的政府。

新社会的各项决定应从街道开始，在公民之间经过面对面的讨论。地方能做出的决定，应尽量由地方去做。经济的分散应伴随以政治的分散。

教育担负着传播文化和劳动技能的任务，主要应以社区为基础。一般地应由地方维持治安，由地方根据普遍接受的人权原则确定哪些是破坏治安的行为。卫生和福利事业也应由地方来搞。生产和分配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应由社区严加控制。

实际做决定的方式，当然要按照传统和地方独创性而有所不同。举例说，可采取地方自治会的形式，由一个较小的能够进行面

对面讨论的小组选出他们其中的一个成员代表他们参加较大地区的自治会；在较大地区的自治会中又同样地选出一个成员，参加更大地区的自治会。这种地方自治会的形式具有密切联系群众的优点，而且又能向上扩大，以便与更大的地区协调行动。

生态方面的需要，使我们更加坚信，需要有一个权力分散的、公有的社会。工业化社会改变它们与地球的滥加开发的关系，将需要经过一个充满困难的漫长时期，要求我们进行极大的自我约束。实利主义和破坏环境的习惯已经根深蒂固。必须建立和实施新的准则。这一任务虽能由国家机构和警察当局来完成，但是这种外力的限制，总不如人们的自我约束更有效。通过充分参与决策和听取舆论的意见，自我约束的风尚是能够形成的。不过，从实际情况看，政治单位越大，参与决策和听取舆论意见的可能性就越小。在由不同民族组成的、权力集中的高度工业化国家的社会中，生态平衡的、稳定的社会所要求实施的种种限制，总使人感到是高压统治，是冷漠无情的政府实施的专横的限制。

我们认为，大的民族国家应在地方、地区、跨国的基础上分解成各种各样的协作组织。应扭转民族国家包揽更多权力的趋势；只有因问题的性质，地方上不能很好地解决时，上一级才有理由调整资源和做决定。如果地方上从理论上说能解决这个问题，而只是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或决心，则应由广大社会的其它组织提供这方面的知识，强制它鼓起干劲。一个软弱无力的社区如果把它的工作交由其它社区代做，它只能变得更软弱无力。

但是，人类的某些问题，地方一级是无法解决的。对于合理地开发某些资源来说，地区计划是必要的。生态方面的争端（比如说，河流上游的社区与下游的社区之间发生的争端）就需要通过地区的仲裁来解决。一些组织可以根据其职责吸收许多社区参加，把民主讨论的形式扩大到更大的范围。

公平的世界制度

差不多每个人都同意建立一个“世界共同体”。但人们很难就世界共同体这个词的涵义取得一致的看法。许多权力分散主义者希望，通过把现存的大的民族国家分割成小的民族国家，并把权力交还给地方，来建立世界共同体。他们认为，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政治单位越来越大的趋向，从根本上说是反民主的和破坏人类准则的。

另一方面，鼓吹建立国际政府的人们，则对政治单位越来越大的趋向感到高兴，认为在当今各国激烈竞争的时代，大的政治单位可以阻止竞争。他们认为，没有国际组织，军备竞赛和热战就不可避免，他们极力主张建立一个国际政府，以结束暴力。

权力分散主义者满有理由地抱怨，大的多民族国家没有能力执行它们自己做出的许多决议，因为这些决议一方面要适合整个国家的需要，另一方面组成这个国家的各个地区的情况又互不相同。但是，正如主张建立国际政府的人们所正确认识到的那样，全人类的利益却是相同的，一些决议应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如何利用海底的丰富资源，如何利用太空，如何对付环境污染，如何把财富分给穷人，所有这些都是需要全人类共同解决的问题。

然而，权力分散主义者攻击权力集中和政治单位扩大的倾向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这一倾向把个人当做机器上的一个齿轮，而他或她对这架机器却毫无了解。如果一个公民很少有机会接近他或她的政府，那么国际政府又怎么可能听到他或她的意见呢？说得更通俗些（因为普通公民对政府的所作所为从来就没有多少发言权），如果大的社会运动要求两亿人的政府进行变革都有困难，那么三十亿人的政府又怎么可能倾听公民的意见呢？

鼓吹建立国际政府的人会更明确地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运

动那种运动对阻止明天、下星期或明年可能爆发的核战争究竟能起什么作用？没有国际政府就意味着无人负责作出最重大的决定——即人类是否生存下去，而让如此重大的事情在残酷的核竞争和核恫吓中去决定。有什么能比这更不民主呢？如果世界上大多数人决定生存下去，并愿意选择政府这个工具达到这一目的，那就是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迈出了一步。而且，如果由一个民主选出的国际议会对现在完全由残酷竞争决定的事情拿主意，人类将普遍地得到好处。

不过，如何执行决议仍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根据定义，政府是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机构。国际政府是否要比别的政府拥有更多的军队？如果它做出的决议违反大多数人的利益，则可能爆发内战。战争并不会因为设立了国际政府并把战争称为“内部冲突”而消失。

我们拥护建立跨国机构。但我们认为，只有当世界发生迅速的变革 穷人不再挨饿 帝国被推翻 军事将领都退役的时候 才能建立这种机构。我们还认为，争取社会正义的革命运动只有具有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纲领，才会不断向前发展。

民主的国际机构应遵守的最重要的一条原理，就是要由人民来执法。当有人为了自私自利的目的希图逃避法律时，人民可以运用非暴力斗争的方法，由人民自己来执法。

让我们假设有一个国际海底资源委员会，它经过几个月的调查之后，发现某个矿工合作小组正使用一种破坏人类长远利益的采掘方法开采矿物。于是委员会命令这个合作小组停止开采。但这个小组已很腐败并与坏人有勾结，拒绝服从命令。委员会于是把问题公诸于众。这时，世界各地关心保护自然资源的人们，会自愿地组织起来对这个小组施加压力。这种压力便成为支持委员会的直接行动。

委员会本身有时也会看不准或犯错误。这就要看人们是否自愿组织起来支持委员会的行动，要看在斗争过程中是否会发现新的事实证明矿工们是正确的。也可能找到妥协办法，找到最初没有人想到的解决冲突的新方法。

委员会是这样一个组织：它既能照顾到鼓吹建立国际政府的人的意见，又能照顾到权力分散主义者的意见。这种委员会可以按不同的职能组织 如海底资源、太空利用、空气污染、世界贸易以及货币等等。各委员会都应对我们这个地球有全面的了解，要有一个专家班子，要由受人尊敬和大公无私的女人和男人组成，要能对全人类的重大问题为全人类做出决定。委员会本身不会走向专制，因为它们的决议不被执行时所采用的强制手段主要是人民自愿进行的斗争。不过，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使作出的决议具有很大的合法性，而且委员会成员为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议进行的斗争，与普通人为此而进行的斗争是截然不同的。

委员会应该只处理全球性的问题，不要试图解决那些地方上可以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委员会的看法和地方上的看法有时会发生冲突。虽然委员会的命令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是决不能把委员会的命令强加给持坚决反对态度的地方。由于委员会各有不同的职责，因而一个地方与某一个委员会有争执，却可能是另一个委员会的最热烈的支持者。这种相互交叉的冲突有助于使这种制度保持稳定，有助于阻止内战的发生。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发生战争的，因为委员会没有军队，而许多地方到那时也许已经改用非暴力手段解决争端了。

跨国组织的其它形式也可能是必要的，特别在确定工作任务和发展方向的轻重缓急方面，尤为必要。举例说，电缆电视的理想用途是：通过它对一些紧急事务进行世界范围的讨论，然后用电子投票的办法进行表决。

通过解散大公司和大的民族国家我们将有可能铲除新殖民主义，人们将越来越多地关心地球的未来，这些将为建立民主的国际制度提供超出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有利条件。

平等的社会

在新社会，商品和一切机会将更平等地进行分配，从而将消除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物质基础。分享民主制将有利于妇女和少数民族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强调个人存在价值的文化，将会消除因种族和性别而产生的成见。男人和女人因性爱需要求偶时，都会找到对象。

在新社会，我们不能指望每个人都享有同样的地位。每个社会都有它的准则：体育才能受到赞扬，杀人受到谴责；勤劳工作受到赞扬，欺骗怠工受到谴责等等。地位的不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

平等的社会所能做到的是建立一些组织。这些组织可以减少某些人在获得优越的地位方面享有的不公平的有利条件，可以分散权力，以避免一些地位高的人据有咄咄逼人的权势。

教育将起到帮助每个人认识自己的真正价值和能力的作用。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所导致的相互竞争的利己主义，必将被鼓励人们不自私的公有社会的精神气质所代替。教育能使一个人亲身经历人类的种种工作和种种创造方法，从而把这个人的内心世界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

由于在将来人口越来越多、资源越来越少的地球上人们将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因而新社会的人可能高度重视人的智力。为了避免由少数杰出人物统治社会，必须明确这样一点：专家们的工作是提出几套可供人们选择的方案，而不是由他们自己做决定。

一个平等和公有的社会不能只靠制度结构就建立起来。协作精神必将成为强大的力量，因为这种协作精神会在每一领域反映

出来，特别是会在不断推动社会向人类成就的更高目标发展的文化运动中，作为范例树立起来。

非暴力社会

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对一切漠不关心、不为任何目标奋斗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已经死了的人。

在新社会，人们将被卷入许多矛盾之中。他们通常是要进行斗争的；但无论如何，不会把问题提到你死我活的地步。甚至在愤怒的时候，他们也将采取促使矛盾尽快解决的一切手段。解决矛盾要包括矛盾的双方在内。

新社会的新准则应该引导人们向这样的方向发展：武力斗争将不再和男性必然地联系在一起，甚至出现一种温良恭俭让的一般准则。这样的准则将会影响斗争的形式。

但是，准则的改变还是不够的。人民需要掌握一种技术和一整套方法，以便在出现矛盾、甚至矛盾的一方使用暴力以达到目的的时候，他们能够使用。我们认为这种技术早已被发现了，尽管它需要得到发展。人们把这种技术称为非暴力抵抗、不合作运动、积极行动。普埃托·里坎斯 *Puerto Ricans* 最近杜撰了“和平战斗精神”这个词，以描绘非常强烈的战斗精神和息事宁人的内在气质的互相结合。使用和平战斗精神的方法有这样几种：罢工、联合抵制、占领、非暴力抵抗、游行、绝食、静坐、拒绝纳税、实行并行制度等等。

这种技术是能够学会的。教育不仅能在更加全面地了解和平战斗精神的历史和动态方面起到强有力的作用，而且也能在和平战斗精神的特别训练方面起到强有力的作用。正象一个暴力社会要使用枪炮等武器的技能武装它的许多成员一样，非暴力社会要发展使用非暴力解决矛盾的技能。

在论述跨国制度的章节里，这种技术的一种主要的广泛用途曾经被这样描写：委员会作出的公正的决议应强制执行；必要时，使用和平战斗精神。当矛盾发展到使用暴力时，另一种重要用途是维护和平：懂得非暴力技能的第三方可以促使矛盾恢复到有利于找出真理的形式。印度的香蒂塞纳（Shanti Sena）（和平军）曾试验过这种方法。

非暴力抵抗也可以用来保卫一个社区或地区免受另一地区或野心家的利用或统治。即使这个行星的大部分已经向新社会过渡，仍会有一些国家不顺应潮流，顽固不变。这些国家可能利用那些已经消灭了好战精神并已经把军备转变为平民防御的邻近国家。

采用不合作和其他非暴力手段以抵抗侵略的做法，在历史上也可以找到一些事例。德国政府曾在鲁尔使用群众不合作的政策反对 1923 年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对那里的入侵。德国人拒绝为占领当局采煤、炼钢、甚至供给食物和开火车，因而受到灰心丧气的入侵者严厉的报复。德国人的抵抗迫使法国人重新考虑赔款的数额和放弃吞并鲁尔的企图。德国人在这次抵抗中虽在人员和物质上付出了一定代价，但远远不同于用类似规模的武装抵抗所付出的代价。

德国人的抵抗自然是在毫无准备和缺乏深思熟虑的战略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还没有平民防御的概念。这个事例和其他事例告诉我们：在新社会，这种抵抗的潜在力量可以避免暴力防御所造成的毁灭性的后果。

我们的设想的互相依存

人们往往提出以下建议中的某一项，认为是解决世界问题的关键。经过分析后，我们认为世界形势太复杂，这种做法是不会收

到效果的。

有些人说，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关键。但他们忽略了生态方面的破坏和已经抛弃资本主义的苏联与新殖民地的关系。

有些人说，民族独立是关键。但他们没有看到，一些独立的国家还在压迫它们的人民；也没有看到，改变着的形势决不会阻碍世界的互相依存。

有些人强调，非暴力斗争是关键。但他们没有认识到，缺乏最终目的的斗争手段是容易导致改良主义和维持现状的。

有些人说，国际机构是关键。但他们忽略了这些机构可能是专制的，除非它们建立在公正的公有制和分享权力的基础之上。

我们认为，斗争必须在几条战线上同时进行，而不能只在一条战线上进行。用一种方法解决问题同用一个原因解释某一现象一样，都是不够充分的。我们认识到，虽然我们尽量使我们的设想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可是它还不够完整。即使我们认为它已完整无缺，也丝毫不想把它强加给任何人。我们只是把它做为论述人类未来的一篇对话提出来罢了。

第六部分 作为一种批判和 一种可能性的无政府主义

一百多年以前，米哈伊尔·巴枯宁曾经宣称：“毁灭欲也是一种创造欲。”激进派既攻击残暴的现状，又肯定光明的前途。这两种态度的交互影响是无政府主义著作的特点。虽然二十世纪曾经发生过多被称为革命的社会动乱，但这些革命都不符合无政府主义为它下的定义。布尔什维克革命和中国革命产生的管理机构比它们取而代之的腐败机构更为强大，权力也更为集中。开始还满怀希望的无政府主义者被东方和西方革命的“进展”搞得严重地丧失了信心。但他们还在继续谴责权威，幻想一种没有国家的自由境界会在明天露出端倪。

近几十年来，一个明确的历史时期似乎正在结束。可以公平合理地说：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早期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反对国家的激进分子从青年人的造反和人们对征兵等象征压迫的事物的反抗中看到了希望，同时也由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政府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堕落而感到鼓舞。他们（再次）提出了一系列批评和建议。照他们看来，首先需要同过去一刀两断，同时要找到通往比较美好的未来的合理途径。

1972年，有一群费城教友派信徒为建立新社会提出了一个严肃的、有局限性但却合乎情理的方案，题为：“革命——教友派为病态社会开的药方”。这个方案既表现了急于改变现状的紧迫感，同时也对社会将真正朝着自由平等的方向变化表示乐观。它的态度是公平合理的。举例来说，它既列举了赞成从政治上参预选举制

度的论点，也列举了反对的论点。这篇文章在无政府主义著作中是有代表性的，因为它强调需要在革命发生以前就实践革命。

默里·布克勤写过一本颇有影响的书，题为《匮乏时期以后的无政府主义》，其中有一篇文章既包含批判，也包含乌托邦思想。在强烈要求革命过程和革命目标的统一时，它集中讨论了权力问题——说得更准确一点就是如何摧毁表现权威的各种形式和各种力量的问题。布克勤在 1971 年写文章时，表达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的一种愿望，即新的觉悟的发展将能导致新社会的建立。

我已经强调指出：到现在为止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无政府主义革命，或许根本不可能发生。但是，如果说反对国家的激进分子提出的批评可能比他们表达的愿望更有意义，这丝毫不是贬低他们。巴枯宁常常说：为了做到可能的事，就必须想象不可能的事。无政府主义的挑战有一个卓越贡献，就是愿意对现存秩序视若神明的一切制度提出疑问。

霍华德·吉恩写的《法律的阴谋》是最优秀的批判文章之一。他以明确的、坚持不懈的、逻辑严密的方式指出所谓“法制”以及立法、执法和要求人们服从法律的制度有一个共同的、集中的基础，就是保持不平等的状况，使社会不公正的现象永远存在下去。他揭穿了法律的神话，结果就出现了他所说的对法律本身“应有的蔑视”。

22. 革命——教友派为病态社会 开的药方 (摘录)

修·卡罗尔、乔治·莱基、
威廉·莫耶、理查德·泰勒

是改良还是革命？

革命性改良：“过渡前”社会的运动

我们现在生活于一个需要彻底变革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中。我们希望将来能够生活于一个远比现在更能维护人类尊严、世界团结和生态平衡的社会里。从现制度走向新制度有一个“过渡”问题，就是要过渡到一个和现在根本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中去。因此我们现在的社会可以叫做“过渡前的社会”。

变革的阻力

但是，实行过渡的可能性究竟是否存在呢？如果不能激发切实有效的力量向现有制度挑战并确立新的制度，就肯定不可能过渡。现有体制虽然不利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千百万群众，它却给少数特权人物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权力。我们并不认为这些特权人物一定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坏，但我们确实认为他们已经陷入一种使他们无法按照慈爱、分享权力、世界团结等等道德观念办事——实际上是迫使他们直接违背这些道德观念——的制度之中而无法自拔。估计他们还会竭力扩大他们的特权。而历史的教训之一是：凡是从财富、权力和特权中捞到好处的人必然要捍卫财富、权力和特权。让步虽然是可能的，但任何希望大大减少这种财富和

权力的企图肯定要碰到强大的阻力。

反对过渡的另一种阻力来自各种为现状文过饰非的言论（“我们的自由企业制度是全世界最好的制度”，“煽动激烈改革的人是共党分子”，等等）。这些言论使许多在现有制度下并未分享财富和权力的人也认为这种制度是合乎需要的。他们也想象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制度。这些人如果站在反对变革的一边是可以料想得到的。另外还有不少人也这样——他们虽然没有分享到巨大的财富，但在现有制度范围内却达到了某种程度的相对舒适和富裕，因此担心大的改革会使他们受到损害。

由于存在这种阻力，任何过渡——如果有可能过渡的话——都必须在‘过渡前’的阶段进行大量准备工作。

过渡前阶段的行动方针

我们已经谈过几方面的准备工作，例如提高觉悟、教育群众、组织建设、采取非暴力直接行动、发展非暴力革命团体、举行激进派核心讨论会、建立训练中心和对立机构等等。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很少谈及在现有政治经济制度下进行准备的目标。我们对现有政治经济机构应当完全置之不理吗？在这过渡前的时期，我们的运动是否应当提倡某些具体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

某些鼓吹社会变革的人认为争取具体的改革是徒劳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他们担心在现有结构范围内进行任何局部性改革都只能加强这个结构，使它更为牢固，担心这样一来我们的运动就会陷入“改良主义”，从而忘记为建立新社会而进行改革这个真正的使命。

我们也认为行动的主要焦点必须是开展运动并在旧社会的躯壳内部建立新的社会。这是符合我们教友派基督徒的看法的。我们认为，只要我们接受天国的精神，使我们个人和集体的生活符合

天国的原则，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体验天国的生活。因此我们强调教育、组织建设和发展对立机构。

但是我们无法同意所谓在现有政治经济制度下作某些改进或进行有限度的改革从来都毫无价值的说法。首先，某些具体改革虽然范围有限，但能大大减轻人类的痛苦，减少压在千百万人心头的恐惧。举例来说，我们支持一切为改变美国政府和企业界的习惯做法和它们的政策、从而消除大约一千万美国穷人所忍受的饥饿和营养不良状况而做的努力，虽然为使每个人都有适当食物而进行的改革不一定是革命性的。我们关心的是使人类生活更加充实、可爱和愉快。如果希望继续忍饥挨饿可以激发革命热情，因而牺牲使当前的生活得到实际改善的机会，那就未免太玩世不恭了。

革命性改良

我们也同意法国理论家安德烈·戈尔兹的意见，认为有可能争取实行革命性的改良，即“有助于社会的根本改造的改良”。^①这就是说，现行政治经济制度的某些变革虽然不能立刻导致整个新社会的建立，却使我们向建立新社会前进了一步。这种“非改良主义的改良”会带来更根本的变化。虽然不可能每次都在事前分清哪些行动属于改良主义的改良、哪些属于革命性改良，下列标准（可能还有其他标准）是可以考虑的：

1. 分权：革命性改良几乎总涉及决策权的分散，总是使人民掌握更多控制权，另一方面也就限制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或以攫取利润为目标的私人资本的权力。
2. 新社会 革命性改良将建立和 或 加强符合革命后需要的机构，使新的过渡后的社会的某个方面反映在现在的社会中。
3. 人民控制：非改良主义的改良将使资源控制权向人民方面转移 或由人民接管）

4. 运动掌握的资源、革命性改良将使社会改革运动获得各种资源，从而壮大它的力量。

5. 统治集团掌握的资源：革命性改良会减少统治集团掌握的资源 缩小它的权力、特权和财富。

6. 行动：革命性改良发生在涉及人民利益和人民要求的“行动所在地”。

至于如何运用这些标准来选择行动方向，大概需要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以当前的房客权利运动为例：在全国范围内领导这个运动的是以华盛顿为基地的全国房客组织（NTO），它在全国各地得到了难以计数的房客委员会、拒付房租团体、房客协会等组织的支持。全国房客组织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使房客（无论住的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房屋）对影响他们住房状况的决定掌握实际控制权。我们不妨设想：要达到他们的目的就必须在整个私营房产市场上大大增加受房客控制的合作住宅，并在公营房产的建设、计划管理和预算分配方面确立房客的高度控制权。

这场运动涉及许多人，举国瞩目，因此符合第 6 条关于“行动所在地”的标准。如果广泛推行合作社所有制和房客控制的办法，房东、房产投机商、地产商和公营房产管理当局（其董事会成员通常来自当地权力结构）就会发现他们的权力和对财富的控制大大缩小了（第 5 条标准），对有关决策权和有关的资源的控制将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全国城镇千百万房客和房客组织的手里去（第 3 条和第 1 条标准）。由于全国房客组织和各地的类似组织参加到要求改革、实行改革和控制改革的过程中来，按照它们参预的程度资源也相应地转入社会改革运动的手中（第 4 条标准）。既然在我们认为比较理想的经济制度中，“几乎全部住宅都可由住宅合作社建筑并归合作社所有”，那么朝建立住宅合作社的方向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也符合第 2 条标准，即在现有的社会中预示过渡后的社会的

一个方面。

在衡量某一特定运动的成就时，非暴力革命团体还可以增加四条标准：

1. 实际执行革命性改良计划的程度。
2. 参加运动者的基本觉悟提高的程度。
3. 向新社会转变的机制（例如建立更多非暴力革命团体和类似机构、举行激进派核心讨论会等等）加强的程度。
4. 社会改革团体内部民主加强的程度。

向新的政治经济制度过渡

要窥测朦胧的未来和猜测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将如何诞生是极为困难的。在这方面 判断、预测、空想、预料不到的历史事件以及人类难以避免的错误等等因素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如果我们只考虑今后若干年的问题，只正视当前的不公正现象，只为短期可以实现的人道主义改良努力奋斗，而不去想那种将来可能实现的、与现在根本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事情就好办多了。

然而我们的信念是：现有政治经济制度必须由一种较好的制度取而代之。因此我们不仅必须提出如何改良现有制度的问题，而且必须提出如何取代它的问题。

政治和选举的作用还不清楚

但是，从我们的方案中可以看出，我们对争取革命性变革运动中的政治因素将会起什么作用还不清楚。这里所说的政治是指一个有组织的运动为竞选公职而动员多数人來支持它的纲领。

在这方面，一个最尖锐的问题是：是否有必要在某个时候组织一个有群众基础的、民主管理的新政党，一个鼓吹美国式人道社会主义、竞选全国性职务并设法控制政府的革命党？

我们强烈认为，主张根本变革的人无论是现在或是不久的将来都不应试图组织政党。今后若干年的任务是做大量的组织工作和教育工作，以便开展一场强大的、非暴力的、致力于根本改变美国政治经济制度的人民运动。同时，我们感觉，如果终有一天要建立政党的话，这个政党也应当同非暴力的人民运动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并不是说要在政党和人民团体之间任择其一；我们谈的是具有政治侧翼的人民运动。

因此，假设有任何必要建立政党的话，我们对建立政党的时间和形式还是比较清楚的。但究竟是否有必要建立政党是我们还无法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建立一个政治侧翼对人民运动会有价值吗？它应当参加竞选吗？

赞成政治一选举途径的理由

1. 在智利、芬兰和瑞典这样的国家和曼尼托巴等加拿大省份里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府通过非暴力的、选举的以及或者议会的手段掌握了权力，并且能够用政府的职权作为杠杆实行影响深远的改革。我们对此感到兴趣。尽管这些地方的经济基本上还属于资本主义，但其经济部门已经高度人道化，而且当权的政党还在为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而努力。这些历史先例使人认为选举的途径可以成为争取实行根本变革的重要杠杆。

2. 选举的途径基本上是民主的。它既不依靠政变，也不依靠少数上层人物去进行改革；它要求教育群众，争取多数。此外，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②，选举使你可以（1）计算自己的支持者，（2）判断反对派的实力，（3）接触群众和教育群众，（4）有机会同其他政党进行公开辩论，使你的对手陷入被动。

3. 一旦掌握政权，就可以利用政府的法律结构和行政结构实行和支持根本改革，例如建立一套保证人民收入、工作、健康等等

的完整的制度——这是新社会设想的一部分。我们认为实行分权对新社会也是极为重要的，而由中央政府（例如在南斯拉夫）来实行分权虽然罕见，但也不是闻所未闻的。一个运动型的政党可以在竞选纲领中要求把中央政府的许多职权分散给地方或交给国际组织。

4. 从某种意义上说，利用政党和选举途径势在必行。这就是说，如果一个非暴力的人民运动真正开始赢得群众的追随，那就会通过候选人的形式得到政治上的反应——候选人的竞选纲领将体现人民新的觉醒。因此，我们可以说，既然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产生政治上和选举上的反应，为什么不利用这种反应，努力去影响它，使它朝着正确的方向转变呢？

反对政治—选举途径的理由

1. 过去一百年来，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所要达到的目标几乎全部集中于加强民族国家，认为这是一种前进的方式。但是我们对民族国家、特别是拥有两亿人口的国家存在严重的保留意见。大国拥有的巨大力量使它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消耗远远超过它应得的那一部分世界资源，并使它很容易走向军事冒险主义。也许非暴力的人民运动应当以摧毁、而不是接管美国巨人作为自己的目标。然而选举的目的则是要取得对民族国家的控制。这种控制究竟是对运动有利，还是会使运动背上沉重的包袱呢？

2. 利用政党和选举途径有利于从中央进行控制，使政府和党的中央官僚机构合法化并得到支持。然而我们谈的那种社会变革要求由人民掌权，而不是使人民俯首听命于远离人民日常生活的权力中心。应当提出的问题是“重新分配权力”而不是“掌握权力”。目标是把权力交还人民，而不是选举一个好心肠的先锋队代表人民的利益来管理中央政府

3. 人民运动的领袖应当走上街头去领导群众、并按照他们领导重大群众斗争的能力使他们的地位得到认可，而不是通过党派辩论、按照他们在议会中玩弄手腕的本领予以认可。人们需要学会采取非暴力的群众行动的本领，但是搞选举会分散他们完成这一重要任务的精力。

4. 搞政治就必然要搞妥协。政客是权力掮客。人民要了解位于权力核心的各种委员会的情况是极为困难的。非暴力的群众运动不可能关起门来秘密进行。从性质上说，它是公开进行的群众斗争，发生的情况是人民看得见的。背叛革命的不是群众，而是他们的领袖。

5. 即使按照人民的纲领竞选的候选人被选入国会，他们也会发现自己所能掌握的权力微乎其微，因为在今天的美国，真正的决策大都来自五角大楼、白宫和上层统治集团。可是，为了当选，候选人就需要许下诺言，说他们能够实行重大改革——当他们做不到时，士气就会消沉。强硬的激进派候选人会因为拒绝妥协而落选；当选的候选人却会发现自己毫无实权。情况就是如此，二者必居其一。

如果按照运动—政党—选举的途径实行变革，我们设想要有一个受非暴力的人民运动控制并得到它支持的革命党；这个政党在选举中获胜，最后在国会中获得多数并控制总统职务。它通过教育和立法手段着手改造政治经济制度，建立国营公司、合作社和由工人管理的企业，确定收入和财产最高限额的法律，建立全面的计划系统，取消军队，建立为所有人享受的社会服务和医疗服务设施，同第三世界建立公平合理的关系，使过去由联邦政府行使的某些职权国际化，等等。当它碰到牢牢掌握财富、特权和权力的人的抵抗时，它可以同人民运动一起，采取非暴力抗议、不合作和实行干预等手段来支持自己的创议。如果有人企图搞政变，它可以采

取 1920 年在德国曾经有效地防止过沃尔夫冈·卡普政变的那种不合作的办法加以对付。（卡普被一群军官搞上台后，立刻碰到一次全面的、甚至连文官也参加的总罢工。这次罢工卓有成效，使这位过了时的政府首脑在权力走廊中易于徘徊，连找一位秘书给他的宣言打字也找不到。尽管他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枪，想把抵抗镇压下去，卡普发现他缺乏统治手段，就逃到瑞典去了。）^③

按照非选举的、人民运动的途径，过渡将发生在统治集团发现自己已无法再做任何让步以后。在这以前，积极活动而且组织严密的人民运动要举行广泛的示威、群众性抵制和罢工，目的都是为了抗议现存的不平等状况，要求进行根本改革，建立新的经济政治秩序。政府和公司系统起初还能通过改良的形式实行让步，但是最后所有的改良“前哨”均被占领，出现了“兵临城下”的形势——统治集团将认识到它无法实行新的变革而不得不大大减少自己的特权和权力。

被抗议群众团团包围并弄得名誉扫地的统治集团试图维护自己的特权，但是发现连一向可靠的警察和军队也无法指望了，因为群众同他们努力搞好关系，并采取了非暴力的策略。同时，镇压也会把政府的名声搞得更臭。最后，政府和企业界将发现它们已无力阻止激进委员会和工人干部接管现有工厂和机构，也无力制止非暴力革命团体占领和控制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组织。各地同非暴力革命团体平行工作的机构以及激进委员会将选举代表参加地区性的“自由美国人代表大会”。越来越多的公民会把税交给这些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将成为实际上起作用的政府。旧的、已失去合法性的政府机构和公司土崩瓦解，由直接从人民组织中发展起来的新机构取而代之。地区性代表大会将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的生态—民主制度，这种制度和运动—政党—选举途径要求建立的制度是一样的。然后，它们就会同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合作，共同建

立跨国机构。

需要进一步讨论

我们提倡的那种革命——包括它采取的非暴力方法、对理想前途的特殊看法、对生态要求的强调以及民主参预——从来没有实现过。因此，尽管我们可以学习历史经验，当过渡阶段到来时却缺乏现成的历史样板向我们指明最合适的前进方向。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希望在的队伍当中并且同其他信仰富有生气的革命的人加强对话，使我们更明确什么是我们应当遵循的最好的途径。

但是我们没有必要等到讨论深入以后再采取行动。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着手提高觉悟和建立组织的工作，现在我们作为个人就可以开始“过革命生活”。

“过革命生活”

关于比较理想的社会的设想以及为实现这种设想而发起一个强大的运动的必要性，我们已经写得很多了。但是过份热衷于我们行动的目标、设想和结局也有危险。其危险在于为了在将来、“在革命后”建立比较合乎人道的局面而认为现在采取不人道的行动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对我们的目的是否能够实现事实上并无把握。我们可以有把握的是：我们采取的手段本身是合乎人道的。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可以肯定我们的行动会有助于全世界人道主义力量的发展。

我们深信必须彻底改造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各种机构的安排将使它们尽一切可能鼓励人们朝完美、慈爱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知道，除非作为“社会变革媒介”的人自己尽可能成为完美、慈爱的人，这个新社会是建立不起来的。除非献身于慈爱、正义、团结、合作、朴实、世界

平等、分享权力、互相关心、使人类同自然界和睦共处等道德观念的人彻底‘渗透’到社会中去。这个新社会也是不能持久的。同甘地一样，我们认为：“如果我们不爱我们的邻人，无论多么革命的变革对我们都没有任何好处。”机构和体制可以大大提高人的尊严，也可以毁掉人的尊严；它们可以使人类的爱得到表现，也可以破坏这种爱。但是任何制度都无法自然而然地保证人们相互之间象兄弟姐妹一样相亲相爱，使他们的关系符合正义的精神。要使人们相互采取这种态度，归根结底取决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抉择。如果生活真正出现革命，个人必须作什么抉择呢？如果我们不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那就是不忠实于自己的理想。

一起讨论

对于真正关心根本变革的人，任何事情也代替不了认真思考和研究。谁也不能代替我们思考。我们大家都必须进行最深入的研究，直到我们能够开始回答有关社会变革的根本问题：“你如何分析现有制度目前的毛病？”“你对一个比较理想的社会有何设想？”要走向比较理想的社会，你的战略是什么？”

生活方式

美国占地球人口百分之六，但它目前消耗的资源却占世界总消耗量的百分之四十左右。这种状况不仅说明财富的分配极不公平，而且危及人类的生存，因为它破坏了生态系统。我们有机会开始纠正我们的生活方式中存在的这种不平衡状况。我们可以采取简单得多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想办法使物资得到反复利用，穿着不那么讲究的衣服，吃得便宜一点，利用较廉价的交通，克服利己主义聚敛的残暴影响。我们可以试验各种共同享受的、朴素的生活方式，同别人生活在一起，相互学习如何克服极端个人主义和

过分的聚敛。（教友派关于朴素和兄弟情谊的传统箴言是符合生态要求的。这个事实对我们当中的教友派信徒来说极有趣味。）

内心生活与觉悟

不经过危机、斗争和痛苦，就不可能实现我们期望的革命性变化。我们的生活必然会出现波折 或者坐牢 或者受到其他侵犯。在同罪恶、不公平和冷酷无情的现象进行对抗时，我们的感情很容易变得冷漠起来。朋友和同志之间有时会出现分歧和紧张状态，情不自禁就要以自我为中心同最亲密的人进行斗争。

由于个人和团体的实利主义、剥削和不负责任地追求私利长期积累下来的影响已经深深渗入我们大家在其中长大的社会秩序，当前存在的过分深重的罪孽中也有我们每个人的一份。

我们需要探索自己的内心深处，从而获得内心的平静和自尊心，使自己既能爱别人又能接受别人的爱。我们需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 例如沉思、读书、祷告、集体做礼拜、征求意见 深化自己的生活，提高自己表达和接受爱的能力，使自己的内心充满安全感和力量，增加勇气，并在其他方面克服我们突出自己而对事物采取不负责任的、漠不关心的态度这种非常容易犯的毛病。

佩格说：一切事物均以幻想开始，以政治结束。祷告、沉思以及改造个人的其他手段是我们可以用来克服偏见、仇恨、剥削和冷酷无情——克服我们自己的弱点——的最具体、最实际的手段。这是我们每天都可以利用的最可靠的方法之一，利用它我们可以把恶变成善，可以开展一场使爱的可能性增加的革命。

关系与感情

任何努力建设新社会的人都应尽可能摆脱种族偏见、性别偏见和阶级偏见的一切痕迹。这应当是不言而喻的。考虑到我们多

么容易对我们运动中最亲密的战友产生敌对情绪，我们可以想办法互让互谅，肯定别人的优点，而不要以势压人或盛气凌人。我们可以用培养感情、利用集体力量和开诚布公谈心等办法寻找表达我们的愤怒的新的、创造性的途径，使我们可以更无顾虑、更开朗、更善于通过接触和语言表达自己的爱。我们可以通过唱歌、接触自然、体验与他人交往的乐趣等办法学会如何使自己的感情更加轻松自如，为我们仍然活着这个简单的令人愉快的事实感到庆幸。

可供选择的机构

为了“过革命生活”和立即认可新的道德观念和新的机构，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支持那些现已存在的、能够反映——即使是很不完美地反映——新社会道德观念的团体和组织，例如通过食品合作社购物，把孩子送往合作学校就读，在秘密教堂里做礼拜，参加激进派讨论会等等。

不剥削

虽然我们无法完全摆脱现有制度，但我们应当尽力摆脱其中的剥削活动，特别要放弃来自股票、债券或地产以及通过继承而来的不劳而获的收入，或者把这些收入转用于支持运动。我们也可以拒绝缴纳战争税，把省下来的钱交给那些试图建立新的社会的组织和运动。

这是我们希望自己以及同我们一起搞运动的人越来越具备的某些品质。教友派领袖鲁弗斯·琼斯在 1937 年教友派世界大会上讲话时很出色地阐述了这个观点。他说：

必须彻底改造社会秩序，使它适应对所有人都公平合理的要求。但是，无论社会和经济秩序出现什么变化，组成这个社会的人的精神质量

永远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即使现在，在一个远非合理的世界里，我们也可以老老实实地、始终一贯地坚持朴素的生活，对一切人相见以诚、视若兄弟，从而有助于这个世界的改组。

注 释

Andre Gorz:《Strategy for Labor》(安德烈·戈尔兹:《工人运动的战略》), 波士顿灯塔出版社 1968 年版 第 6 页起。

②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

③ George Lakey:《Strategy for A Living Revolution》(乔治·莱基:《充满生气的革命应采取的战略》)油印本 未出版 第 63—64 页。

23. 匮乏时期以后的无政府主义 (摘录)

默里·布克勤

前题和可能性

过去所有成功的革命，都是在整个社会中占少数地位的某一阶级谋求把他们特定的利益置于整个社会利益之上的狭义的革命。现代史上资产阶级的历次大革命虽然都宣称进行了彻底的政治改组，但实际上只不过确认了资产阶级的社会统治，赋予了资本的经济支配地位以合法的政治表现形式。“国家”、“自由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崇高的字眼掩盖了集权国家、被分裂的和孤立的个人、资产阶级利益的统治这些世俗的现实。尽管这些革命宣称进行了彻底的政治改组，但都是一个阶级的统治被另一个阶级所代替，一种剥削制度被另一种剥削制度所代替，一种奴役制度被另一种奴役制度所代替，一种心理上的压制制度被另一种心理上的压制制度所代替。

我们时代的特点是狭义的革命已经被纳入进行广义的革

命——全部的和完全的革命——的可能性中。资产阶级社会，如果说它没有别的成就的话，至少它使生产手段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革命化了。以电子计算机进行控制为其顶点的这种技术上的革命，为一个没有阶级统治、剥削、奴役和物质匮乏的世界创造了客观上的和数量上的基础。现在已具备了产生完人的条件，这种人不会去干违法乱纪的事，不会再受独裁式的教育，可以随心所欲，尽情追求感官上的美好享受。现在可以设想人类未来的经历将处于一种谐调一致的进程中，思想和行动、思维和感觉、纪律和自发、个人和社会、人和自然、城市和农村、教育和生活、工作和娱乐的相互分立都将得到消除，它们将和谐地、有机地构成一个全新的自由王国。正如狭义的革命产生特殊的、分立的社会一样，广义的革命将能够产生一个有机地结合起来的 multilateral 的社会。有产社会所带来的以“社会问题”的形式出现的巨大的创伤，现在可以治愈了。

必须从人的角度而不是从动物的角度——从生活而不是从生存的角度——来设想这种自由，这点是非常明确的。人不会仅仅由于摆脱了社会的支配和获得了抽象的自由而解除束缚成为真正的人。他们还必须有具体的自由：没有物质短缺，不会被奴役，不必把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即他们生命的大部分用来为获得生活必需品而奋斗。卡尔·马克思对现代革命理论的贡献，是他发现了人类自由的这些物质前提，并强调自由的先决条件是自由支配时间和物资的丰富达到使自由支配时间不再成为一种社会特权的程度。

基于同样的理由，自由的前提不能误认为是自由的条件。有可能获得解放，并不等于已经获得了解放。技术进步固然有其积极的方面，但也有其显然消极的一面，阻止社会前进的一面。如果说技术的发展确实扩大了获得自由的历史可能性，那么资产阶级

对技术的掌握也确实加强了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和日常生活的组织结构。技术和丰富的资源为资本主义提供了使社会的各大阶层依附于现有的统治制度和权力制度的手段。它们向这个制度提供武器、侦察装置和宣传工具，用以进行威胁和实行大规模的镇压。由于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资源的丰富加强了在政治机构中实行垄断、集权和官僚主义的趋势。总之，它们给国家提供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操纵和支配生活的整个环境的手段——以及使等级制度、剥削和没有自由永久保持下去的手段。

然而必须强调指出，操纵和支配环境是很成问题的并充满了危机。资产阶级社会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控制和利用，非但没有带来安定（根本谈不上和谐），反而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关于大气和水流的污染情况，关于森林覆盖和土壤被破坏的情况，关于食物和饮料中含有有毒物质的情况，许多著作已作了论述。更具有威胁性的后果是，人这种复杂有机体所必需的生态环境受到污染和破坏。生物体中放射性废物的聚积，是对差不多所有生物的健康和遗传素质的一种威胁。由于杀虫剂阻止浮游生物制造氧气或由于汽油废气中铅的含量接近有毒水平所造成的世界性污染，是很难消除的，这种污染威胁着包括人在内的所有高等生物的健康生长。

同样令人惊恐的还有这一事实，即我们必须大大改变关于哪些东西是环境污染物的传统概念。几十年前，如果把二氧化碳和热称作通常意义上的污染物质，人们认为是荒谬的。现在两者都可能列入造成未来生态不平衡的最严重的污染物之中，并可能对这个星球的生存造成重大威胁。由于工业和家庭的燃烧活动，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在过去一百年里大约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到本世纪末很可能增加一倍。报刊已经在广泛地谈论由于这种气体含量的不断增加而将出现的“温室效应”。人们认为其结果是这种

气体将阻止地球上的热向宇宙空间散发，造成整个温度上升，从而将融化两极冰帽，最终将淹没广大沿海地区。热污染主要是原子能发电厂和常规发电厂排出的热水造成的，它对湖泊、河流和港湾的生态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水温的增加不仅妨碍了鱼类的生理活动和繁殖活动，还促使藻类大量繁殖，给河道造成了难以对付的问题。

从生态上来说，资产阶级对环境的开发和利用正在降低地球供养高等生物的能力。危机正在加剧，其原因是，对空气和水的污染正在大量增加；不可分解的废物、铅残留物、杀虫剂的残留物及食品中的有毒添加剂正在不断增加；城市正在扩展成为广阔的城市地带，拥挤、噪音及居住的集中增加了人的紧张感。矿山开采、森林采伐及地产投机正在任意破坏土地。结果，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地球受到的掠夺，达到了人类定居这个星球以来从未有过的规模。

就社会而言，资产阶级对环境的利用和操纵，使人们的日常生活枯燥乏味，令人无法忍受。当社会变成了工厂和市场的时候，生活的真谛也就被降低成了为生产而生产——以及为消费而消费。

补 救 办 法

是否有一种补救办法能够引导社会向着一种无政府主义社会的方向发展，在那里人民能够完全掌握自己的日常生活？这种社会辩证法会带来资本主义的结束吗？这种可能性由于使用高度先进的技术来达到镇压和掠夺的目的而被扼杀了。

在这里我们必须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在物资缺乏时期是可以被人理解的，它是从经济方面来阐述社会辩证法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的。前面已经着重指出，马克思研究的是解放的前提，而不是解放的条件。马克思的批判立足于过去，立足于那个物资匮乏和技术发展比较有限的时代。甚至他的有关异化的

人道主义理论，主要也是围绕工作问题和人与其劳动产品相脱离的问题。然而，今天的资本主义则寄希望于未来，是依靠技术和自由开发资源而生存的吸血鬼。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工业资本主义是围绕物资匮乏的体系来组织其商品关系的。一个世纪前，人们必须忍受物资匮乏；今天则不得不人为地制造匮乏——由此可见现今国家的重要性。这并不意味着现代资本主义已经解决其矛盾，已使社会辩证法不起作用，而是意味着社会辩证法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已从经济方面扩展到社会统治集团，从抽象的“历史”领域扩展到每日生活的具体细节，由生存的舞台扩展到生活的舞台。

官僚国家资本主义的辩证法，产生于商品社会的压迫性和技术进步的享有极大自由的可能性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还使社会的开发机构同自然界相对立，自然界不仅包括自然环境，而且包括人的本性——人的性爱派生出来的冲动。社会的开发机构同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人类生存所依赖的大气、水流、土壤和生态是不可能通过改革、让步和对方针政策修正来恢复的。没有技术能够再生产出足够多的氧气来维持这个星球上的生命。地球上的水文系统是无法用其他东西代替的。也没有技术可以消除放射性同位素、杀虫剂、铅、石油废物造成的大规模的环境污染。而且丝毫没有迹象表明，资产阶级社会在不远的将来的任何时候会放松它对生命攸关的生态进程的破坏，放松对自然资源的胡乱开发，停止把大气与河流作为倾倒废料的场所，或停止带来严重后果的都市化，停止滥用土地。

更为直接的是社会的开发机构和人的性爱派生出来的冲动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为在一个官僚操纵的、无个人独立性的集体社会中生活的枯燥乏味。人类由性爱派生的冲动会受到压抑或升华。但是它永远不会被消除。它随着每一个人的出生和每一代年轻人的出现而得到更新。今天不足为奇的是，年轻的一代较

之经济上的任何阶级或阶层更加有力地表现出人的天性中的生命冲动——强烈的欲望，感官上的要求和对奇迹的向往。因此，产生早期等级社会的生物本能，在新的水平上再现于等级制度行将结束的时代。只是在今天，这种本能中才渗透着各种社会现象。在无法控制人的胚胎原质的情况下，生命的冲动只能随着人类本身的灭亡而消失。

官僚国家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存在于资产阶级社会确立起来的，并使之过度发展的所有统治形式中。这些统治形式——国家、城市、中央统制经济、官僚机构、父权家庭和市场——长期以来培育了有产社会并推动了它的发展，现在已经达到了其历史的极限。它们作为起稳定作用的模式，其社会功能已经衰竭。至于这些统治形式是否起过马克思所说的“进步作用”，这不成其为一个问题。正如拉乌尔·瓦尼格姆所说：“等级制度的力量使人类几千年来得以保存下来，正如酒精保存胎儿一样，既不让它生长，也不让它腐烂。仅仅指出这一点也许是不够的。”今天，这些统治形式已经成了现代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各种革命力量攻击的目标。是否会有人认为其后果将象正在威胁着人类生存的核灾难或生态灾难一样呢？

由于等级制度的发展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社会辩证法非但没有被消除，反而获得了新的意义。它以全新的方式提出“社会问题”。如果人类必须获得生存的条件以生活下去（象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那么，现在他必须获得生活的条件以生存下去。生存和生活之间的关系的这种倒转，使革命具有一种新的紧迫感。我们面对的不再是马克思的名言，在社会主义和野蛮状态之间进行选择，我们面临的是在无政府主义和毁灭之间进行差别更为悬殊的选择。需要和生存的问题已经同自由和生活的问题趋向一致。它们不再需要任何理论上的调和、“过渡”阶级或集权机构来作为现

实和可能之间的桥梁。事实上，凡是能够存在的，便是可能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了将近一个世纪的‘过渡’问题，不但由于技术进步，而且由于社会辩证法本身，已不复存在了。社会重建问题已经成为可以解决的问题，可以通过人们的自我解放行动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

事实上，革命不仅获得了新的紧迫感，而且获得了新的希望。在嬉皮士的部落文化中，在成百万青年的逃避社会生活及性放纵中，在自发地同无政府主义共鸣的团体中，我们看到了否定的行动中蕴藏的肯定。随着“社会问题”的转化，社会辩证法也在发生变化，伴随着‘否定’自然而然地会出现‘肯定’。

这些解决办法的出发点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在历史的进程中，当国家、城市、官僚机构、中央统制经济、父权家庭和市场达到它们的历史极限的时候，问题已不再是改变形式，而是对所有统治形式本身的绝对否定。对国家的绝对否定是无政府主义——在无政府状态下，人们不但解放了“历史”，而且解放了他们日常生活的全部直接环境。对都市的绝对否定是公社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整个社会环境将分成一个个完美的、生态平衡的公社。对官僚主义的绝对否定是从间接关系中突出直接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人大会中的面对面关系将代替代表制。对集中经济的绝对否定是采用地区性生态技术——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工具将与生态系统的资源相适应。对父权家庭的绝对否定是性行为的解放——在这种情况下，自发将超越一切对性行为的规定，平等的人将不受限制地表达性爱。对市场的绝对否定是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集体富裕和合作将使劳动变成娱乐，使需要变成欲望。

自发性和乌托邦

在历史上的某一时刻，当统治集团的权力及控制构成最严重的威胁时，人们就会开始怀疑统治集团、权力和控制这些概念，这并不是偶然的。对这些概念提出挑战，是因为人们重新发现了自发的重要性。而人们能够重新发现自发的重要性，是因为人们对生态有了了解，对自我发展这一概念的认识有了提高，对社会革命进程有了新的理解。

生态学已经表明，自然界的平衡是由有机物的复杂多样，而不是简单划一形成的。例如：一个生态系统中植物群和动物群的种类越多，可能出现的某一种害虫的数量就越稳定。环境多样化越是遭到破坏，潜在害虫的数量的波动也越大，越可能达到不可控制的程度。如果让一个生态系统自然发展，它会自发地趋向于达到有机物的千差万别，植物群和动物群会增加，被捕食动物和捕食动物的数量和种类会增加。这并不意味着必须避免人类的干预。在提高农业生产力这也是对自然的一种干预时，最重要的是粮食的种植和森林的管理必须符合生态要求。同样重要的是，人类能够使生态系统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常常能够大大提高生态质量。但是，人类在从事这些活动时必须具有洞察力和理解力，而不是凭借强权和控制。

这种管理概念，这种对自发的重要性的新的重视，将对技术和社会——当然，也对自由社会中人的社会形象，产生深远影响。它向种种资本主义的理想，如把农业当作工厂来经营，在广阔的集中控制的土地上组织生产，搞高度专业化的单一作物生产，把农田变为工厂，用化肥取代有机肥料，使用班组劳动，等等，提出了挑战。如果要使粮食的种植成为与自然界的一种合作，而不是对手之间的竞争，那么农学家就必须非常熟悉土地的生态，必须对土地的要

求和可利用的程度有一种新的敏锐感觉。这就要求把农业缩小到与人相称的规模，恢复中等规模的农业单位，并使农业多样化；总之，要求采用一种分散的合乎生态要求的粮食种植方法。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对污染的控制。发展大联合工厂和只使用一两种能源，是造成大气污染的原因。只有通过发展较小的工业单位（通过广泛使用清洁能源——太阳能、风力及水力）来使能源多样化，才有可能减少工业污染。人们不久就将掌握进行这种巨大技术变革的手段。技术人员已经研制出了一些替代大型工业的简便方法——使用多种多样的小型机器并采用先进方法使太阳能、风力和水力变为工业或家庭可以利用的能源。同现有的大型设备相比，这些替代办法生产力较高，浪费较少。

小型农业和工业对社会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人类要控制生态系统，那么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本身就必须是生态系统——即生态公社。这种公社还必须是多样化的、均衡的和计划周密的。产生这种公社概念的动机绝不是仅仅由于需要在人类和自然界之间保持持久的平衡，它还符合乌托邦关于完美的人的理想。完人的情感、经历及生活方式，是由于受到广泛的刺激，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和接触个人所能理解的社会而产生的。于是，生存的手段和条件成了生活的手段和条件；需求变成了欲望，欲望变成了需求。结果，社会的大分解为建立更高形式的社会结合体提供了条件，使极为紧迫的生态要求和最高的乌托邦理想结合成了一个整体。

如果正如盖伊·德博德所说的那样“，日常生活是衡量一切的尺度（衡量那些已经实现了的或者没有实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衡量我们对时间的利用）”那么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要一天一天生活下去的“我们”究竟是谁？获得了解放的自我怎样才能把时间变为生活，怎样才能把空间变为公社，怎样才能建立美妙的人

人之间的关系？

自我解放首先涉及的是社会进程，在一个使自我变成了商品、变成了制造出来供交换的物品的社会里，不可能有完美的自我，而只有有自私自利的萌生，即寻求自我满足的自我的出现——这种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为实现自我而必须克服的障碍制约的。一个社会如果其矛盾已发展到非爆发革命不可的地步，如果其劳动者的痛苦已成了无法清除的痼疾，如果其形势愈来愈危急，那么，在这个社会里，唯一具有实际意义的想法和做法就是让革命爆发。任何环境，无论是社会的或个人的，如果不将这一事实看作是人类的主要经验，那它就是虚假的，就会把我们在吸收进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日常毒素后还剩下那点儿自我消灭殆尽。

很清楚，今天革命的目的必须是解放日常生活。未能实现这个目标的任何革命都是反革命。首先，必须获得解放的是我们，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包括每日、每时、每刻，而不是泛泛的“历史”和“社会”。自我在革命中必须总是能够辨认的，而不是被革命所压倒。自我在革命过程中必须总是能够觉察的，而不是被革命所淹没。在“革命的”词汇中，再也没有比“群众”这个词更为有害了。革命意义上的解放是涉及社会各个方面的自我解放，而不是背后隐藏着特权阶层、统治集团及国家统治的“群众解放”或“阶级解放”。如果一场革命不能通过革命者的自我活动和自我动员产生一个新社会，如果它在革命过程中没有锤锻自我，那么这场革命就将再次欺骗那些要一天一天地生活的人们，日常生活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革命的结果必须出现能够完全支配其日常生活的自我，而不是能够完全支配自我的日常生活。因此，阶级觉悟的最高形式是自觉——伟大的正在解放中的万物皆存于日常生活中。

单单为了这个原因，革命运动就是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必须使革命完全体现在生活中，而不仅仅是参加革命。革命运动必

须同革命者的生活方式、革命者和周围环境的关系以及革命者自我解放的程度紧密相连。在试图改造社会的同时，革命者自己也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这要求革命者重新征服自我。革命者正如他所参加的运动一样，必须反映他正在努力创造的社会条件——至少在今天可能达到的程度上反映出来。

半个世纪以来出现的背叛和失败，使得“不能使革命进程同革命目标相分离”成了不言自明的公理。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目标是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实行自我管理，那么这个社会就只能通过自我活动来建立。这意味着必须采取一种始终由自我支配的管理方式。人统治人的权力，只能在人获得支配自己生活的权力的过程中，也就是在他不但‘发现’自己而且更主要的是使自我体现在社会各个方面的过程中，才能被摧毁。

自由的社会只能通过自由的革命来建立。自由是不可能作为“革命”的“最终产品”向个人“交货”的。代表会议和公社不可能用法律或者命令使其存在。一个革命团体可以有目的地和有意识地设法推动代表会议和公社的创立，但是，如果它们不是在分散化的过程中，在自我活动和自我觉醒中成长起来，那么它们就会象俄国革命后的苏维埃那样，只是停留在形式上。代表会议和公社必须在革命的过程中产生，而革命的过程必须产生代表会议和公社，同时必须消灭权力、财产、统治集团和剥削。

作为自我活动的革命并不是我们的时代所独有的。它是现代史上所有伟大的革命的最突出的特征。1792年和1793年的“无套裤汉^①的日子”，1917年2月彼得格勒的著名的“五天”，1936年巴塞罗那无产者的起义，1956年匈牙利革命初期的日子以及1968年巴黎的五一六月事件，都显示了这个特征。在我们时代的历史中，

^① 无套裤汉，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对广大革命群众流行的称呼。——译者

差不多每次革命起义都是由“群众”的“自我活动”自发地发动的——常常公然蔑视革命组织采取的犹豫不决的政策。在这些革命中，每个人的个性得以尽情地表现出来，呈现出一片欢乐和团结的气氛，使日常生活变成了节日。革命进程中的这种超现实的现象，连同它爆发出来的顽固的色情力量，就象映照在闪烁的水面上的色情狂的面孔一样，狂笑地记载在历史上。所以，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委员们 1917 年 11 月 7 日的夜晚在冬宫大砸酒瓶，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传统左派的清教徒主义和工作道德，来自今日反对革命的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即资产阶级的环境侵袭革命组织的能力。这种力量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商品性，这种性质几乎自然而然地传给了有组织的集团，而有组织的集团又把它强加给了自己的成员。正如已故的约瑟夫·韦伯所强调指出的，所有有组织的集团都“有一种自治的趋向，也就是脱离它们自己原来的目标，而把集团本身看作是一种目的，听凭那些操纵集团的人发号施令”。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国家机构和准国家机构、执政党和工会组织，而且存在于革命组织。

离开革命进程本身决不可能完全解决脱离原来的革命目标的问题，但是可以通过强烈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而防止其出现，或者通过革命者和革命组织对其自身进行自愿而彻底的改造而部分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当革命集团认识到它是革命进程中的一种摧化剂而不是“先锋队”时，这种改造才会开始。革命集团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它的目标不是夺取权力，而是消灭权力——必须理解有关权力的全部问题，认识到只有消除了上下之分，才能消除来自下面的控制和来自上面的控制。

最为重要的是，革命集团必须放弃各种形式的权力——诸如法令、等级制度、财产、命令、偶像、动产、官方礼仪——以及那些极

为微妙而且极为明显的官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特性，这些特性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加强了权力和等级制度。革命集团必须受到公众的监督，不仅对已作出的决定进行监督，而且对作出决策的过程进行监督。从更深刻的意义上来说，革命集团必须始终如一地确保它的理论就是它的实践，它的实践就是它的理论。在其日常活动中，它必须摆脱所有的商品关系，必须按照它谋求建立的社会——公社、代表会议、自发性——所要求的分散化的组织原则来构造自己。用约瑟夫·韦伯的精辟话语来说，革命集团必须“始终具有简单和单纯的特点，经常有成千上万普普通通的人参加进来并进行管理，始终对所有的人是透明的并由所有人来控制。”只有当革命运动同它谋求建立的权力分散的社会相一致时，它才不致成为社会发展的又一个突出障碍，才能象外科手术线溶化在愈合的伤口中那样溶化在革命之中。

展 望

今天，美国正在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人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结构的彻底否定。具有深远意义的是，人们正在对现行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理想抱负、特别是构成现存秩序的各种制度采取一种无比蔑视的、离经叛道的态度。千百万美国人正在以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摆脱对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应承担的义务。他们不再相信这个社会的主张。他们不再尊重它的象征。他们不再接受它的目标，而意义最为深远的是，他们近乎直觉地拒绝按照它的准则来生活。

这种日益强烈的抗拒已发展到了很深的程度。它由反对战争发展到仇恨任何形式的政治控制。从反对种族主义开始，进而对统治权力本身的存在提出疑问。从厌恶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和生活方式，迅速发展对商品制度的抵制；对环境污染感到恼怒，进

而厌恶美国的城市和现代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总之，它趋向于超越对社会的某一现象进行具体批判，而要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对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进行全面的反抗。

就这点而言，我们现在生活的时期非常类似于十八世纪席卷了法国的革命启蒙运动时期。革命启蒙运动彻底唤醒了法国人的觉悟，为1789年的大革命准备了条件。那时和现在一样，旧的制度在被群众的革命行动推翻以前，早就从下面受到了分子运动的侵蚀。这种分子运动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无法无天的气氛：人们越来越不顺从，与现存制度日益“不合”，在日常生活各个方面，人们试图冲破陈规旧俗，这看起来虽然“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却关系重大。事实上，当时的社会秩序已混乱不堪，社会风气一天坏似一天——这种情况最引人注目地表现在官方公布的不断增长的犯罪率上。人们对社会制度展开了广泛的批评——二百年前表现为启蒙运动，今天则表现为对一切事物的批判。这种批判态度渗入了下面，从根本上加速了分子运动。不论是以手势表示愤怒，或发动“暴乱”，还是有意改变生活方式，总之，愈来愈多的人开始自发地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对现存制度表示蔑视，他们对有组织的革命运动承担的义务并不比对社会本身承担的义务更多。

从其具体发展来看，这一社会解体的过程是由许多因素促成的。这一过程同所有其他革命运动一样，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充满了各种矛盾的。在十八世纪的法国，激进思想在严格的科学态度和轻率的浪漫主义之间摆动，自由的概念中既有明确无误而合乎逻辑的自我克制思想，又有模糊不清而出自本能的对自发行为的向往。卢梭和霍尔巴赫意见相左，狄德罗和伏尔泰意见相左，然而，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看到在革命的酝酿过程中，两者不仅互相超过对方，而且还互为因果。

今天，同样存在着不平衡的、充满了矛盾的酝酿过程。在许多

情况下这一过程是沿着笔直的道路发展的。“垮了的一代”使五十年代牢固的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出现了巨大的缺口。和平主义者、民权主义者、抵制征兵者和蓄长发者的非法行为，则极大地扩大了这一缺口。对此，具有反叛精神的美国青年人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以各种形式充分肯定了自由意志和乌托邦。他们要求不受限制地表示性爱，把建立公社作为奋斗目标，鄙弃商品和货币，相信互助的力量，并尊重自发行为。尽管革命者可以很容易地罗列出一些采取这种个人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包含的危险，但事实依然是，这种价值观对于形成目前的蔑视法律和道德、尊重自发行为、充满激进主义的自由气氛，起了决定性的准备作用。

革命启蒙运动和我们时代的第二个相似之处是，下层民众，即所谓“暴民”成了对社会表示抗议的主要工具。公众表示不满的制度化了的典型方式——在我们的时代，是有秩序的选举、游行示威及群众集会——趋向于让位给民众的直接行动。从前是在现存社会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人们预料得到的、组织严密的抗议活动，现在人们则以社会无法接受的（甚或反对社会的）形式进行分散的、自发的、近乎暴动的袭击，这反映出民众的心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暴乱者”开始同历来使民众和现行秩序结成一体的那些根深蒂固的行为准则决裂，尽管这是出于直觉的部分决裂。他们竭力摆脱已在人们头脑中扎根的权力结构、长期形成的条件反射以及由内疚心理造成的顺从。同害怕警察和拘留相比，内疚心理可以更为有效地把人们拴在现行制度上。社会心理学家认为，采取直接行动是个人屈服于被称为“暴民”的可怕集体的结果。事实同这种观点相反，“暴乱”和民众采取的行动表明民众正在开始摸索怎样走向个性解放。民众正开始抛弃那种由资产阶级家庭、学校和宣传工具培植出来的千人一面的、机械的行为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众正趋向于个性化。而且，民众所采取的行动表明，他们重新发现

了街巷的意义，力求解放街巷。最终，还是要在街巷上消灭权力：这既是为了街巷，也是为了解放它们所作出的努力。最终，人们还是在街巷上熬苦日子，还是在街巷与权力相遇并与之斗争，因而要改变的是街巷，使其成为人们可以享受、创造和充实日常生活的场所。民众造反不仅标志着个人反抗开始自发地演变成为社会反抗，而且标志着个人反抗开始触及日常生活问题。

最后，正如启蒙运动时期那样，我们现在也看到正在出现一个人数众多并不断扩大的失去社会地位的阶层。它是由社会各阶层游离出来的人组成的。我们时代里经常负债和在社会上没有保障的中产阶级，大体上可以同法国革命前经常无力还债和地位不稳的贵族相比。那时也象现在这样，出现了大批漂泊不定的受过教育的人，生活漫无目的，没有固定职业或固定的社会根基。在上述两种结构的底层，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量陷入贫困的人——无赖、流浪者、半失业者或失业者、危险的难以控制的“无套裤汉”——依靠政府救济和捡垃圾过活，他们是巴黎贫民窟和美国黑人区的穷人。

所有相似之处已如上述。然而，法国启蒙运动是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进行革命过渡——这两个社会都建立在物资匮乏、阶级统治、剥削、等级制度和国家权力的基础上。十八世纪人民的日常抵抗活动虽然最终发展成为公开的革命，但很快便被新出现的工业秩序——以及赤裸裸的暴力镇压了下去。人数众多的失去社会地位的人和无套裤汉，大多被吸收进工厂，被工业纪律驯服了。过去没有立足点的知识分子和漂泊不定的贵族，在新的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结构中找到了固定的位置。社会再次从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变化不定、其结构和关系极为松散的情况，强化成有严格的、特定的阶级和制度的社会——典雅的维多利亚时代不仅出现于英国，而且或多或少地出现于整个西欧和美国。评变成了辩解，造反变成了改革，失去社会地位的人们变成了划分

得清清楚楚的阶级“暴民”变成了选民“暴乱”变成了我们称之为“游行示威”的秩序良好的列队行进，自发的直接行动变成了选举活动。

我们的时代也是一个过渡的时代，但是有根本的和新的不同之处。在最后一次大起义中，法国大革命中的无套裤汉高喊的口号是“要面包，要 1793 年宪法！”美国贫民窟里的黑人无套裤汉起来斗争时高喊的口号则是，“黑人是美丽的！”“要爱，不要战争”。在这两个口号之间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变化。十八世纪的失去社会地位的人们是在农业时代转向工业时代的缓慢过渡中出现的；他们是在一种奴役制度转向另一种奴役制度的历史过渡中产生的。在有产社会的演变过程中，任何时候都可以听到要面包的呼声。二十世纪新的失去社会地位的人们则是由于以奴役为基础的一切社会形态的崩溃而产生的。他们是有产社会发展进程本身和物质至上主义的最终产品。在技术进步和自动控制有可能消除人剥削人的现象、苦役和任何形式的物资匮乏时，“黑人是美丽的！”“要爱，不要战争”的口号标志着传统的对生存的需要已转变成一种有历史意义的对生活的新的要求。今天美国各种社会矛盾的根源，是要求有一种完美的、平衡的、全面的生活方式使人的全部潜力得以发挥。总之，今天美国革命的潜力，存在于人类本身的潜力中。

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在最大胆的乌托邦思想有可能实现的历史关头，一百五十年来的资产阶级化过程正在被打破，资产阶级的一切制度正在被摧毁。而且，除了官僚主义制度和国家资本主义，现行的资产阶级秩序拿不出别的东西来代替已被摧毁的传统的资产阶级制度。在美国，这一进程正在十分引人注目地发展。在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里，“美国的梦想”也即美国的神话破灭了，根据这一神话，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商品关系之上的物质丰富，可

以掩盖资产阶级生活固有的贫乏。这一进程将发展成为革命呢，还是会逐渐趋向于消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革命者是否能提高社会觉悟，是否能保护革命发展的自发性不受“左”的和右的集权思想的干扰。

24. 法律的阴谋

霍华德·吉恩

法律经常把其他人当作阴谋者来加以迫害，因而说法律本身是阴谋，当然具有某种讽刺意味。而且，使用阴谋这个词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它可以使人联想到集体意志，使偶然的事件具有计划性。法律的阴谋同人的阴谋的区别在于，人不是策划者而是执行者；人并不制订全盘计划，但其行动却可能导致某些相同的结果。

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人类已丧失其目的，但每个人却有其各自的目的；社会结构在其形成过程中容纳了人们各种各样的动机，这些动机变为行动时便产生了一些很有规律的结果。我们熟悉其中的某些动机。马克思、韦伯、米歇尔·哈里·斯塔克·沙利文在这方面给了我们一些指教：人们在商业中追求利润，在政治中追求权力，在官僚机构中追求效率，追求“其他重要人物”的支持。所有其他人的动机是适应社会的需要，争取获得合法地位。这种社会需要把现代社会中复杂多样的要求变成了一种简单的模式，即服从法律。如果人们按照这一模式行事，一切都将照旧。

因此，我使用“阴谋”这个词含有阴谋会导致有计划的结果这一层意思。“有计划的”这个词可以避免陷入极端，以防人们误认为所导致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使用“不可避免的”这个词已招致猛烈的攻击。马克思遭受的攻击尤为猛烈。‘有计划的’这个

词表示某些事物具有强烈的倾向性和一致性。我使用这个词还为了表示在我们现在复杂的制度中还有人的因素，同时突出个人必须承担的责任，尽管人们处于分散的状态而且被分成不同的等级。否则，就会把这种制度看作是无可驯服的怪物，而认为人类处于无能为力之地。实际上，这一制度的“意志”是由我们的行动执行的。要挫败这一制度的意志，同样需要我们的行动。

批评社会（以及社会的主要管理者）的激进分子有时相信“阴谋说”。这一学说指控社会中的一些人阴谋反对另一些人。极端分子之所以相信这一学说，是因为他们敏锐地觉察到现代社会中的某些现象——战争、种族仇恨、政治迫害、贫困以及异化——经常出现，从而错误地得出结论说，一定有人在搞阴谋。作出这样的结论使我们失去了潜在的盟友，因为他们怀疑是否确有证据证明有人在搞阴谋；它还使朋友误入歧途，因为它使他们的矛头对准某些阴谋家，而不是对准更大的结构上的缺陷。（如果说有人不愿夸大罪恶的话，那一定是南非的黑人，有一次我听到一位来自约翰斯堡的黑人说，“我不愿夸大我们的恶劣处境，因为这会使我误入歧途。”）

因为我没有用通常的方法来给“阴谋”下定义，也就是说没有指出它是否违反法律，所以我必须在法律范围以外寻找搞阴谋的目的。我发现搞阴谋是违反道德目标的。这里提一句，下面我将论述人们在享受生活和自由以及追求幸福方面的平等权利，并说明法律是如何阴谋反对这种权利的。

虽然享有平等权利仍处于不成熟的试验阶段，但它比“法治”要好，因为我看不到法治中有道德内容。一些表面上看来稳定而且具有内在道德力量的事物，实际上并不十分可靠，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法治”带来某些方面的安定，实际上是以牺牲其它方面的安定为代价的：牺牲国际来为国内，牺牲个人来为社会；或者正如我

们所看到的，法治带来的“和平”是用动乱换来的。

我们往往过高地估计西方在封建时代以后实行的现代化（工业化、都市化、科学、人道主义、教育、议会政治）带来的好处，在这同时我们便夸大“法治”取代“人治”的好处。在历史上，人们对大宪章、美国宪法和拿破仑法典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尊敬，其原因是，大宪章规定了人们对帝王拥有的权利，美国宪法明确了（而且被认为是限制了）政府对人民拥有的权力，拿破仑法典统一了法国的法律制度。拿破仑在1807年写给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的信中说，“贵王国的宪法将用明智而自由的管理‘取代’普鲁士的专横统治”并敦促他“作一个遵守宪法的国王”。历史学家罗伯特·帕尔默和乔尔·科尔顿在《现代世界史》一书中评论拿破仑的话，与我的看法不谋而合：“尽管他是骑在马背上的人，他仍然坚信法治。”

据认为，在现代，专横的人治已被客观而公正的法治所代替，但这并没有根本改变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状态。过去怎样（剥削男人和女人，将年轻人送去打仗，把不安分守己的人送进地牢）现在依然怎样，只不过现在不再是封建领主或国王独断专行，而是拥有了中立的、与个人无关的法律的权威。实际上，由于这种非人格化，现在可以在更加合法的外衣下，对人民更加肆无忌惮地实行暴政。法治可以比神授王权更无情，因为谁都知道，国王毕竟也是人，即使在中世纪，人们也承认国王不能违反自然法。（参看奥托·吉尔基：《中世纪的政治理论》注释 127—134。）法典较之现实的君主政体更容易遭到反对；在现代，实在法具有自然法的特点。

在人治的情况下，敌人很容易识别，因而起义的农民驱逐领主，奴隶杀死庄园主，激进分子刺杀君主。在公司和代议制的时代，敌人很隐蔽，很难识别，即使对于激进分子来说，无政府主义者贝克曼企图暗杀工业家弗里克，也是一种越轨。在《愤怒的葡萄》

一书中，那个被赶出了家园的农民，向推倒他房屋的拖拉机手胡乱打了一通枪。他知道拖拉机手的背后是俄克拉荷马城的一个银行家，俄克拉荷马城的银行家背后是纽约的一个银行家，但他喊道：“下一个我该打谁呢？”

现代社会中的“法制”并不比以往社会中的“人治”民主，它同从前一样，强行分配财富和权力，但现在采取了非常复杂和间接的方法，使旁观者迷惑不解；旁观者从一个原因追溯到另一个原因，最后只能在迷宫中老死。过去是直接统治，现在是间接统治。过去是个人统治，现在是非个人统治。过去一目了然，现在则神秘莫测。过去农民把自己的一半产品交给领主，这显然是剥削，现在则由复杂的市场社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法令进行剥削。在维斯塔自愿者电影公司最近出品的一部电影里，一个年轻人问阿巴拉契亚的一个矿主为什么煤矿公司只交那么少的税，自己留下那么多非法利润，而让当地人民挨饿。矿主回答说，“我完全是按照法律纳税，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

君主的直接统治已被议会的间接统治所代替，起作用的不再是一时的冲动和圣旨，而是编集成典、写成文字的宪法和法令。卢梭清楚地看到了代议制的局限性，他说：“权力是可以转让的，但意志却无法转让。”并说：“英国人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但他们的这种看法完全错了。……一旦选举结束，他们便又回到了受人奴役的状态，因为他们什么也不是。”他说：“实行代议制的想法，来自封建制度这一邪恶而荒谬的统治形式。在封建制度下，人是卑微而不光彩的。”

法律的阴谋出现于有文字的时代，并竭力利用文字的力量。因而伪善这一通过符号交流人类赠送给世界的礼物，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殖民制度下，蒙蔽和庇护是次要的控制形式；最主要的是暴力。在现代自由资本主义（应该指出，还

有国家社会主义)世界,暴力则是预备性手段,正如弗朗茨·范农在《世上苦人》一书中所说的“现在主要是依靠大批讲授伦理道德的教师、律师和其他具有欺骗性的人或物来把被剥削者和当权者分离开来。”在大批具有欺骗性的人或物中,最具有欺骗性的是法律书籍。

历史(它现在已进入成年,到了该有自己信仰的时候)经常被人有选择地、为了某一政治目的而加以利用。至于我国的历史,我们吹嘘的常常是向“现代”转变的伟大过渡时期,从而模糊了非正义从古至今,从人治到法治的延续。只要于己有利,我们就完全无视历史。例如,我们谈论自由民主政体时,似乎它真是那么纯洁无瑕,产生于人们之间的某种崇高的契约,而不是产生于雄心勃勃和勇于冒险的革命者的流血斗争。大卫·休谟试图消除人们的错误思想,他说“现存的几乎所有政府以及有记载的所有政府,其建立或者是依靠篡夺权力,或者是依靠征服别国,或者是二者并用,没有一个是借口人民完全同意或者自愿服从的。”(《论原始契约》)休谟还简洁有力地驳斥了苏格拉底的这种说法,即我们有“义务”服从所在国的法律,因为国家是建立在某种神秘的原始“契约”上的。休谟说:“因此他(柏拉图)才认为保守党必须服从辉格党,因为辉格党是建立在原始契约上的。”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特点是,到处出现骚乱。即使没有其他的证据,这也使我们怀疑美国究竟是不是“自由世界”的领袖,使我们对其巨额的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使用得是否合理提出疑问。我们不需要倾听激进分子的批评,而只需看看政府的报告及其它并无恶意的材料,就可以证明我们的怀疑是有根据的:克纳委员会告诉我们,种族偏见是非常普遍和严重的;《统计摘要》告诉我们,四千万美国人在获取充足的食物和足够的住房上有困难;《纽约时报》告诉我们,石油公司依靠政府的

进口限额，每年可以从美国消费者身上榨取五十亿美元的超额利润；全国电视网报道了大量有关战争的情况，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山美事件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所犯下的累累暴行的一个突出事例。

过去也曾出现过全国性的抗议浪潮。但现在和过去不同了。过去的抗议是有局限性的，其矛头是指向健康社会中不健康的东西，并能很快得到平息。例如，宣布废除奴隶制后，废奴主义者便销声匿迹了，尽管还残存着半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经济形势的好转，以及威尔逊和罗斯福通过立法活动实行的改革，平息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人民党党员和激进分子的怒气。美一西战争铸成的大错渐渐被人遗忘后，反帝运动也就自行结束了。现在则是另一番情景：少数民族居住区的骚乱不是发生在不景气时期，而是发生在‘繁荣’时期；城市发生暴乱并不是由于有人滥用私刑，而是在国会刚刚通过一系列‘民权法案’之后；人们开始是反对越南战争，后来便反对所有的军事政策；尽管是自由派（肯尼迪和约翰逊）主持白宫事务，人们仍对政治制度日益丧失信心，正是在‘华伦法院’时代，在它扩大诉讼权利时，人们对司法制度所抱的幻想破灭得最厉害。

总而言之，不满的对象不再是非常事件、不景气、私刑、某一特别残酷的战争、萨西柯—范齐塔案件，而是美国社会的正常活动。贫富问题不再是困难时期的问题，而是繁荣时期的问题。种族问题不再是南方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战争问题不再只关系到某一具体的军事冒险，而是关系到整个对外政策。政治问题不再只涉及保守的共和党，而且也涉及开明的民主党。受到仔细审查、批评和攻击的，不再是标准的东西，而是美国文化中离经叛道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目前的抗议运动如此重要，为什么它不会消失，为什么它或者将进一步发展或者将被惊恐万状的当权者镇压的原

因。

当社会的正常运转产生贫困、种族歧视、对外扩张、不公正和寡头政治时——当这个社会是正常地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法律运转时——这说明出毛病并非是偶然事件，并非是由于违反了法律和常规，相反，毛病就出在法律制度本身，是通过法律制度起作用的。

历史告诉我们，偶然出毛病的看法是错误的，现在困扰着我们的社会弊病已存在了几百年之久。美国财富的分配不均可以追溯到殖民时代；培根的造反”契约苦役”以及十九世纪的劳工斗争，所有这一切都证明阶级矛盾贯穿于我们的全部历史。最初是在十七世纪的弗吉尼亚和佩科特战争期间，虐待以至屠杀黑人和印第安人，随后便是奴役和消灭大平原上的印第安人，再后来便是屠杀底特律市阿尔及尔汽车旅店里的黑人。1789年通过了扰乱治安惩治法，1968年通过了拉普·布朗法令，这些法令使政府有权在紧急情况下监禁示威者。越南战争只是我国由来已久的侵略扩张活动中最近的一例，最初我们只占有大西洋沿岸的一个狭长地带，在我们的氢弹则指向世界各个角落，我们的士兵遍布全球。

所有这一切不仅不违反法律，而且符合法律，处处是在按照法律办事。这些罪恶行径并不那么容易辨认，并不是不间断地、一个接着一个地发生的。如果很容易辨认，而且是连续发生的，我们也许早就看透其实质了。国运的时盛时衰、时进时退以及“好”年景和坏年景、“自由党”领袖和保守党领袖、战争和“和平”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交替，掩盖了上述罪恶行径中包含的制度方面的问题。我们被错综复杂的事态弄得喘不过气来，最后只好相信我们的制度基本上是好的（它待我们这些有时间进行思考、有时间高谈阔论、有时间舞文弄墨的人确实很好）。现在我才猛醒过来，才认识到，问题不仅仅在于“坏”年景、坏”领导”和“坏”战争”而在于整个血腥

的制度，它运转顺利和不顺利与问题无关。

我们对凭运气的事一向很天真；不是么，我们既有萧条时期，也有繁荣时期，既有战争时期，也有和平时期，既有遭受政治迫害的时期，也有伸张正义的时期，既有滥施私刑的时期，也有民权得到保障的时期。用库尔特·马尼古特的话来说，“事情就是这样的。”这就象轮盘赌，有时赢有时输，有赢就有输，有输就有赢。确实，谁也没法预料那个小球落入红槽还是落入黑槽，对此谁也不负有真正的责任。但在轮盘赌中，你最后几乎总是输。你之所以不怀疑有人在搞阴谋，是因为有那个“几乎”（毕竟有人有时还赢过），同时还因为你可以自由旋转那个轮盘——只有纵观整个历史，才可预测大致的方向。

社会结构方面的问题也是如此。我们经历过许多改革时期，许多和平时期，对麦卡锡主义也作出了强烈的反应，这些足以说明那个“几乎”是有其实际意义的。而且每一事件本身似乎只是个人决定、集团冲突、个人怪癖和试验摸索的产物，没有一个全面的目标或计划。只有观察其结果，才可看出其模式。

如果所表现出来的模式正如我所描述的那样，那么这种模式将在我们对法律所采取的态度上，以及我们是否愿意服从法律的问题上产生重要的意义。许多人反对在美国搞非暴力反抗（指拒绝遵守政府法令，拒绝纳税等。——译者的理由是：我们的社会本质上是好的，尽管某一项具体的法律或某一件事可能有错误或办得不妥当。例如在《法律与哲学》这本论文集中，约翰·罗尔斯一开始就宣称：“至少在象我们这样的社会里，我们有道德上的义务服从法律”只要“法律秩序是符合宪法的、民主的”。在同一本论文集中，门罗·比尔兹利劝人们不要违反法律，因为“每个人都同整个法律结构利害攸关……”去年，约瑟夫·邓纳在提交给美国政治科学学会的一篇文章中写到：

我认为，尽管在专制制度下，人们通常不仅有道德上的权利而且有道德上的义务进行非暴力反抗，但在民主国家鼓吹并进行非暴力反抗，非但不能“对法律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反而很容易被集权主义者利用来蓄意摧毁民主制度，建立起他们自己的残暴统治。

这便是大多数美国作家在谈到非暴力反抗时提出的论据，即：美国是“实行法治的民主国家”，应作特殊情况看待。他们认为美国的法律大都是好的，因而必须尊重法律，不得进行非暴力反抗。

由此看来，是否应进行非暴力反抗，最重要的是看社会的实际情况如何。休谟正是依据社会的实际情况向苏格拉底提出挑战的。苏格拉底决定服从雅典的法律，是因为他认为，雅典人愿意留在他们的社会里这件事本身表明，他们享受到了好处，否则他们可以随时离开自己的国家。休谟争辩说，“当一个贫穷的农民或工匠不懂任何外国语言，不熟悉外国的风俗习惯，而只有微薄的收入时，我们能够说他可以自由离开自己的国家吗？”

对于我们来说，对实际情况的感受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总是得意洋洋地说享有“民主”我国的制度和其他国家的制度具有天壤之别，因而应该对法律和反抗采取与别国不同的态度。对于这种轻率的结论，现在还不是加以重新考察的时候。这里我所要说的是，若拿我国的实际情况同民主理论和政治上的花言巧语作一比较的话，则根本没有理由对法律卑躬屈膝。相反，纵观我国的历史，大多数法律总是从变化无常的方式维护不公正的世道。法律以及伴随着法律的“法治”究竟是怎样维持不公正的世道的呢？下面我将列举它所使用的一些方法。

1. 我们被要求无条件地支持法律制度，但法律制度这一概念掩盖了各类不同法律之间的差别。从小学一、二年级起，我们就知道了人权法案和其他法案中规定的公民权利，学校的大肆灌输使我们相信公民权利是我国法律中最重要的部分。每当我们想到

“尊重法律”时，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法律中有关权利和自由的这些仁慈的规定。但我们对法律了解得太少了，以致不知道还有大量有关国家财富的法律，如税法、拨款法（既有联邦一级的又有地方一级的）以及无数旨在维护现有财产制度和现有财富分配制度的法律。人们只要看看法学院课程表，看看学生们攻读的课程名称：“财产”、“合同”、“公司法”、“民事侵权行为”就可以了解我们的法律制度在维护现行经济制度上花了多大的力量，尽管这个制度浪费惊人，不平等现象极为严重。

1791年人权法案生效时为此着实大大地宣扬了一阵，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大约在同一时候提出来的经济方案，则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多大关注。人权法案长期以来只不过是一种宣传品，但汉密尔顿的征收关税、承担债务和建立国家银行的方案公布以后，便开始了通过联邦法律为富人建立福利制度的漫长历史。（关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政府利用法律资助大企业的许多方法，参看查尔斯·比尔德1932年的论文《粗鲁的个人主义神话》）。从汉密尔顿的“关于制造商的报告”到目前的石油损耗补贴，联邦法律的这种维护富有者利益的倾向始终没有改变。

不仅法规的数量是重要的，而且法规的效力也是重要的。一条法律或某一宪法条款的存在，并没有告诉我们它具有多大的效力。它是（象征收关税的法律那样）立即生效呢？还是（象宪法第一修正案那样）在适用于任何人之前需要打很长时间的官司，花费大量的金钱，并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它是（象承担债务的法律那样）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呢，还是（象“国会不得制定法律来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条款那样）被人忽视？

共和国建立之初的情况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点。宪法第一修正案毫不受人重视，生效还不到七年国会就于1798年通过了扰乱治安惩治法。该法案完全剥夺了人们的言论自由，有十个人只因为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就被关进监狱。由此可见，宪法第一修正案当时并没有得到实施。另一方面，对威士忌酒征收货物税（为了实施承担债务的计划，需要用税款来偿付富有的公债持有者）的法则得到了有效的实施。1794年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小农户起来反对征收这种货物税时，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亲自率领军队将他们镇压了下去。政府总是强制实施那些它认为需要实施的法律；这便是美国法律传统的一部分。

通常的观点认为法律制度可以使我们免于陷入无政府状态，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法律，或者通过它们的规定（当具有有关的法律时）或者通过它们的许可（当没有有关的法律时）造成了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它们或者允许或者出钱帮助对自然资源的肆无忌惮的掠夺；它们允许，甚至鼓励生产危险品——毒药、枪支和炸弹。用国家的巨额财富生产武器或毒品，并不违反法律，相反，这是依靠一系列法律和法令完成的。

2. 法律制度这一概念还掩盖了各类法律之间的另一种差别：一些法律是保护我们的人身不受伤害的，另一些法律则是保护财产不被盗窃的。当我们被告诫不要破坏法律制度时，我们通常想到的主要是法律保护我们不致遭到攻击、强奸及谋杀。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实施法律都是为了保护财产而不是为了保护人。迄今为止，大多数犯罪行为都是针对财产而不是对人的。（1966年，侵犯人身的案件为十二万件，而侵犯财产的案件则为一百六十七万件。）

一些事情的重复出现，经常提醒我们执法的重点所在——财产比人更重要：警察常常开枪打死小偷（一个人通过限价而榨取一百万美元决不会遭到人身伤害，但一个小孩如果偷了五美元而拔腿就跑的话则有被开枪打死的危险）抢劫案发生后，警察的汽车在疯狂的追捕中常常打死或打伤群众（根据最近提交给美国医药协会的一份报告，每年有五百人死于警察的追捕中）。

实施法律严格与否取决于是谁遭到攻击以及侵犯财产的性质。1970年2月的同一天,《波士顿环球报》报道了两个审判结果。在一个案件中,警察承认在底特律的阿尔及尔斯汽车旅店杀死了两个黑人,因而被控共谋剥夺这两个人的人权,但判决却是无罪。在另一案件中,得克萨斯州的一个人从干洗店里偷了七十五美元,则被判刑一千年。

我们的法律制度主要是用于维护社会的现存财富分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财富的分配不是依据需要,而是依据权力和随机应变的能力。刑法主要不是用来保护普通人的人身安全,而是用来惩罚那些在实利社会中行为过于外露以致违反比赛规则的人。侵犯财产罪是私营企业制度特有的一种现象。

3. 把法律制度看作是一块铁板,掩盖了法律是针对激进分子的这一事实。法律制度的建立尽管表面上是为了保护整个社会,实际上却是试图保存现有的政治经济制度。1917年的反间谍法(甚至其名称也具有欺骗性,使人们认为其目的是保护整个社会)试图防止人们向士兵或未来的士兵灌输某些思想,这些思想不利于他们执行作战任务。该法案回避了这样的问题,即进行战争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幸事还是祸事。

史密斯法案禁止人们以暴力推翻政府,认为政府怎么也不会坏到要用暴力来推翻的地步。征兵法案认为征兵是为了保护我们大家,可实际上它却为了另一些人的利益而让我们的孩子去送命。这只是一小部分法律,但是它人们对人们行使抗议权利产生的心理影响怎样估价都不为高(例如人们常说这样的话:“留神脚下,否则会……”)。这种法律可以随时用来镇压持不同政见者。芝加哥市最近对所谓“阴谋案件”的审判就是一个例子。

4. 我列举上面三个差别目的是说明人们的习惯看法是如何维护法律制度,把法律制度看作是仁慈的保护伞,而没有看到不同

的法律是为不同的目的服务的。一些较为有理由存在的法律（如保护言论自由的法律、惩治强奸罪和谋杀罪的法律）只是堂皇的门面而已，其背后是大量维护现存财产和权力制度的法律。在这些法律中有些是用来对付那些试图以有组织的方式推翻现存制度的人的。

除上述三种差别外，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差别，就是行为准则和产生于某种特定社会秩序的准则之间的差别。前者是任何社会秩序中的人们若要和睦地、符合正义原则地共同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后者则是某一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H. L. A. 哈特在《法律概念》一书中曾谈到所谓“首要义务准则”，其中包括不随意使用武力；积极为社会服务，为人类的共同生活作贡献”。这些准则不是用现代社会的强制手段来实施，而是“依靠人们对自己的标准行为方式采取的普遍看法来实施”。

巴枯宁把产生于人性的“自然法”和诸如继承法这样的“审判法”区别开来。哈特同巴枯宁的分歧在于，他认为较为复杂的社会需要有“次要准则”。我认为，虽然哈特有关次要准则的看法未免过于轻率，但他的功绩在于他把首要准则和次要准则区别开来，由此我们可以比他更为仔细地研究一个社会，甚至于一个现代社会是否有可能由首要准则来支配的问题。认识到这二者的不同，可以使我们摆脱现存社会制度的束缚，看清哪些法律是必需的，是符合人性的。我们既可以回顾原始社会（象哈特所做的那样），又可以瞻望未来的理想王国。任何一种文化的思想意识都企图抹杀人类所必需的法律和使现有文化永存的法律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5. 人们认为“服从法律”是天经地义的事。哲学家的语言也许更为贴切，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作人们在思想上对法律负有“义务”）但被要求服从法律的所有公民并不晓得。政府官员拥有很大

的权力来决定谁可以违反法律，谁不可以违反法律。有人不履行义务什么事也没有，另一些人不履行义务则会立即受到惩罚。

这一点在涉及种族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我说政府有选择地实施有关种族平等的法律时，我指的并不是南方而是指联邦政府。在南北战争以前，联邦政府根本不理会禁止输入奴隶的法律，但却派遣武装士兵实施逃亡奴隶法（例如在波士顿引渡安东尼·伯恩）。自 1871 年以来，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法令，使联邦政府有权控告那些侵犯黑人人权的人，但每一个总统，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从哈代一直到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富兰克林·罗斯福、约翰·F·肯尼迪以及林登·约翰逊都拒绝为黑人使用这个权力。举例来说，在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任职期间，1961 年至 1962 年乔治亚州的奥尔巴尼发生了一系列侵犯黑人人权的事件，但联邦政府只对其中一个事件提出了起诉——指控奥尔巴尼民权运动中的黑人和白人对当地的一个商人布置了纠察线。

法律实施的不平等不仅在种族问题上极为明显，在经济问题上也明显得很。公司违反了法律无人过问或只是受到温和的指责；通用电气公司通过限价活动从消费者手中骗取了数百万美元，但受到的处罚却很轻。涉及到有权有势的人时，情况也是如此。例如在军队里，1966 年驻西贡的一个美国陆军上尉被发现犯有倒卖进口丝织品、军用飞机和国库支票罪，但却获准退休享受养老金；另一方面，1968 年许多士兵围成一圈坐着高唱“我们一定胜利”，抗议旧金山一个兵营里的条件，却被判处几年苦役，罪名是“兵变”。有选择地实施法律并不违背法律，而是合法的。

6. 公众所不了解的另一情况是，当他们被要求严格遵守法律的时候，执法机构本身正在违反法律。这包括联邦调查局窃听电话的活动（该局的特工人员有时在法庭上供认不讳），以及各地经

常发生的警察殴打人以致谋杀人的事件。

7. 报纸杂志偶尔揭露我们社会中的一些‘贪污’行为 往往激起人们愤怒地谴责那些为了满足私欲而违反法律的政治家和商人。但公众却不知道，法律在分配财富和权力时犯有更为严重的贪污罪。例如，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大谈特谈哈定执政时期“茶壶大厦”内发生的丑闻及其它法律上的鬼把戏，而忽略了通过税收法令（提出这些法令的是财政部长安德鲁·梅农，由柯立芝执政时期的国会批准）对财富和权力进行的合法的、严重得多的（不但由于其规模 而且由于其持续性）再分配。

同样 报纸大肆报道亚当·克莱顿·鲍威尔虚报工资单的事，却只字不提政府通过与通用动力公司和洛克希德公司签订合同，并通过大量补贴象詹姆斯·伊斯特兰和赫尔曼·塔尔梅奇那样的穷农民而合法盗用公民钱财的事。最高法院的一个人选由于有不忠于法律的嫌疑而遭到了否决，另一个人选则由于效忠于法律而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司法委员会的批准，尽管此人的品行不如第一个人。人们忘记了问题在于轮盘的结构，而不在于偶然出现的不公正的管钱人。我们周围发生的一切是法律制度本身造成的，而不是偏离法律制度造成的。

8. 法治无论其效果如何，总还受到国界的限制。由于国际法的力量比国内法的力量小得多，因而在实施国际法方面具有更大的选择性。人们密切注视的往往是合同的履行和对被没收财产的补偿，而不理会禁止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法，就象在越南发生的事情那样。尽管国内还有那么一点点秩序（当然是非正义底下的秩序）但国际上却既没有秩序 也没有正义。

9. 与我们文化中的法律密切相关的是，人们在思想上总是喜欢连续持久而厌恶瞬息万变，喜欢坚固稳定而厌恶左右摇摆。格尔在《权利哲学》一书的序言中要我们象承认自然的合理性那

样承认国家的合理性，而不忍心让我们大家听凭“命运摆布，沦为被上帝抛弃的人”。但“合理性”的这种诱人性质掩盖着阻挠变革的动机，实际上是要“法律和秩序”不要改革和革命。因而，黑格尔痛斥了他的同事 J. F. 弗里斯在一篇有关国家的演说中阐述的观点。弗里斯教授在那篇演说中说，“如果人民被真正的公社精神所支配，那么履行所有社会义务的热情就会来自底层，来自人民自己。”弗里斯曾因为参加 1817 年瓦特堡联欢节而受到过德国政府的惩罚。黑格尔著作的译者 T. M. 诺克斯评论说，“瓦特堡联欢节实际上是一种大规模示威，要求德国实现统一，实行施泰因的改革。黑格尔虽然支持德国的统一和改革，但是他认为群情激昂的示威并不能代替思考，而只会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和无政府状态。”

虽然要求持续性及合理性有一定的道理，但另一方面，这种要求也具有法律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自然倾向（从其最好的方面而言），即它代表的往往是过去的情况和过去的要求。正如理查德·沃塞斯特罗姆教授 1968 年 7 月在全国律师公会上的发言《律师与革命》中所指出的：“法律的保守性正如语言的保守性一样。它企图同化一切已经发生的事情和尚未发生的事情。”在人们迫切要求变革的时代，法律所固有的这种缺陷便显得特别明显。毫无疑问，人们应该按照得自长期经验的规律和原则办事，而不是只凭一时的兴致。但是，这种经验决不应成为绝对的经验；相反，应该根据新的实际经验不断予以补充。

在过去与现在的关系问题上，尼采是比黑格尔更好的导师。尼采的下面一段话见《对历史的利用和滥用》一书，似乎是针对黑格尔说的。尼采说，“那些受过历史教育、盲目相信世界进程的人，只知道象过去那样生活下去，爱过去所爱的，恨过去所恨的，读过去所读过的报纸。对于他们来说，唯一的罪恶就是不象过去那样

生活。”

10. 维持现存的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状态，既不需要违反法律，也不需要法律采取什么激烈举动。只需要法律在原来的基本结构内更新内容，扩大范围，但基调必须与原来一样，虽然允许改革，但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在法律成典时期（在美国即是制定宪法的时期），现代生活的基本形式已经固定：不合理的生产体制由商业利润来推动，政治权力集中在议员手里，司法权力集中在文职官员手里，传播和交流思想的大权掌握在学校、教会及富人手里。从那时以来，法律制度只是在不断完善，在其弹性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缓慢的改革。正如麦迪逊所预料的，法律制度通过政治代表制冷却了任何可能出现的对于暴乱和变革的狂热，压制住了无产者的“愤怒”。在基本结构已经固定的情况下，法律制度可以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宽宏大量，宣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阿纳托尔·弗朗斯的话现在仍然有效，“法律对任何人都具有同等的威严，它既不允许富人也不允许穷人沿街乞讨或在公园里睡觉。”

11. 上面我谈的是立法机构如何通过法律，行政机构如何执行法律。当法律出现在法庭上，由法官、陪审团、律师和警察局长加以运用的时候，它已受尽了上述种种社会磨难，以致法官还没有出庭，就可能出现不公正。在司法过程的内部，所有内在的正常的法律机制都是为了加强已经颁布的法令。

还需要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法官。那令人敬畏的黑长袍掩盖了他们是通过地方政治中最肮脏的途径或政治委派当上法官的事实。如果在最高法院中出现任人唯亲的现象（杜鲁门和文森，肯尼迪和惠茨·怀特·林登·约翰逊和阿贝·福格斯）那么在作出大多数判决的地方法院，这种现象肯定更为严重。

法官就是法庭的最高统治者：由他决定陪审团的组成；决定哪些证据可以接受，哪些证据要加以排除；哪些人可以出庭，哪些人

不能出庭；陪审团应该听什么，不该听什么；律师必须遵行什么样的原则；甚至被告可以雇用什么样的律师；陪审团作决定时应注意些什么。他既可以驳回一个案件，也可以诱使陪审团对某一案件作出有罪的裁决。他出身于中产阶级或上流社会，毕业于法学院，是私人俱乐部的成员。他的思想陈旧，环境有限：一套舒适的公寓房间、一所乡间别墅和法庭本身。充满了痛苦和反抗的世界只是他的窗帘上一个吓人的黑影。在《白垩园》这出戏中，退庭的老法官望着坐在席上的法官若有所思地说：“那法官脸上的皱纹是法律绘成的而不是生活绘成的。”

法律大都是由地方上制定的。除极少数例外，大多数法律都具有狭隘的地方色彩，充满了阶级偏见和种族偏见，以及对人民反抗的仇恨。波士顿的高级法官伊莱贾·艾德路曾对房客运动的一个领导者（此人帮助一户穷人——不合法地——搬入了一套空房间因此而遭到警察的殴打并被指控犯有强占罪）说如果他改变他的哲学，就把他关进监狱。这只是有名的法官干的世人皆知的侵犯人权的事，在其背后，不知有多少无名的法官对无名的被告作出的无名的判决，把多少人关进监狱并被人们所遗忘。

律师的社会学——同行间相互行方便，向法官谄媚以及同原告作交易——长得叫人无法细述。陪审团的社会学中包括有目的地挑选陪审团的成员，选中的往往是中产阶级人士，白种人，他们性情温顺，具有正统观念，抱有共同的偏见，而且大都是中年人或老年人。

美国的司法在经济方面有意从各方面——其中包括拘留、保释条件、审判、辩护律师的选择、判决、上诉的机会、假释的可能性等方面——歧视穷人的作法早已尽人皆知，这里无庸赘述。（上星期报上有这样一则报道：在纽约的一座监狱里，几十人因为付不起保释金，已被关押了半年至二年等候审判。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

已认为他们无罪的情况下，但无罪又有什么用呢？)

从市法院到州最高法院以至联邦法院，司法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基本实际情况变化很少，但是这却被一种庄严而古朴的气氛所掩盖，给一种根本没有人性的过程披上了一件令人肃然起敬的外衣。赫伯特·里德所描绘的英国的司法制度（见《无政府状态与秩序》一书中里德的文章《自由的锁链》）与美国的司法制度没有什么两样：

司法的独立性表现在各个方面。戴假发、穿长袍可以使律师的人性丧失殆尽，令人惊讶不止。律师在激烈辩护的过程中如果偶然摘掉假发擦拭额角上的汗水，我们便可以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正如一只乌龟突然离开了甲壳那样。关键就是那个甲壳，习俗与礼仪的甲壳抑制着生命的活力和跳动，抑制着它对光明的追求。

12. 主要的判决是在法庭外面作出的，是由把人们带到法庭上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作出的。这一点由于法院力图限制争论和判决的范围，从而尽量减少法院的判决对社会的影响而使人看得很清楚。这意味着，即使把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只是对如何处置某一拒服兵役的人作出裁决，而对另一重要得多的问题迟迟不作裁决，即越南战争是否合法？

这种态度在伦·福勒虚构的“斯佩伦塞安探险号”案件中得到了说明。探险船上的人曾集体决定牺牲一个人以使大家得救，而办理这一案件的法官拒绝对这一复杂的道德问题作出裁决，尽管他承认：“需要我们裁决的唯一问题是，这些被告是否触犯了法律，是否蓄意谋杀了罗杰·惠特莫尔。”

现实生活中持不同政见者的案件则不是虚构的。持不同政见者常被指控犯有一般的刑事罪，法官不许他们阐述其政治观点。（西奥多·蒙森说得好：“政治审判的公正无私如同圣母玛利亚的纯洁受胎可望而不可即。”转引自奥托·柯切米尔的《政治公正》

一书)。令人深思的是，莫斯科的一个法院和密尔沃基的一个法院在相隔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发生了两件相类似的事。在莫斯科，一些人因为在红场上散发反对苏联入侵捷克的传单而被捕，法官不许他们讨论任何政治问题：他说，唯一的问题是：他们有没有违反有关的法律？

同样，密尔沃基的法官不准烧掉征兵案卷的牧师解释他们的动机。他说 唯一的问题是：“被告是否犯有纵火和盗窃罪？”当一个证人谈到非暴力反抗的目的时，法官打断了他的话，以一种十足的审判者的口吻说：“那是问题的实质所在，你不配谈。”

我的论述至此已接近了尾声，当然也可以说是另一论述的开端。在需要革命变革、人类奋力挣扎以免于灭亡的时代，泛泛要求人们履行“服从法律的义务”是有害的。我们应该把服务于人类的法律和骑在大多数人头上的法律区别开来。我们应该抛弃可爱的抽象概念，而把目光集中在支配我们社会的法律制度的实际运转和作用上：即法律制度的社会学、经济学及对人类产生的后果。

通过冷静的思考我们会认为，在不公道的世界上必须进行非暴力抵抗。历史的证据，即我们周围的人民的实际生活告诉我们，这个世道确实是不公道的，而现存的法律制度却维持着这样一个世道。了解这一点仅仅是开始。我在这里反复强调对“法治”要采取适当的批判态度，目的只是使人们站在起点上，处于起跑的状态。现代文明在强加给我们不公平的法律的同时，也给了我们以理想。我们应该学会如何违反法律以实现我们的理想。

我们每个人，根据自己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临终之时都会为自己的一生作出正确的评价。在托尔斯泰的《伊万·伊里奇之死》中，那个规规矩矩、完美无缺、一帆风顺的地方法官伊里奇在弥留之际突然意识到，他虚度了一生，他的一生是那样无用和无聊。托尔斯泰是这样写的：

他突然想到：“也许我没有象我应该生活的那样去生活。可我老老实实 还要怎么样呢？”他心里说：“我当初要是知道活着为了什么该有多好啊！但那根本不可能。如果真的可以说我没有象我应该生活的那样去生活，那么或许可以找到其原因，但却不能那么说”。——于是他回想起他那遵纪守法、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一生中的许多事。